2024 年第 3 期　第 23 卷 总第 132 期

雲南大學學報

社会科学版

主　　管　云南省教育厅
主　　办　云南大学
主　　编　蒋　红
编 辑 出 版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印　　刷　昆明瑆煜印务有限公司
国 内 发 行　昆明市邮政局
　　代号:64–85
国 外 发 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代号:BM　1860
订　　购　全国各地邮局
出 版 日 期　2024 年 5 月 18 日
国内统一刊号　CN53–1176/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1–7511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云南大学敬宾楼 1210 室
邮 政 编 码　650504
电　　话　(0871)65031238　65032099
电 子 信 箱　yndxxb2222@163.com
定　　价　人民币 15.00 元

刊 名 题 字　启　功
创 刊 时 间　2002 年 8 月 28 日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廖炼忠

副主任　蒋　红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建军　杨立华　吴增定
张国庆　陆　韧　罗　刚
段吉方　蒋　红　傅永军
廖炼忠

目　次

执行编辑/宋琴琼　　编　务/东　陆　　封面设计/吴丰虎　　英文翻译/何昌邑

■ 马克思主义理论

005　陈红桂　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及其新时代创新发展

015　廖小明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与实践拓展

■哲　学

外国哲学

026　张励耕　存在一元论能否合理地解释空间的本质？

——以布拉德雷、西田几多郎和不二论吠檀多为例

036　贺　念，朱　葵　“美是那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

——论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美学的现象学阐释

中国哲学

048　李明书　从关怀伦理视角论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

——基于儒家义务论与儒家美德伦理学的反思

本刊已许可相关学术数据库出版发行机构在其所属产品及互联网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其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声明。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

■ 历史学

056 杨 毅，单旭东 回归史料本身
——图像证史问题的档案学思考路径及其反思

066 张清涛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社会学

076 吴晓燕 信义治理何以可能：信托制物业的实践与阐释

086 吴 波，周学馨 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建构与实证研究

098 沈 澈，党秀云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实践及逻辑

■ 法 学·管理学

107 丁国峰，寿晓明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法律风险及其规范化防控

120 刘 凤 数字赋能提升城市旅游绩效机制初探

■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135 高静毅 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论析

[期刊基本参数] CN 53-1176/C＊2002＊b＊A4＊144＊zh＊P＊1500＊2000＊13＊2024-05

CONTENTS

005 **CHEN Hong-gui** The Continuit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015 **LIAO Xiao-ming** The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and Expansion in Practice in Connection with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026 **ZHANG Li-geng** Does Existence Monism Reasonably Explain the Nature of Space? The Cases of F. H. Bradley, Nishida Kitarō and Advaita Vedānta

036 **HE Nian & ZHU Kui** "Beauty Is the Most Shiningly Visible and the Most Worthy of Being Loved(εκφανεστατον και ερασμιωτατον)": On Heidegger's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Aesthetics

048 **LI Ming-shu**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Teacher's Duty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Care Ethics: Reflections Based on Confucian Deontology and Confucian Virtue Ethics

056 **YANG Yi & SHAN Xu-dong** Return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A Reflection on the Use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rchival Science

066 **ZHANG Qing-tao** Interaction and Game: An Analysis of the 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Vietnam in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

076 **WU Xiao-yan** How Is Fiduciary Governance Possible?:Practi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ust Property Management

086 **WU Bo & ZHOU Xue-xin** Construc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n Aged Society and its Case Analysis

098 **SHEN Che & DANG Xiu-yun** Practice and Logic of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ecurity Services in Ethnic Areas of China

107 **DING Guo-feng & SHOU Xiao-ming** Legal Risks of th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and their Standardiz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120 **LIU Fe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Empowerment Promoting Urban Tourism Performance

135 **GAO Jing-yi** On 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及其新时代创新发展

陈红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　211106］

摘　要：革命文化在党领导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孕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得到与时俱进的赓续传承。革命文化产生发展过程彰显出刚柔相济的特点以及进步性与民族性的本质特征，呈现出深厚历史底蕴和丰富精神内涵。当前，革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国内国际形势、亚文化冲击、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等挑战，需要在直面问题中实现转型发展。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革命文化需要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明确自身定位，探索出具有可行性的创新性进路，激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从而展现出新的时代意蕴，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革命文化；“刚柔相济”；“变与不变”；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05－10

党领导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丰富精神内涵。大力弘扬革命文化，从中汲取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动力，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承载着红色传统、红色基因，熔铸于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贯穿近代中国历史，又随着时空演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实践中得到与时俱进地丰富与发展。然而新时代新征程中，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②]基于此，革命文化如何传承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已经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理论创新和实践伟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

收稿日期：2024－02－06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重点课题“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研究”（项目号：2023JSJG1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红桂，哲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24－425页。

②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华网，2023年10月8日。

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两个结合”方法，必然也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文化建设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行动指南。通过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新时代传承创新的革命文化将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深沉、持久的精神动力，并以新的内涵带给当代人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震撼，彰显出独特而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革命文化的产生及其特点

革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既是马克思主义出于理论拓展与完善的需要，更是革命实践的产物。追根溯源，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领中国人民寻找救国救民出路的过程中主动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尽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就已出现了革命的势头、气息和舆论，但并未明确提出“革命文化”的概念。“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 因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真正在思想意识层面唤醒民众、凝聚全民族共同革命的精神力量，从而也无法彻底改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华民族的苦难命运。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② 革命面貌之“新”，很重要的一点就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用思想理念启蒙和影响人民，唤醒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由此逐步奠定革命文化的具体形态。简言之，革命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进步性斗争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先进文化。这一先进文化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923 年，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新革命文化”的概念，区别于一切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论述，他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质和意义。17 年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新民主主义论》问世，毛泽东在此文中广泛运用了“革命文化”的概念，彰显出近代中国语境中的“革命文化”标识与马克思主义鲜亮底色的交相辉映。

就整个生成过程来看，革命文化发展至今其具体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的革命实践进程，立足于重要事件和人物，最为直接地彰显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下反帝反封建的前进脉络；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下诞生的一系列革命方法和思想，立足于重要理论和战略，最为突出地表明了先进理论武装的政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优势；三是与共产主义信仰最为契合的各种优秀革命精神，立足于坚定理想信念，最为生动地揭示了硝烟战火之中激励英雄人物披荆斩棘、舍生忘死的精神密码；四是革命实践历程中诞生的一系列革命主题文艺成就，立足于宣传和动员，最为形象地体现了“文化启蒙所激发的广大民众的顽强意志和勇敢精神成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强大动力”。③ 从重要事件和人物、重要理论和战略、理想信念到革命主题文艺成就，这些革命战争烽火中探索出来的具体的文化内涵共同灌注了时代的声音，焕发了革命的恢宏志气。

中国的革命文化不仅紧密联系了由“一个幽灵”走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无产阶级革命谱系，同时也不断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顺应了《周易》当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变革思想，展现出具备本土性、民族性的真理光芒，昭示了在民族和阶级压迫的背景下中国革命斗争的未来方向，即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马克思曾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④ 作为一种历史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 38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537 页。
③ 张菊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建设及其启示》，《理论学刊》2012 年第 9 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84 页。

畴，革命文化发轫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族解放和人民斗争之中，却又与时俱进，在不同的时代实现了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成了追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的精神养料和前行动力，也彰显了自身无限延伸的生命力和进步性。

基于这样的民族性和进步性，革命文化在转型发展之中不断充实自身，孕育更为完整的内涵，展现出“刚柔相济”的特点：一方面包含着斗争之“刚”，另一方面包含着坚忍之“柔”。

斗争之“刚”，首先表现为英勇斗争的激情和不畏牺牲的壮志。“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① 早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共产党人站在最前列领导工农力量开展武装运动时，就迸发出了一种强大的革命激情：英勇斗争、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他们的英勇大无畏，在于宁愿壮烈地死去，绝不苟且偷生。在瞬息万变的地上地下战场，他们往往以信仰作为前置的坐标，不为威逼利诱所撼动，始终保持一种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基于此，这种“刚”还表现为革故鼎新的奋进和前赴后继的果决。“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② 革命者不畏惧于旧势力的繁荣旺盛，而是准确地体察到时局的变迁，捕捉到世事的改换，顺应潮流地开拓进取。失败了并不可怕，革命人揩干牺牲的同志身上的鲜血，继续大踏步前进，接续奋斗着，他们敢于立时代之潮头，育新机、发新声、开新机、谱新篇，寻找救国救命的新出路，为民族的未来指明方向。

坚忍之“柔”，首先表现为理想信念的感召和家国情怀的滋养。早在中共二大召开之时，《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③ 这一政治宣言，表明了革命者将中国建设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信念。他们同时具备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家国情怀，彰显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豪迈气概。无数革命者舍小家、为大家，将个人和家庭的安危和幸福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紧密相连。基于此，这种“柔”还表现为人民幸福的追求和坚强不屈的韧性。“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④ 作为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西柏坡，条件再艰难，也没有冲淡鱼水深情。无论是在历经失败后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色道路，还是面对“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打响了艰苦卓绝的持久战，抑或击败装备精良的“不可战胜之师”，革命者没有畏惧过，更不曾屈服过，而是凭借着韧劲，克服艰难险阻，自力更生、百折不挠，历经重重考验，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刚柔相济的辩证关系，愈发彰显了革命文化进步性与民族性相交织的本质特征。在不同时代，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范畴，既有不变的价值内核，又有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的具体内涵。其进步性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发展，不停歇、永向前，突出了“变”的一面；民族性表现为一种静态的标识烙印，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突出了“不变”的一面。在“变与不变”的交融之中，更好地展现了革命文化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端，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凝聚升华出激昂向上的精神状态，又为开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进程奠定基础的重要价值，孕育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道德和政治品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5－11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

“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① 面对着中国特色进入新时代和“两个大局”的时空背景，革命文化需要在战胜时代挑战的基础上实现不断发展，基于“刚柔相济”“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在新时代凸显新的内涵，作为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和精神动力，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助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

二、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所面临的时代挑战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树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② 革命文化是一个时代里上下求索的仁人志士和先锋模范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践行初心和使命，自觉联结个人理想追求与民族救亡复兴伟大梦想的真实写照，作为深远持久的精神力量，可以通过自身与时俱进的转型发展，成为指引我们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③ 的基础上不断前行的旗帜，具备突出的现实价值和传承的必要性。

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革命文化由社会存在决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④ 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于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产生了现实挑战，容易使得这种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的文化被忽视甚或误解。“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⑤ 因而，要想避免重蹈苏联亡国、苏共亡党的覆辙，就必须认清和化解革命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时代挑战。

第一，“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逐渐消解人们对革命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诚然，我们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顺利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抓住了历史变革的时机，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篇章，逐渐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高歌猛进、风雨无阻。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⑥ 虽然不再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战火，但我们正处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关键时期，还需要持续保持斗争精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统筹兼顾城乡、地区、行业等多个维度，随着老的问题逐渐解决，新的问题往往又会出现。以完成脱贫攻坚为例，在其后需要实现脱贫成果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建立配套保障机制等系列任务的深度、广度和难度都是丝毫不亚于脱贫本身。这俨然已经成了一场新的革命，并且不似先前那般直接和有形，更加容易被忽视或轻视。因此，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转型发展，革命文化必须结合我们正在进行的奋斗、适应解决当前问题的需要、契合更高的时代要求和更新的价值理念，从中发掘能够作为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力量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同时既要警惕片面强调革命的“唯革命论”，也要批判片面强调现代化的“告别革命论”，正确处理新时代条件下的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放眼寰球，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恐怖主义等不利因素依然客观存在的现实背景下，中国

① 《在科学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习近平在江西调研考察纪实》，《江西日报》2008年10月17日第1版。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7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9－420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9页。
⑥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8页。

不可能也绝对不能成为一座孤岛，因而也面临着重大的威胁和隐患。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身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需要面对的风险和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一直持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迷状态，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间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弗朗西斯·福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一度叫嚣“历史终结论”，这对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尤其是作为它的具体内容样态的革命文化具有极为不利的影响。二是中国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也处于不利地位，存在“强敌环伺”的隐患，部分邻国与我国的领土纠纷和外交矛盾在域外霸权势力鼓动挑拨下时有激化，与此同时还遭受“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污名化论调的诋毁。三是中美结构性竞争、俄乌冲突等的重创下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与世界格局的难以预料，为日后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力量复杂博弈埋下了伏笔，进而增添了革命文化转型发展进路的难度，对其发展逻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意味着，革命文化需要在内外交困中焕发新的生机并彰显新的影响力。

第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亚文化对革命文化的转型发展构成冲击。“亚文化”（Subculture）一词，最早出现于1886年，本义代指居于主文化相对地位的文化形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英格尔（J. Milton Yinger）提出了亚文化的两种具体范式，其中一者往往表现为“这一团体与其所属的较大群体的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冲突而形成的具有特定行为规范的文化”，[①] 并将其特别定义为“反文化”（Contraculture），暗指其可能产生相较于主流价值观而言具有颠覆性的价值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倡导的思想解放大潮虽有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形成了多元文化交织、交融，共同繁荣、发展的格局，但纷至沓来的“亚文化”中却也难免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一些错误甚至荒谬的亚文化形态即以“反文化”面貌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从而冲击了革命文化的转型发展。一是极端个人主义，即时刻以个人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强调高度利己。与革命文化中所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立，更是背离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允诺，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极易导致追逐私利和贪污腐败。二是享乐主义，即把一切行为和追求的目的都归于获得自身的享受和快乐，且表现为精神懈怠、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等人生状态。与革命文化中所蕴含的英勇奋斗精神相冲突，更是背离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自信，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高速发展时期易导致好逸恶劳和贪图享乐。三是自由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总结了干部队伍中自由主义的7种表现，归根到底就是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和政治规矩。与革命文化中所蕴含的团结精神相排斥，更是背离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革命纪律，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极易导致信仰飘忽和初心动摇。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②] 只有革命文化这样的先进思想文化才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指南针”和“方向标”。而以“亚文化”形态粉墨登场的价值观念，看似只是社会个体的价值追求和生活取舍，实际上却蕴含了反动势力冲击或消解革命文化的险恶用心：通过割裂革命战争与美好生活的固有联系，只强调现世的唯我，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否定革命、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归根到底在于借此误导国人的政治认同，进而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这样危害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问题，既为革命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带来了挑战，也需要经由革命文化自身更好的转型和发

① J. Milton Yinger，“Contraculture and Subcultur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0，Vol. 25.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6页。

展来加以解决。

第三，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制约了革命文化转型发展过程中实际功能的发挥。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量，革命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特定文化是与特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反映的是特定状况下的社会发展动向，因而也需要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之下才能完整地展现出其本质特征。当前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与革命文化刚刚诞生时相比已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往往存在难以反映其全貌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① 置身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长远时空中，革命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得到长期延续，所需要的最好介质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当前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往往表现为一种相对和平、舒畅和富足的经历或环境，只能通过微观化、碎片化的语言、图片、文物等形式获得对革命文化一定的感性认知，无法亲身体验和感受革命年代的腥风血雨，因而对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所沉淀的文化遗产具有一种较强的疏离感和陌生感，难以产生共情。因此，革命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往往无法形成直接紧密的联结：一方面，当代人自我意识较强，诸如切身相关的利益、细琐微小的感触，小快乐、小幸福的追逐等成为一些青年人的兴趣所在，对国家民族层面宏大关怀的缺乏导致对于革命文化的感受易流于浅表；另一方面，即便产生相应感受，往往也会因为冲击力不够、陌生感较强而表现为非常态。致使革命文化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陷入一种"时空困境"。这时，需要立足新的实际，借助科技、文化资源与平台，不断从内容、形式、载体、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更好地增强体验感，才能够弥补相应缺憾。

其次，革命文化作为一种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革命文化虽然一直在努力实现转型发展，但并不一定总能够"敏感"且准确地回应时代的需求和呼唤，更多情况下依然只是按照原有的固定轨道发展下去。特别是在高速运行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作为中心任务的经济发展往往以快节奏、高效率为发展目标，因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速度，而文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完成沉淀、升华的过程，转型发展所形成的革命文化时代意蕴也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加以检验才能够体现出其功效。因而在文化反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因文化自身的这一特性形成一定的"迟滞"现象。这时，革命文化的转型发展过程更容易陷入迷茫和飘忽，需要经由准确定向甚至力挽狂澜的过程才能予以规避。

最后，人民是创造社会精神产品的主体，但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与革命文化之间形成了一定的隔阂。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 在文化层面上，人们的需求往往也会由单向度地接受意识形态灌输的内容转变为更加体现出飞扬个性的元素。就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革命文化向来所代表的那种崇高、严肃、正式、厚重和庄严的氛围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娱乐化"和"庸俗化"气息激增的倾向，人们更需要的或许是欢乐、轻松、愉悦、解压和随意，两者表现出渐行渐远的趋势。尤其是对于社会新生代而言，他们成长于一个更加崇尚实用的环境，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聚焦点转移到舍生忘死、大义凛然的精神特质上存在一定难度。因此，革命文化难以满足他们在当前时间里的精神需求，便无法彰显出精神引领和价值导向功能，容易陷入"被边缘化"的"叙事困境"之中，需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长期教育才有可能走出困境，对青年人发挥影响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三、新时代革命文化创新发展路径

革命文化源于时代的实践孕育，也是时代发展的持续精神。早在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便深刻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① 这表明在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历程中，全党全国上下依然应当时刻保持“赶考”心态，以“革命者”的精神、态度和毅力回答好时代交予我们的治国理政的“考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同样离不开革命文化作为丰富的精神养料和精神动力。“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②

新时代革命文化创新转化需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两个结合”。不同民族、国家有着不同历史积累、文明积淀，由此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③ 革命文化本身便是衔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此，“两个结合”不仅催生了革命文化，更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方法。因此，面对诸多新的挑战，新时代革命文化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基础上有机结合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具体国情、具体问题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明确自己的定位及创新转化进路。进而展现出能够立于时代潮头，解“现实之惑”、救“思想之急”的时代意蕴。由此引领人们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凝聚更多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和奋力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第一，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新品质为前提，实现从“聚焦民族救亡”到“矢志民族复兴”的内涵发展。回想近代中国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艰苦岁月，四万万人的泱泱大邦屈居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承受着主权被别国任意践踏、领土被别国任意侵占、国民被别国任意凌辱的辛酸。正是一群胸怀信仰、肩负高度历史自觉的革命者，带着高于天的革命理想披荆斩棘，方能在驱赶外敌、结束内战、开启建设、矢志改革的历程中一步一个脚印，不断从黑暗走向光明，由边缘逐步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

革命文化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以高于天的革命理想为支撑，树立起的俨然是一面“矢志民族复兴”的大旗。尤其用好了改革开放的“制胜一招”，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民主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精神文化、对外交往和治党治军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形成了“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④ 新时代的革命者继续站在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高度上追逐民族复兴的革命理想，以革命文化的时代意蕴作为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和矢志向前的精神养料，也是我们从革命的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精神是在推动中国伟大社会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坐标和方向指引，彰显了与革命文化一脉相承、愈发坚定的革命理想，也由此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1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9页。

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革命文化的新时代内涵。

第二，以“人民至上”的新坚守为核心，实现从“为人民得解放而敢于牺牲”到“为人民谋幸福而勇于开创”的内涵发展。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一开始就是为改变穷苦人民命运而带领他们进行革命，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湖南农民运动、发动秋收起义、上井冈山，都是为了穷苦人民。”① 当时占据中国大多数的都是这样的穷苦人民，革命者中的不少出身于此，又以此为奋斗的归属，凭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概和魄力，敢于牺牲，换得了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得解放的非凡成就。

革命文化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应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在不断为人民谋幸福的奋力实践中勇于开创新局，推进事业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② 尽管在过往岁月里，我国的物质生活条件、国防军事力量早已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核心理念，作为革命者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使命，着力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获得感。“为人民服务”依然作为所坚持的宗旨，昭示着革命决心，凸显了“人民至上”的坚守。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为了兑现对人民的允诺，新时代以党员干部为主力军的革命者立足于不同的战线和领域默默辛勤耕耘。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例，全国上下的结对帮扶单位、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发扬革命精神，各司其职、协调统一，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锻造出“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书写了新时代革命文化“不负人民”的绚丽篇章。

第三，以“向着胜利坚持斗争”的新担当为引领，实现从“负重前行艰苦奋斗”到“不断超越永远奋斗”的内涵发展。中国一度经受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悲苦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就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客观状况发出了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在落后于最早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情况下，为了实现“赶上时代”，老一辈革命家负重前行、艰苦奋斗，依靠斗争精神，艰辛创业，逐渐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革命文化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以不断发展和勇于超越为目标导向，向着胜利进军，坚持了斗争精神，展现出革命者的忠诚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③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我们依然需要在各行各业各领域勇于直面风险和考验，不断实现超越，永远坚持奋斗，进而在长期、艰巨和复杂的斗争中实现伟大梦想。以科技领域的发展为例，“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就是新时代传扬革命文化的新典型。在探索天体奥秘、深化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的过程中，科技工作者坚定报国初心，常怀报国之志，传承了老一辈革命者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崇高精神品质，不惧艰险、矢志不渝，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启了探月征程，为科技强国事业建功立业。只有更好地理解、生动地阐释并积极地弘扬这种“不断超越永远奋斗”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103 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5 页。

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0 页。

的时代意蕴，我们才能达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崇高境界，向着更高远的革命事业进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坚持斗争、敢于胜利。

第四，以“革命大无畏”的新作为为目标，实现从“不怕困难迎战强大敌人”到“迎难而上应对复杂突发问题”的内涵发展。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的英勇大无畏大多表现为面对敌人时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他们通过不懈奋斗和持续抗争，在艰难困苦中坚守信仰、践行忠诚，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卓著功勋。“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① 正是蕴含着这种英勇大无畏精神的历史激励了后来革命者接续奋斗，在和平年代仍不忘革命初衷，不断向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继续前进。

革命文化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始终秉承革命者英勇大无畏的高尚品质，彰显革命者在迎难而上、直面复杂突发问题的过程中展现新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矛盾运动中，我们面临着诸多斗争和考验，“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② 意识形态、公共卫生、社会秩序、生态环境等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宛如现实交予新时代革命者的一张考卷，此时面对的“敌人”往往更为隐蔽、无声和无形，存在的问题往往更为复杂、突发和棘手。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③ 新时代革命者未曾畏惧，更不曾屈服，而是以准确的判断力、勇猛的战斗力和坚决的执行力迎难而上，化险为夷。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新时代的“革命者”同病毒展开了殊死较量，凭借着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中国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④ 最终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以英勇大无畏为内核的革命文化在新时代仍然焕发出重要的精神力量，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更广泛的领域攻克难关、战胜挑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成就。

结　语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站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将“建成文化强国”纳入“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⑤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深邃的历史洞见定位党的文化担当，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极大深化。也就是，充分认识到作为社会主义独有的、体现社会主义鲜明特征的，从革命、建设、改革中一路走来的革命文化的历史意义，充分辨识了革命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背景下面临的矛盾转变和多元冲击中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充分说明了革命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进一步转型创新发展乃是文化强国战略的应有之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 页。

② 习近平：《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在颁发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3 日第 2 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9 页。

④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人民日报》2020 年 2 月 24 日第 1 版。

⑤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5 页。

革命文化不仅通过将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精神熔铸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充分理据和充足底气，不仅通过千千万万革命文化主体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精神基因、精神标识，共同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共同奠定了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而且通过本身的激昂向上、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凝聚升华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激励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为坚定文化自信赋予了坚强基石和强大支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所做的重要指示，“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①] 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诸多新挑战，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两个结合”的新时代文化建设方法，明确革命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伟大实践的历程中的定位及创新发展进路，引领人们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这不仅对于我们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历史时刻，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从而建成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必将成为凝聚更多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和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张瑞臣

The Continuit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CHEN Hong-gui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1106, China)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has been nurtured in the great struggle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herit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ng firmness with softness, as well a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gressiveness and ethnicity, presenting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rich spiritual connotation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a new era and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faces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such a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subcultural shocks, and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culture itself. It needs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handling problems direct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ly strong country in the new era,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needs to adhere to the “two combinations”,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larify its own identity, explore feasible innovative paths, create and stimulate the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vitality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new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becoming a powerful spiritual force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tegrating firmness with softness; change and invarianc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①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华网，2023年10月8日。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与实践拓展

廖小明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成都　610071］

摘　要：公平正义体现为一定社会的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必须随着时代变迁进行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政治前提和现实基础，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重要基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进程中，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以“分”和“合”的形式展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在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含的公平正义要求为基础引领，重点在于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平正义的多维呈现。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公平正义；话语创新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015－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①]作为复合概念，公平正义内含公平、正义、平等、公正等丰富涵义，包含着伦理道德层面的“应该”和价值层面的目的和意义，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对社会主义而言，公平正义是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从宽泛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就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探索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正式提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必须推进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更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特色和伦理优势。

一、公平正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公平正义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和特征，“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

收稿日期：2024－03－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重要论述研究”（项目号：18BKS1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廖小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2023年第19期。

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①] 这就说明，公平正义本身是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结果。一般而言，所谓的公平正义，涵盖公平、正义、平等、公正等意义，是人们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存在的各种关系和现象应然性的理解和价值追求。[②] 它包含价值层面合规律和合目的的有用性和伦理道德层面“应该”的应然性，体现为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从社会发展进程看，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总是受制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实现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一）公平正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理论建构和话语表达

一方面，社会发展进程需要不断建构和创新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应该怎样”的伦理道德问题，其理论建构、话语表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阐释说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和人的活动的合道德性，这就要求阐明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得其所应得”。从本质上说，“得其所应得”之“应”就是“善”。善恶观念的建立从根本上确立起人类社会活动的道义原则和伦理规范。无论古希腊时期把“公正”作为“四大主德”，视为“一切德性的总汇”，[③] 还是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④]，都在理论上论证着“应该”和“意义”，证明着公平正义作为伦理规范的极端重要性。在人类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样的理论建构和话语创新。世界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后，追求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需求更加增长。资产阶级打着追求公平正义的旗帜实现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需要扬弃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公平正义为此要实现话语表达上的创新和实践的拓展。由此观之，从形式和表达看，公平正义伴随社会进程不断实现理论建构和话语创新。

另一方面，社会发展进程是不断追求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建构和实践的过程。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总体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找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理想的社会制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平正义伦理价值观念不仅需要被认同，而且需要得到实践拓展。这个过程从根本上证明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成为单个人和群体的目标价值，也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价值。从历史进程的客观实践看，以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为引领，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应当”和“应得”就能得到体现和实现，人们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能得到激发，社会秩序就能得到维护，社会就能良性有序发展，反之，如果公平正义缺失或者话语僵化，实践停顿，“应当”和“应得”不彰，消极状态或对抗状态不断增多，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会遭到破坏，社会发展就必然迟滞，严重时甚至导致社会变革。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不断变革和完善公平正义追求的过程，也是实现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次社会的更替都是公平正义的一次跃迁。[⑥] 当然，公平正义始终是观念体系，我们既要肯定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积极作用，

①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5页。
② 黄有璋：《比较中的公平正义概念辨析》，《桂海论丛》2019年第5期。
③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④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⑥ 徐琛：《如何从历史角度看待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求知》2009年第8期。

又要充分认识其受规律制约的客观性。

（二）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重要基础

今天将公平正义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本质上就是在历史长周期上认识公平正义之于社会发展进步以及人的发展进步的意义和价值。从语义表达和内容结构看，公平正义和中国式现代化都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进程中，而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又为公平正义提供了理论视野和问题场域。从范畴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比中国式现代要更大一些，时间逻辑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形成了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根本基础，而这种创新和实践拓展又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特有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追求。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

1.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共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

一般而言，一个理论体系包括两方面：一是价值，就是它主张什么，追求什么，这决定着其本质和灵魂；二是逻辑，也就是它如何论证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决定着其特点和方法。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自始至终有其鲜明的价值主张和伦理追求。这种价值主张和伦理追求要通过一系列的概念范式和实践过程予以体现。公平正义就是这样的概念范式和实践方式。从本质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都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种必然性之中包含着"得其所应得"的价值主张和伦理追求。社会主义必然继承发展和努力实现人类社会共有的价值理想和道义精神，而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和过程，也要承载社会的价值形态和伦理道德，这种价值形态和伦理道德受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根本制度的决定。显然，公平正义就是这样的价值形态和伦理道德。然而，正如社会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实现的形式不可能一成不变一样，现代化在每一个国家实现的形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③ 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形成都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这种统一性关系下，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作为社会观念上层建筑，具有历史生成的过程，既要受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一般规律和要求的制约，也要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式"所赋予的特定要求和特征，这就必然要求公平正义要进行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以更好表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特色和伦理规范优势。一定程度上说，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道"，这样的"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之中，④ 也在现代化的"理"之中。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提供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场域

从根本意义上说，任何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以及伦理规范都有自身特色。这种特色需要在实践的场域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为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提供了丰富场域。首先，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1 版。

② 董振华：《马克思主义的"道"与社会主义的"理"》，《学习时报》2018 年 5 月 28 日 A1 版。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23 页。

④ 董振华：《马克思主义的"道"与社会主义的"理"》，《学习时报》2018 年 5 月 28 日 A1 版。

从问题逻辑看，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的认识和思考，成为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的基础和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都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公平正义不仅内在于实践，而且外在于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话语创新和表达。其次，从历史溯源看，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进而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型塑当代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提供了依据。

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也好，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根本上都是要使人民过上好日子，而好日子除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外，必须有精神上的富足和价值的引领。党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在客观上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伦理价值观型塑的特定问题域。在那个时代场域下，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思考必然包含着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而且必须要型塑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为此，推进公平正义的理论建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就成为思想理论建设和价值观念塑造的重点内容。最后，从实践进程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程，同时也相应地形成公平正义概念范畴提出的问题语境。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新的现代化建设全面铺开。邓小平同志针对小康社会提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在这一时期，实践方面已经形成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语境。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提出问题，更善于解答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的思考之中，"中国式的现代化"② 就是通过"三步走"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社会主义始终是建设现代化的基础，建设市场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具有价值引领和伦理支撑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场景下，价值观念塑造和伦理规范的重建不再僵化保守，公平正义观念的建构和话语的创新也进一步推进。因此，邓小平同志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抛弃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相反，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场域和问题背景下做出的新思考、新回答和新阐释。于是，我们看到共同理想的提出，共同富裕的强调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归纳等等，这些做法虽然没有直接用公平正义，但是，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的现代化所构成的时代场域和问题语境下的创新性表达，不仅是理论的阐释，更是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因此，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始终以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为基础和前提。

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推进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强调社会公平，但没有出现公平正义这个概念。公平正义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出现在21世纪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件之中，明确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②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时，他根据出访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进行深入考察和反复思考的结论，认为基于当时的国情，到20世纪末实现国际标准的现代化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他对客人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96页。

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强调按照包括公平正义在内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①] 进入21世纪，为何提出公平正义这个创新语词呢？从本质上看，提出公平正义这一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

（一）公平正义源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

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但是，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道义基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内在确认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坚持人性自私论与市场决定论的价值取向和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经济伦理，以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形式平等自由遮蔽和掩盖了真实的资本逐利。资产阶级善于用市场规则的公平掩盖实质的不公平，正义更是资产阶级学者们为资本主义粉饰太平的虚假政治术语。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应该而且必须体现出更广泛真实的平等自由，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得到最真实的实现和维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上要求实现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实质、内容和结构的统一，既要坚持人类社会发展共有的话语表达，也要创新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文化特色的话语形式。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既不拒斥公平，也不排斥正义，既不简单套用资本主义的公平和正义观念，也不简单注重公平和正义的形式，而是在现实的、具体的、发展的实践中赋予公平和正义以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价值理想和道义追求，内在确认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反映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支撑的公平正义权益。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并未正式使用公正、正义等词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正义、公正等语词日益被关注和使用。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②]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探索商品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可能和必然。正义、公正这些词语逐渐从学术话语转换到政治话语，从理论话语转换为实践话语。从本质上看，追求这些价值目标和伦理原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尽管在人类社会前进的历史过程中，剥削阶级往往扭曲甚至遮蔽这些伦理价值，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现代化进程客观上强化和突出了这些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社会主义是要最终扬弃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建设从根本上体现和保障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义的社会。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设现代化，就是要使整个社会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革命性"变革，让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进程中更加显现，价值追求和道义原则更加彰显。这就要突出对公平、正义、公正、平等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的形塑和彰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很快被邓小平同志赋予"中国式"的科学内涵。到20世纪80年代，公平、正义理论逐渐被学者们广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平、平等、正义概念也得到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形成并正式提出的过程中，正义、公正等词语逐步显性化，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进程之中。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推进公平正义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更加紧迫，在公平、公正、平等、正义等词语广受重视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被

①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第1版。

②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第3页。

赋予了更大的价值和伦理规范的期待，提出“公平正义”这个概念正当其时，因为它具有更加全面丰富的内容和更大包容性，而且朗朗上口便于表达。这无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还是对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体现人的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创新发展的结果，是时代和人民要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推动了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作为合成词的公平正义概念，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拓展的新境界，提供了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现实场域。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建设阶段。但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到底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双重回答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夯基垒土，而且在认识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辩证学习借鉴社会主义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奠基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提出和实践探索奠定了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的变局和现代化风起云涌的进程中总结出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必须建设自己的现代化，而且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世纪之交国际国内背景出发，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把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域。上述进程实际上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视域和新境界，也为社会主义价值和伦理方面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开创了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传统文化的平等观、西方文化中的正义观，汇集在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话语创新时空场域和理论境界中。在此情况下，公平、公正、正义、平等这些概念应该进行富有时代特征和内涵的解释，为我国学术发展增加新的养分，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伦理价值引领，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价值观塑造和伦理规范的依据。进入新千年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复杂国际背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急需更高质量推进的背景出发，把发展问题作为重心，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本身就是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题中之义，而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深度融入其中。于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公平正义”这个语词呼之欲出，成为和谐社会基本特征，实现了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三）新时代公平正义以“分”和“合”的形式展现

客观上说，作为语词的公平正义，非常鲜明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和道义原则，直观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价值优势和伦理道德优势。从本质上看，公平正义涵盖了公平、平等、正义、公正等诸多词语的内涵，体现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进行现实选择的“最大公约数”。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必然要总体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公平正义贯穿全过程各方面，但是，这种贯穿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新的展现，体现为公平正义内涵和外延精准和精细化的表达。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满足于包容性发展的公平正义总体目标和追求，而是要对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进行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但是，如何实现呢？这就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认识和拓展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新任务。从新时代以来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看，公平正义“分”

和“合”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已经得以实现。

从“合”的方面看，第一，党中央在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明确将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整体性要求，是公平正义之“合”的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以看到公平正义作为整体意义的存在和贯穿，这不仅体现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而且也在制度构建上体现出来。这就要求不仅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要求落到实处，而且通过公平正义的引领，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实现了社会整体进步，极大彰显公平正义。第二，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为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本质上体现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利益归宿，典型地体现了公平正义“合”的新表达，具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鲜明特色。

从“分”的方面看，第一，党中央明确将正义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价值目标和伦理道德要求，明确强调法治正义，要求要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正义，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领域”（法治领域）的公平正义。按照这个思路，还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内政、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公平正义作出具体、精准的阐释分析，比如外交方面的正确义利观坚守。第二，党中央明确将公正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这体现了“分层面”（国际层面）的公平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全球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表达。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还可以对公平正义做出各个层面的具体化、精细化的分析和说明。总体来说，从“分”和“合”的思路上更能辩证整体把握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三、新征程进一步推进公平正义的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作为整体概念，公平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重要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提供了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新要求、新场域和新机遇。推进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含的公平正义要求，聚焦基础引领，重在过程落实。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含的公平正义要求引领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根本上说，作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公平正义这一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是一种整合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含的公平正义要求，推进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形成鲜明的价值导向和伦理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一是把公平正义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题中之意以及促进社会共建共享的基本要求进行落实和体现。二是把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镜子”和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根本原则，贯通改革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既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三是把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生命线，确认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保人民当家做主，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根本保障；重点在厉行法治，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全面保护；关键在公正司法，为社会公平正义树立最后防线。四是把公平正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追求，把党建设得坚强有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作为重点。五是把公平正义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要求，把构建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视为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提供好新时代构建公平正义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①] 上述五个方面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的五个方面紧密相连，既有对时代场域的高度重视，也有对问题重点的精准把握，还有结合核心要义的内容提炼，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科学内涵、九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和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外显于中国式现代化鲜活的实践进程，是推进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依循。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定性，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更加突出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话语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形成更加鲜明的价值引领和伦理主导，统整引领多样价值形态和伦理观念，显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优势和伦理特色。

（二）在基础引领中实现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新年贺词中提出："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②] 如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老百姓的日子都一天比一天更红火，孩子的抚养教育越来越好，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越来越顺畅，老年人的就医养老越来越有保障，这不就是公平正义的实现吗？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也是十四亿人民的根本要求，既是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也是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彰显。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突出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公平正义基础引领，实现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坚持公平正义价值的基础引领，凸显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鲜明导向和本质特色。"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③] 回溯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探索到 20 世纪 70 年代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建党 100 周年之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不变的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坚持。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公平正义价值的基础引领，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并且把这些原则和根本要求贯穿全过程和各方面。二是坚持公平正义的基础引领，凸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伦理和政治价值观特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高政治领导，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政治领导。执政党在执政中奉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分配的伦理道德调控导向，进而形成社会矛盾调处的基本原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通过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带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建设和发展，促进整体利益的合理分配和各种矛盾的有效调处，将这一过程统合到党的初心使命之中和执政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塑造和引领之中，本质上就是凸显公平正义价值整体引领，凸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伦理和政治价值观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把"人民对

① 冯颜利：《习近平关于公平正义思想重要论述的五个维度》，《当代世界》2018 年第 10 期。
②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24 年 1 月 1 日第 1 版。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127 页。

美好生活的向往”[①] 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②] 变为现实，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根本价值原则和伦理准则。三是坚持公平正义的基础引领，凸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理政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正义根本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社会事务，实现各方面权利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和各种矛盾的有效调处。由此可见，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是彰显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公平正义价值整体引领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优势彰显的重要方面。总体上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把凸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理政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放在重要位置，坚持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统一，坚持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放到突出位置，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坚持和贯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统一，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整体性价值引领。四是坚持公平正义的基础引领，凸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③]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目标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④]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宽广的视野考察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面向世界现代化发展必然方向，在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往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上突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⑤]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示最大先进性、现实性和包容性，凸显倡导和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目标方向，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在多维呈现中实现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公平正义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引领实践的过程，也是公平正义多维呈现的过程，形成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的场域。

1．在认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规律基础上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实践，既无现成模式参考，也无现成经验借鉴。但是，就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实践总有特定的伦理性和价值性。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程长期而复杂，但是，总体看，它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也相应地形成了公平、效率等重要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然要重视观念更新与重塑，注重实践变革和拓展，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必然遭遇诸多困难和问题，甚至面临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性带来的对诸如人的主体性遮蔽甚至丧失的风险，因此，我们要主动推进价值观的革新和伦理原则重塑。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各国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思路和方法各异，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等难题和困境，也面临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失范的风险。新征程如何避免这样的难题和困境，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公平正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实践中必须强化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基础上必须强化的“软”实力和伦理价值

①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0页。

②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12页。

③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第3版。

④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页。

⑤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第3版。

引领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直面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发展的现实要求，加快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形成更加鲜明的价值观念引领和伦理规范主导，从而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优势和伦理规范特色。

2．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聚焦制度创新实践

一般而言，制度这种规范化、定型化了的正式行为方式与交往结构受到一定权力机构的强力保障，表现于外，体现为具有管束、支配、调节作用的行为规范、程序。[①] 自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公平正义就是一个体现社会发展价值伦理最大公约数的概念。它不仅标示着和谐社会应该而且必然具有公平、正义、平等、公正等价值伦理追求，而且务实地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这些价值伦理的可行之路——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价值伦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公平正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就是从整体意义上倡导和践行包容性的价值伦理，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需要长期坚持和实践的价值应然要求和实践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强调“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②]。因而，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重视制度机制建设，将公平正义作为整体概念始终贯穿制度机制建设。公平正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价值伦理的创新话语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显著特征，引领这种制度机制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③] 因此，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聚焦以制度创新推动公平正义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丰富和突出公平正义整体性、包容性特征，显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强调制度机制的公平正义价值导向和伦理特色。

3．在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实践中推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长期的、全面的、复杂的、系统的、深刻的。新时代新征程，公平正义仍然也必将继续贯穿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首先，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上看，立足新实践的新概括，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整体融入和贯穿。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征、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和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在实践层面体现了公平正义作为整体性、包容性、发展性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引领。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④]，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能够也必然贯穿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目标牵引，这也必然和直接体现着公平正义在实践创新中的贯穿。社会主义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必然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目标导向，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彰显公平正义。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参与全球治理的鲜明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

① 高兆明：《制度公正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②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2版。
③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2版。
④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2023年第19期。

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①] 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层面就是要创新合作交流的方式和渠道，倡导全球公平正义，践行公平正义，促进公平正义。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科学内涵、九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和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本身就彰显了公平正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语境中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心任务的过程中，必然全面体现和实践公平正义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拓展。

■责任编辑/张　磊

The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and Expansion in Practice in Connection with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IAO Xiao-ming

(Party School of Sichuan Province of CPC, Chengdu 610071, China)

Abstract: Fairness and justice are reflected in the pursuit of certain social values and ethical norms, and must be innovated and expanded in practice with the historical change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political precondition and actual foundation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mbine to form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and the expansion in practice in connection with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and the expansion in practice in connection wit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ind expression in the form of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and the expansion in practice in connection with fairness and justice rely on the adherence to CPC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view on fairness and justice contained in hi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as the guidance and foundation, which finds expression mainly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manifesta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airness and justice;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

存在一元论能否合理地解释空间的本质？

——以布拉德雷、西田几多郎和不二论吠檀多为例

张励耕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　要：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哲学思辨当中，如何理解空间的本质都是一个重要话题，比如哲学家们往往会争论空间是否具有实在性、是否仅仅是对象间的关系等。而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立场，存在一元论有着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却在解释空间等基础性概念时遇到了各种困难，因为空间所暗含的区分或差异很难与存在一元论所主张的唯一的存在者相调和。本文对三种相似却又不同的存在一元论——英国的布拉德雷哲学、日本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印度的不二论吠檀多哲学——分别做出考察，分析其在各自理论框架下给出的对空间本质的解释，并分别指出这些解释包含的困难：布拉德雷没有前后一致地使用“矛盾”概念，并且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西田很难合理地说明绝对的“无”如何能产生“有”；不二论则未能融贯地解释“梵”与世界究竟是等同的还是不等同的。以此为基础，本文试图指出存在一元论本身的某种缺陷，即它从根本上无法调和“一”与“多”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超越文化和时代上的差异，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哲学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关键词：空间；存在一元论；布拉德雷；西田几多郎；不二论吠檀多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026－10

一、存在一元论面对空间问题时的固有困难

对“世界上究竟存在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不同形而上学立场的核心。通常来说，这些立场可以被分为三种：一是认为最终存在的是一个或一种东西，即一元论（monism）；二是认为最终存在的是两个或两种东西，即二元论（dualism）；三是认为最终存在的是多个或多种东西，即多元论（pluralism）。其中，一元论又可能包含非常不同的含义，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基体一元论（Substance Monism）[①]、优先一元论（Priority Monism）和存在一元论（Existence Monism）。从总体上看，基体一元论的主张较为温和，认为最终说来只有一类基体（比如物质或心灵）存在，而事物的多样性可以通过该基体得到解释；优先一元论的主张更激进一些，认为一切事物最终都来自于或可以被追溯到一个与它们自身不同的源头，比如新柏拉图主义所谓的“太一”；存在一元论的主张则最为极端，认为严格说来只有唯一

收稿日期：2023－12－0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布拉德雷著作的翻译与研究”（项目号：2021NTSS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励耕，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副教授。

① 在汉语学界，“substance”常常被译为“实体”，但这样就容易与另一个近似的术语“entity”相混淆。为此，笔者尝试将“substance”译为“基体”，而将“entity”译为“实体”（该词在本文中并未出现）。至于这种区分是否可行，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的一个“东西”存在，而万事万物不过就是对它的划分或是它显示出来的样子。

最后这种立场看似匪夷所思，却在理论上有着独特的魅力：它设定的基体数目最少，而且可以提供其他哲学很难提供的、万事万物合而为一的“神秘主义”体验，由此吸引了不少聪明的头脑为之辩护。而且，它不仅存在于西方哲学中，在东方哲学传统中（比如印度哲学和日本哲学）也有不少拥趸；在有些方面，东方的存在一元论形态甚至更为典型和系统化。因此，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倾向。但是，它也面临着显而易见的难题：我们的世界无疑是丰富多彩的，不仅包括各种不同的东西，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样一个世界怎么能被说成是唯一的一个“存在者”呢？简言之，存在一元论必须解答的问题是：如果世界上最终说来存在的只有“一”，那么“多”又是如何可能的？或者说“一”如何可能成为“多”？

解答该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想合理地解释多样性，我们就必须在唯一的存在者中预设某种区分，但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存在，否则任何区分都无法被有意义地刻画；而这样的预设与只有唯一的一个存在者这一点是冲突的。在这些区分当中，极为基本的一个部分就是时间和空间。[①]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释空间本身的存在及其本质，存在一元论（可能也包括某些形态的优先一元论）就无法合理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空间不仅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性概念，对其本质的理解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无论是在西方哲学还是其他哲学传统中，哲学家们通常都会追问：空间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具有实在性（reality）的东西，还是某种观念性（ideality）的产物？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是一种基体），还是基体的属性（property）？空间与对象（或曰事物）的关系是什么：是对象得以存在的某种先决条件，抑或仅仅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哲学史上有不少关于这些问题的经典讨论，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的第一组二律背反，以及莱布尼茨在与克拉克的通信中提出的关于实质主义（substantivalism）和关系主义（relationism）的争论——其中，实质主义认为时空是独立存在的基体，关系主义则认为时空仅仅是对象或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这种关系的衍生物。[②] 但在存在一元论的框架下，对空间本质的解释往往会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其支持者必须在坚称最终只有一个东西存在的前提下合理地说明空间所必然会暗含的差异性。解决该困难的思路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三种：

一是在“真正存在的东西”和“看上去存在的东西”之间做出截然的区分，主张前者是实在的、唯一的，后者则不过是前者的一种“显现”，而空间只是显现的一种，不过较为基本或独特而已，这样就彻底否定了空间的实在性、真实性；

二是以某种隐晦的方式、暗中把唯一的“一”解释为“多”，从而让“一”具备某些潜在的差异，进而让更为复杂的多样性的存在变得顺理成章；

三是做出类似第一种思路那样的区分，但并不完全否认空间的实在性，而是让空间与唯一真实的存在统一起来，达到“实在”与“显现”的调和。

笔者认为，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日本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印度的不二论吠檀多哲学分别是上述三种思路的典型代表。接下来就让我们对这三者进行具体考察，看看它们的主张是否站得住脚。

二、空间概念本身包含“矛盾”——布拉德雷的思路

布拉德雷哲学体系的立足点在于实在（re-

① 必须说明的是，空间与时间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往往也把它们放在一起称为“时空”（space－time）。但时间问题又比空间问题更为复杂、更难得到清楚的阐释。因此，本文将讨论的话题限定在空间上，不专门讨论时间。

② 参阅 Mander, W,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Bradley's Metaphys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112－113。

ality）与显象（appearance）[①] 的区分，其最重要的著作《显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即得名于此。他区分二者的标准也很简单：矛盾的东西是显象，不矛盾的则是实在。但必须注意的是，他对“矛盾”一词的用法与日常的理解非常不同。关于自己所谓“矛盾”的含义，他曾在《显象与实在》附录的“笔记A”中给出过两种略有不同的解释：一是在没有做出区分的内在根据的情况下谓述差异，也就是在事物本身没有区分的情况下将其谓述为是有差异的——这之所以是矛盾，是因为一个东西不能既没有区分又有差异；二是把多样性在一个点上统一起来，也就是在事物本身是多样的情况下将其谓述为是统一的——这之所以是矛盾，是因为一个东西不能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②] 应当说，这两种表述都大致符合我们对矛盾的日常理解，即一个东西不能既是A又不是A。但是，布拉德雷有一个后果很严重的混用，即他几乎不加区分地使用“相反的”（contrary）与“矛盾的”（contradictory）这两个术语。根据通常的理解，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条相反的命题不可能同时为真，但可以同时为假；而两条相矛盾的命题则既不可能同时为真、也不可能同时为假。例如，“A是白色的”与“A是黑色的”就是相反的命题，它们不可能都为真，但可以都为假，比如真实情况是“A是绿色的”；但“A是白色的”与“A不是白色的”就是相矛盾的命题，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它们都不会同时为假。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布拉德雷并不按照通常的方式理解矛盾式“A并且非A”中的“非A”，而是把“非A”解释为“与A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等于是把“相反的”也当作是“矛盾的”。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混用，那就意味着：如果一条陈述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通过逻辑连接词“并且”关联在一起，或是如果两条陈述没有述说任何共同的东西，则它们都是矛盾的——这比通常所谓的“矛盾”要宽泛得多。他之所坚持这样的独特用法，是为了给显象和实在划定一条严格的界线：包含“矛盾”的东西属于显象，指事物或世界看上去的样子，最终说来并不是真实的；不包含“矛盾”的东西则属于实在，是事物或世界本来的样子，是真实的。根据这样的标准，不仅几乎所有的日常事物，而且包括时空、自我、逻辑、哲学等在内的东西都会被归属到显象的范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样被理解的世界是自相矛盾的（contradicts itself），因而是显象而非实在。”[③] 这可以说是一种比黑格尔更极端的立场。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框架下理解空间呢？布拉德雷首先批驳了关于空间的实质主义理解。根据他的概括，实质主义者认为空间关系具有独立性、实在性，存在于点或位置这样的抽象事项之间；关系主义者则认为空间不是独立的、实在的，只能存在于物质对象之间，因而不可能存在绝对空洞的空间。前一种观点会引导我们把一个具体的东西看作空间关系中的关系项，这就意味着在尝试理解空间时，会不断产生出与一个额外关系项的新关系，从而无法发现一个最终的关系项，如此便陷入无穷倒退的境地。相比之下，关系主义的方案更为融贯，因为关系与相关项是不同的，而“关系会把不是单纯关系的空间结合起来”[④]；这样一来，虽然空间关系的关系项可以始终在空间中扩展，但由于空间本身并不是这种关系中的一个相关项，因此不会陷入无穷倒退。[⑤]

可以看出，布拉德雷的空间观总体上是“关系主义+观念论”式的。但是他思路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并不只意图证明空间是一种关系而非实在，而是要进一步证明：即便空间

① 笔者将“appearance”译为“显象”而非“现象”，既是因为这种译法更契合“appearance”所包含的“看上去”“显得像是”的意思，也是因为布拉德雷还使用了另一个与之不同的术语“phenomenon”，而这个词更多地被译为“现象”。在布拉德雷的体系中，“phenomenon”应当只是“appearance”的一种。

② 参阅 Bradley, F. H., *Appearance and Re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p. 505。

③ Bradley, F. H., *Appearance and Re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p. 9.

④ Bradley, F. H., *Appearance and Re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p. 31.

⑤ 参阅 Mander, W,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Bradley's Metaphys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114 – 117。

是一种关系，它也最终是自相矛盾的，因而是显象而非实在。他的目标是达到如下典型的矛盾式：空间既是又不是单纯的关系。其具体论证看上去并不复杂，包含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关系，因为单纯关系的叠加不可能产生出空间，还必须要有对象的存在；另一方面，空间又不过就是关系，因为空间与其部分之间的关系将导致一种悖论——我们会在空间所包含的空间部分的叠加中陷入无穷的进程①——这样就可以导出上述矛盾式。他由此得出一种与康德的二律背反类似的结论："空间是一种它不可能是的关系，也是一种它不可能是的性质或基体。"② 换言之，通常所谓的空间只能是关系性的；但也恰恰因为如此，它又不可能是关系性的，因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一个有限的、在自身之外没有空间的空间是自相矛盾的。……空间要成为空间，就必须拥有外在于自己的空间。它永远消失在一个整体中，这个整体被证明绝不会超出与某个超越此之外的东西的关系的一个方面。……这么来看的话，空间**不是**空间；如果试图在空间之外找到空间，我们就只会发现消逝在一种关系中的东西。空间是关系项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项是绝不可能被发现的。"③

上述结论在直觉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毕竟我们很难直接否认空间本身的存在；其具体论证过程也面临着一些关键性的困难，我们在此只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两点。

首先，从知识上看，布拉德雷做出的关于空间的某些知识性的预设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单纯的关系叠加无法产生出空间的观念这一点可能并不成立，因为某些情况下的叠加可以让各个部分产生出此前没有的性质。例如一块有颜色的区域可以由本身不是颜色或无颜色的东西组成，特定的粒子排布就可以让物理对象具有不同的颜色，而颜色这种性质显然是粒子自身不具备的。④ 在布拉德雷的论证里，这种可能性实际上被完全忽视了。

其次，从论证的逻辑上看，布拉德雷先是因为逻辑上包含矛盾而否定了对空间的实质主义理解，接着又因为关系主义的空间观念包含矛盾而将关系归于显象，这就意味着他要么在没有彻底驳倒实质主义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假定了关系主义是正确的，要么在两个不同的论证中使用了不同的"矛盾"标准。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他就首先预设了空间是关系性和观念性的，如此便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面临的挑战则可能更大，因为一旦严格执行他自己的矛盾标准，那么所有理论之间也就无法进行任何争论或比较了，因为它们必定都包含矛盾、因而同样都是错误的——这样的后果显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布拉德雷的论证都未能给我们提供一套对空间本质的合理解释：他的空间观要么做出了违背关于空间知识的预设，要么是循环论证的产物、事先预设了"关系主义＋观念论"的立场。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承认了他论证的效力，空间本身的角色和地位又会变得很尴尬：它不过是"显象"，我们对它的刻画或认知最后会陷入"矛盾"中——这意味着我们最终无法获得关于空间的任何肯定性的、正面的认知。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免布拉德雷论证中的困难，在坚持存在一元论的前提下提出更合理的空间观，或者至少使得其与"关系主义＋观念论"的立场更相容呢？在这个问题上，西田几多郎的"场所逻辑"可以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参照。

---

① 参阅 Bradley，F. H.，*Appearance and Rea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30，pp. 31－32。

② Bradley，F. H.，*Appearance and Rea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30，p. 31。这里一个隐藏的预设是，布拉德雷认为关系都是包含矛盾的、非实在的，因此只要有任何东西涉及关系，就肯定属于显象。不过，这种关于关系的观念是成问题的，后来也引发了无数争议。囿于篇幅，我们在此不做过多深入。

③ Bradley，F. H.，*Appearance and Rea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30，p. 32.

④ 参阅 Mander，W，1994，*An Introduction to Bradley's Metaphysics*，Oxford：Clarendon Press，p. 116。

三、用“场所”来理解空间
——西田几多郎的思路

西田能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凭借的还是在《场所》等文章中提出的“场所逻辑”“绝对无的场所”（Basho of Absolutely Nothing）等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构成了其哲学体系最有特点的部分，而且与布拉德雷的形而上学思路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又具备独特的东方哲学色彩。

“场所”（场所/ Basho）[①] 这个词在日语里的字面意思就是地点、地方，但西田赋予了它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关于他提出这个概念的最初动机，一种常见且合理的解释是：他试图找出一种能克服西方哲学中流行的主客二分的二元论之弱点的、把主体与对象统一在一起的理论。“场所”概念的引入就以对亚里士多德主词逻辑的反思开始，建基于对判断结构本身的重新思考。简言之，西田的基本思路是在判断中更侧重谓词而非主词，这等于是一种以谓词为出发点的进路，可以被称为“谓词逻辑”（predicative logic），而整个场所逻辑就建基于对主词和谓词之间角色的倒置。具体来说，在一个判断中，本来应该代表共相（或曰普遍者）的谓词取代了本来应该代表殊相的主词，被西田重新确立为一条断言或判断的真正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日常语言都需要被重新解释。例如在“红色是一种颜色”（red is a kind of colour）中，虽然其语法上的主词是“红色”，但真正的主词却应当是“颜色”，因为该命题说的其实是：普遍的“颜色”将自身“映射”（mirror）为“红色”。[②] 经过这样的“改写”或“重释”后，谓词就被理解为我们做出判断的地方（place）或场所，而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或场所中，语法上的主词才被允许出现并发挥其相应的作用。可以看出，场所由此就成了一种可以包含所有“东西”的处所；对这样的处所而言并不存在主客二分，相反，它才是主客二分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西田有时将它形容为一面“自我映照的镜子”（自ら照らす鏡/self－mirroring）[③]。可见，西田所理解的谓词是包容性的（inclusive），借助研究者克鲁梅尔的总结就是：“（这）意味着比语法上的谓词或概念上的普遍者更多的东西，而西田有时会提醒我们，普遍者和特殊者……都被放置在（implaced in）他等同于真正无的场所的、最终超越性的谓词层面（final transcendent predicate－plane）。”[④] 一旦接受了这种思路，我们自然就会被引向一个吞噬所有普通认知和思想的深渊，那里不再有任何主客之间的区分；[⑤] 而西田本人对此做出的比喻性描述是：“我想在所有事物的根源那里，设想一种没有见者的看（a seeing without a seer）。”[⑥]

那么，在场所逻辑的体系下，我们该如何理解空间的本质呢？

西田哲学有一个较为漫长和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较早的《善的研究》阶段，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纯粹经验”，指一种无区分的经验整体，空间等概念就是在“纯粹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构造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空间观同样可以被视作是“关系主义＋观念论”式的。这种“纯粹经验”的观念在其后来的哲学中并没有被放弃，而是与场所逻辑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有人认为西田的场所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客观世界确立自身的地方，而场所包含的

① 在英语世界中，“场所”更多地被音译为“Basho”而非意译为“place”，这是因为它并不指示任何具体的地点，而是指我们的经验得以可能的处所。参阅 Krummel, J. , 2015, *Nishida Kitaroö's Chiasmatic Chorolog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 25。

② 参阅《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东京：岩波书房，第428－429页。关于西田的译文，笔者会直接引用黄文宏翻译的《西田几多郎哲学选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③ 《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第454页。

④ Krummel, J. , 2012, “Basho, World, and Dialectics: An 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ishida Kitarō”, in Place and Dialectic: *Two Essays by Nishida Kitarō*. Translated by John W. M. Krummel and Shigenori Nagatom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8－19.

⑤ 参阅《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第458页。

⑥ 《西田幾多郎全集》第三卷，第451页。

否定性的、没有主客之分的那一面，就是“纯粹经验”当中的一种“否定性的空间”（negative space）。[①]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西田的空间观呈现出与布拉德雷类似的倾向性，即认为空间不是真实的（至少不是真实程度最高的）存在，而是要以某些先验（transcendental）的东西为前提条件。[②] 只不过，西田并未因此就将空间斥责为包含矛盾的显象，而是通过自己的场所逻辑体系给予它一个恰当的位置。

具体而言，西田认为通常所谓的物理意义上空间只能以场所为前提。对了说明这一点，他使用了反证法：空间本质上涉及关系（这也表明他在此问题上持有典型的关系主义立场），任何关系又必定涉及关系项，而如果没有一个让这些关系项成为整体的场所存在，我们就会陷入无穷倒退的境地。因此他断言：“能让物理的空间与物理的空间得以关系在一起的，并不是物理的空间，而且物理的空间还必须有‘存在于其中的场所’（於いてある場所）。”[③]

显然，西田对关系的理解与布拉德雷如出一辙，两人解决关系可能暗含的无穷倒退的方式也很类似，即通过反证法表明必定有一个东西让关系项成为一个统一体，而这个东西又不可能由关系项自身提供。只不过，两人在达到这一点之后便分道扬镳了：布拉德雷认为这表明关系自身包含矛盾，因而将其斥责为显象；西田则认为能提供这一点的是自己所谓的场所。

西田指出，空间与场所不同，因为“就空间来说，同一个空间中不能同时有两个物存在，但是在意识的场所中，无限的重叠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无限制地透过全般概念来超越受限定的场所。”[④] 但必须注意的是，他所谓的场所也是有等级的。在涉及空间本质的问题上，我们可以达到的只是“对立的无的场所”（the place of oppositional nothing/对立的無の場所）或“相对的无的场所”（the place of relative nothing/相対無の場所）；这种场所只是相对于具体对象而言的，是这些具体对象存在于其中的“地方”。之所称其为“对立的”或“相对的”，是因为其自身的存在仍然需要另一个“地方”。而真正为“相对无的场所”提供场所的，只能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绝对无的场所”，这也是整个场所逻辑的终点。

至于日常所谓的空间，“相对无的场所”已经提供了它存在于其中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被称为“先验空间”（transcendental space）[⑤]。既然日常的空间以“先验空间”为前提，它本身就不可能是纯粹的无；所以虽然我们有时会认为空间是“空”的（“空しき空間”）[⑥]，但这并非其本质。更准确地说，空的空间也是一种“有”，毕竟它不可能像“绝对的无”那那样空无一物。由此可见，西田是按照逻辑的顺序来理解空间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空间得以可能的逻辑条件，然后是空间在整个场所逻辑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而在达到场所逻辑的终点之前，空间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在相对的“无”之中的“有”，就是空间；在“有”之中的“有”，就是日常事物。[⑦] 日常的空间也被他称为“知觉空间（知覚の空間）”[⑧]，它需要以“先验空间”为前提；而“先验空间”自身也需要前提。为了终结这样的无穷倒退过程，最后必定有一个真正的“无”、也就是“绝对无的场所”，作为相对的“无”的前提。[⑨] 直到抵达“绝对无的场所”，

① 参阅 Botz – Bornstein, T., “Nishida and Wittgenstein: from ‘pure experience’ to Lebensform or new perspectives for a philosoph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ian Philosoph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of the East*, Vol. 13, No. 1, 2003: p. 54。

② 参阅 Krummel, J., 2012, “Basho , World, and Dialectics: An 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ishida Kitarō”, in Place and Dialectic: *Two Essays by Nishida Kitarō*. Translated by John W. M. Krummel and Shigenori Nagatom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3。

③ 《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第 416 页。

④ 《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第 452 页。这里的“全般”即我们通常所译的“一般”。

⑤ 参阅 Krummel, J., 2015, *Nishida Kitarōō's Chiasmatic Chorolog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 25。

⑥ 参阅《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第 436 页。

⑦ 参阅《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第 441 页。

⑧ 参阅《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第 451 页。

⑨ 参阅《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第 451 页。

“有”与“无”之间的矛盾才会消失，此时只有纯粹的无存在。①

之所以能构建出这样的体系，不仅因为西田坚信空间是一种关系，还因为他对关系的理解很独特：他认为所有关系的基础最终说来就是一般（日语为“全般”）和特殊之间的逻辑的关系，空间关系就是以这种逻辑关系为基础构建而来的。他举例说明道：“在‘红色是颜色’这个判断当中，就客观的层面来说，系词意味着在全般者当中有特殊者存在，意味着全般者是特殊者的场所。真正的全般者在其自身是同一者，并且必须内在地包含种差。”②

可以看出，西田想为自己的整个体系寻找这样一个终点或最终的根据：它无需其他标准或前提，而它本身又是其他一切东西的标准或前提，或至少是这种标准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与布拉德雷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布拉德雷恐怕很难走向这样一种通过“无”来解释“有”的思路，毕竟“无”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而这样的思想资源对于布拉德雷而言是缺失的。

然而，西田通过场所做出的对空间本质的解释仍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在涉及“绝对无的场所”时，我们会遇到本文第一节提出的那种问题：这种“无”本身包含区分吗？如果它不包含区分，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产生出“有”，毕竟“有”的存在就意味着区分的存在——何况我们至少还可以做出“有”和“无”之间的区分；如果它包含区分，我们恐怕就无法理解它在何种意义上还能被称作“无”，毕竟区分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些什么存在，无论这些存在如何被理解。与布拉德雷相比，西田的方案或许更融贯一些，但他不得不以某种隐晦的方式让“绝对无的场所”本身就暗含某种差异，其实也就是暗含了“有”或“多”。比如在此前提到的“自我映照的镜子”中，“自我”和“镜子”显然是两个东西，不可能都是纯粹的无。这就等于是克服了布拉德雷方案的部分缺陷，却落入了另一处陷阱。那么，有没有可能摆脱上述这些陷阱，在存在一元论框架下更融贯地解释空间的本质呢？为此，我们可以去另一种东方古老智慧的结晶——不二论吠檀多——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

四、空间与“梵”是一体的——不二论吠檀多的思路

“吠檀多”（Vedānta）一词的本意是“吠陀的终结”，也可以指印度正统六派哲学③中的一派。它虽然有较为浓烈的宗教色彩，但有大量内容涉及与世界和人有关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如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什么是解脱、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人的本性是什么、灵魂与神的关系等，因而代表了印度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吠檀多内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根据近代印度哲学家辨喜（Vivekananda）的概括，这些流派包括二元论（dvaita）、限制不二论（viśiṣṭādvaita）和不二论（advaita）。在印度的宗教背景下，其不同流派的主要分歧在于人与永恒存在的神之间的关系。例如，二元论（其代表人物为摩陀婆［Madhva］，生活在约13—14世纪）认为存在着永恒的神、永恒的自然以及无数永恒的灵魂，这就意味着人和神是永恒分离的；限制不二论（其代表人物为罗摩奴阇［Rāmānuja］，生活在约11—12世纪）则认为人在神之内，可以说是作为整体的神的一颗微粒，而整个宇宙则都是神自身的显现；不二论（其代表人物为商羯罗［Śaṣṭkara］，生活在约8—9世纪）则认为人就是神、人与神并无分别。可以看出，这三种吠檀多在逻辑上——而非时间顺序上——构成了三个阶段，即从二元论、限制不二论到不二论，不二论是其最高级的形式。这三者中的后一个阶段并不是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升华或发展；不二论者也并不认为限制不二论或二元论是错误的，

① 参阅《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第443页。

② 《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三卷，第4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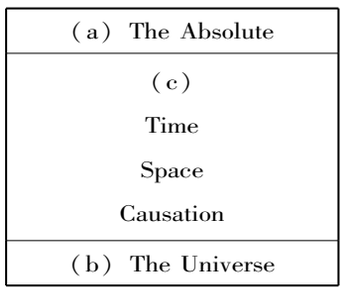
③ 即数论、瑜伽、正理、胜论、弥曼差、吠檀多。

而是将它们视作对自身主张的一种不完善的展开。

不二论的基本观念在奥义书的部分段落中得到了初步的表达，例如“最初只有存在，独一无二”①。概括地说，不二论者坚称最终说来存在的只有一个东西，而我们看到的世界不过是这个唯一的存在者看上去的各种样子。这显然是典型的存在一元论立场，自然也就面临着此前提到的难题：我们的世界明明是多种多样的，怎么能说是这些东西都是“一”呢？就算世界是“一”，难道我们各自的灵魂也都是一体的吗？这是不二论哲学中最核心的困难。

商羯罗在化解此困难时采用了关于黏土的经典比喻：黏土可以被做成各种东西，也就是呈现为各种不同的样子；但无论如何，黏土本身其实并没有任何变化，是唯一真实的东西，而使用其作为材料的罐子等物品则不过是它的各种显现。他认为我们看到的世界也是如此：在世间万物出现之前，唯一存在的只能是那个无差别的存在者或曰绝对者（The Absolute）。这样的说法看上去与布拉德雷和西田非常类似，但商羯罗一个极富洞见性的观点是：即便在万事万物出现后，真正存在的仍然只有那个无差别的存在者或绝对者——它可以被称为“梵”（Brahman），世界是它的各种显现，但这些显现并不能脱离它而独自存在，因此仍然与它是完全一体的。而这些显现之所以呈现为看上去的样子，只是源自名称（name/ nāma）和形式（form/ rūpa）上的差别而已。②

在各种名称与形式中，空间居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关于这一点，辨喜在后来给出的解释更浅显易懂一些。他把我们此前提到的核心困难概括为：无限者、绝对者如何成为有限的东西？对此，他通过如下图示加以说明：③



在这张图中，时间（Time）、空间（Space）和因果关系（Causation）就像一面玻璃或一张面纱，我们只有透过它才能看到绝对者（The Absolute）——这里的绝对者其实就是“梵”——因而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它。而当绝对者透过这张面纱被看到时，其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宇宙（The Universe），也就是这个充满多样性的世界。由此可见，真正的绝对者其实是无法被看到或知道的，它超越于可感、可知的东西之上，我们通常的感觉和知识都不适用于它；而时间、空间、因果性这三者构成了我们认知世界的基础，一旦离开它们，我们也就不会再看到绝对者显现出来的样子了。

上述论断似乎与布拉德雷关于实在的说法、西田关于“绝对无的场所”的说法都非常接近：在布拉德雷看来，显象被斥责为是包含矛盾的、因而不真实，显象与实在之间被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自然就意味着空间属于显象、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在西田看来，空间是一种相对的有，需要“相对无的场所”作为自身存在的、逻辑上的前提条件，因而也

① 参阅《歌者奥义书》6.2.1，引自《奥义书》，黄宝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还请参阅 Sri Sankaracarya, 1996, *Brahmasūtrabhāṣya of Śrī Śaṅkarāchārya*, translated by Swami Gambhirananda, Calcutta: Advaita Ashram, 2.1.14, p.128。需要说明的是，印度的哲学家很少直接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而是通过注释经文的方式阐发各自的理论。商羯罗也不例外，所以其主要哲学思想其实被表达在他对各类经典的注释中。这里提到的 *Brahmasūtrabhāṣya of Śrī Śaṅkarāchārya* 即商羯罗对经典文献《梵经》（*Brahmasūtra*）的注解，也是商羯罗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英译本为目前商羯罗研究中通行的版本。

② 参阅《歌者奥义书》6.1.4，6.2.1－2，出自《奥义书》。参阅 Sri Sankaracarya, 1996, *Brahmasūtrabhāṣya of Śrī Śaṅkarāchārya*, translated by Swami Gambhirananda, Calcutta: Advaita Ashram, 2.1.15－20, pp.128－137。“名称”和“形式”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在中国佛教中也被翻译为“名色”。

③ 参阅辨喜《瑜伽奥义丛书·卷二·智慧可以带我们到哪里：辨喜论智瑜伽》，张励耕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只是一种构造的产物。但是，不二论在处理空间之类的事项与梵的关系时另辟蹊径：并没有简单地断言前者并不具有实在性、是与梵不同的另一类存在，而是主张它们与梵是一体的。

具体而言，不二论并不认为梵（或曰“绝对者”）是真实的、其显现（或曰“世界”或“宇宙”）是不真实的，而是坚称它们本就是一个东西，所以从一种极端的角度甚至可以说，世界和世界内的万事万物其实从未真正诞生过。[①]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不仅可以说空间并不真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它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而我们之所以拥有关于空间的经验或观念，只是因为隔着名称和形式的面纱在“看”唯一的绝对者而已；但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如此，空间又不能被说成是与梵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梵，甚至“空间”这个词也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并没有指称梵之外的任何东西。

不二论者正是通过这样独特的方式克服了布拉德雷和西田面临的一些困难。与布拉德雷把实在与显象截然分开、使用奇特的“矛盾”概念的方案相比，不二论者既没有坚持一种成问题的“矛盾”观念，也没有片面强调梵的真实性，而是把空间界定为单纯的“名称”或“形式”，这样反而让空间成了一个不能与梵相分离的东西，因而永远地与真实的东西合而为一。而与西田的“绝对无的场所”相比，由于梵超越于“有”和“无”之上，它就既不能被说成是“无”，也不能被说成是“有”，不二论者也就不会像西田那样陷入“无”不能产生“有”的困境。可见，在这三种学说中，不二论对空间本质的解释其实更经得起推敲。

不过，与其他存在一元论的情况类似，上述主张又引起了另外的困难：根据不二论的解释可以推导出“世界既等于梵又不等于梵”，但这是一条明显的矛盾式。说世界等于梵，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任何名称或形式当作真实的存在，因而唯一存在的只能是梵，所以世界不可能拥有比梵更多或更少的部分，双方只能是相等的；说世界不等于梵，则是因为双方不可能具有所有相同的性质，比如梵不可能拥有区分，而世界则不然，它可以包含多样性和差异。简言之，梵和世界都必定会拥有一些对方所不拥有的性质。化解这个难题的进路无非就是三种，但都是走不通的：如果认为世界所拥有的那些性质是非实在或非真实的，不二论就可能会回到布拉德雷的立场上；如果认为世界所拥有的性质是真实的，则梵本身就包含了区分，这样就可能会回到西田的立场上；如果认为世界所拥有的性质既是真实的又不是真实的，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一条显而易见的矛盾式——这就让不二论再次陷入了悖论式的境地。可见，虽然对空间本质的解释相对融贯，但在更深入的层次上，不二论本身仍然有难以克服的障碍。

五、结 论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存在一元论解释空间本质的三种尝试都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

在布拉德雷那里，首先，他的解释部分违背了关于空间的知识；其次，他并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贯彻“矛盾”概念，而且整个思路有比较大的“循环论证”的嫌疑，事实上是先预设了对空间的关系主义理解，最后又将其作为结论。由于这些缺陷，我们很难说他所提供的对空间的“关系主义+观念论”解释是令人满意的。

在西田那里，空间仍然在“关系主义+观念论”的框架下被理解，而日常的“空间”观念则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构造，后来又被阐释为其场所逻辑中的一环。与布拉德雷相比，西田的理论并没有明显的循环论证嫌疑，也没有简单地否定空间的真实性，而是将其置于“绝对无的场所”之下的某个层面上，因而相对更合理一些。但是，由于对于绝对的“无”如何生出“有”的解释充满争议，其空间观的

① 参阅 Sri Sankaracarya, 1996, *Brahmasūtrabhāṣya of Śrī Śaṅkarāchārya*, translated by Swami Gambhirananda, Calcutta: Advaita Ashram, 2. 1. 14, p. 128.

哲学基础仍然是不牢固的。

不二论提供的空间观相对而言最为融贯：通过对“名称”“形式”的独特解释，空间之类的日常概念既不会对唯一的存在者本身的实在性产生影响，又通过与之融为一体的方式而确立了自身的地位。然而，它对于世界和梵之间关系的解释却很难说是站得住脚的，要么必须退回到布拉德雷或西田的立场上去、从而又陷入他们各自面临的困境，要么不得不接受某些形式上的矛盾式，这样的代价同样很难让人接受。

空间只是诸多日常概念中的一种，但对它本质的解释在一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而上述哲学体系提出的空间观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笔者看来，我们由此可以做出的推论是：存在一元论很难与我们日常的空间概念兼容，而这种不兼容性的根源还是在于“一”与“多”，或者说是“无”与“有”之间的鸿沟。毕竟，无论做出怎样理智上的努力，我们总是不能完全合理地解释“一”如何产生“多”，或是“无”如何生出“有”，总还是要做出某种对“多”或“有”的预设才行，无论这种预设多么隐晦、巧妙。

在此基础上，需要被进一步反思的恐怕是存在一元论这种立场本身。如之前提到的那样，不可否认的是，存在一元论的确有其独特的理论魅力，但其背后所隐藏的却是对统一性或一体性本身的过分追求，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时常会偏离最基本的常识乃至逻辑规律——布拉德雷对“矛盾”一词的怪异使用就是例子。既然如此，在理解日常世界时，我们还是采取二元论、多元论或相对温和的基体一元论、优先一元论为好，这样也可以更好地维护我们的常识与逻辑规律，从而为哲学领域内的理智探险提供更好的支撑和保障。

■责任编辑/张瑞臣

Does Existence Monism Reasonably Explain the Nature of Space? The Cases of F. H. Bradley, Nishida Kitarō and Advaita Vedānta

ZHANG Li-ge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How to interpret the nature of space is a significant topic in both our daily life and philosophy; for example, philosophers tend to argue whether space is a kind of reality, or whether it is merely a relation between objects, and so on. As a metaphysical view and with its uniqu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Existence Monism has encountered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its interpretation of 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including space, because the distinctions or differences implied by space are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the only “One” asserted by Existence Monists. This paper scrutinizes three quite similar but different kinds of Existence Monism in F. H. Bradley’s philosophy, Nishida Kitarō’s philosophy, and Advaita Vedānta, and then analyze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ature of space within thei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pointing out the weaknesses of these interpretations respectively: Bradley fails to use the concept of “contradiction” consistently, and his argument is suspicious of circularity; Nishida has difficulty in rationally explaining how the Absolute “Nothing” can give rise to “something”, and Advaita Vedānta cannot coherently shed light on whether “Brahman” and the world are equivalent or not. On the basis of these inquiries, the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some weaknesses of Existence Monism itself, concluding that it is fundamentally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One” and the “many”. Such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will help us to transcen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s, gain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different kinds of philosophies.

Keywords: space; Existence Monism; F. H. Bradley; Advaita Vedānta; Nishida Kitarō

“美是那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

——论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美学的现象学阐释

贺　念[1]，朱　葵[2]

［1．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2．四川大学，成都　610065］

摘　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来源于他对柏拉图美学的现象学阐释。针对柏拉图《理想国》中艺术与真的关系，海德格尔指出艺术并不处于与真的“分裂”关系之中，而是在指向存在之真时具有等级意义上的归属关系；进一步，海德格尔通过对《斐德若篇》中“美是那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进行现象学阐释，指出美是“对存在之观照”（Seinsblick）的赢获和保持，因而是架接具体存在者的“显象”（Schein）与源初的“存在”（Sein）之间的桥梁。在重建美与真共属关系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了其存在论的美学命题：“美是存在的耀显（Scheinen des Seins）”，美在于现象的自身生成。

关键词：海德格尔；柏拉图；艺术；美；存在论美学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036－12

鲍姆加登建立美学学科之时，其整体的思考框架是以近代主体论哲学为背景的。从人所具有的主体能力知、意、情三个方面出发，他分别为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寻求哲学根基。他将美学理解为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并将之作为“低级的认识学说”。[①]后来，康德力求为美学与认识论划清界限，他认为美是无利害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的对象：“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和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种表象方式做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做美。”[②]并且正因为美是无利害的，所以鉴赏判断表达的是“无概念的普遍性”，它不同于逻辑判断，后者是通过客体的概念而构成关于客体的知识。康德的这一发展导致了近代主体论美学的两个后果：其一，美成了主体情感的对象，而经过费希特、新康德主义以及尤其是狄尔泰之后，艺术也成了表达主体体验的对象；其二，美与真之间的分裂。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正是在批判这两个理论后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比如针对第一方面，在《艺术作品的本源》的“后记”中海德格尔提出：“或许体验就是艺术死亡于其中的因素”，同时他为“死亡”加了脚注说：“这个句子并不是说，艺术绝对地走向完结了，而是说，将体验作为艺术的绝对因素是艺术的一种坠落，……并且要为艺术的生成去获得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因素。”（GA5，S.67）[③]主体性的体验不能作为艺术的绝对因素，它阻碍了艺术的生成，

收稿日期：2024－0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中的规范性问题研究”（项目号：21BZX09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贺念，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朱葵，四川大学国际处助理研究员。

① Baumgarten, *Texte zur Grundlegung der Ästhetik*, übersetz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ans Rudolf Schweize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3, S.17.

②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③ 本文在引证海德格尔文本时除了《存在与时间》采用单行本之外，其余均采用 Vittorio Klostermann 出版社的全集版，以学界惯例直接在正文中标注缩写、卷数及页码。

那么什么可以通达艺术自身呢？那个“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因素”是什么？回答自然是：存在。海德格尔说：“只有从存在问题出发，对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沉思才得到了完全的和决定性的规定。”（GA5，S. 73）。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美和艺术，不能将之作为表达主体情感或体验的对象来理解，而应当从存在自身出发，从现象自身的显现出发来理解。

针对第二方面，海德格尔则从真作为存在的无蔽出发，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提出了其著名的论断“艺术就是真自行设置入作品”以及“美就是存在的耀显（Scheinen）”“美是作为无蔽之真的一种本性化（wesen）的方式”（GA5，S. 43），从而重建了艺术、美与真之间的共属一体的关系。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观的提出扭转了我们思考美学基本问题的路径，对后世美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海德格尔为美学所带来的这一“存在论转向”以及由此重建的“艺术、美与真的源初关联”究竟在思想上生发于何处呢，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尚缺乏研究。本文则尝试提出，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根本上起源于他对柏拉图美学所进行的现象学阐释，尤其是他对柏拉图《理想国》和《斐德若篇》中“艺术与真之关系”以及“美是那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之独特本性问题所进行的深入而又富于创造性的阐释。

一、海德格尔对《理想国》中“艺术与真之关系”的现象学阐释

一般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艺术理解为“对事物之显象的摹仿”，而具体事物又是对事物之理型（eidos）的分有，故艺术乃是“影子的影子”，它与真之间隔了两层；并且也正是因为艺术与真之间是分裂的，进而柏拉图提出应将诗人赶出理想国。这样似乎容易造成一种印象，柏拉图对艺术、美与真的关联会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批判态度。如果是这样的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就似乎应当从反对或舍弃柏拉图美学开始，而又怎么会说，恰恰从它之中起源呢？事实恰恰相反，海德格尔通过重新考察，对“艺术与真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梳理。

海德格尔在对《理想国》卷三和卷十的文本解读中，他的确也同意在柏拉图哲学中艺术与真之间有不可克服的距离（Abstand），对此，他总结到：“柏拉图初步向我们表明：艺术带来和给出的东西，始终都是对存在者的描绘；艺术并非无所事事，但它的生产和制作，即 poiein，始终是 mimesis（摹仿），是一种仿描和重描，一种虚构意义上的创作。因此，艺术本身就包含着不断欺骗和撒谎的危险。按照其行为的本质来看，艺术并不具有与真实之物和真实存在者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关联。”（GA6. 1，S. 170f.）然而，海德格尔却进一步指出这种在等级上的距离并不等于一种分裂（Zwiespalt）。如果要真正理清该如何界定这种关系，那就需要重新考察柏拉图所提出的床的三种制造者之间的关系。

在《理想国》卷十中谈论了三种床及其分别的制造者（596b－），第一种是由神所制造的床的理型，第二种是工匠所制造的实际存在的床，第三种是由画家通过摹仿而制造出来的床的显象（Schein/Anschein）[①]。我们首先考察前两种制造之间的关系：作为理型的床是所有个别床中的那个“同一”，它让床的本质涌现，作为个别实存物的床来自于工匠的制造，它是

① 此处的希腊语是 φάντασμα（598b），它来自于动词 φαντάζω（意思为“使显露、展现”“夸耀”等），对应的德文词是 Schein（海德格尔有时也会使用“Anschein”来翻译它），其含义有“显象”“光线”“外表”等，对应的英译为 appearance（参看 Plato：*Plato Complete Works*，edited by John Cooper，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p. 1202），中文里有多种翻译，在一般哲学语境里多数情况被翻译为“假象”或“幻象”，在柏拉图文本中，一般翻译为“外形”（参看《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第 59 页）或者“影像”（参看：《柏拉图全集》第 2 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617 页），本文主张翻译为“显象”，主要考虑有二：其一，强调了它本来的动词在中性意义上的“显露”含义，其可能的“假象”或“幻象”含义都是在此基本含义基础上的引申；其二，这一点更为重要，那就是只有译为“显象”才能将海德格尔对此阐释所采用的现象学的第一条原则“有多少 Schein，就有多少 Sein”结合起来。相应的，本文也将其动词“Scheinen”翻译为“耀显”，如海德格尔说“美是存在的耀显（Scheinen des Seins”（GA5，S. 43）。在溥林翻译的新的希腊语与汉语对照本中也被翻译为“显象”，参看柏拉图：《理想国（政制）》，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 年，第 757 页。

可供使用的，是现实地完成了的。工匠的制造是有前提的，因为对一个工匠来说，“他必须看见理型，才能成其所是，即成为桌子的生产者。”（GA6.1，S.177）因此，理型是在他之前的，作为一个制作者，工匠已经以某种方式是一个摹仿者了。工匠的这种制作，意味着：“使理型本身在另一个被制造者中显示自身，把理型‘生产’（带出来，her－stellen）出来，并不是把它本身完结（anfertigen）出来，而是让它显现出来”（GA6.1，S.178），也就是说，工匠并不是将理型（存在）自身生产出来，而是将存在者的存在带入感性可见的在场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看，工匠所生存的就是某个具体的存在者，而不是生产“存在者的存在”，他并不生产床的 Wassein（作为什么而是），而是生产这个或那个床。因此，工匠的制造从属于 eidos，从属于作为存在之无蔽（aletheia）的真。

那么，画家的摹仿与工匠的制造有何区别呢？“艺术”（techne）这一语词，在古希腊与“技术”同源，techne 最初并不是指一种制作或者手工行为本身，而它乃是一种“知道”（Wissen），它以知识性的生产指导为方式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开启。这种知道根本上乃是存在者之去蔽。[①] 柏拉图则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艺术作为带来和给出东西，始终都是对存在者的描绘。与工匠生产实际的床不同，作为摹仿者的艺术家是拿着“镜子”生产的人（596d）。艺术的生产不再是现实性的制作，而只是带出来，即镜子使一切存在者如其看起来的显象那样在场着。工匠只能生产专门的东西，木匠看到桌子的理型而摹仿，鞋匠看到鞋的理型而摹仿，而艺术家则能“生产”一切东西，正如柏拉图所说“你马上就可以试试，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你就会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以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切东西”（596d－e）[②]。尽管艺术家通过镜子可以制造一切，然而“却只能在显象上制造它们，而不是实体”[③]。艺术生产的其实不是存在者的存在，即 eidos（理型），而只是纯粹理型的显象（Anschein/appearance）。海德格尔在此给出了工匠的更进一步的区别，即画家只能从一个视角来生产桌子，因而并不能将一个个别的桌子“完全地”生产出来：“一张个别的桌子呈现出不同面的不同景象。……与之相反，画家却始终只能从特定的位置把桌子收入眼帘。因此，他所生产的始终只是桌子显现的一个视角（Ansicht），一种方式。如果他从前面画桌子，那他就不能画它的背面了。他始终只是在一个视角中把桌子生产出来。画家不仅根本上不能生产任何一张个别的桌子供人使用，而且他甚至不能把这张个别的桌子完全表现出来。”（GA6.1，S.188）——在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摹仿从属于工匠的制造。其原因不是因为艺术家在“复制”或“临摹”意义上摹仿，严格来讲，他无法真正复制存在者，而是由它在存在者之无蔽的制造方式中的距离位置所决定的。

如果工匠对床的制造从属于神所制造的床的 eidos，而艺术的摹仿又进一步从属于工匠的制造，那么“艺术其实是远离真的”（598b）。这种差距不是量上的，而是等级上的。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尽管艺术与源初的存在之真之间有等级上的距离（Abstand），但却并没有分裂（Zwiespalt）。海德格尔这一观点根本上有两点理由：

第一，神、木匠和画家所制造出来的床并不是床的三种不同的种类（Art），毋宁说都只是那作为源初之真的床的三种不同的显示方式。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三种不同的存在者之床，而是唯一的存在者“床”的三种自行显示的方式。如海德格尔讲到，“在这里，柏拉图的意图是要说明，在这里的‘同一者’（das Selbe）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显示自身的，即要说明自行

① 对作为“艺术”与“技术”的“techne”的原始含义的详细探讨，可另外参看海德格尔：《尼采》第1卷，GA6.1，S.78－81，S.164－172；或参看李必桂：《原艺——海德格尔与尼采艺术哲学比较研究·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② 可对照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英文版 Plato：*Plato Complete Works*，edited by John Cooper，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p.1201

③ 同上

显示的三个方式以及在场状态的三个方式，因而也就是存在本身的三个变化方式。”（GA6.1，S.184f）因此，艺术与源初之真的距离并不是不同存在者之间的距离，而是同一存在者的自行显示方式在存在等级上的距离。

第二，海德格尔认为，如果要使用“分裂”这个语词来形容艺术与真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必须预设艺术与真其实是被抬到了同等的（并列的）本体论地位，实际上，艺术与真的距离根本上是因为艺术的地位从属于真。[①]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对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来说，在存在者之在场状态的不同方式，因而也就是存在的不同方式的等级秩序中，艺术是远远低于真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距离。但距离（Abstand）并不是分裂（Zwiespalt）。……因此，只要按照柏拉图《理想国》的描写，根据真来衡量，艺术处在第三等级，那么艺术与真之间虽然有一种距离和从属关系，但不可能有一种分裂。要是艺术与真之间可能有一种分裂，那么艺术首先就必须被抬高到相同的地位上。”（GA6.1，S.190，192）海德格尔的这一分析一方面是对柏拉图所言“艺术与真之间隔了两层”这一论断之真正内涵的剖析，另一方面也是对其可能导致“艺术与真之分裂”的误解之纠偏。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说“艺术与真是分裂的”，而只能说“艺术与真有距离”，艺术作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第三等级的摹仿只能从某一个视角出发，而且必定实现在感性领域，故远离了源初的存在之无蔽（真），但这也并不是说艺术完全不能通达真，恰恰相反，艺术作为显象尽管它可能带有错误和欺骗，但却是指向着源初的存在之无蔽的，因为画家所创作的“床”指向的并不是另外的东西，而恰恰就是那“同一个”床的 eidos。海德格尔在此实际上采取了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有多少 Schein（显现、显象/假象），就有多少 Sein（存在/是）”[②] 作为其核心阐释方法，他一方面强调作为摹仿的艺术生产的是显象，它有可能产生欺骗或缺陷，但依然是指向存在之真的，尽管艺术与存在之真之间有着等级上的距离。举个例子来说，梵高的绘画《星空》作为一种对星空之存在的一种“观看方式”，他实际上就是关于星空之 Sein 的一种 Schein，二者在无蔽之真的完全度上是有差距的，但尽管梵高所表达的这一显象可能带有欺骗和缺陷，根本上梵高的绘画制作活动所指向的“意向对象”还是那个同一的“星空之存在”，而不是指向仅仅关于它的某个侧显（Abschattung）。这一显象可能成为假象，但其指向的并不是“假象”，毋宁说，可能成为假象的显象是具体意向活动所产生的意向内容，但却不能将它等于意向对象。反过来说，作为意向对象的“星空”之存在者，它也只能在意向活动中呈现自身，也即是说在具体的直观活动所揭示的 Schein 中来表达自身。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象学的第一条原则“有多少 Schein，就有多少 Sein”被海德格尔十分熟练地运用在了理解艺术与真之关系上。

尽管海德格尔在此没有为艺术在存在论等级上的地位辩护，他没有在艺术与科学在表达真这一问题上究竟谁具有优先地位与柏拉图进行直接的争辩，[③] 但我们对海德格尔的柏拉图美学阐释的现象学路径已经具有了清晰的认识。

---

① 海德格尔明确承认，在柏拉图原始论述中，艺术与真的确是有距离的，但人文主义者埃拉斯穆与画家丢勒的理解后来则仅仅改了一步就扭转了柏拉图的这一看法，即丢勒的兔子虽然描绘的是个别，但却“并不是把一个直接呈现在眼前的唯一的个别景象表现出来，毋宁说，由于他总是把当下个别的事物显示为这个独一无二的个别事物，他就让兔子存在（亦即动物的动物存在）在此个别兔子身上成了可见的”（见 Heidegger，GA6.1，S.189f），以此方式，艺术所表达的个别（诸多中的一个）就与真所代表的“一”统一了起来。

② 对这一原则的哲学含义之考察参看贺念：《有多少 Schein，就有多少 Sein：对现象学“第一条原则”的再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③ 不同于柏拉图将摹仿的艺术在表达真实的等级地位放置在数学与科学之下，海德格尔则通过强调艺术将大地与世界的争执彰显出来，尤其是可以让大地作为自身遮蔽者而显现出来，从而防止科学对大地完全的穿透，所以是源初的真之显现的方式，而科学只是一种真的扩展方式，故在表达源初之真意义上，科学的等级要低于艺术：“相反，科学却绝不是真的源初发生，科学无非是一个已经敞开的真之领域的扩展（Ausbau），而且是用把握和论证在此领域内显现为可能和必然的正确之物来扩建的。”（见 Heidegger，GA5，S.49）

在此，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即：如果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理想国》中艺术与真之间是一种有距离的从属关系，而不是分裂关系，那么在柏拉图思想中，真正探讨存在之真与存在之真的感性显现之间的“既分裂又共属一体”的关系是如何实现的呢？也就是说，存在之真的感性显现不再是对存在之真的从属（类似于传统哲学中现象对本质的从属），而是与它并列，在具备差异化的同时又与之共属一体的这种新型关系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只有说明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找到海德格尔提出“美是真本性化的一种方式”这一核心论点真正的哲学起源。这一秘密就隐藏在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斐德若篇》的现象学阐释中。

二、海德格尔对《斐德若篇》中“美”之含义的现象学阐释

《斐德若篇》的主题是探讨爱与美，以及爱与灵魂的关系，因此可以与《会饮篇》放在一起阅读。《会饮篇》更强调爱与美的阶梯说，而历史上曾分别给《斐德若篇》加上了“论美”“论爱”和“论灵魂”的副标题，后者则更强调爱与美的一般本性及其神圣性。海德格尔对《斐德若篇》的重要性给出了最高的评价，他认为“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以最严格和最完满的形式对艺术与美作了最深刻和最广泛的追问”。（GA6.1，S.170）之所以给出这个评价，是因为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才正式点明了“美与真”在存在论上的关系：一种“共属一体的分裂关系”。

海德格尔对《斐德若篇》中“美”之含义的创造性阐释分成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揭示柏拉图是在什么样的语境和范围中探讨“美”；第二步，指出柏拉图在此范围内对“美”赋予了什么意涵；第三步，总结柏拉图思想体现了“美与真什么样的关系”。

针对第一步，与《理想国》不同的是，《斐德若篇》对“美”的探讨完全不是在艺术或者艺术与真之间的联系的语境，而是在“人与存在者本身的关系”这一原始问题的范围内。柏拉图在《斐德若篇》里谈到了四种迷狂：预言的、教仪的、诗歌的和爱的，而他正是在最后也是最高的爱的迷狂中谈论“美”：“有这种（爱的）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存在者源初的真正的美，因而恢复羽翼，而且新生羽翼，急于高飞远举，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像一个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把尘世里的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称为迷狂。”（249d－e）对美的爱让人有了向着存在者源初之真进行超越的动力，这是人的灵魂所达至的最高迷狂。在此，柏拉图表达了一个关键性的看法：每个人的灵魂，天然地就曾经观照过存在者源初之真，“每个人的心灵都已经自发地看见了存在者之存在，要不然，他或许就从未进入这种生命状态”（249b）。正式凭借于人的灵魂“总是已经”亲临了存在者之真，那么对于真实存在之事物的认识，就依靠的是人的“回忆”：“哲学家的灵魂常专注在对这样美之事物的回忆，而这些美的观照正是使神成为神的。”（249d）[①] 柏拉图的这种“回忆说”思想所包含的“人的灵魂总是已经观看了存在者源初之真”之内涵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表达的就是存在之真对人的源初性关涉，[②] 并且它构成了对人之本质最根本的规定，用海德格尔在《尼采》讲座中所使用的语言就意味着“存在观照属于人的本性，使得人能够作为人而存在”（GA6.1，S.198）。这种源初性关联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人源初性的超越本性，人总是已经逸离出自身，并且在自身之外，也就是说，人的超越本性（因为美的耀显，而从感性领域向着存在者之真的源初领域进行飞越）正是在对美的爱的迷狂之中所发生的：“这种被提升而超出自身以及被存在本身所吸引的情况，就是爱（eros）。只是就存在能够与人

① 关于柏拉图论述美与爱的迷狂这一段文本参看：《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99－101页。

② 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将“存在对人的关涉”（Bezug des Seins zum Menschen）作为思想最高的行动，见Heidegger，GA9，S.313；另外，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实际上也已经借由器具的指示结构，亦即此在对物的理解与世界的源初性关涉的“先天完成时”（见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27，S.85）规定，表达了这一关涉总是已经发生了，总是已经被设为前提了，也就是说，不可再进行进一步还原和追补了。

相关发挥出‘爱的’力量而言，人才能够思考存在本身并且克服存在之被遗忘状态。”（GA6. 1，S. 197f. ）爱（eros）最根本的意义代表着人的超越性，并且同时是向着自己先前已经拥有的本质（对存在的观照）进行回归，也就是说，严格来讲，爱的超越性所实现的其实是对存在观照的一种“重新赢获”。爱重建了人的存在的源初关联，实际上，这种重建的源初动力就来自于美。于此，我们的考察跟随海德格尔而进入第二个步骤。

针对第二步，海德格尔的解释基于柏拉图在《斐德若篇》（250b－e）中所表达的关于“美”的颂词：

正义和审慎，以及人根本上必须首先珍视的其他东西，所有这一切在与它们的显象（Anschein）照面时都黯淡无光，毋宁说，我们是借助昏暗迟钝的工具来把握存在，并且是模糊且少有的，只有极少数人他们朝向与之相应的目光来洞察原初的源泉，亦即在显象中呈现出来的本质起源。但过去美却是光芒四射的，当我们的灵魂跟着宙斯走在灿烂的歌咏队伍里时，灵魂看到了极乐的景象，并被引导向最具仪式感的神秘之中。……如果理论智慧的显象（Anschein）能够如同美一样明显地被我们的目光所洞穿，它就会引起不可思议的爱了。但只有美才分得了这种命运，就是成为最耀显、又最令人出神的东西（εκφανεστατον και ερασμιωτατον）。①

这一段，柏拉图是在将正义等美德与美进行比较，他认为正义等美德在与它们的显象照面时是暗淡无光的，一般人很难把握到其本质，然而美却是光芒四射的，是最耀显的，最能够激起人的爱欲的。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这里谈论的根本问题是源初的“存在”如何通过具体的“存在者”而显现出来，通常我们较难通过正义的具体的“存在者显象”来通达其作为源泉的正义的源初存在，因为它暗淡无光，然而美却与之相反，它在“存在的闪现之本质秩序”中拥有最高的地位，因为它是那最耀显的（das Hervorscheinendste）和最令人出神的（das Entrückendste），从而最容易引领人朝向源初存在进行超越。正如海德格尔所总结到的：“美是那种最直接地走向我们并且迷住（berücken）我们的东西。由于美作为存在者与我们照面，它同时也使我们出神（entrücken），使我们进入对存在的观照。美就是这种在其自身中包含着对立者，它参与最切近的感觉显象同时又提升到存在之中：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出神的东西②。所以，正是美把我们从存在的遗忘状态中拉出，并提供给我们对存在的观照。”（GA6. 1，S. 199）如果我们想要在作为具体存在者的“显象”（Schein）与源初的“存在”（Sein）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话，那么美就是这一角色最理想的承担者，因为它一方面是在感性上最耀显的，容易吸引人，激起人的爱欲，但另一方面它也是最令人出神的，因而也是引导人离开自身，超出感性领域而向着源初的真进行超越的最强大的力量。由美所激起的爱不是走向自身，而恰恰是出离自身，从而完成由“对存在者的感性直观”向着“对存在的观照”进行飞跃式的转化。③ 本文将美所具有的这种独一无二的“二重性”特征归纳为从存在者层次的耀显

① 海德格尔对这一关键段落的翻译参看 Heidegger，GA6. 1，S. 199；对应的英译参看 Plato：*Plato Complete Works*，edited by John Cooper，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p. 527f：“but now beauty alone has this privilege，to be the most clearly visible and most loved”；朱光潜先生的翻译为“只有美才赋有一种能力，使她显得最出色而且最可爱”，参看：《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 191 页；溥林在新版的希汉对照本中译为“而事实上唯有美具有这种命份，以至于它是最能彰显自己的东西和最能唤起爱欲的东西”，见柏拉图：《斐德若》，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年，第 67 页。

② 为了突出美所具有的这种“间－性”或“二重性”，海德格尔在此有意使用了矛盾的构词“das Berückend－Entrückende”，两个词都是有动词词干 rücken 组成，原始含义为“推、移”，前者带有的不可分前缀 Be－是及物、使动的含义，意指“使移至醉心”，而后者带有的不可分前缀 Ent－是“去掉、远离”之意，故同时又指“出神”“迷到移出”。

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为什么说胡塞尔的“范畴直观”问题直接影响了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因为“从存在者到存在”就完全类似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六研究”中对“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的区分，与传统柏拉图主义将二者存在者与其存在（eidos，理型）分割在两个世界不同，现象学则认为对感性存在者的直观与“范畴直观”是同时发生的，是一个生活世界中发生的不同层次的直观活动而已。而海德格尔在其柏拉图解释中，最大的现象学收获乃是美是沟通“对存在的感性直观”与“对存在的范畴直观”之间的桥梁。

向着存在自身进行超越的桥梁。

鉴于海德格尔将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进行了时间性维度上的先天改造，那存在观照就属于已经先在的人的本质。但在感性生活领域中，存在遭到了遗忘，这种遗忘通常来说并不能首先通过对正义等问题的理智思考来唤醒，因为正义之显象“黯淡无光”，对常人来说，它的存在之真无法成为可见的，因此“必然要有一个东西，使得对存在观照的重新赢获、不断恢复和保存成为可能。这个东西只可能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照面之物的最切近的显象中同时也最可能使最遥远的存在显露出来。而在柏拉图看来，这个东西就是‘美’”（GA6.1，S.198）。海德格尔在此将美提升到了作为克服西方形而上学最根本问题“对存在的遗忘”的药方的地位，因为美一方面离我们很近，在感性领域中是最耀显者，另一方面它又指向最遥远者，即存在本身，从而使我们打破“存在遗忘”状态，向着存在之真进行超越。海德格尔对美的本质总结道：“美的本质已经变得清清楚楚了。美使一种对存在观照的赢获和保持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它使我们有可能从那种容易把我们吸引入遗忘状态之中的最切近显象中重新赢获和保持对存在的观照。”（GA6.1，S.200）在此，海德格尔甚至还提到了美相较于实践智慧（phronesis）所具有的优先性，因为实践智慧虽然与存在之真有着本质关联，但它自身并不具备自己的显象领域，所以并不具备如美所拥有的“打破存在遗忘”这一功能，根本上来说，海德格尔借助于柏拉图《斐德若篇》中对美的“二重性”的论述，独独将沟通存在者层次（感性领域）与存在自身层次（超感性领域）的关键桥梁作用优先地赋予了美。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走向第三步，事实上，海德格尔的回答已经呼之欲出了：因为美完成了从感性领域的存在者之耀显向着存在之真的过渡，所以尽管美与真是并列的，因而是“分裂”的，但就“都将存在自身带向显露”这一根本点来说，二者乃是“共属一体”的。海德格尔对此写道：

存在观照是把遮蔽之物开启出来，使之成为无蔽之物；按其本质把真实现出来，亦即把存在者之存在揭示出来，这就是美所完成的事情。美是这样来完成这件事的：它在显象中闪烁着令人出神，把人推入在显象中闪现的存在之中，这就是说，它把人推入存在之敞开状态之中，推入真之中。真和美本质上都与这个同一者（即存在）相关联；它们在这个惟一的决定性的事情上是同属一体的，那就是：使存在敞开出来并且使之保持敞开。（GA6.1，S.201）

如果我们简要地总结海德格尔的观点，那就是“美与真是同一的”，但这绝不意味着美与真是一回事，或者是相等的同一个东西，仿佛这样二者就可以相互代替，因为海德格尔绝不放弃美与真之间的差异，它具体体现在：“真乃是哲学思想中直接的存在的揭示方式，它并不参与感性领域，从一开始就疏远于感性领域。相反地，美则是进入感性领域之中，又从感性领域逸离出来的令人着迷的向着存在的出神（berückende Entrückung zum Sein）。”（GA6.1，S.202f.）美与艺术一样都直接关联于感性领域，但艺术与美在柏拉图哲学整体中具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完全不能将通常可能会有的“艺术是表达美的一种手段或途径”一般理解带进柏拉图哲学中，实际上在古希腊，艺术与美是完全不同层面的事情，二者经常是彼此冲突的概念。非常明显，艺术作为摹仿与美在柏拉图哲学整体具有不同的地位，比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谈到“美的阶梯说”时涉及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美，但并没有特别涉及“艺术美”。艺术与美甚至在与真的关系存在着冲突，因为艺术与真隔了两层，是从属的关系，艺术甚至因为等级较低而没有资格来谈与真的分裂问题，而美与真则处于并立分裂基础之上的共属一体关系，海德格尔称之为“令人振奋的分裂”（beglückender Zwiespalt），因为“真与美尽管有着共属一体的关系，但必定还是两个东西，彼此必定二分。不过，这种二分，即广义的分裂，在柏拉图看来绝不是一种激起惊恐的分裂，而倒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分裂。美让人超越感性而返回真。在这种彼此二分中占上风的还是一致性，因为美作为闪现者、感性之物，预先已经把它的本质隐藏在作为超感性之物的存在之

真中了”（GA6.1，S.202）。但是另一方面，美与真的这种“令人振奋的分裂”关系所意味着的“美与真是同一的”也绝不意味着在如下意义下“美与真是统一的”，仿佛美与真都可以放进一个更高的概念之下，实现二者之间矛盾的消解，比如“儿子”和“女儿”放在“父母的子女”这个共同的更高概念之下的“统一”。毋宁说，在美与真之外，并没有一个外在的更高的概念来统摄二者，因为美与真自身都是对作为无蔽的存在之真的敞开，根本上来说只是敞开的方式不同，真是纯粹超感性的，而美则是二重性的，它从感性领域中耀显出来，并指向了朝着存在之真的出神。美的这种二重性，更准确地来说，是“居间”的意义，它是连接者和桥梁。

综上而言，海德格尔围绕“艺术与真”以及“美与真”的关系这两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对柏拉图《理想国》以及《斐德若篇》中的文本思想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了其创造性的阐释，我们能够非常明确地看到海德格尔阐释的两个核心特点：第一，海德格尔实际上采取了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有多少 Schein（显现、显象/假象），就有多少 Sein（存在/是）”作为其核心阐释方法；第二，海德格尔的阐释根本上是一种存在论的解读，因为他强调“美是那最耀显的、最令人出神的”，将美作为了沟通感性领域的存在者与超感性领域的存在自身（真）之间的桥梁，并尤其将美作为打破存在遗忘的现实契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海德格尔赋予了美学独特的优先地位，只是这种存在论美学必须是现象学式的，因为美在此不是指主体的愉悦感，也不是指客体具有的性质，而是指在显象耀显的过程之中所带出的存在自身的彰显，它需要借助于现象学的方法“让自身显示者如其从自身出发所显示的那样，从其出发而被看见”①。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同时意味着，现象学也要以美作为其根本任务和方法，因为在美之中，最重要的现象，即存在自身，才能够得到最耀显的自身表达。在此意义上，现象学完成于美学。

三、美在于“现象自身显示其存在”：海德格尔的创造性转化

在以上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美学思想的现象学阐释中，我们已经明确，柏拉图的“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美，乃是“对存在之观照”的赢获和保持，美打破了我们日常的对存在的遗忘状态，唤起了我们对存在的观照。然而，这一点主要还是针对美所具有的存在论上的功能和优先性而言的，那究竟该如何理解“美”的本性呢？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美不应当从主体的体验，也不应当从客体的属性方面进行规定，那究竟该如何理解呢？海德格尔在《尼采》讲座中，借助于对康德对美之基本规定“无利害性”（Interesselosigkeit）的解释提出，在无利害的审美态度下，纯粹对象自身的显现就是美，而不是纯粹对象带给人体验的情感上的愉悦感，也不是纯粹对象具有什么样的客体方面的属性特点。海德格尔总结道：

> 对这一‘无利害’的曲解，导致人们认为，随着对功利的排除，也就把一切与对象的本质性关联都禁止掉了。其实情形恰好相反。与对象本身的本质性联系恰恰是通过“无利害”而发挥作用的。人们没有看到，现在对象才首次作为纯粹对象显现出来，而这样一种进入显现中就是美。“美”一词意味着在这样一种显象中的显现（das Wort schön meint das Erscheinen im Schein solchen Vorschein）。（GA6.1，S.110）②

“美就是纯粹对象的显现”，这意味着，美不再是如康德所说的一种自由的情感，而是这种显现自身。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说出了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美之本性最经典的规定“美是存在的

①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27, S.34.

② 关于海德格尔这一结论是否有对康德的误解，还是他更加本源性的思考了康德思想中那所未思的，可参看刘旭光：《海德格尔与美学》，“什么是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年，第 234－240 页。

耀显”——这就是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美学现象学阐释的创造性转化。让我们回到《艺术作品的本源》，看看海德格尔如何论述作品与美的关系：

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是真，而不只是一种真实。刻画农鞋的油画，描写罗马喷泉的诗作，不光是显示这个个别存在者是什么，而是使得无蔽本身在与存在者整体的关涉中发生出来。鞋具愈单朴、愈根本地在其本性中出现，喷泉愈不加修饰愈纯粹地以其本性出现，则伴随它们的所有存在者就愈直接愈有力地变得更具存在者特性。于是，自行遮蔽着的存在便被澄亮了。如此这般形成的光亮，把它的耀显嵌入作品之中。这种嵌入作品之中的（存在的）耀显（Scheinen），就是美。美是作为无蔽之真的一种本性化（wesen）的方式。（GA5，S. 43）

作品之为作品绝不在于它描摹了对象的真实，而是在于它敞开了世界与大地之间的争执，从而实现了作为无蔽的真，将林中空地中无蔽与遮蔽的争执带入作品之中，从而存在者赢得了它的世界，在这个敞开着的历史性世界里，它获得了其本己性，只要它愈单朴，愈纯粹地进入其本己性，那么它就越存在。而为什么这时，就有美产生呢？“这是因为自身遮蔽的存在自身，被照亮并且进入林中空地。林中空地因此便进入作品耀显，这种耀显以这种方式成为作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美，因为美就是真耀显的一种方式。通过对美的这种思考，我们就可以重新获得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① 也就是说，当真自行设入作品，真在作品中本性化地发生时，美就产生，美就是无蔽的真本性化的方式。

美在作品中是一种发生，它不是静止的固定的某种状态，它是存在的动态的显现过程。这一看法，扭转了整个形而上学对美的定义。但是，也许我们这里还需要追问，为什么存在的显现，或者说“真”的发生就是“美”的呢？这种“显现”与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有何不同？黑格尔的“显现”指的就是感性化，或者具体化，是对抽象普遍性进行的具体感性的表达。对黑格尔而言，美的显现依然是一个固定的形态，而不是显现过程自身，即不是一个动词。② 更为重要的区别是，黑格尔的美的规定，即绝对理念，是根本的主体性，而不是存在自身。只有存在自身显现，美自身才是可能的，其他的主体性的美才继而是可能的。

而存在的显现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存在自身的生成（Ereignis）乃是一种无化（das Nichten），它表现为纯粹给予之“让”，此“让”乃是奠基性的，它纯粹相关于它自身，即本源地是无利害的，自由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张祥龙先生也分析了“为什么现象本身就是美的”，他说：“现象原本就是‘悬中而现’的，因这纯境域中构成的纯显现先于一切可把捉的现成者，对他的体验就不可能是偏执于某一边或某一实在形态的。正是出于这一缘故，这种原发体验或现象知觉具有‘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③ 正是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摆脱了现成存在者的利害，存在的显现不是占有，不是强制，而是纯粹给予之让，故源初现象显示其自身存在就是美的。④

美作为存在的显现，它现在被作为动词而理解，它本性化着，这实则意味着：美在生成，美就是现象的自身生成，只要现象自身显示其存在，它就是美的，因此生成乃是美最根本的规定。然而“生成”这一规定并非外在于美的任何东西，如经验、理性或者上帝，它自身乃是无根据，作为如此，它让美自身本性化地发生。“生成”不是规定“什么是美？”，而是规定着“美自身如何本性化”。美在生

① Joseph J. Kockelmans：*Heidegger On Art and Art Work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s，Dordrecht，1986，p. 166.

② 关于黑格尔的“理念的感性显现”与海德格尔“存在的显现”的区分，可参看刘旭光：《海德格尔与美学》，第244－246页。

③ 张祥龙：《为什么现象本身就是美的》，《民族艺术研究》2003年第1期。

④ 张祥龙在身前的《文艺现象学讲稿》中，他也进一步提出过类似观点：“如果现象是按照它天然的方式呈现的，就一定是带有美感的。”参看张祥龙：《现象学如何说明“美感”与“神秘”？》，《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32辑）2023年下卷，第29页。

成，因此其实意味着：美就是现象的自身显示过程，美自身美化。美不再是人的主观体验，不再是客观对象及其性质，不再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亦不再是感性实践活动的创造，而是美自身美化。

以上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创造性的现象学诠释，后来同样被专研柏拉图阐释的伽达默尔所接受，他跟随海德格尔指出无蔽才是美的本性，美就是显现自身，并且将它自身作为一种光。伽达默尔说：

> 耀显（Hervorscheinen）并非只是美的东西的特征之一，而是构成它的根本本性。正是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所说的无蔽（aletheia）才是美的本性。美并非只是对称均匀，而是以之为基础的显现本身。……美具有光的存在方式。光并不是它所照耀东西的亮度，相反，它使他物成为可见从而自己也就成为可见，而且它也唯有通过使他物成为可见的途径才能使自己成为可见。……使一切事物都能自身阐明、自身可理解地出现的光正是语言之光。①

伽达默尔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回溯“美”这个语词含义的历史以及它源初的含义，② 而更加确证了海德格尔阐释的合理性。伽达默尔在考察“美”之含义在哲学史上的变迁时，进一步指出了美作为“存在之耀显”的源初含义何以成为了其他理解的基础。

德文词 schön（美）的希腊文是 kalon，它作为修饰词使艺术与技术区分开来，即与生产有用东西的“机械的”艺术区分开来。同样，除了美的艺术，我们还可以说美的习俗、美的文学和美的精神等等，其中 schön 都跟 kalon 一样，是与其希腊文的对立概念 chresimon（有用）相区分的。而所有不属于生活必需品，而关系到生活的方式，即被希腊人理解为 paideia（人文教育）的东西就叫做 kalon。美的事物就是那些价值自明的东西，它不像有用的事物总是作为某种手段，而被用于某种目的，它只是其自身，它自身就是目的。即便讲到与“美”相对的“丑”（aischron）时，它自身也还是目的，没有作为手段，只是它是“不忍卒看”的。于是，美的概念就与善（agathon）的概念有了密切联系，因为善也是为自身而选择的东西。如在柏拉图那里，美与善经常是互用的，善的事物也是美的事物。美的理念同时是最高和最完满的美，因为美在理智领域比感官领域表现得更加纯洁和清晰，感官领域总是受到不同尺度和不完善性的欺骗，感官领域的美是对美的理念的分有。在中世纪，美的理念同样与善的理念紧密相连，甚至干脆就用善（bonum）来翻译古希腊的美（kalon）。如托马斯·阿奎那样认为：“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神住在里面。”

另一方面，美的理念与目的论的存在秩序的理念之间联系的基础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尺度概念（Massbegriff）。柏拉图用尺度、合适性和合比例性来规定美，亚里士多德则把秩序、恰当的比例性和规定性作为美的要素。于是，适当的尺度、对称性就成了一切美的事物的决定性条件。而这些规定乃是一种普遍的本体论的规定，即自然与艺术是没有对立的，都有美的规定的符合，且自然是具有优先性的，因为艺术乃是对自然的摹仿。然而，到了 19 世纪，近代美学的兴起将重心转到了艺术，一切关于美和艺术的问题成了美学问题，即关于人的科学的问题。人类的艺术精神使一切美的东西最终只能从人自己的精神作品角度来理解，自然丧失了其优先地位，它成了精神的一种反射，这尤其表现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中。

那么，美的源初含义究竟是什么？于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阐释。尽管美的理念与善的理念紧密相连，但二者同样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包含着特有的“美的优先性”。“善的不可把握性在美之中，亦即在存在物和附属于它的无蔽性（aletheia）之间的和谐性中发现的一种相适性，因为美具有一种最终的显明性（überschwenglichkeit）。美与绝对不可把握的善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可以被把握的。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 624－625 页，译文有些许改动。

② 以下关于“美”的语词含义的历史及其本源性追溯，参看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第 618－635 页。

美的固有本性就在于能表现出来。美就表现在对善的追求之中。”[①] 美能够自身显现，它能够在其存在过程自身呈现出来，这是它与善的根本区分，因此，美自身是有光亮的，它甚至是“最耀显和最令人出神、最值得人爱的东西”。在如此意义上，“耀显”就不再只是美的一个特征，而是其根本本性，美就是作为无蔽（aletheia）的真。美不只是原先目的论的尺度意义上的对称均匀，而是以之为基础的显现本身。

于此，我们已经切近了“美”的本源：它是显现活动本身，它表明为敞开和照亮。存在者之存在在艺术作品中的耀显，也就是美自身美化的过程。美作为最耀显和最值得人爱的东西，它使存在自身被照亮，将人从存在的遗忘中拉出，并带入了存在观照（Seinsblick）。本源的美不是尺度意义上的客观规定，也不是人类精神的对象或者其创造产品，而恰恰是现象自身显示其存在的活动本身。

如果我们在此总结海德格尔借助柏拉图的现象学阐释对作出的对美给出的存在论规定，那么主要有两点：一，美在于现象自身显示其存在，即美是一个动词。美不是一种现成的状态，而是一个成为美的过程。美不是客体所具有的对象化性质，不是主观的体验，也不是主体与客体的某种统一或者符合的关系，美是存在自身的显现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事物之所以美，就在于它们成为自己，它们自身生成，事物因而各有各美，美不再是事物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标准或尺度，比如符合和谐的黄金分割比例等。二，美与真共属一体，美是存在者之真自行设置入作品，是真的自行发生。美与真并不是完全对立不可沟通，而是保持着差异的同一。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美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思考：美规定了人，提升了人。人加入到美中，才能去理解、经验和思考存在。这就意味着，人不再是美之标准的评判者，也不是美的创造者，而是“生成之美”的参与者和守护者。

海德格尔说：“美是那个规定着我们以及我们的行为和能力的东西，因为通过美，我们最高地占有了我们的本性，这就是说，我们超出了我们自己。”（GA6.1，S.113）美提升了我们的生命，美作为调音者，规定着我们，而不是我们规定了美。海德格尔以画家阿尔布雷西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一句名言来说明这个问题：“千真万确，艺术存在于自然中，因此谁能把它从中取出，谁就拥有了艺术。”（GA5，S.58）这句话绝不能理解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而是说，艺术已经原始地在自然之中了，它隐藏着，当它被取出时，即在作品中显现时，艺术就被拥有了。这意味着，艺术家归属于艺术，只有艺术家已经进入了艺术，他才能创造。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里说：“创造（Schaffen）意味着：汲取（schöpfen）。‘从源泉中汲取’意思就是：接受喷涌出来的东西并把所接受的东西带出来。”（GA5，S.298）创造因此不再是从主体方面去规定，而是从艺术，从存在自身的显现去规定，创造不再是主体骄傲蛮横的主观表达，而是从艺术和存在自身汲取，并如其所是地让其被看见。总结来说，美和艺术就是存在之现象的自身生成，而艺术家就是让这一生成活动成为可见的“现象学家”。

结 语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反对近代主体论美学带来了两个后果，即一方面将美理解为“情感愉悦的对象”，将艺术作为表达主体体验的对象，另一方面割裂了美与真的源初关联。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来源于他对柏拉图美学的现象学阐释。针对柏拉图《理想国》中艺术与真的关系，海德格尔指出艺术并不处于与真的“分裂”关系之中，而是在指向存在之真时具有归属意义上的等级关系；进一步地说，海德格尔通过《斐德若篇》中爱、美与灵魂的关系探讨，对“美是那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进行了充分的现象学阐释，一方面美是在感性领域上最耀显的，容易吸引人，另一方面也是最令人出神的，引导人离开自身，朝着超感性领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2004年，第622页。

域的存在之真进行超越，所以美是架接具体存在者的“显象”（Schein）与源初的“存在”（Sein）之间的桥梁，用现象学的语言表达就是：美是对存在者的感性直观与作为“范畴直观”的存在观照（Seinsblick）之间的桥梁。

由于美成了抵达存在之真的一种优先性的通道，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遗忘状态，那么美与真就是共属一体的关系。海德格尔在此基础上，不仅提出“美是无蔽之真的一种本性化的方式”，而且提出“美就是存在的耀显（Scheinen）”，也就是说存在之现象的自身显示就是美。美不是一种现成状态，它既不是客观对象的属性，也不是主观的体验，同样也不是主体与客体的某种统一或者符合的关系，毋宁说，美是一个动词，是存在自身的生成与显现过程。这种理解的“美”不仅为主体论美学赋予了更深厚的存在论基础，而且改造了美与人的关系：人不再是美之标准的评判者或者创造者，而是生成着的美的参与者和守护者。

■责任编辑/张瑞臣

“Beauty Is the Most Shiningly Visible and the Most Worthy of Being Loved (εκφανεστατον και ερασμιωτατον)”: On Heidegger’s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Aesthetics

HE Nian[1] & ZHU Kui[2]

(1.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Heidegger’s ontological aesthetics comes from his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aesthetic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truth in Plato’s *The Republic*, Heidegger demonstrates that art is not in a “splitting” relationship with truth, but hierarchically belongs to it when pointing to the truth of Being; further, through the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beauty is the most shiningly visible and the most worthy of being loved” in *Phaedrus*, Heidegger points out that beauty means the acqui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Insight into Being” (Seinsblick), and therefore is the bridge between the “appearance” (Schein) of specific beings and the original “Being” (Sein). On the basis of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belonging-together between beauty and truth, Heidegger puts forward his ontological aesthetic proposition: “Beauty is the appearing of Being itself (Scheinen des Seins)”, and beauty lies in the self-generation of phenomena.

Keywords: Heidegger; Plato; art; beauty; phenomenology

从关怀伦理视角论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

——基于儒家义务论与儒家美德伦理学的反思

李明书

［浙江大学，杭州　310058］

摘　要：儒家与西方伦理学的比较自康德义务论至美德论的发展已有一段时间，受到康德义务论与美德论诠释儒家的影响，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基础易于被视为理性的道德原则与美德，而教师的职责即在于教导学生如何实践道德原则与美德。关怀伦理学视角进入儒家研究领域之后，认为道德教育的基础是自然情感的关怀，以关怀为基础，才能真诚地行使道德原则与美德。以关怀伦理视角反思义务论与美德论，可证明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也是以关怀为基础，而教师的职责应是教导学生发挥关怀的情感以从事道德的行为。

关键词：关怀伦理；古典儒家；道德教育；教师；职责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048－08

儒者的责任通常被认为是将人民培养成有仁德的人，而后负担起经世治国的工作。这样的观点同时构成古典儒家对于个人的实践要求与目标，并以此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亦即儒家旨在教育人民成为有仁德且能治理国家的人。然而，仁德与政治能力的培养并非古典儒家所要教育人民的基础。仔细考察古典儒家经典中关于教师与学生的相处，以及孔孟等圣贤对弟子与君王说教的内容之后可以发现，仁德与政治能力的基础在于关怀，也就是基于产生了希望对方变好的自然情感，接着才有各种美德与各种能力的展开。

这一思考的脉络，在西方伦理学的康德义务论（deontology；道义论）、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美德论）与关怀伦理学（care ethics）等理论诠释儒家思想之后，形成古典儒家道德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的讨论。遗憾的是，在儒家义务论与儒家美德论被系统性地建构之后，往往忽略了关怀才是教师教育学生的基础。经由关怀伦理学对于关怀的重视，以及以关怀伦理学诠释儒家思想在近几年产生的成果，[①]本

收稿日期：2024－01－04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大学2022年度德育与学生发展研究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日常思政工作研究”（项目号：22dykt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明书，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特聘研究员。

① 李晨阳于1994年发表了儒家“仁”概念与关怀伦理学的比较，是第一位比较关怀伦理学与儒家思想异同的学者，参见Chenyang Li，“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Jen and the Feminist Ethics of Care：A Comparative Study”，*Hypatia*，Vol. 9，No. 1，1994，pp. 71－79。之后虽引发许多儒家是否是关怀伦理学的讨论，但较少以儒家思想回应关怀伦理学的理论问题；在支持儒家相似于关怀伦理学的立场中，也缺乏以儒家关怀思想探讨伦理议题的研究。儒家与关怀伦理学比较研究的介绍与梳理，参见韩玉胜：《儒家关怀伦理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第1－36页。近期则有学者引入关怀伦理学的“专注”（engrossment）与“动机移位”（motivational displacement）概念解释儒家思想，而不仅是比较两种思想系统的异同而已，参见张容南：《什么是好的关怀——儒家伦理对关怀伦理的启发》，《哲学动态》2019年第5期；李明书：《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哲学研究》2022年第9期。

文将借由关怀伦理学的理论特点指出古典儒家的教师职责在于培养学生乃至于全体人民的关怀情感，而道德原则、美德与政治能力则是在关怀情感确立之后，进一步须培养的人格特质与能力。

一、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背景与教育理念

自康德提出以行为动机的善恶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之后，其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许多伦理议题的讨论，至罗尔斯（John Rawls）将其引入政治哲学的讨论之后，对于学术的影响更是深远。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即是援用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心理学的质性研究，而提出三层次六阶段的道德发展理论。[①] 当时其学生兼助理的吉利根（Carol Gilligan）发现柯尔伯格在研究过程中所设计的题目，皆是伦理学上的道德两难情境，而这样的思路是以理性为主的正义伦理发展下所设计而出，男性善于依据理性作答，而女性则更倾向于了解道德情境发生的背景，了解当事人之间那种非普遍的特殊关系，而不是以普遍的伦理原则套用在相似的道德情境上以寻求解答，或是给出一个是非对错的判断，这种行为即是所谓的“关怀”（care）[②]。吉利根认为柯尔伯格的理论预设不足以概括女性对于道德情境的判断，导致测试的结果是女性仅能达到六阶段中的第三阶段，而无法及于男性的高度；[③] 如果改以关怀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将得出不同于柯尔伯格的结论。

基于这样的反思，吉利根重新设计心理实验的问题与道德判断的标准，在 1982 年出版《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④] 一书，一般被视为关怀伦理学的开端。由于关怀伦理学是以女性特质为基础而发展出的伦理学理论，故在初期又被视为女性主义的伦理学理论，其后经由诺丁斯（Nel Noddings）、赫尔德（Virginia Held）、特朗托（Joan Tronto）等多位学者持续发展，尝试将其建构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伦理学理论。[⑤]

在几位关怀伦理学者之中，身为教育学家的诺丁斯，探讨了较多的教育理论与议题，并且在建构关怀伦理的教育理论过程中，也较为全面地回应了西方伦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康德义务论、美德论等理论。[⑥] 是故其教育观点可谓是在反思了西方伦理学理论之后，提出与以往不同的见解。诺丁斯反对道德教育的内容以规则、原则、知识为主，而提倡应培养学生的关怀情感，以教师本人作为榜样，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使学生在离开学校学习之后，仍能秉持这样的关怀情感以待人接物。

以诺丁斯为主的关怀伦理学与以往的伦理学理论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第一，诺丁斯认为人最初并不是以理性的人而出生，而是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自然情感，形成了关怀关系之后，才进一步推动了道德行为的产生。[⑦] 关怀的情感是人与生俱来就有的，不须经由理性思辨或客观知识的学习才出现。[⑧] 在关怀的基础上，才能够发展出道德原则或美德。[⑨] 第二，对比于原子式的道德主体，关怀伦理重视关怀者（one – caring）与被关怀者（cared – for）之间

---

① Lawrence Kohlberg, *The Philosophy of Moral Development: Moral Stages and the Idea of Justic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1, pp. 409 – 412.

② care 有关怀、关心、关爱等不同的翻译，在英语文献中通常依论述的脉络而决定使用何者。由于本文并非探讨翻译上的问题，而是以自然情感的关怀为基础展开道德教育的实践，故不特别区分不同翻译的用法。为求行文的一致性，除了引用译文之外，本文皆以“关怀”表示关怀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与教育基础。

③ Carol Gilligan,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9 – 30.

④ ［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

⑤ Joan Tronto,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3, 6; Nel Noddings,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45 – 46.

⑥ Nel Noddings,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pp. 30 – 31.

⑦ ［美］内尔·诺丁斯：《批判性课程：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知识》，李树培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94 页。

⑧ Nel Noddings,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pp. 57 – 58.

⑨ Nel Noddings,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p. 30; Nel Noddings, *Caring: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p. 96 – 97.

的关怀关系（relation），良好的关系是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需求共同得到满足之后才算完成，[①]而不只是独立的个人能够依据道德规则而实践道德行为，或是个人德性的完满。

理性的道德原则与科学知识融入学校教育已久，但是对于关怀情感的培养却始终付之阙如。于是诺丁斯认为教育的基础应该是培养学生关怀的情感，而不是知识的灌输，或是在虚设的两难道德情境中要求学生依据既有的道德原则推论应如何实践；教师的职责就是在教育过程中将学生的关怀之情培养起来，使其能依据这样的情感，热爱其未来的工作与周遭的人。诺丁斯的教育理论已构成完善的体系，包括教学理念、方法、结构、课程设计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议等，并且国内外皆有许多引介与讨论，但其核心观点仍是在于以关怀为基础而展开的教育活动，认为“帮助学生培养这种互相关爱的能力，是所有教师的重要职责”[②]，是故本文将以关怀伦理学在教育上的基本观点，展开古典儒家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的论述。

二、古典儒家的教育责任与教师的职责

“责任”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身为一个人就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应该做的事情之具体内容，可能基于理论、文化、身份、能力等各种条件而有所不同；“职责”则是在一个职业上应尽的责任，如教师的职责是身为一个教师应该在其职业上尽其所能完成的事情。

儒家自孔子开始即为教育家与教师的表率，承担起教育国君、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可见教育的责任与教师的职责在古典儒家思想中尤其重要。古典儒家的重大责任通常较直接令人联想到曾子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以及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结合在一起，相当于“内圣”与“外王”的理念或实践要求，前者指对于个人而言，应以“仁”这一所有美德的总摄范围，培养各种美德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后者则是依于自身的美德，向外推扩到社会、政治的事务上，将能力所及的范围建立成以美德为基础的运作单位。

话虽如此，但这毕竟是对于一个儒者（“士”），乃至于有志于担当国家“大任”者的要求，对于尚未能立志从事儒家思想，将儒家理念作为自身责任的人而言，儒家显然不是以培养一个人的美德为基本要求，而是以诱发、引导人更为基本、更能触动人的自然情感为主。这种对于人们自然情感的诱发与引导，其实才是古典儒家认为教师应尽的职责，也是道德教育的基础与目标。这一点从先秦文本中可以得到许多证明。

虽然《论语》中并未直陈与系统性地论述一个教师应尽的职责，但孔子更多时候是以身作则地示范，而教师的职责就表现在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之中。此处先以广为人知的孔子与宰我论三年之丧的意义来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这一则文本背后的意涵十分丰富，历来也有许多解释与讨论。基于本文主题，以下将聚焦于孔子与宰我之间的关系，以及孔子究竟希望宰我学习到什么重点来看。

从文中的情境可知，宰我与孔子对话之后

① Nel Noddings, *Caring: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68;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4 – 35.

② ［美］内尔·诺丁斯：《21世纪的教育与民主》，陈彦旭，韩丽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0页。诺丁斯也曾提过道德教育者希望两性都应学习关怀，参见 Nel Noddings, *Educating Moral People: A Caring Alternative to Character Educ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2, p. 19.

即离去，而孔子继续对着留下来的人说明一些道理。由此可以推想，这应是孔子作为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由于宰我不愿守三年之丧，理由在于这样太过于旷日废时，守丧过程无法维系当时的礼法。身为教师的孔子并未向宰我论陈守丧之礼的社会、政治意义与功效，而是直接切入情感、心情上的安稳与平复，并且在宰我离开课堂之后，指责其忽略了父母在他初生之时，将他在怀抱中呵护了三年之久的这份关怀之情。此处虽无从得知孔子为什么不当面向宰我说明，可能是已经猜想到不论如何教导，宰我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但从中可以清楚得知的是孔子最终以“不仁”评价了宰我，指责宰我已经失去了对于父母这份关怀的追思，甚至忘记了父母曾经对他的细心呵护。

这一则文本还有两个要点需厘清，才能更清楚地呈现身为儒家教师的孔子在教学过程所希望达到的成效。首先，基于文本的解读，孔子说宰我“不仁”，暂且不论“仁”这一概念的丰富意涵，[①]“仁”作为古典儒家最重要的美德或道德概念当是毫无疑义的，是故从字面上看来，孔子确实是批评宰我不具有“仁”这一美德。然而，孔子批评宰我不仁的理由并不是宰我不能展现仁德在是非对错上的判断，也不是宰我未能表现政治事功的能力，而是由于宰我已经忘却父母曾经对他的关怀之情，于是不拟以相应的情感回报父母。由此可知，孔子试图诱发或唤醒宰我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这份真挚的情感，由于这份情感无法维系，才产生了“不仁”的判断。其次，从经典中当事人的身份可以推知，宰我与未被记名的弟子们既然都还处于求学阶段，尚须集中接受孔子的教导，尚未成为意志坚定的儒者，亦未达到能够担负天下大任的身份地位，这正是最能说明师生关系，以及作为儒家的教师所应教会学生的能力，亦即这份真挚的关怀之情。

一旦这种关怀之情确立，也就是教师确实能教会学生不论在对待任何人事物时都能秉持这份情感，则未来施展任何能力、从事任何事业，才不只是当作纯粹的技能或谋生的工作而已，而是可以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怀应用于社会与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果怀着这样的情感而从事道德实践与工作，却在某些能力有缺陷或结果不如预期，将不至于受到严厉的谴责；但若仅将待人接物或工作视为一种纯粹的技能发挥或效益的计算，则将与器物、工具并无太大的差异，甚至对于孔子而言，这样的人已经失去了为人的基本价值（“不仁”）。宰我认为守丧的目的不能妨碍礼乐制度的运行，而忽略了亲子之间真挚的情感，即是将礼乐制度的社会效益置于首位。

从孔子的叙述可知，父母对于子女的“三年之爱”以及守丧三年的追思皆是出于自然情感之间的互动，如果学生已经失去这份关怀之情，教师即有责任引导学生重新体会并表现出来；倘若这份情感仍维系于学生及其父母之间，则教师应教导学生更进一步应用于实践与社会工作上。当下若无法教会宰我之徒发挥关怀之情，则应将更多心力投注于还有可能受教的学生之上。

孟子教导伦理实践也是以自然关怀之情为基础，接着才展开说理的过程。如孟子论“四端之心”时所说：

>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

① 在《论语》中，“仁”有时有情感的意义，有时指个人道德修养，有时又指政治事功，如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所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这里的“仁”显然是指管仲在政治上的成就。在此无法详细展开“仁”的丰富意涵，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政治能力的培养与事业的成就，一定是一个人经过一番学习、历练之后所得，在个人的生命经历与教育过程（至少在家庭教育上）中还是以情感为基础。

母。”（《孟子·公孙丑上》）

许多讨论将这段著名的文本集中于“四端之心”的解读与证成上，[①] 此处不拟针对这些讨论进行评析，而是将这段话视为孟子教育君王和提供后人学习的文本来看。不论“四端之心”如何展开，以及展开成什么样子，孟子首先提出的是“不忍人之心”这样的自然情感，在见到孺子入井时会不自觉地涌现出来，而且不计较任何功利名声，只希望能够将孺子救起。如果一个人在面对这种情境时可以抱着这份情感去救孺子，则可期许这样的人也能够以这份最真挚无私的情感去从事社会、政治等事务。即便可以宣称在此处“仁之端”的“不忍人之心”与“义之端”“礼之端”“智之端”是并列的关系，是故如“义”“礼”“智”等近于理性的内涵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共同构成人性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子在说明道理的过程中，“仁之端”不仅置于首位，而且对此的阐述最为丰富。[②] 我们或可试着反问，如果一个人的实践基础是“义之端”“礼之端”与“智之端”，则表示对他人的自然关怀之情是在评估了自身的羞恶、懂得礼让与辨别道德规范的对错之后才能够生起，那么这样的关怀之情还是自然而不假思索的吗？还是不计较功利名声的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是故这段话语所表示的教育意义，是在说明人应以培养自然关怀之情为基础，而后才能较好地以此情感对待政治事务。

从古典儒家更多的文本中皆可看到对于亲情的重视，而后从家庭开始逐渐往外推扩出去的记载。即使荀子与孟子持不同的人性论看法，但却同样重视自然之情。这一观点反映在荀子对于三年之丧的解释上：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荀子·礼论》）

荀子在论三年之丧时虽一再强调这一礼法的制度性意义，后续更以此证明人民为君王守丧三年的必要性。然而，无论这一制度具有何等崇高的价值，这一基础需建立在情感之上，而且既然是三年之丧，则这情感亦是从父母抚养婴孩的最初三年培养而出，而不是依据理性的法律或道德规范才制定这样的礼制。

虽然儒家终究是要教人成为一个道德上完满而无所欠缺的人，进而成就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但从古典儒家的许多文本之中，皆可以看到身为儒家教师的职责，应以教导自然关怀之情的发用为实践的基础与根本，否则只是在培养技术性或机械性地做出符合外在道德规范或法律制度的行为，却不是发自内心愿意对他人、对人民、对政治行善，这样的人难以长久地在群己的实践中维持下去。

在对于古典儒家经典有这样的认识之后，接着将进一步回应以西方伦理学解释儒家之后所产生的教育哲学问题，并指出上述的观点更接近于关怀伦理学的视角，以其他理论看待儒家的教师职责可能产生误解，使儒家对于教师责任的探讨可以与西方学界关注的议题进行对话与比较。

三、对古典儒家道德教育基础的反思

如果以关怀伦理学所谓的自然情感的关怀解释古典儒家道德教育基础，则以往的功利主义、康德义务论、美德伦理学、关怀伦理学与后习俗责任伦理学[③]等解释均有值得反思之处。这些理论进入我国的学术领域之后，产生了儒家究竟属于或较接近西方哪一种伦理学系统的

① 笔者曾从关怀伦理学视角论述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较为接近关怀伦理学所说的关怀，而非康德伦理学的道德义务或美德伦理学的美德，参见李明书：《关怀伦理视角下的〈孟子〉“孺子入井”章诠释》，《哲学研究》2024年第1期，第77－86页。

② 历代注解多认为“四端”之中最主要的是“仁”，“仁”可以包含或衍伸出“义”“礼”“智”三者，参见朱熹：《朱子语类》卷第六，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6页；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5页。

③ 后习俗责任伦理学（typology of practical reason）是结合了康德义务论的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之后的道德发展理论。虽然这一理论以“责任”为核心概念，但其所论的责任是人应以关怀为基础而建立普遍的道德原则，在对话与沟通的过程中逐渐达成这一目的。林远泽将后习俗责任伦理引入儒家的诠释。参见林远泽：《儒家后习俗责任伦理学的理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公司，2017年，第32页。由于该理论与本文所论的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并无直接关系，是故暂不讨论儒家后习俗责任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讨论。当然儒家思想有其自身的独特性（道家、佛家等思想亦然），本无须以西方伦理学系统进行定位，只是基于学术对话证明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以儒家思想回应西方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并且也已经是常见的讨论方式，是故以下将依着这样的发展脉络，提出在儒家伦理被西方理论诠释的发展背景下，应如何理解儒家思想的教育基础，亦即古典儒家是以什么内容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与教师的职责，而后展开教育体系的建构。

在这几种伦理学理论中，首先可以排除功利主义在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讨论，因为功利主义要求的行为原则与儒家有着明显的差异，是故以此定位儒家伦理系统较不适合，本文在此即不详述，而是以发展历史较为长久的儒家义务论为起点，亦即以康德伦理学定位儒家理论系统的研究开始。

（一）反思儒家义务论的道德教育基础

康德伦理学重视道德行为的动机，亦即在从事或判断一个道德行为时，应以其动机是否为纯粹的善而不以行为的结果为标准。如果一个行为的动机是善的，则不论结果如何，皆可宣称这是一个道德上好的行为。以牟宗三为首的港台新儒家，引入康德伦理学解释儒家之后，将儒家解释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形态，再以儒家思想回应康德伦理学的理论困难。[①] 牟宗三后学对其思想虽有补充与反思，但是整体而言仍未脱离康德的话语系统，因此以下仍以牟宗三对于古典儒家的解释为核心进行讨论。

牟宗三虽未聚焦探讨古典儒家的教育思想，但其诠释孟子的内容，实亦说明了古典儒家的教育基础。牟宗三引用康德的观点与概念，说明儒家所认为的仁义之行，亦即在行善、从事道德实践时，必须不夹杂任何私心、功利之心，而应以该行为是纯粹的善而去做，也就是无条件的善，而这无条件的善是每个理性的人普遍皆有的。如牟宗三所说："这种心、情，上溯其原初的根源，是孔子浑全表现的'仁'：不安、不忍之感，悱恻之感，悱启奋发之情，不厌不倦、健行不息之德等等。这一切转而为孟子所言的心性：其中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是心，是情，也是理。理固是超越的、普遍的、先天的，但这理不只是抽象地普遍的，而且即在具体的心与情中见，故为具体地普遍的；而心与情亦因其即为理之具体而真实的表现，故亦上提而为超越的、普遍的、亦主亦客的，不是实然层上的纯主观，其为具体是超越而普遍的具体，其为特殊亦是超越而普遍的特殊，不是实然层上的纯具体、纯特殊。"[②] 并且"如孟子所说往救一将入井之孺子不是为要誉于乡党也，不是为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不是为恶其声而然也。这便是无条件的纯善。依康德，这纯善就是实践理性之对象，亦就是所谓德。好善即是好此德，恶恶就是去掉那有私意者。人只应依无条件的命令而行，其他决不应顾及，即使得不到幸福，亦应如此行。"[③]

上引第一段是解释孔子论三年之丧与孟子论"四端之心"的根源，第二段则是解释人救入井的孺子时所应保持的态度与行为判断。从其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牟宗三认为守三年之丧所应怀抱的"不安"之心与救孺子时的"恻隐之心"是生而为人的真情实感，但这样的情感是"理"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而且是基于理性的思辨之后，得知这一情感是不夹杂任何私欲与功利的计算之后发挥而出，才能成为康德所说的无条件的纯善。牟宗三将这样行为推到了相当崇高的境界与地位，尤其表现在孔孟这样的圣人身上时，这样的情感必须经过实践理性作用之后才能表现而出，与一般人的喜怒哀乐或同情共感有着相当程度的区别。

这种境界在古典儒家之中可以作为圣人理想状态的呈现是毫无疑义的，只是圣人的理想境界是实践的目标，而不是所有人在未能达到这一境界之前的道德要求。孔子当时面对宰我等学生而有三年之丧的阐述，宰我等学生皆非圣人；孟子所欲证明的是不论任何人皆有不忍

① 牟宗三指出康德伦理学的根源问题为"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三个预设，但儒家不需预设上帝存在与灵魂不灭，而意志自由（或自由意志）是人性普遍现象而非理论预设。参见牟宗三：《原善论》，《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50页。

②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31－132页。

③ 牟宗三：《原善论》，《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2册，第180－181页。

孺子入井之情，于是建议应保有这份情感而推展到政治事业上，并非以圣人境界作为普遍于所有人的要求，而是只要是人，都会有这种自然而普遍的关怀之情，以至于可以朝向圣人的境界而实践。

如果将此一道理聚焦在教育的观点上，则牟宗三所述的情与理合而为一的情况，必须是建立在先能将基本的人之常情发挥之后，再对于这样的情感进行理性的反思，以证明这一情感的纯粹性；然而，这情感已不再是人天生而有的自然关怀之情，而是经由理性反思检验之后的理性之情。这固然足以诠释古典儒家教育思想崇高的一面，但却不是古典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

（二）反思儒家美德论的道德教育基础

美德论是关心行为者的理论，义务论与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以功利主义为代表）则是对于行为提出道德规范，儒家显然也不只是要求行为应符合道德，而是致力于培养一个人在人格与一生的道路上皆能完满而无欠缺。[①] 黄勇与陈来等学者对比了义务论、后果论与美德论等三种理论与儒家的关系和异同之后，认为儒家最接近于美德论，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上皆更为完备。[②] 美德伦理学围绕人的美德而展开相关议题的论述，例如有德者是否是利己主义者、人为什么要有美德、美德是否可教等，这些议题亦可从儒家的思想资源中提出回应的观点。儒家美德论中与教育最为相关的是“美德是否可教”这个议题，由于黄勇主要致力于以儒家思想回应西方美德论的问题，与本文的研究目的较为相关，是故以下即梳理其观点并进行反思。

“美德是否可教”之所以被提出，是基于如果美德是人天生且内在的品格，则教与不教对于一个人并无太大的影响，但是显然现实上有许多人并不能发挥美德而做出道德上为恶的行为，姑且不论人为恶的原因为何，重要的是如果承认人具有美德，则是否可以教人实践美德，以及如何教人实践美德才是更为重要的部分。孔子在人既有美德却又为恶的解释上，只是表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因为导致行为结果的复杂因素，本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是故孔子更致力于说明一个已经为恶或是尚未能将美德表现成行为的人具有发挥美德而为善的可能。黄勇举出孔子导正子路，以及对于其他弟子的教育，使各个弟子依据其品格与才能，在各个社会领域中有着很好的表现。[③]

既然孔子已经有了许多教育成功的案例，我们即无须再怀疑美德可教的可能性，于是这一命题的重点就成为如何使美德可教成为可能，也就是孔子是如何教育、运用了什么方法才能使这些学生的美德可以充分表现出来。

黄勇整理孔子的道德教育方法可分为个人与政府两方面。在个人方面，首先须使受教者感到快乐，才能增加他们学习的意愿；其次是诗教的重要性，诗可激发受教者的情感，使人们对于和道德相关的事件感同身受，而不只是教师陈述教条而已；再次是运用适当的劝谏态度与方法；复次是以道德典范作为榜样的价值。[④] 在政府方面，黄勇对比儒家政治观点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的差异，指出儒家的政府应负担民众道德教育的职能，而不只是在社会制度上追求公平而已。[⑤]

古典儒家重视道德教育，自孔子开始，儒家的圣贤就善于运用各种兴发的教学方法，以及将美德的培养置于刑罚制度的建构之上，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既然谈到道德教育的基础，则必定是从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展开的。如上一节所述，古典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的核心概念是“仁”，但“仁”的含义甚广，如孔子与宰我论三年之丧时说宰我“不仁”，这里的“仁”表示父母与子女之间真挚

① 儒家培养完整人格的理想与思想系统通常被称为“成人之教”或“学以成人”的讨论，参见杜维明：《为什么要“学做人”？——关于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的思考》，《重庆与世界》2018年第16期，第14－17页；安乐哲：《“学以成人”：论儒学对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贡献》，黄田园译，温海明译审，《孔学堂》2020年第2期，第4－13页。

② 参见陈来：《儒学美德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

③ 参见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第161、165－166页。

④ 参见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第174－179页。

⑤ 参见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第179－180页。

的自然情感；又如孔子以“仁”称赞管仲的政治事功，此处当指儒家所说的“外王”之伟大成就。孔子与宰我等学生的课堂教育，想必先于孔子评价政治上已有成就的管仲，因此在“仁”的各种意义与价值之中，关怀仍是其教育的基础，而后才发展成美德。也就是说，古典儒家在教育上以道德或美德概括整体的内容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儒家就是在培养一个人成为道德上无所欠缺的人。本着关怀之情，培养美德以发挥具有美德的行为，并且尽力拓展造福人群的事业，但是展开道德教育与政治事业的基础并不是美德，而是关怀，也就是当一个人能够对他人产生关怀之情后，美德、德行与事功才有重要的价值。

其实从黄勇提出的个人方面的道德教育方法而言，已经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如其所言，要使受教者乐于学习，以诗教等看似与道德不直接相关的方式启发人们对于培养美德的兴趣等，[①] 均揭示了施教者首重的是关怀受教者的情感，而不是直接以美德的内涵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只是黄勇直接将这种带有意愿、情感的教育视为美德学习的一环，而未将其与美德区分开来。如果回到三年之丧的例子来看，可以得知关怀之情才是孔子的教育基础，而教会学生运用关怀之情是教师的职责，但总有学生不愿接受这样的观点，因此这样的人确实达不到儒家所谓的有德者，当然也成就不了伟大的政治事业，但不能因此就将美德视为儒家道德教育的基础。

结　语

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基础与教师职责可以归结为对于两个提问的回答：第一是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基础是道德原则、美德还是关怀？第二则是古典儒家的教师应该优先教导学生的是道德原则、美德还是关怀？经由以上的梳理可知，不论道德原则与美德在古典儒家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但道德教育的基础是关怀而非道德原则与美德，而教师的职责首重教导学生以关怀的情感去运用道德原则与美德而实践，而非在孩提或初学阶段就以理性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一观点不仅是基于西方伦理学发展脉络而提出，并且在古典儒家经典中皆有充分的文献支持。即使这一主题的讨论是建立在回应西方伦理学议题的基础上，但以关怀作为古典儒家的道德教育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既符合经典的意义，又可借此以儒家思想与西方理论进行比较和对话，期待未来能够引发更多相关的讨论。

■责任编辑/张瑞臣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Teacher's Duty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Care Ethics: Reflections Based on Confucian Deontology and Confucian Virtue Ethics

LI Ming-shu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Since Kantian deontology and virtue ethic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ethics of the West has had a fairly long histor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by Kantian deontology and virtue ethics, the basis of moral education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 is easily seen as rational morals and virtues, while the teacher's duty is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practice moral principles and virtues. Care ethics in Confucian studies holds that the basis of moral education lies in the care for natural emotions, and the sincere practice of moral principles and virtues relies on care. The study of deontology and virtue eth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are ethics can reveal that moral education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 is also based on care, while the teacher's duty is to teach students to exercise the emotion of care to engage in moral behavior.

Keywords: care ethics; classical Confucianism; moral education; teacher's duty

① 参见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第174－175页。

回归史料本身

——图像证史问题的档案学思考路径及其反思

杨　毅，单旭东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摘　要：图像证史问题既是传统艺术史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图像研究进入历史学领域的重要前提。图像虽已作为新的史料依据和证据来源进入历史学实践，但图像资料在“可信度”与“清晰度”上的困境，以及其作为文字叙述补充的附属地位影响其入史的限度与可能性，引发历史学理论层面对于史料观念的思考。此番问题的讨论究其根源在于当前史学领域虽在应用领域关注图像史料，但是仍旧未能脱离文字史料研究的路径惯性，因此也就未能对图像自身特殊的记录方式及其所决定的多元内容信息予以理论视角的明晰。以档案学视角重新审视图像证史的问题本质与作用机制，借图像资料本身的档案属性与史料特质，图像得以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进而成为客观、原始的文本依据，继而完成图像入史的研究前提；而要真正实现图像证史的目的，则要全面的认识图像的内容构成及其所对应的历史联系，以更为详细、全面的文献记载还原更为复杂、多面的历史事实。所以图像证史问题的讨论要回归图像史料的记录特性本身，在史料的求真、求新之外更要求全，在实现完整、系统的史料观念认知与运用的同时，也为更多的相关问题提供思路与方法借鉴。

关键词：图像证史；二元档案实践；史料观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056－10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学重视且依赖史料，伴随着史学的发展，史料的概念与范围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梁启超对史料有充分的认识，“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①]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对于史料的认识与使用问题讨论却众说纷纭。自后现代史学的叙事转向展开对于史料文本性质的探讨以及史料编纂之中叙事问题的反思，以实物、图像为代表的新史料也逐渐从实践进入到理论视野，并引发关于研究方法上的一番探讨。恰如翦伯赞先生对于史料重要性的强调，同时也指出：“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就等于废物。”[②]在图像的史料价值认

收稿日期：2024－0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云南民族档案资料数据化整理与开发研究”（项目号：YB2022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毅，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单旭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② 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9年第2期。

识基础以及史学研究视角的多元取向影响下，史学界掀起图像证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其以传统史学的方法考证并阐释史料的价值，把图像作为历史的证据，力图探索其可证之历史事实。赵世瑜借云南楚雄大姚镇文庙中一石刻画资料中所提供的历史信息，配合文献资料揭示出石羊镇井盐变化发展及其在帝国经略西南边陲过程中的意义以及对于当代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①] 荣新江以近些年考古发现的有关粟特人的图像资料为分析对象，获取关于古粟特人在华生活与精神世界，更展示了中西交流的场景信息。[②] 陈琳从图像证史的理论出发，引入情境的分析来提升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可信度；[③] 李根则从卡罗·金兹堡的图像证史理论出发，论证图像作为历史证据在内容信息与表现手法上的独特性，并对考证形式进行分析。[④] 然而既有的研究多从传统史学求真之秉性寻求图像所记之历史文本与实际发生之历史事实之间的对应性，以至于当在图像史料中发现真实、客观性偏差时，总是以传统考证之法予以文字史料层面上的纠正与合理化，带着怀疑的态度去使用图像史料则弱化了其证史的限度，在此影响下的图像更多是作为呈现历史事实的透明、客观反映并以此成为研究之证据与工具而非独立的研究与反思对象。作为现代管理学重要构成的档案学学科，其重视管理对象内容系统构成以及与管理工作经验总结的外部视角，决定了档案学在看待史料的方式上是区别于史学的。而针对图像证史理论的探讨及其在历史学领域的应用问题，或许也可从档案学的视角出发，在传统史料观下对于档案本身记录内容的关注之外，也在文献生成、整理的视野下重视对文献本身记录方式与叙事规律的讨论。同时也可在此过程中深化对于图像内容实质以及传统史学史料观与研究方法的认识，最后实现从具体问题的探讨到跨学科层面的延伸思考。

二、二元档案实践视角下图像档案的内容分析

图像证史议题的困境较多地集中在图像自身信息“可信度”“清晰度”等问题的争论上，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以一个恰当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合理地论证、厘清图像内涵、内容以及意义的多样性。在这种实现图像从历史记录向历史凭证体系的过程之中，档案学视野下的二元档案实践或可作为一种方法尝试来实现对于图像记录内容与记录方式的新理解。二元档案实践就是指将档案工作的实践对象分化为“档案实体集合”和“档案历史联系的记录”，基于此档案的记录内容就从单份文件的事件“发生”，过渡到文件集合所反映出的社会实践活动即事件的“发展”过程。图像档案被纳入史学研究的范围之中，究其原因还在于图像所记录、保存与传递的历史信息，及其凸显于图像自身记录、解释功能上的特性。同时，伴随着图像档案进入到保存、流通以及传播的领域，图像所记录的内容又会因不同的整理、利用社会背景进而形成多维度的历史关联，这些关联最后都会固化为特定的内容与形式信息并纳入文献的记录体系之中，进而在后续的历史真相呈现、规律总结中发挥记史、证史的功能。鉴于此，可以从二元档案实践理论的视角对档案记录历史的特殊方式以及图像档案内容的多元构成加以论述。

（一）图像内的历史——图像档案的内容信息

历史研究中关于图像档案的定位，更多的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或者是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证据材料，而关于图像的内容，最为直观的就是视野能及中图像档案的画面本身所能提供的史料信息。以史学家对于历史一词以“实在的

① 赵世瑜：《图像如何证史：一幅石刻画所见清代西南的历史与历史记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2 期。

② 荣新江：《从图像看历史新发现的粟特图像及其解释》，载《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

③ 陈琳：《图像证史之证解》，《东南学术》2013 年第 2 期。

④ 李根：《图像证史的理论与方法探析——以卡罗·金兹堡的图像研究为例》，《史学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

历史”与“描述的历史”二者所做的区分。[①] 忠实于社会现实的“纪实性”图像，即是以呈现“实在之历史”的图像类型，图像档案的内容信息就是客观实在的发生历史。图像档案在形成过程中会形成诸多联系，但是图像档案的内容信息是对于来源联系最直观的呈现。真实性作为图像档案内容信息的本质要求，它因此被视为历史的客观反映，尤其是在理解历史“是什么”的层面，它的价值尤为突出。图像档案内容信息的形成需要一个包含文字与图像的概括性属概念——痕迹。“痕迹的概念使‘写入’的范围超越了文本，扩大到摄影照片以及对于物体或者通过物体进行的力的作用。”[②] 从早期郑樵在《图谱》中提出以图文结合的方式来呈现形与意，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图像的复兴所形成的丰富图像史料，“图像档案的内容借助于色彩、构图、布局、位置、变形构成的一套基本的表述体系，在文献、仪式、口传的形式之外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③] 早期的图像档案内容写入信息，依赖于物理作用力施加到载体之上，而摄影技术的传入与发展，则借助于编码、感光材料的使用以实现“绘制”的目的，这些手段现在也成为图像档案记录内容信息的主要方式。

过去的某些信息只能由视觉图像来提供。“由于缺乏图像证据，历史调查研究受到了限制，无法合理表现某一特定历史场景中发生了什么。”[④] 尤其在文字材料非常缺乏或者是文字出现之前的助记忆时期，图像档案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记录决定其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如借助于考古活动所接触到的物质文化遗存，将中华文明的起源追溯到文献记载之前，再如借助于“二里头遗址”中所发现的宫廷遗址、建筑遗址以及大量的青铜冶炼等视觉证据，我们实现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程”的科学验证；借助于视觉形式所获得的关于青铜器物在纹路设计、颜色调配以及工艺造型的直观信息，即可得出关于早期文明在艺术审美、冶炼技术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历史信息。与此同时，即使是在文字产生之后的多媒介共存的历史时期，图像档案也依旧通过记录方式的特殊性即对于事物直观、清晰的反映，维持其独特的记录、表达与传播系统。正如郑振泽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编纂序言中所写道：“从自然环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到建筑、艺术、日常用品、衣冠制度，都是非图不明的。有了图可以少说了多少的说明；少了图，便使读者有茫然之感”[⑤]。图像档案的内容信息更多地为我们提供关于历史事实发生的信息，以独特的记录方式所留存下的适合以图像的形式来记录和表达的历史，同时即使是对于同一客观历史对象的记录，图像借助于记录方式特性和内容特征也可以弥补视角上的差异，借助于文字和图像的互文，进而实现更好的叙事效果。

（二）图像外的历史——图像档案的历史信息

立足于档案学历史主义原则，二元档案实践下图像档案的凭证作用由社会实践、文件、档案之间的关系及隐含的立体结构系统地记录下来，成为记录历史、证实历史的一个有效体系，成为一个既包含原始性，又高于原始性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记录体系。[⑥] 也就是说，图像档案不仅依赖档案的文本信息记录历史，同时也记录下档案在形成、传播和利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联系信息。图像档案之外的历史信息并非直接呈现在文本之上的符号，因为每一幅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总是产生于

① 王学典：《史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② ［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7页。

③ 安琪：《图像的“华夷之辨”——清代百苗图与苗疆历史的视觉表述》，《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④ ［美］海登·怀特著，王佳怡译：《书写史学与视听史学》，《电影艺术》2014年第6期。

⑤ 郑振泽：《〈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序·跋》，载郑尔康编：《郑振泽艺术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35页。

⑥ 李福军，刘新安，桑毓域：《从凭证体系向历史记录体系的转化——二元档案实践体系下档案功能研究》，《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1期。

某一社会实践活动，在产生与处理的过程中总是会形成多方面的历史联系。如果从生命史的视角将档案的形成、传播到消亡的历程看作是完整的生命周期，那么图像档案之外的历史信息就是关于档案的生命史信息。这种图像档案对于外在社会历史信息的记录并非借助于档案的内容记录可直接获取的，而是图像档案未能实现记录、需要加以解释和联想才能间接获取的历史信息。我们可以对图像档案这种视觉艺术材料进行特殊技巧的解读，对历史信息进行重构，完成对于历史的复原性想象，对文字材料的空白进行合理填补。① 因此，无论是对于图像档案中所记录的历史还是被图像档案遗漏或忽略的历史，其所记录下的都是图像档案形成、传播与利用活动与所在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一种张力信息，这些内容信息就和图像档案所反映的客观实体信息一起构成图像档案完整、系统的记录体系，进而实现二元档案实践体系下图像档案用来记录历史活动，历史地反映客观事物，广泛地反映社会实践的目的。②

图像实体所记录的历史，是已固化于特定载体上的文本信息，但是“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只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尤其头绪”③。图像之记录与其他载体的记载之间区别又关联的地方可得到关于历史的信息。因此，图像内历史信息的获取是以图像自身为对象而得到的内容信息，但是图像外的历史信息则是以图像为途径、方式而获得的背景信息。人们信任古代图像，是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重大或者特别事件必须要同时运用视觉艺术和书面历史两种手段加以记录，如果不这样做，那不仅会弱化它们对后世的影响，而且也会在真实性上打了折扣。④ 这种多媒介记录的初衷是建立在关于历史发生完整、系统的理解视角上。图像配合文字就是人们记载重要事件的常见方式，人们常陷入图文关系在真实性上的争论，其实正是忽略了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在于相互弥合而非取代，图像材料相对于文字材料，可以借助于特殊的记录方式来重构历史情境，进而还原文字历史未能触及的历史细节。借助于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关联，图像所证之历史并不是图像本身所传递、呈现的客观历史，而更多是从由同一事实所形成的表达差异中，所反映出的关于历史主体的创作动机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信息的记录与形成是在图像同周遭社会环境的交互活动中实现的，其思维起点虽然是以作为客观实在的图像内容为起点，但是解读的视角却要从图像的创作、形成以及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多历史联系出发，在获得图像外历史信息的同时也获得阐释其文化意义的方法。历史学研究强调置身于大的社会背景了解历史事实，而这种与图像生成、留存以及应用传播有关的背景信息，也自然成为图像历史信息的重要构成，区别只在于它呈现的对象或者是陈述的角度。

（三）图像的历史——图像档案的载体形式信息

图像档案的构成中，除了关于图像档案自身的内容构成和表达方式之外，档案的载体形式也是图像档案研究视域中的重要构成因素。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以及技术的革新投射在多元档案内容的记录与档案形态中，考察档案形态、种类的演变，对于研究人类历史，了解档案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以及档案的性质和特点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⑤ 图画作为最早期的档案类型之一，人类最原始的记事方法恰可

① ［英］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新美术》2004 年第 3 期。

② 李福军，刘新安，桑毓域：《从凭证体系向历史记录体系的转化——二元档案实践体系下档案功能研究》，《档案学通讯》2004 年第 1 期。

③ 《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 年，第 6 页。

④ ［英］弗朗西斯·哈斯克尔著，孔令伟译：《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105 页。

⑤ 冯惠玲：《档案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6 页。

反映出档案的形成初衷和人们对于档案性质、属性与价值的认识，作为档案载体的重要构成与档案形态演化的重要阶段，媒介变迁既改变了档案叙事的形式，还引起了人们对档案认知方式的同步转型，即塑造了不同的档案文化。[①] 也就是说无论是图像档案抑或是文字档案，其实质都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记录、存储与再现载体与技术，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和媒介技术才是档案的实质。这就是由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信息”理论，继而可以解释为媒介研究的最新方法不光是考虑“内容”，而且还考虑媒介及其赖以运转的文化母题。[②] 图像的表述方式是形象，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形象自身的力量与“内容”。作为记录媒介的图像档案载体自身是被“制作”出来的，而作为“技术”应用结果的档案载体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思维习惯有关。图像档案总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与人群主体存在着对应关系，如在语言文字尚未成熟的新旧石器时代研究，图像档案作为记录的方式代表了人类早期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而现代社会中，无文字民族借服饰、图画等方式传承、传播文化的方式也可侧面反映出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也就是塑造图像档案类型与书写档案文献内容的时代与地域信息。

图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载体，从文字到图像档案载体的演变，二者不仅代表着人类在认知程度上的推进和思维框架的选择，更意味着不同思维方式间的更迭。而考察图像媒介叙事就要从与图像媒介或图像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文字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成为艺术学乃至图像证史问题的核心。当然，“任何媒介在某一方面的长处在另一方面就可能成为短处。尽管在流利地叙述时间进程中的故事方面，图像叙事不如文学叙事，但图像的描写能力却强于语言。”[③] 尤其是在细节的描写和空间物品的安排与社会用途论述的时候，图像的价值尤为突出，正如国家博物馆所藏《滇南盐法图》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井盐生产工艺方面清晰且直观的陈述，相对于文献中关于井盐提炼技术的一笔带过，图像记录下的制盐工艺更为详细且从视觉、空间的逻辑呈现并体现出技术流程的前后演变与逻辑关系。借助于现代技术放大图像细节获得历史发生的情节要素，在空间中呈现技术流程的时间变动则感受表现内容的动态特征，而这些图像载体所呈现与记录的信息如果换做是文献典籍则需要更多的篇幅，且主题也不止一种。因此图像档案和图像档案所记录的内容一样，是人类特定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型塑的结果，图像档案同其他文化载体类型一起体现并记录人类记忆载体与方式的发展与多样性，折射出文献史料的内容及其形成活动本身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图像证史的二元档案实践路径——以《皇清职贡图》的内容分析为例

如前所述，图像证史问题的分析最终还是需要回归到图像档案的内容构成本身，认识到档案本身记录历史的层次性以及图像档案特殊的历史呈现方式。遵循着从档案的内容信息到档案实践过程中历史关联的系统描述，将档案所记录的历史信息拓展到档案实体之外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以更为具体的历史记录还原更为多元的历史情节，进而为图像的利用、解读提供范围更广的实践领域。在此，可以《皇清职贡图》的内容分析为例，进一步讨论图像史料的构成与应用问题。

史籍档册，历来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重视，以图籍反映周边民族状况，状其形而识其俗，在中国亦早已有之。“南朝梁元帝时，便有《职贡图》绘图记俗，凡三十余国。明代以后，出现了不少反映边疆民族状况的手绘本画册，

① 杨光，奕窕：《记录媒介演进与档案历史叙事的变迁》，《档案学通讯》2019 年第 4 期。

② ［加］马歇尔 · 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21 页。

③ 龙迪勇：《时间与媒介——文学叙事与图像叙事差异论析》，《美术》2019 年第 11 期。

多为图文并行，以图绘诸族体态服饰，文字记载其渊源、风俗。”[①] 明代时亦有仇英《职贡图》描绘边疆民族进京朝贡的场景。作为古代朝贡制度的产物，伴随着清代中期国力的强盛以及疆域范围上发生的变化，前来朝贡的域外国家和域内民族逐渐增多。及至清朝，基于“大一统”的理念，政治合法性的建立至关重要，因此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政府更加重视民族问题。推行合理的民族政策以强化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的关系，清朝建立起广阔的统治疆域，包括广西、云南和贵州的诸多少数民族人群陆续被纳入清朝统治，外藩与四夷纷纷被纳入或强化到已有朝贡关系中。乾隆十六年（1751 年）六月初一，乾隆借谕旨言：“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着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僮、黎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②] 足见职贡图编修工程已成为王朝统治中重要的信息收集方式。职贡图多以各地所呈送的素材稿本为来源，交由当时的宫廷画师来制作，庞大专业的绘制队伍加上长时段的完善与增补过程，使其具备丰富的历史信息，成为研究清代民族社会历史发展、促进对少数民族认知的重要史料依据。正如伍德沃德关于地图分析的主张“将图像置于其绘制的背景和文化之中去看待”，图像研究并不局限于图画内容，更要着重挖掘图画内容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且将地图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和知识的载体，将其放置在其形成的各种背景中去看待和分析，才有可能充分挖掘地图独有的史料价值。[③] 这句话或许可以概括出档案学视角下关于图像档案内容的三层认知：

首先，图像内的信息是图像符号所记录与承载的历史信息，这是通过“看图说话”的方式所能获得的最为直接的历史信息。葛兆光认为《职贡图》所绘图像一半为纪实，一半为想象。[④] 关于职贡图的纪实，首先体现在绘图来源即《番图》的实际调查方式。在乾隆宣布《职贡图》绘制计划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前奉旨令近边各省将附近番夷形貌衣饰绘图呈览。查闽省界在东南，外夷番众甚多。臣等绘图进呈通计畲民二种、生熟社番十四种、琉球等国外夷十三种。种各有图，图各有说。凡风土嗜好，道里远近，无不具载。报闻”[⑤]。在这个层面上，图像的作用是进行直观的历史书写。与此同时，在《皇清职贡图》的绘制过程中，外邦、藩属或边地少数民族首领、使者进京朝见皇帝时，特命丁观鹏、贾全等宫廷画师前往观看临绘。[⑥] 因此，职贡图得以对少数民族服饰、风俗、民族文字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绘写，由于资料的获取方式多为实地调查和当面临绘，因此单是从图画本身，人们就可获取众多较为可信的历史信息。

以图出发，图文结合，职贡图以编纂——“汇”的形式呈现收集——“计”的数量信息，其所记载几乎涵盖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以及朝贡体系下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些统计数据也可以我们提供特定的历史信息，如祁庆富、史晖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题名为“云南民族图考”的绢本彩绘图册，绘写云南夷人 40 种，与《皇清职贡图》所绘云南夷人 36 种中的 32 种类目相同且形象极为相似，遂得出《云南民族图考》由《皇清职贡图》及其他图册汇编而成的结论。[⑦] 这种便是将历史的材料转化为数据，从而对历史问题进行纵向的谱系梳理并实现历史的理解。

其次，图像在形成、传播与利用的过程中，

① 潘洪钢：《清代官修民族图册〈皇清职贡图〉浅说》，《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4 期。
② 〔清〕傅恒等编纂：《皇清职贡图》，扬州：广陵书社，2008 年。
③ 成一农：《图像如何入史——以中国古地图为例》，《安徽史学》2020 年第 1 期。
④ 葛兆光：《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文汇报》2005 年 11 月 13 日。
⑤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一十九，乾隆十七年七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 495 页。
⑥ 畏冬：《〈皇清职贡图〉的创制始末》，《紫禁城》1992 年第 2 期。
⑦ 祁庆富，史晖等：《清代少数民族图册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50 页。

总是会与特定的主体形成政治、文化的关联，进而充实原有文献信息内容，该类信息可将之称为图像外的历史信息。这里的“外”寓意我们需要从整体、系统的视角，去分析图像“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与相关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摒弃传统“相机取景”式的直观结构性呈现，从图像记录的事件过程中，将更多的研究视角与记录时段，纳入问题域，也就是由问题来决定我们选用哪些资料以及选用方式。同样以《职贡图》的使用为例，编纂《职贡图》的历史背景是清军入关继而建立起对于全国的统治，并在扩张过程中强化了对西南边陲的控制。另一方面，清廷在武力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同时，也制定了一些安抚政策，试图促进苗疆的稳定，这就要求清廷必须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基本状况有基本的了解。因此，乾隆在位时下令编制了《皇清职贡图》[①]，来记录清代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认知。绘制《皇清职贡图》的原始素材，主要由边疆的督、抚组织人员绘画提供。[②] 诸如《伯麟图说》即由云贵总督伯麟负责搜集、汇编，其中云南少数民族资料以李沽依《云南诸夷图》为蓝本编绘制作。由于《皇清职贡图》对于少数民族风俗、服饰等信息记载详细且真实可信度较高，那么在以《伯麟图说》为材料来源的《皇清职贡图》、以《伯麟图说》为原本遴选而成的《云南种人图说》，大量引用《伯麟图说》的（道光）《云南通志》以及随后迭代引用《皇清职贡图》的地方史志之间，在围绕地方史志关于同一文本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叙述差异等问题上，是否又可引出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该问题的提出，正是建立在对图像史料形成过程的探究基础上。在《皇清职贡图》完成之后，随着清廷版图的不断扩大和边疆少数民族的陆续归附，丁观鹏所绘的第一卷在乾隆时期又陆续进行了四次增补，[③] 结合增补的时间所对应的内容变化、由绘制图像的变形、内容的增减反映出清朝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并能获得图像外的社会情境信息。因此《职贡图》的制作经历了一段从各地上缴的《番图》，到宫廷画家所编绘的《职方会览》，再到《职贡图》的过程。[④] 图像内容的丰富信息通过图像的制作、传播与利用过程表现出来，构成图像内容的第二个层次。

最后，《职贡图》作为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与知识载体形式，体现了图像建构知识体系的能力，更是特定社会历史信息的呈现。自《周礼》中以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到两汉时期史书中出现少数民族专题篇章，再到《职贡图》形成正史中为各民族、族群列传的体例。外国及国内的少数民族的纪实图像与社会状况，分别以朝贡呈送并纳入正史书写体例，并成了固定的知识制式。作为古代“华夷秩序”的文本叙述和文化书写层面的认知体现，官方绘制的《百苗图》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百苗图》的视觉表现形式与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清代苗疆的社会历史情境构成的对应关系，使其成为一类典型的社会性艺术。“这一图类是清帝国边疆观念想象与具象的再现，是以视觉媒介为载体对苗疆社会历史情境进行的一种创造性‘转译’。”[⑤] 这里的图像以及图册形式所承载的信息，就是被彼得 · 伯克称之为“套式”的东西，像《滇夷图》《百苗图》等反映少数民族状况与习俗的图集正是这一“套式”的产物。相较于文字，图像更容易与风格、主题联系在一起，受图像研究中一个特定因素“母题”的影响，同类型的图像总是会围绕特定的图像母题进行创作，进而形成图像中被反复使用的原型、线索与脉络，而少数民族图册的体例制式，同传统史书中对于少数民族部分的史籍书写体例一样，都是古代中国华夷观念影响下，国家从中心的立场对于边疆与边疆人群的想象与文

① 赵荔：《清代〈普洱夷人图说〉研究》，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9 页。
② 祁庆富：《〈皇清职贡〉的编绘与刊刻》，《民族研究》2003 年第 5 期。
③ 畏冬：《乾隆时期〈皇清职贡图〉的增补》，《紫禁城》1992 年第 6 期。
④ 赖毓芝：《构筑理想帝国〈职贡图〉与〈万国来朝图〉的制作》，《紫禁城》2014 年第 10 期。
⑤ 王万发：《基于苗图的苗族图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152 页。

化表述。同样，职贡图以其写实的绘法也呈现出受西方绘画技艺影响下中国传统宫廷画的时代特征，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绘画发展历史的一面镜子。

四、二元还是多元？——后现代语境下档案史料内容的多重面向

二元档案实践立足于“档案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文件”这一前提，在文件形成之时与形成者之间所建立的内在来源联系之外，增加了档案在整理、传播以及利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外在”关联。归结起来，这些观点都是从档案的“外在关系”视角即“属性”“功能”“结构”等方面来探讨档案本质。[①] 这些外在的关系也就是档案与形成背景之间的联系，它不仅是档案所记录的重要历史信息，同时也是理解档案内容的前提，是从历史的维度对来源一词本身以及来源原则的丰富与拓展。电子文件时代文件多元复杂的形成主体、现代组织的复杂性以及后现代等因素都对此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影响。这种对于过程、系统关联的关注，实质是后现代档案学理论从重视信息载体的记录转向逻辑构建的解释力。后现代史学不再关注单一的史料所记录与陈述的事实，更拒斥用客观、结构、规律而代之以解释、叙述和意义等词确立起历史研究新的问题取向。图像档案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并非只是单个组成部分的机械相加，这种建立在杂乱、无序史料基础上的历史分析只是在寻求主观记载与客观实际发生之间的对应性，因此很容易陷入真实、客观等单一的评价准则，而忽略图像档案本身构成的多元与复杂性。这种在文字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传统史料观念影响下，图像因而被排除在史料的范围之外或者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只是将其视作文字史料的补充，由此也就引发关于图像入史的限度以及图像证史的可信度问题。

后现代史学从历史编纂学学科入手，以叙事、解释与建构的视角分析历史作品中的“虚构”与“建构”成分，这些被称之为情节与结构的建构、虚构性因素就是历史记录与事实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史料在形成、发展与流传过程中与各关联主体间形成的历史信息。后现代史学并没有解构和否认史料的真实与客观特性，而是强调需要从整体、系统的史料观念之中去理解史料的真实。后现代思潮对于档案学的影响与表现更为明显，与史学类似，同样以档案史料作为研究对象的档案学也逐渐开始关注档案的形式内容，也就是借助于历史联系所建立起的过程性与情境性信息。传统的档案学研究关注档案的结构性构成，即包含符号、形制与载体等内容信息，但是在后现代观念影响下，档案开始关注形成这些内容信息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在整理、利用以及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而累积的新的意义与内涵。档案是历史学研究视野中一手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与依据。档案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依据，档案进入史学研究所依赖的是其呈现情境化和结构性有机历史整体的价值，这是对于档案内容构成的多元认识。这种对于档案的内容与价值使用的多元主义认识建立在对于历史事实和社会现象复杂、多元属性的认识基础上，不过，档案只是社会记忆保存的构成部分，而要实现历史事件的解读，需要关注多类型的社会记忆体系，强化合作才能形成客观、全面的认识。除了实现对于档案自身内容构成的多元认识之外，档案工作人员也应该在包括档案的形成、管理以及利用的过程事件中重新认识与定位自身的工作性质，强化自身的合作与整合意识。档案管理者在面对历史研究者的史料诉求中，不再是被动的提供历史事实相关的档案原件，而是需要树立全面、系统的史料观，主动提供有助于研究者理解档案内容信息的背景材料，进而提供给研究者解读与应用史料的思路。换句话说，档案管理者不仅要力图呈现出档案内容信息的全貌，更要将自身对于档案生命周期的参与过程客观、及时地记录下来，按照时间的顺序编排置于原有的信息序列中，以

① 刘新安，伍振华，崔杰：《档案历史联系与历史的同构性：一个新的档案本质观点》，《档案学通讯》2016 年第 6 期。

方便后人可以在连续的记录序列中查阅并利用文献。

有鉴于此，后现代思潮与其说是解构了档案的透明、真实特性，倒不如说是对于档案真实特性的不断丰富与完善。虽然相较于传统的档案学研究，档案的价值更多地服务于现实维度下的信任、情感以及认同等问题，对于由因果关系主导的历史真实的原因探讨日渐式微，但是档案价值的实现仍需要立足于档案自身所能够提供的证据信息，而证据一词更多代表的是至少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档案的真实、客观属性源自于档案与形成者之间形成的关联，这是对于历史事实发生原貌最为直接的描述与反映。档案的整理、管理以及利用工作就是不断地通过记录下围绕档案所发生的事件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联系、在不同时段所形成的历史联系加以区分，进而维护历史记录本身的真实与可靠。在此基础上，人们相信档案内容之中包含着真相，但是这种真相呈现出系统、全面与多层次的特征。同时这种在史料整理、编纂以及利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多样性真实，也恰好说明历史事实的多样性。因此后现代思想在档案中的表现就是一种系统、完整、过程性多元主义观在档案概念界定、内容构成以及价值发掘中的应用。

在确立了这种后现代观念下的档案史料观念之后，史料或者档案本身的构成就包含史料所直接记录的内容信息与借助于历史关联所建立起的间接背景信息，文字史料与图像史料都具备这两方面的信息。正如上文中以《职贡图》为例对于图像内容构成的分析，图像记载的内容就不仅包含图画本身所直观呈现的，更包含图像在形成以及演变进程中所反映出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变迁信息。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字与图像史料都只是“过去”遗存于今天的遗迹，本质上都是历史研究有待解读的文本，都记录着特定的历史信息或陈述与事实之间的某种“建构性”差异。因此，图像不仅可以像文字一样记录历史信息具备史料的价值，甚至某种程度上讲，图像的史料价值要高于文字。“图像叙事的本质是空间的时间化，即把空间化、去语境化的图像重新纳入到时间的进程之中，以恢复或重建其语境。”① 这也就意味着图像所记录下的不仅包括单个事件的发生要素，而且也将各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呈现了出来。叙事的本质是将历史作文本化的比喻，以记忆与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而更好的实现叙事和理解的目的，最终图像可以实现相对于文字更好的叙事效果，图像的使用也就更为契合后现代思想下对于多元、整体历史的还原，由此也就更能实现证史的功用。

遵从这样的逻辑，二元档案实践的思路完全可以延伸成为“多元档案实践”，档案的内容信息会因为所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增多而呈现、反映出更多的社会主体与环境背景信息，多元档案实践观就是对于档案多元内容构成的认识，是多元系统的认识观在档案研究中的体现。历史研究中多元、系统的认识观是建立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复杂性以及历史记载的多面性所形成的。也就是说，后现代史学并非否认过去这一“历史实在”，而是认识到“历史实在”的多元存在。这种多元不仅体现在历史事实本身发生的复杂与多元，更会因为记录主体的不同、记录角度的偏差以及呈现载体的多样而衍生出多面的历史信息。从文献的载体出发，不同载体的符号语言所对应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历史的研究需要认清复杂且多元的历史研究对象，通过置身于更大的问题语境之中，回归史料的记录内容与记录方式本身，以多载体、多学科的视角表达更为多元的观点，于此或能以“多元主义”弥补“主观主义”，对历史问题作出更为全面的解释。

结 语

以图像为对象所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每个学科所能提供的图像证词是不一样的。在对于图像和文字关系的讨论中，对待二者固然要有

① 龙迪勇：《图像叙事：时间的空间化》，《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独立的认识，但同时需区别又联系地加以使用，也就是将其应用于不同的研究层面。因为图像的历史学研究就是历史学家于艺术学和历史学两种语境间去选取图像的内容并加以转化利用，这也决定了在此背景下的图像证史问题讨论得不出明确且统一的答案。正如哈斯克尔在《历史及其图像》中所言，历史学家需要将艺术证据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做出最好的解释，但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要想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就需要充分认识到彼此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必然差异。[①] 因此，对于图像证史问题的研究就需要寻找到合适的问题导向，以多学科的视角表达更为多元的观点，才能对其核心问题即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实现更为合理的解释。历史学视角下的图像研究，如果只是将其视为历史证据的来源与补充，则忽略了对于图像内容记录、意义表达乃至文化类型多元性的认识。文化的多样性记录与表达中，图像与文字以及其他文化表达形式之间是“和而不同”的关系，图像作为证据实体也作为方法进入到历史研究中，需要引发更多超越图像本身的思考。借用图像对于历史情感的激发功能，历史学的图像研究过程本身就应该成为一幅历史图景，激发人们对于图像、历史学学科转型以及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思考。图像既以刻写之符号作为史料入史，同样也需秉承后现代主义的多维视野，关注图像本身在形成与存续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元历史关联，以及由此所能触及并续写的多面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图像以改进成说，以趋近客观的历史。

■责任编辑/张瑞臣

Return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A Reflection on the Use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rchival Science

YANG Yi & SHAN Xu-do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use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art history, but also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entry of image research into the field of history. Although images as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ources of evidence have entered the study of history,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image materials in terms of credibility and clarity, as well as their subsidiary status as a supplement to textual narratives, have affected the scope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ir entry into history, leading to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of history. The root cause of this discuss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current historiography focuses on the use of image-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still cannot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ways of text-based historical research. Therefore,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unique recording methods of images and the diverse content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ival studies, and through re-examining the essence and mechanism of image evidence in history and leveraging the archival attributes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 materials, images can enter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become the objective and primitive textual basis, thus completing the research premise of image history. To truly achieve the goal of verifying history through images,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elements of imag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historical connections, and to restore more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historical facts through more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documentary records. Therefore, the discussion on the use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should return to the recording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mselves. In addition to seeking truth and novelty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requires comprehensiveness. While achieving a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s about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also provides ideas and methods for more related issues.

Keywords: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binary archival practice; concep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① ［英］弗朗西斯·哈斯克尔著，孔令伟译：《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解释·导论》，第10页。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张清涛

［云南民族大学，昆明　650504］

摘　要：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嘉道时期；清朝；越南；藩属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066－10

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朝的对外政策，与周边国家构建了以清朝为主导、以封贡为纽带的藩属体系。嘉道时期，清朝经过康乾盛世开始走向衰落，在对外政策上趋于保守。在整个清代与越南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嘉道时期是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因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在整个中越关系史上呈现新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前期或者光绪时期，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①]且已有成果主要探讨嘉庆初年清阮藩属关系的建立问题，但论述还不够深入，对整个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的发展演变也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清朝与阮朝藩属关系的建立过程以及藩属体系下清阮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并总结这一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影响。

一、安南新旧阮之争及清朝态度

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安南阮文岳、阮文惠、阮文侣三兄弟发动了反抗广南阮氏统治的西山农民起义，建立了西山政权。为了与广南王阮氏区别，阮文岳兄弟被称之为“新阮”，广南阮氏则被称之为“旧阮”，新旧阮为争夺安南统治权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这

收稿日期：2023－12－02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晚清中法越南问题交涉研究”（项目号：2024J05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清涛，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

① 参见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年；余定邦，喻常森：《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年；柳岳武：《清代藩属体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叶少飞：《越南阮福映政权的合法性塑造及对清越朝贡关系的认知与利用》，《理论学刊》2020 年第 6 期；段红云：《论藩属体系视阈下清代中越关系》，《史学集刊》2023 年第 1 期等。

场战争也被称之为“新旧阮之争”。

西山农民起义爆发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二月占据了归仁城。面对日益强大起来的起义军，广南旧阮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十二月，广南阮主阮福淳以尊室香为节制，率军讨伐西山新阮，但惨遭失败。阮文岳等乘胜追击，广南旧阮纷纷败退。据《大南实录》载：“岳进据广义府，该奇尊室斌拒战不克，引还，岳又使其党侵掠延庆、平康诸府，于是广义以南至平顺，皆为岳所有。”①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十月，阮福淳禅位于东宫阮福旸，“东宫以事势交逼，不得已受命，称新政王，尊上为太上王”②。九月，西山新阮擒获了阮福淳、阮福旸以及众多宗室，并将其杀害。至此，广南旧阮政权已被推翻，西山新阮控制了今天越南中部和南部地区，但是新旧阮之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春正月，阮王侄子阮福映被旧阮残存势力尊为大元帅并摄理国政。阮福映积极招纳旧臣，整顿兵马，试图收复失地。自 1778 年至 1782 年，阮福映与西山军经过四年激战，虽然各有胜负，但是由于实力悬殊，西山军最终占领柴棍和嘉定，阮福映不得不匿避于海中的富国岛。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秋八月，阮福映部下朱文接收复柴棍并派人去富国岛告知阮福映，阮福映大喜，回銮柴棍。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二月，西山阮文侶、阮文惠复率兵来攻打阮福映，阮福映不敌，退走三埠，“从臣惟阮金品等五六人，兵不满百人”③。此后不久，阮文惠又驱兵前来，阮福映失利退回富国岛。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二月，在西山军的追击下阮福映逃至暹罗，寄居于暹罗望阁城。

在阮福映避难于暹罗期间，安南国内局势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在控制了旧阮的统治区域后，阮文惠以“扶黎灭郑”之名挥兵北上，攻陷了黎朝国都升龙，消灭了郑氏集团，但由于新阮政权人心未稳，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阮文惠恢复了黎显宗的权利。黎显宗去世，阮文惠又拥护皇孙黎维祁继位，随后命部将分守升龙及其以北地区，阮文惠自己率师返回富春。阮文惠南返后，郑氏集团又重新独揽政权。黎维祁密诏驻守在义安的西山新阮部将阮有整北上升龙，诛灭郑氏集团势力。然而，不久阮有整又大权独揽，势力渐强。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阮文惠又以诛阮有整为名，再次派军北上升龙，黎维祁仓皇出逃，西山新阮重新控制了北方地区。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受黎维祁求助，乾隆帝以兴灭继绝为旗帜，出兵安南，扶黎灭阮。但是，清朝的军事行动先胜后败，最终不得不于 1789 年撤出安南。至此，安南北方也被西山军完全控制，黎朝灭亡。随后，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以阮光平名义多次上书清朝求和请封，乾隆帝承认了西山政权对安南的统治，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与安南西山朝建立了藩属关系。

阮福映避难暹罗期间，时刻关注着安南国内局势的变化，并制造战船、招募军士，伺机复国。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在阮文惠围攻归仁时，嘉定地区兵力空虚，阮福映趁机率兵攻打嘉定，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攻占了整个嘉定地区。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阮文惠病死，其子阮光缵即位。此时西山朝内讧不断，阮光缵无力控制局势，矛盾不断激化，在新旧阮之争中，其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转向被动。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阮福映率兵围攻罗台堡，西山军不敌，“贼参督范文恬败走，尽夺其粮饷，收复富安府”④。嘉庆六年（1801 年）五月，阮福映领兵攻打富春，收复了都城富春。嘉庆七年（1802 年）三月，阮福映攻占了归仁城，西山残军退守京城升龙。同年六月，阮福映攻占了升龙，俘获了西山国王阮光缵，西山政权灭亡，新旧阮之争最终以旧

①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伪西列传》，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语学研究所（言语文化研究所整理），东京有邻堂影印本，1962 年，第 1332 页。

②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前编·睿宗孝定皇帝实录》卷十二，第 170 页。

③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第 321 页。

④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六，第 390 页。

阮胜利而结束。

在新旧阮之争后期，以阮福映为代表的旧阮势力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西山朝统治辖区不断缩小。面对阮福映的步步紧逼，阮光缵多次向清朝求援，但是嘉庆帝均以“与内地无涉”“不必过问”的态度敕谕大臣严防边隘，拒绝出兵。对此，《大南实录》也有记载：“西贼阮光缵奔北城，改伪号宝兴，使人如清乞师，清人不许。”① 在藩属体系下，西山阮氏作为清朝的册封对象，清朝有责任维护其在安南国的正统地位。但是，面对西山阮氏的求援，嘉庆帝仍秉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嘉庆帝恪守藩属体系下“不治夷狄”的礼法制度，不干涉属国内政。清朝建立后，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以清朝为中心的藩属关系。双方通过“册封朝贡”的政治往来，“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字小事大”“兴灭继绝”等礼治体系，共同维系东亚政治秩序的稳定。在藩属体系下，清朝虽然要承担“兴灭继绝”的责任，但是同时也秉持“不治夷狄”的原则，对属国内政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不问其国内之政，不问其境外之交”②。所以，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属国内部“自相争杀，原属外夷情事之常，中国并不过问”③。也正是这样，面对安南新旧阮之争，嘉庆帝从藩属体系中礼法制度出发，敕谕守边大臣严守边界，对安南内乱采取不干涉的政策。

第二，嘉庆帝对西山阮氏纵容海盗的行为不满。④ 在清代，海盗问题一直影响着清朝沿海地区的稳定，是困扰清朝统治者的一个大问题。嘉庆初年，清朝虽然命西山阮氏缉捕海盗，但其不仅不配合，反而窝藏海盗，劫掠清朝商船。嘉庆元年（1796 年）十二月，福州将军魁伦缉拿到乌槽船海盗，“内有安南总兵及该国兵丁”⑤，并发现了安南国的封爵敕命和印信等物，嘉庆帝敕谕两广总督吉庆：“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安南何官，即行严办。再此后拿获安南盗匪，审明后当即正法，毋庸解京。”⑥ 嘉庆六年（1801 年），洋盗陈添保携眷内投，言称自己因捕鱼时遭受风难，被阮光平掳去，封为总兵。得知真相后，嘉庆帝极为震怒，“阮光平深受皇考重恩，如此丧心蔑理，实非人类”⑦。可见，嘉庆帝已经对西山阮氏的“不臣之心”深为不满，对其请兵之事予以拒绝亦在情理之中。

第三，嘉庆帝吸取了乾隆“安南之役”失败的教训。乾隆时期，清朝虽欲扶黎灭阮，但是军事上却遭到失利，损失惨重，这也影响了清朝的安南政策，正如阮福映谋臣邓文诚所言：“清人自有事于北河为西贼所挫，能不痛心疾首、积憾贻惭?”⑧ 加之，嘉庆时期，清朝国内矛盾重重，国力日渐衰弱，在边疆政策上也趋于保守。所以面对阮光缵的乞兵求助，嘉庆帝不得不谨慎应对。

总的来看，嘉庆帝拒绝阮光缵的求助主要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在藩属体系下，清朝虽然需要承担“兴灭继绝”“字小存亡”的责任，但是这并非是清朝构建藩属体系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维护清朝边疆地区的安全。所以“兴灭继绝”只不过是清朝维护边疆安全的一种手段，而何时运用这种手段则要根据现实利益的需要。当属国的内乱不威胁清朝边疆安全，不有损其天下共主地位，清朝往往会不予干涉。而西山朝在受到 清朝的厚赐与重视后，并非恭顺臣服，“惠自以为得志，骄肆益甚”⑨。此后，阮文惠又对清朝六猛之地提出领土要求，在遭到清朝拒绝后，“惠由是稍有不

①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十四，第 527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七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63 页。
③ 《清仁宗实录》卷二百一，嘉庆十三年九月己丑条，第 682 页。
④ 张清涛，吝成璋：《清嘉庆年间安南新旧阮之争及清朝不干涉态度述论》，《红河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
⑤ 《清仁宗实录》卷十二，嘉庆元年十二月辛卯条，第 185 页。
⑥ 《清仁宗实录》卷十三，嘉庆二年春正月庚戌条，第 193 页。
⑦ 《清仁宗实录》卷九十，嘉庆六年十一月丁亥条，第 200 页。
⑧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十，第 455 页。
⑨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四，第 360 页。

平，励士卒造船艘，阴有窥觎两广之志”，甚至扬言：“假我数年畜威养锐，吾何畏彼哉?”[①] 西山朝的种种不臣行为，违背了藩属体系下“字小事大”的基本原则，这也表明西山政权并非清朝的理想选择，所以为有效地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全和藩属关系的秩序，清朝有必要在安南寻求一个新的政权来代替西山政权。基于此，面对安南内乱，清朝采取观望谨慎的态度，这也表明在属国问题上清朝的政策更加务实和理性。

二、阮福映遣使求封与清阮藩属关系的确立

在对清朝态度上，与西山政权纵容海匪的“不臣”行为不同，阮福映则频频向清朝示好，并采取多种措施以争取清朝的支持。在乾隆帝出兵安南之时，阮福映便遣使臣奉书前往广东，并“以米五十万助力军饷”[②]，但因在海上遭遇风难，音信久绝。随后，因清朝与西山政权建立了藩属关系，阮福映不得不中断与清朝的联系。在新旧阮之争中，阮福映势力不断增长，扭转了颓败局势，为获得清朝的支持，再次积极主动与清朝联系。嘉庆三年（1798 年）五月，延庆留镇阮文诚、邓陈常上疏阮福映：“方今我与西贼正所谓以国敌国，势不得不伐交求援，使贼势日孤，方为万全良策”，建议阮福映将俘获的匪船送往清朝，“清帝必将嘉纳，不忍以寻常眇我”，倘若能临廷面觐，“一则提说西贼外帝内臣，投彼所忌以构其隙；二则探问黎皇，潜通消息，俱与之力请”[③]。阮福映采纳了阮文诚、邓陈常的建议，同年六月，派遣翰林院侍学吴仁静奉国书随清商船前往广东探访黎维祁消息。到广东后，吴仁静访得黎维祁已经去世，遂还。

嘉庆六年（1801 年）五月，阮福映攻克富春后，再次向清朝示好，“帝以旧京既复，议以国情移于两广总督”[④]，派清商赵大任携带禀词前往广东，对清朝恤赏该国遭风难番的行为表达感激之情。两广总督吉庆将此事奏报嘉庆帝，嘉庆帝对此比较警惕，认为阮福映递禀之意，“不过欲嘉其恭顺，希冀奏明，或可邀天朝恩助”[⑤]，但是农耐与安南现在争夺未定，不可稍存偏向。对于如何回复阮福映，嘉庆帝向两广总督吉庆做了明确指示：“惟当谕以上年恤赏该国难番，系属天朝抚绥各国外夷常例，并未专折奏闻大皇帝圣鉴。今民人赵大任漂至尔国，尔国照料回粤，并带有文禀。本部堂深悉尔国感谢之忱，但上年抚恤尔国难番之事，既未具奏，此时尔国禀词，亦不便代为奏达。”[⑥] 从清朝的覆文中可以看出，嘉庆帝对于安南内乱之事避而不提，对阮福映亦无责备之意，只是不愿意与阮福映发生官方联系，对安南内乱仍是持观望态度，不予干涉。

嘉庆七年（1802 年）五月，阮福映建国称帝，年号嘉隆。此时阮福映不但俘获了新阮所支持的齐桅海匪，还缴获了清廷锡封西山政权的册印，西山政权已是摇摇欲坠。阮福映与群臣商议，指出：“我邦虽旧，其命维新。复仇大义，清人尚未晓得……今所获伪西册印乃清锡封，所俘海匪乃清逋寇，可先遣人送还而以北伐之事告之。”阮福映遂以郑怀德为如清正使，吴仁静、黄玉蕴为如清副使，“赍国书品物并将所获清人西封伪西册印及齐桅海匪”前往广东，并请两广总督吉庆将此事代为上报。[⑦] 嘉庆七年（1802 年）八月，嘉庆帝在接到吉庆奏折后，对阮福映送还册印、海匪的行为颇为赞赏，认为阮福映能“遣使恭缴敕印，并缚献逋盗，深得事大之理”[⑧]。但是对于阮福映恭进表贡之事，又以其“邦家未定，又非素备藩封，揆之

①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伪西列传》，第 1350 页。
②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五，第 364 页。
③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十，第 455－456 页。
④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十四，第 538 页。
⑤ 《清仁宗实录》卷八十八，嘉庆六年十月乙卯条，第 168 页。
⑥ 《清仁宗实录》卷八十八，嘉庆六年十月乙卯条，第 168 页。
⑦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十七，第 571 页。
⑧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〇二，嘉庆七年八月甲辰条，第 361 页。

体制，尚不应在职之列”①，婉言谢绝。

不过，嘉庆帝也意识到西山新阮将不能保有境土，加之其严重的不臣行为，所以也有了放弃西山政权的打算。阮福映抚有安南全境后，再次“命移书于两广总督问以邦交事宜”时，嘉庆帝已经知晓安南之事，又认为阮福映比较恭顺，故同意与其建立藩属关系，同时敕谕阮福映“既抚有安南全境，自应修表遣使请封”②。在获得嘉庆帝允许后，同年十一月，阮福映再次遣使携国书及贡品前往清朝请封，表曰：“臣之先祖，辟土炎郊，日以浸广，奄有越裳、真腊等地方，因建国号南越，父传子继，二百余年。兹臣遥仗天威，扫清南服，有此疆宇，亦由先祖肇基南越之所自也。……伏望圣聪曲垂轸顾，锡以荣封，兼赐国号南越，俾臣赖得荷殊恩，继先志，奠安南服，永保藩封。”③

阮福映态度虔诚，嘉庆帝阅其表文后颇为满意，但是对于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一事，则持警惕之心，未能答应。嘉庆帝认为南越之地包含甚广，清朝广东、广西地界也在其内，而此时阮福映即使占有安南全部之地，也仅为交趾故地。由于南越之名与安南事实不符，所以嘉庆帝怀疑阮福映“有恃功要请情事，恐其心存叵测”④。因此将请封表文予以退回，同时又密饬两广地方官小心防备，不可稍有松懈。由此可以看出清廷在没有弄清楚阮福映的真实意图时，对其请封之事仍持审慎态度，这也是明智务实之举。

嘉庆帝驳回阮福映的表文后，又命大学士会合六部尚书议奏，共同商讨如何解决其请封之事。嘉庆七年（180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及六部尚书奏称赵佗时期的南越国疆域广大，而今阮福映所占据的仅为南越一隅，“若该国复南越之古，名实既不相符，体制尤为未协”，“至安南国号，自宋迄今，数姓相承，并无更改”，因此“应请仍以安南为称，庶于事理允协”⑤。但是，嘉庆帝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嘉庆八年（1803年）三月，阮福映再次遣使请求清朝赐封“南越”国号，与上次上表不同，这次详细禀述了阮朝建国始末。四月，嘉庆帝阅其表文，觉其情词委婉，极为恭顺，所以不应当再授予“安南”之名。经过深思熟虑后，嘉庆帝予以变通，将其国名改为“越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并认为“越南”意为“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称名既正，字义亦属吉祥，可永承天朝恩泽……该国膺此嘉名，备位藩服，更足显荣勿替”⑥。“越南”之名符合了阮福映的利益诉求，阮福映认为该国名“名称正大，字义吉祥”⑦，欣然接受。

嘉庆八年（1803年）十一月，清廷正式任命齐布森为册封使，前往越南进行册封。为了欢迎清朝册封使到来，阮福映“以邦交事体关重，令城臣仿黎故事增构殿宇及河津接使堂。又令谅山修仰德台，自洱河至谅山量地置驿凡七所，各设公馆”⑧。嘉庆九年（1804年）正月初四日，册封使齐布森出镇南关，行抵越南境内。正月十三日清晨，阮福映在敬天殿庭至朱雀门设大驾卤簿，命亲臣分别前往嘉橘公馆以及河津接使堂迎接册封使齐布森一行，阮福映则携百官在朱雀门等候。齐布森到达后，在敬天殿向阮福映行宣封礼，代表清廷向阮福映颁布了诰命诏书，并赐予了驼纽镀金银印。在册封仪式结束后，阮福映在嘉橘公馆设宴款待齐布森一行人。席间，阮福映向齐布森馈赠了纨绢、布、犀角、琦楠等物品，同时又以越南地方特产进贺，齐布森虽然辞谢，但阮福映仍然请“收其一二以慰其心”⑨。这期间，阮福映对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〇二，嘉庆七年八月甲辰条，第361页。
②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十九，第601－602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92页。
④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〇六，嘉庆七年十二月丁巳条，第428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493页。
⑥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十一，嘉庆八年四月庚午条，第48页。
⑦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二十三，第641页。
⑧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十九，第602页。
⑨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卷二十三，第642页。

齐布森的招待不可谓不隆重，据《大南会典事列》载："凡清使初到日、行礼日、回程日均有宴款，各一次。"[①] 册封典礼完成后，齐布森辞归，阮福映命尊室嶂送其一驿，又命候命大臣护送出关。根据册封礼仪，清廷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后，阮福映需要遣使谢恩。所以在齐布森归国时，阮福映以黎伯品为刑部参知，充如清正使，陈明义、阮登弟充甲乙副使，携带贡品前往清朝谢恩。

从阮福映请封到清廷册封，再到阮朝遣使谢恩，清越之间完成了整个邦交典礼，这也意味着清朝与阮朝正式建立了以清朝为中心，以朝贡与册封为纽带的藩属关系，旧阮政权获得了清朝的承认，清越之间的藩属关系从新走向正途。

三、藩属体系下清阮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清阮藩属关系的建立，对清廷而言，既维护了其"天下共主"的地位，也有利于保障边疆地区的稳定；对越南而言，既有利于其国内的统治，也为其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由于清朝与阮朝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在藩属体系下双方积极互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清越之间继续开展封贡活动。清越藩属建立后，阮朝按照"两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的规定，积极向清朝朝贡。道光十九年（1839 年），道光帝认为越南"远道驰驱，载途雨雪，而为期较促，贡献频仍，殊不足以昭体恤"，因此谕令该国"四年遣使朝贡一次"，贡品"照两贡并进之数减半进呈"[②]，以显示清廷绥怀藩服之意。越南除了按照贡期积极纳贡外，在嘉庆帝、道光帝万寿大庆时也会上表庆贺。如嘉庆十四年（1809 年），嘉庆帝五旬万寿时，阮福映命侍中学士武桢携表书及贡品如清庆贺。除此之外，在嘉庆帝驾崩、道光帝登基时，越南也请求遣使进香谕祭以及庆贺新帝登基。另外，越南阮朝皇帝去世时，阮朝向清朝遣使告哀以及请求册封新帝，清帝也会派员谕祭、册封。清朝与阮朝通过封贡活动强化了双方之间的藩属关系，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清朝与阮朝之间的关系比以前两个王朝更为密切。[③]

其二，清朝与阮朝经济贸易往来频繁。清阮藩属关系建立后，阮朝积极向清朝遣使朝贡，这既是政治上的交往活动，也是一种官方贸易行为，双方通过朝贡贸易互通有无。越南贡使进京朝贡时，往往还带有采办货物的重任，如道光十年（1830 年），明命帝遣使如清时，便令贡使采买苍璧、黄琮、黄珪等物品。此后又特意嘱咐贡使："朕最好古诗、古画及古人奇书而未能多得，尔等宜加心购买以进。"[④] 此外，越南阮廷也常常命人前往清朝购买急缺物品。嘉庆十九年（1814 年），嘉隆帝委托清人谢明周、周泗记等到广东采买货物，而这次采办货物的费用达一万两，可见采购规模之大。当然，这种官方贸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消费的需要，在两国贸易往来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边境贸易与海洋贸易为主的民间贸易。以广西段边境贸易为例，在中法战争前就有 3 关、92 隘、52 卡，共 147 处之多。[⑤] 与边境贸易相比，清越之间的海洋贸易规模更大。据统计，1821 年前后，每年驶入越南各港口的中国商船达 116 艘，载货重量近 20000 吨。[⑥] 由此可见清越海上贸易之繁盛。这种繁盛的经贸往来的背后既是双方关系友好的表现，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藩属关系的发展。

其三，清越之间在平定边界匪患以及海匪问题中积极合作。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

① 越南阮朝国史馆编：《钦定大南会典事列》卷一百三十，法国远东学院藏本，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048 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二十，道光十九年三月庚申条，第 1019 页。

③ 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41 页。

④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六十九，第 2390 页。

⑤ 黄滨，张斌：《清代广西段的中越贸易》，《东南亚纵横》1992 年第 4 期。

⑥ 田汝康：《17—19 世纪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33－34 页。

逆匪高罗衣及其同伙在云南临安府作乱，为防止其逃窜至越南境内，嘉庆帝谕令守边督抚“豫期檄知该国，令其各守本境，一有窜入该国之贼，即行拦截缚送，交该督军营”①。嘉隆帝在接到谕旨后，便“命城臣发文盘州兵守水尾州、罗顺州兵守昭晋州、伦州兵守莱州以备之”②。道光十三年（1833 年）七月，越南北圻地区发生农文云叛乱，明命帝叩关请兵平乱，道光帝虽然婉言拒绝，但是仍“整旅境上，遥为声援”③。农文云及其部众逃进清朝境内后，被清朝陆续擒获，并交予阮廷处理。此后双方在平定边境匪患问题上继续合作，尤其在 19 世纪 60 年代后，清越边境地区发生李扬才叛乱，阮朝无力镇压，清军曾五次入越剿匪，深化了两国藩属关系，也为此后共同抗击法国入侵奠定了基础。

海匪问题曾是清朝的一大隐患，清朝也曾因西山新阮纵容海匪而与其交恶。清阮藩属关系建立后，双方在缉捕海盗上积极合作。如嘉庆十三年（1808 年）三月，在清朝的追捕下，有八十余艘齐桅匪船逃至越南安广洋外，阮福映派水军对此进行了围剿，“斩匪十余馘，俘老少六十余人”④。同年七月，有海匪逃至越南海域，嘉庆帝敕谕越南国王进行堵截。九月，越南水军将海匪擒获并送至清朝。此后，在道光时期，清朝与阮朝又多次合作缉捕海匪。虽然直至清末海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清朝与阮朝的联合缉捕下，海匪数量与规模大大缩小，海匪活动也没有西山时期那么猖獗。清朝与阮朝合作缉捕海匪的行为不仅有利于维护两国沿海地区的稳定，同时也促进了两国的交往，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其四，清越之间在海难救助中互动频繁。中越两国依海相邻，两国人民通过海上往来频繁，因此时有海难发生。在海难之中，既有阮朝船只飘入清朝境内，也有清朝船只飘入越南。对于因海难而飘入越南的船只，阮朝统治者一般都会非常重视，给予钱米救助，甚至派人代为修理船只。不过，对于海难中的官船和私船，救助办法也有差异，“凡清官船漂到，厚加资送，仍缮具公文投递该国督抚知照；若系私船，照例发给钱米，听其随便搭回，或居住营生，无有发送”⑤。如在嘉庆十五年（1810 年），清福建千总萧远侯难船停泊于平和柑榄海口月余，镇臣才听闻，随即遭到了嘉隆帝的斥责。嘉隆帝认为镇臣怠慢了萧远侯，命赐萧远侯钱三十缗、绢四匹、布五匹、米六方，随兵七人各给钱五缗、布二匹、米三方，并谕镇臣：“外国难船济给已有定例，惟萧远侯乃清公差，故别加赏给，示从优也。”⑥ 当清帝听闻阮朝救助清朝难民时，也会对其嘉赏，并允许阮朝护送难民人员就地进行免税贸易，以示天朝上国怀柔远人之意。对于因海难而飘入清朝的越南船只，清朝也会进行救助，“给予口粮，加以抚恤”，然后遣送回国。

清朝与阮朝通过多方面的互动与交流，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互动之下，两国之间也存在博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阮朝自认为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越南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在明清时期甚至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并常以“中国”“中夏”“中华”自居。⑦ 嘉隆帝曾自豪地对群臣说：“三代而下，惟汉得天下为正，后世莫及。本朝开创中兴名义甚正，亦无愧于汉矣。”⑧ 明命帝在与群臣论及祭祀典礼时，也曾指出：“衮冕之制肇自轩辕，三代而下鲜有行者……北朝自清人建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八，嘉庆二十二年三月甲子条，第 326－327 页。
②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 · 世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十七，第 984 页。
③ 《清宣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五，道光十三年十一月戊寅条，第 691 页。
④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 · 世祖高皇帝实录》卷三十五，第 762 页。
⑤ 越南阮朝国史馆编：《钦定大南会典事列》卷一百三十一，法国远东学院藏本，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062 页。
⑥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 · 世祖高皇帝实录》卷四十，第 812 页。
⑦ 陈国保：《越南使臣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评论》，《史学月刊》2013 年第 10 期。
⑧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 · 世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十四，第 950 页。

国以来亦已久废。我今举行之，倘清人易世后，典礼既失，亦将取于我大南取正。”[①] 明命帝认为明朝不亲郊祀有失事天之义，清朝祭天一年举行两次是渎祀，二者都不足以效法，只有阮朝一年一祭才是符合典礼，应当传之万世遵守。[②]

阮朝以中华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在与清朝的交往中，也格外重视“国体”。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明命帝遣吏部右参知吴位如清，吴位到谅山关后，请以公文、土物赠送给两广督抚，遭到了明命帝的强烈反对，明命帝认为“人臣无外交之义，《会典》甚明，两广纵与我厚，安可私交以丽法乎!”[③] 在明命帝看来，私赠两广督抚礼品，不符合邦交礼仪，有失国体。为防止有损国体，阮朝在挑选如清使者时，比较重视使者的学识。道光元年（1821 年）十二月，使臣陈伯坚、黄文盛自清返回越南，明命帝问其清朝事，结果二人“皆不能对”。明命帝因而下令嗣后奉使清朝，“当择才识者充选”[④]。道光二十年（1840 年），明命帝再次强调，“如清使部，须有文学言语者方可充选”，指出“若其人贪鄙还为他国所轻，如西山使部私买食物，今成笑柄”[⑤]，要求大臣要以此为鉴。在使者如清朝贡时，临行前阮朝统治者也会向其强调“慎辞令、重国体”。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于越南阮朝影响之深。

阮朝统治者有着强烈的华夷意识，并反映到了与清朝的交往上。道光元年（1821 年），阮朝候命陪臣阮文典、潘文璨上呈清朝册封使臣广西按察使潘恭辰，称清朝奉送到仪注中有“彝官”二字，而以前往复公文中从未有这种字样，所以要求清朝“请后以越南官三字代用为好”[⑥]。而在册封典礼之前，明命帝认为要礼随国俗，强烈要求用阮朝之礼进行册封。在按照阮朝礼仪完成整个典礼后，明命帝下诏布告中外，特意指出：“此次清使将命前来，凡事一从我国礼，自始至终雍容揖逊，用能早完钜典。”[⑦] 道光二十年（1840 年），适逢贡期来临，明命帝与群臣论及清廷排列贡使朝觐班次问题，认为清廷将越南排在高丽、南掌、暹罗、琉球之后，是失于排列。在明命帝看来，“高丽文献之邦固无足论，若南掌则受贡于我，暹罗、琉球并是夷狄之国，我使班在其次，尚成何国体哉!”所以明命帝要求贡使提出抗议，倘若清廷仍旧如此排列，“宁出班而受其责罚，不宁立在诸国之下”[⑧]。从朝贡礼仪的争端中，可以看出以文献之邦自居的阮朝视南掌、暹罗、琉球为夷狄之国，充分体现了文化优越感。

其二，阮朝在心理上对清朝存在蔑视。如道光十三年（1833 年）春正月，广西巡抚移文越南，称清廷未将历书送到，权将在广西历书送往越南。谅平署抚黄文权将此事呈报明命帝，明命帝批示曰：“不知彼国事若何，甚至正朔无以与人。可笑，可笑!岂有巡抚颁正朔之理?”[⑨] 命人将历书退还。明命帝连批两个“可笑”，对清朝有悖藩属礼法体制的不齿和轻视溢于言表。鸦片战争后，明命帝将鸦片战争起因归咎于林则徐虎门销烟，并指责清朝，“朕闻北朝皇子、藩王、文武大臣俱吃鸦片，城门市肆亦有公然排列，其国如此，何以律外国乎?”[⑩] 面对清朝与英国战事，明命帝以旁观者的心态，对于清朝久不能取胜进行嘲讽，“近闻清国与红毛相攻，经六七月未能取胜，夫以堂堂大国天下之瞻仰，始则失信以招兵，终则老师而长寇，成何事体?”[⑪] 并对清朝的局势进行评论，“清

①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七十一，第 2421 页。
②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七十一，第 2421－1422 页。
③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五，第 1510 页。
④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十二，第 1594 页。
⑤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一十八，第 4695 页。
⑥ ［越］黎统编纂：《邦交录》卷三，越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A691/1－2。
⑦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十二，第 1597 页。
⑧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第 4727 页。
⑨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八十八，第 2662 页。
⑩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〇八，第 4528 页。
⑪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〇九，第 4532 页。

人懦弱，我知之矣”[①]。从明命帝的言论中，看不出作为清朝属国应有的恭顺，而是充满对于清朝国势衰弱的讥讽之情。由此可见，明命帝的自大心态以及对清朝的轻视，同时也表明阮朝并非甘心臣服清朝。

其三，阮朝与清朝也存在边界纠纷。越南阮朝建立后，随着其国力的发展，其疆土意识和主权意识也更加强烈，中越边界纠纷不断。嘉庆十年（1806 年），越南兴化镇目递送传词给临安府六猛，称“各猛本彼嵩陵、莱州，沦入内地”，令其叛入越南。[②] 云南总督伯麟接据禀报后，一面“饬委镇道等将六猛掌寨妥为抚慰，严谕各边界加意巡防，并令该掌寨等自行具文先行回覆越南镇目”，一面“拟缮照会该国王文稿进呈”[③]。云南总督伯麟“将传词驳回，晓以大义，令其恪守旧规”[④]，嘉庆帝称赞伯麟所办甚是，同时也要求该处镇道等“凡与越南接壤之处，严密防范”，并严谕六猛掌寨，“毋许越南夷人偷串入境”[⑤]，表现出了强烈的主权意识，越南方面终不再争执。到了明命帝时，越南再次对六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遭到了清朝的拒绝。可见，在领土纠纷上，阮朝与越南历代王朝具有继承性，并不会因王朝的更替而放弃对于中国领土的觊觎。

阮朝虽然自认为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并对清朝存在蔑视心理，但实际上作为清朝所主导的藩属体系下的属国，在清朝的眼中其仍是“夷”。早在新旧阮之争中，嘉庆帝即将阮福映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称之为“农耐夷人”。可以说，在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下，越南“夷”的身份在清朝统治者的思想中一直存在。阮朝统治者虽然力图摆脱“夷”的身份，并以“中国”自居，但这只不过是满足越南国内统治的需求。在藩属体系下，清朝统治者所关注的不过是越南能否按时朝贡以及接受清朝的册封，只要这一大前提存在，清朝一般仍视其为恭顺之国。阮朝虽然存在自大行为，但在侍奉清朝的外交礼仪上，仍然保持着下国对上国的恭顺之情，所以清朝也秉持“厚往薄来”的原则，对阮朝施加恩惠。当然，嘉道时期，阮朝统治者在心理上对于这种外交礼仪上的不平等虽有不甘，但是又无法摆脱清朝所构建的藩属体系的影响，所以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阮朝一方面与清朝互动不断，另一面又有意摆脱清朝的影响，与清朝存有博弈，这也反映了越南统治者与清朝交往时的复杂心态。

结　语

清朝入主中原后，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统治者所构建的藩属体系，通过对周边属国施行“布恩信、怀远人”的政策，确立了“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⑥] 的“天子守在四夷”的边疆拱卫体系，共同维护中国王朝国家的安全，为清代中国边疆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嘉道时期，在藩属体系下，越南阮朝积极与清朝交好，并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海难互助上展开合作，这也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时由于越南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凸显，也与清朝进行了博弈和角逐，中越藩属关系呈现出了新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从藩属体系的运行来看，嘉道时期清朝延续了“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不治夷狄”等藩属体系的基本内涵，但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清朝在处理越南问题上更加务实和理性，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内涵更为凸显，所以面对新旧阮之争，嘉庆帝不再像乾隆帝一样“兴灭继绝”，出兵越南，而是任由越南国内事态发展，不予过问。此后越南国内发生动乱，清朝也多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即“蛮触相争，从不过问”，“倘该国有叩关吁求等事，

①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 ·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一十二，第 4589 页。
② 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一百〇七《武备志 · 边防下 · 临安》，道光十五年（1835 年）刻本，第 16 页。
③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六，嘉庆十一年正月丙辰条，第 5 页。
④ 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一百〇七《武备志 · 边防下 · 临安》，第 16 页。
⑤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六，嘉庆十一年正月丙辰条，第 5 页。
⑥ 故宫博物院编刊：《清光绪朝中法外交史料》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第 2 页。

著该抚正词拒绝”[①]，体现出了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礼法原则。

其次，从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的发展演变来看，这一时期越南阮朝并非甘心臣服于清朝所构建的藩属体系，而是试图摆脱清朝的影响，尤其是随着阮朝统治疆域的扩大，“东边一带，讫于南海，绕过西溟，凡戴发含齿，皆隶版图，海澨山陬，尽归率土”，道光十八年（1838 年），明命帝将嘉庆初年赐封的“越南”国号更定为“大南”，并认为“原称‘越南’，今称‘大南’，更明名义”[②]，这充分体现了阮朝清晰的疆域观念和主权意识。与此同时，阮朝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在心理上对清朝存在蔑视，甚至觊觎清朝边疆领土，这也挑战了清朝所构建的“天下体系”和“藩属体系”。由于清朝国力的衰弱，其治边政策不断收缩，藩属体系中“兴灭继绝”“保藩固边”等基本内涵逐渐弱化。清朝虽然通过羁縻手段维系着中越藩属关系，但主要体现在虚幻的封贡礼节上，这也表明清朝在维护藩属体制上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第三，从中越所处的区域政治格局来看，嘉道时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悄然变化，但是中越两国均未能洞悉世界大变局，仍然以保守的心态经营两国藩属关系，尤其是越南试图打破清朝所构建的藩属体系的束缚，对清朝“做朕屏藩”表现了出消极懈怠的态度。道光十年（1830 年），明命帝得知英国将侵略中国广东时，不但没有将消息上报清朝，而是冷眼旁观，“英谋侵清国，于我亦毫不相干”[③]，这表明藩属体系下清朝“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由于清朝秉持“不治夷狄”的原则，不过问越南国事，而越南也对清朝漠不关心，所以在法国侵略越南并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越法和平友好条约》时，越南未向清朝报告，而清朝也未予以重视。可见，在世界大变局下，面对外敌入侵，双方并没有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进一步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责任编辑/张瑞臣

Interaction and Game: An Analysis of the 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Vietnam in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

ZHANG Qing-tao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 China)

Abstract: The 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 maintained the basic connotations of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the policy of giving more and receiving little”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minority groups with moral values” in the previous vassal system. But the border-governance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gradually weakening, the basic implications of non-interference in the previous vassal system became more obvious, such as its non-interference attitude towards the civil strife in Vietnam. During this period, although the Nguyen dynasty of Vietnam acknowledged its position as a vassal state of China and actively cooperated with the Qing dynasty on such issues as trade exchange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bandits, it wanted to get rid of its position as a vassal state and even coveted the terri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due to its growing sense of nationhood and sovereignty. Thus, the policy of “Vietnam safeguards southwest China” in the vassal system failed in operation. Meanwhile, facing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Qing dynasty and Vietnam remained conservative, and did not jointly work out policies against the foreign enemy, which foreshadowed the French invasion into Vietnam in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later dissolution of the vassal relationship with Vietnam as a vassal state of China.

Keywords: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Vietnam; vassal relationship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五十，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戊寅条，第 333 页。

② ［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第 4230 页。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322 页。

信义治理何以可能：信托制物业的实践与阐释

吴晓燕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成都　610071］

摘　要：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构建人人尽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居民小区从物理空间共同体转向利益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需要借助互动、互利社区活动的持续参与，形成合作、互信的关系，创制利益和信任连接机制。在信托制物业服务实践中，在法律信义义务履行的基础上建构了业主、业委会和物业企业三方的信义关系结构，依凭信义义务的履行再生产出社区主体间的信义关系，这是一种面向中国基层治理情境的社区信任再造，并依凭信息公开、关系建构、协商参与、多元监督等核心要素和强弱反转的责任机制、服务优先的报酬机制、互为补充的监督机制和帕累托改进机制，型构了“信义治理”的社区治理创新路径。

关键词：信托制物业；信义义务；社区信任；信义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076－10

一、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的商品房小区，来自不同行业、地域甚至阶层的居民共同居住和生活在一个社区物理空间，如何达致通过“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①]的治理目标？如何在一些社区公共议题、公共事务上达成基本一致？如何从利益共同体转变为生活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在一些社区，借助物业管理这一具体事务，通过推行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在法律信义义务的基础上逐步再生产出社区主体间的信义关系，这是一种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中国情境的社区信任再造。由此，基于物业服务的创新逐步转换为社区治理创新，“信义治理”成为社区治理变革的一种选择。

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不断涌现，学界从这些创新实践中提炼出了参与式治理、韧性治理、智慧治理、空间治理等分析框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随着成都市社区治理实践的纵深推进，学界对成都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关注也日益增多，主要的研究涉及以下领域：一是对成都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整体解读。何艳玲长期关注成都市的治理创新，指出以社区治理带动城市治理、社会治理，以

收稿日期：2023－12－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20年后农村减贫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研究”（项目号：20AKS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晓燕，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4页。

打造和谐宜居的品质社区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由维稳型的基层管理转向人本型社区治理，成都实践是走向精而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发展治理。[①] 吴晓林等通过对成都市基层治理创新案例的考察，运用“系统条件—过程机制”的二维分析框架揭示了同样系统条件下地方基层治理持续创新的内驱机制。[②] 二是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阐释。在社区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成为必然要求，成都市的探索以组织赋能、人员赋能、居民赋能、质量赋能和发展赋能为特质的“授权赋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型构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③] 李威利等结合成都经验，指出成都市以党建赋能的路径推动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为走出我国社区治理中存在的“资源缺乏—行政依赖—自治不足—再度依赖”的循环性悖论提供了一种选择。[④] 三是对信托制物业模式的研究。成都市信托制物业的试点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吴晓林等从关注政策主张如何转化为政策执行的时序过程出发，以信托制物业为例，用“时空适配”机制对这一政策创新作出了解释。[⑤] 有研究在讨论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来源和具体类型时关注到信托制物业的实践，[⑥] 指出信托制物业作为尝试回应城市社区物管纠纷的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创制，[⑦] 重构了小区治理多元共治格局，对于未来物管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启示和借鉴，[⑧] 是一种从冲突走向善治的实践。[⑨]

已有研究表明，学界对近年来社区治理创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理论阐释，针对信托制物业的实践，也从政策执行、社区治理的多元参与等维度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启迪。但信托制物业作为一种物业服务的创新，如何能转换成社区治理的创新？信义义务的履行如何促成社区信任的生产？从物业服务信托中演化而来的社区“信义治理”，其关键环节、构成要素和运行机理是什么？信义治理的价值能否扩展，其限度何在？要回答这些问题，表明信托制物业还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空间。本研究主要以A小区为例，呈现信托制物业下社区信任再生产的过程，探求信义治理的逻辑，尝试提出社区“信义治理”的理论框架。

二、信托制物业的运行与社区信任再生产

（一）信托制物业的运行环节

信托制物业运行的基本过程是用收取的物业服务费和小区公共收益合并成立小区物业维护基金，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与物业企业签订信托合同，以信托方式将基金的管理权与使用权委托给具有专业资质的物业企业，物业企业在获得合同规定的、有尊严的报酬的前提下，在信托机制的约束下，以实现业主利益和小区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提供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

具体而言，信托制物业的运行有以下关键环节：

① 何艳玲：《人民城市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何艳玲：《成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发展治理》，《先锋》2019年第6期。

② 吴晓林，谢伊云：《政治赋能与双向激励：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驱动机制——对成都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案例考察》，《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7期。

③ 姜晓萍，田昭：《授权赋能：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④ 李威利，马梦岑：《党建赋能的城市社区发展治理：成都经验》，《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⑤ 吴晓林，谭晓琴：《以时间换空间：基层治理创新的“时空适配”机制——对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的考察》，《公共管理学报》2022年第3期。

⑥ 赵欣：《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与路径选择——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22第5期。

⑦ 孙柏瑛，胡盼：《城市社区物管“信托制”实验：行动目标与行动路线》，《学海》2022年第4期。

⑧ 陈藻：《“信托制物业”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研究——以成都市武侯区为例》，《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2期。

⑨ 舒可心：《从冲突走向善治：信托制物业服务的运行逻辑及其实践》，《住宅与房地产》2021年第10期。

第一，引入信托理念，重建三方信义关系。在实践中，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成为社区治理的老大难问题，业主与物业之间的利益纠纷成为社区治理中矛盾的集中爆发点。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二者之间地位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不信任，要扭转这种状况，第一步就需要重建彼此之间的信义关系，用制度规则、法律上的权责约束来构建新的主体关系。信托制物业就是基于这一理念，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企业签订信托合同，受托的物业企业按照合同忠诚地履行信义义务，并以此获得约定的报酬，当委托方对受托义务产生质疑时，受托方承担举证自证的义务。全体业主、业委会对受托方义务履行的情况、经费开支情况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样使得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弱强”的关系结构发生了改变。

第二，建立共有基金，重构财产权属关系。在A小区，全体业主缴纳的物业费、小区公共收益合并组成小区物业维护基金，基金所有权归全体业主，由受托的物业企业使用和经营，基金的15%（此比例在签订信托合同时协商确定，可调整）为物业企业的酬金，85%用于小区物业服务。通过明晰物业维护基金的权属关系，业主作为基金所有权人，成为小区真正的主人，物业企业获得有尊严的、稳定的物业服务收入，成为忠诚的“管家”，二者逐步形成信义关系。为确保物业维护基金的安全，与社会企业益宝合作，引入全国首个公益性信托物业公共责任险，小区作为投保人每年支出6000元保费，购买信托物业公共责任险，可获得高达几百万的保障，[①] 增强了物业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第三，搭建公开平台，充分保障业主权益。业主作为物业维护基金的所有权人，其权益如何得到保障？一是小区物业维护基金存入市级基金监管平台，设立独立账户，实行财产隔离，保证专款专用。二是为物业维护基金设立双密码账户，每一业主通过一个App程序，随时可以查看每一笔收支和所有财务凭证，大到分门别类的总账，小到保洁物资的采买，并对经费使用有质疑权。借助这个公共平台，确保了业主的财产知情权，让物业基金的支出公开透明，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物业费用支出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失信困境。三是推行开放预算，吸纳小区业主参与物业基金年度预算，物业基金年度内用于哪些项目，小区业主通过参与公开预算有自主决定权。

第四，创立监察人制度，实现多元协同共治。信托制物业创立了监察人制度，对于物业基金的使用和物业服务的质量，除了全体业主和业委会是监督人外，还引入专业的第三方监察人，由街道社区、小区党组织、律师、会计师组成第三方监察人。一方面监督物业公司，确保收支公开、财务凭证可查、按照标准开展服务，以保障业主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监督业委会规范履职，不得谋私利。由此，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小区物业共治的格局。

依凭以上四个环节，把原来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转换为基于义务履行的信托关系，一方面是基金账户的专款保管、账目开支的公开透明、预算用途的自主决定、所有权人和第三方的专业监督，进而确保了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实现了业主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是稳定且有尊严的服务报酬，物业企业由逐利行业逐渐转变为以服务取胜的社会企业。由此建构起了以下信义关系结构（见下页图1[②]），这一关系结构作为一种制度，进一步稳固了信托双方的信任关系。

（二）信托制物业实践中的社区信任再生产

信托制物业是一种回归信义、导向和谐的物业治理模式，推动业主与物业企业的关系从

① “益宝”成立于2014年11月，2015年8月独立注册转型为一家社会企业，为中国首家公益人和低保障人群的综合保障服务平台。A小区作为投保单位，每年支付保费6000元，获得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伤亡赔偿限额3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赔偿限额3万元、年度累计诉讼费2万元、年度累计赔偿限额500万元”在内的5项保障。

② 图1参照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江维2021年10月20日的讲座：《从社区营造到信义治理》。

传统的买卖关系转换为信托关系。信托关系下，“信任”是信托制物业得以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信托制物业落地运行的自然结果，以“信义为本”的社区信任再生产就发生在引入和实施信托制物业的过程中。

其一，“先营造，再引入”：居民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之间信任的达成。通过社区营造引入信托制物业是社区信任再生产的起点。2019 年 10 月，在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后文简称成都市社治委）的主导下，武侯区启动小区试点工作，决定在群众反映强烈、物业纠纷和矛盾多发、社区信任环境不佳的小区中率先引入信托制物业。经过考察，A 小区入选首批信托制物业试点小区。但面对信托理念和新的物业管理模式，大多数居民却持观望、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①] 如何让业主愿意参与这一物业管理试点，进而相信信托制物业的可行？A 小区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社区干部、骨干居民耐心细致地介绍信托制物业的运作流程、相关制度构架、相比现行包干制物业的特点和优势，在取得居民的理解、同意和支持的前提下引入信托制。从社区信任再生产的视角看，前期的宣传是一种社区氛围营造，就是通过多种形式的社区协商，在向居民推介信托制物业的过程中，重点收集居民对传统物业管理模式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将现有矛盾解决方案融入信托制物业这一新模式中。宣传推介、意见收集、以新的物业管理模式回应诉求，这一系列步骤达成了小区居民对社区党组织进而对信托制物业的初步信任。在此基础上，社区党组织主导召开小区业主大会，选举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并投票决定引入信托制物业，信托制物业由此得以在 A 小区试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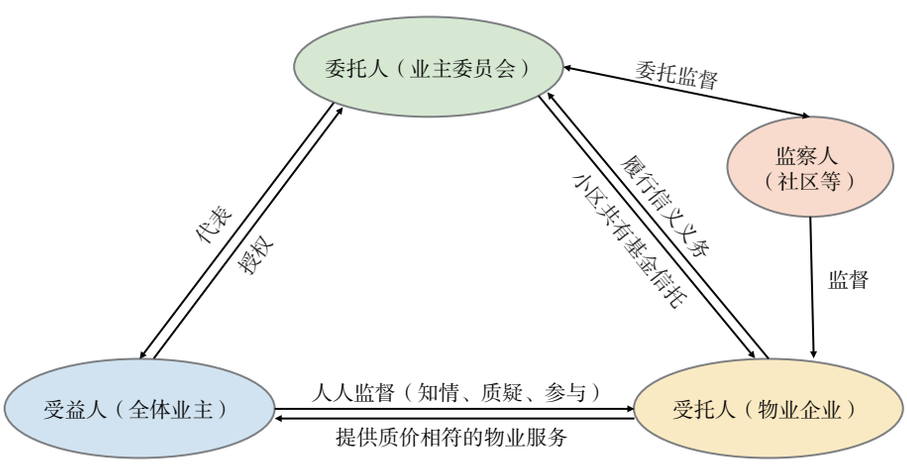


图 1　信托制物业的三方信义关系结构

其二，“以业主利益为中心，质价相符”的原则：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构建。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冲突不断的原因何在？A 小区居民的回答触及了症结——物业“质价不符”“只想涨费，不涨服务”。[②] 不管是酬金制还是包干制，传统物业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对物业费的抽成，物业费的使用不透明，业主难以监管，逐利的追求势必导致物业服务质量难以随着费用的上涨而提高。根源在于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导致居民对物业企业缺乏信任，拖欠、拒交物业费的现象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

① 观望者表示：“看看信托物业能不能把小区搞好。”怀疑者认为：“物业公司都是要赚钱的，怎么可能以业主利益为先，信托物业很难搞得好。”否定者直言：“小区物业一直都不好，现在又要搞这个，还不是做样子工程。”——来自对小区居民 A、B、C 的访谈（访谈编码：20220319A、20220319B、20220319C）。

② 来自对小区居民 D 的访谈（访谈编码：20220319D）。

盾，以致陷入“业主欠费——服务下滑”的恶性循环，成为难以化解的死结。信托制物业要求以业主利益和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旨归，物业企业受托使用和经营物业维护基金的前提是履行信义义务——提供符合一定质量标准且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并在业主参与基础上协商编制预算和服务方案，经过公示后执行。物业企业成为忠实履行受托义务的小区管家，获取忠诚担当信义责任的报酬，而不是逐利的企业。物业企业的忠实履责成为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信任达成的基础，信息公开、开放参与、多方监管成了二者信任关系构建的保障机制。业主与物业之间信任的达成让信托制物业在小区得以落地。与此同时，信托制物业管理模式的实效又强化了社区信任持续生产的动力。受访的小区物业服务人员对公司的服务质量信心满满，不再惧怕与业主的矛盾和冲突，其自信的态度与小区居民的感知基本耦合。① 由此，信托制物业的推行改善了 A 小区的信任环境，信义义务的履行构筑了小区信任基础，实现了物业服务水平、物业费收缴率、居民满意度均大幅提升和降低物业矛盾纠纷的多重治理目标，而治理目标的达成又为社区信任的再生产提供了内在动力。

其三，“第三方监察人”制度：夯实了社区信任的基础，扩展了信任生产的空间。A 小区的信托制物业为了确保物业企业履行信义义务，建立了包含个体业主、业委会和第三方监察人协同监督的体系，多方监督尤其是由街道社区组织、律师、会计师加入的第三方监督既有助于弥补业主监督专业性不足的短板，又跳脱了利益相关者的羁绊，使监督更为客观可信。在多元主体协同监督下，一方面，及时主动公开财务信息夯实了信任再生产的基础。信托制物业要求物业企业定期公布物业维护基金的收支明细，具体包括物业服务费、停车管理费、代收水电费等收费情况与物业办公费、设备维护费、物业管家服务费等支出情况；此外，公示期内物业企业还要接受业主的质询，并给予合理答复。另一方面，第三方监察人的专业监督作用扩展了社区信任再生产空间。分散的个体业主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对物业企业进行监督，这是传统物业模式下社区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信托制物业下，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其他社区组织以及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共同组成第三方监察人，接受业委会委托进行专业监督，大大提升了物业监督的效果和可信度，不但在业主与第三方监察人之间建立了信任链条，也借第三方监察人强化了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的信任链条，社区信任持续生长的内力更强，信任空间得以延展。

信义义务的履行促进了社区主体间信任关系的逐步再生长，这是一种基于中国社区治理问题场景的信任关系构建，并逐步推动买卖关系转化为信托关系，物业企业逐渐在社区居民中树立起“忠诚信义”的小区管家形象，不再以逐利为唯一目标，逐步演化为社会物业企业，朝着制度设计者变民生服务领域的企业为良心产业的方向迈进。

三、信义治理：信托制物业实践的理论阐释

近年来，学界关于社区治理创新提炼出了诸如“多元主体参与式治理”“韧性治理”“微治理“智慧治理”等模式，可无论何种治理创新，小区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的关系都是社区治理绕不开的内容，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中，如果业主与物业之间建立了稳定、可持续的信任关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将会事半功倍。成都市在一些小区试点的信托制物业模式，可以解读为一种信义治理的社区治理创新。“信义治理”成为当下一些社

① “只要我们的服务搞好了，就不怕矛盾纠纷。”——来自对物业企业员工 A 的访谈（访谈编码：20220320A）。“物业服务搞好了，矛盾确实变少了。”“只要服务搞得好，我们还是相信物业的。”——来自对小区居民 A、C 的访谈（访谈编码：20220319A、20220319C）。

区治理中化解业主与物业纠纷的一种可行模式，那么，是哪些结构要素和机制保障了其运行？

（一）信义治理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信义治理”一词首先来自成都市的社区治理推动者，自2019年第一批小区试点以来，信托制物业的试点逐步扩展，成都市社治委总结试点经验，提出了“信义治理”的概念，并将其内涵表述为“信义治理是基于信托法理，在住宅小区治理体系中，党建引领利益相关各方（物业企业、业委会、业主）建立信义关系、秉持信义精神、遵守信义义务的互动合作过程，其核心是信托制物业管理服务机制。”① 这一界定表明信义治理缘起于小区物业服务机制的创新，物业服务的良性运转依赖于信义关系的构建，这是一个多方主体合作互动的过程，由此形成基于信义的社区治理框架，其本质是社区信任的生长和再生长。

根据信托制物业的运行过程可以看出，信义治理具有以下核心要素：

其一，信息公开。传统物业模式下业主与物业的矛盾源于彼此缺乏信任，但信任阙如根本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对称。收取的物业费、小区的公共收益等究竟有多少、每年支出多少、物业服务成本占比多少、物业企业的利润多少，这些信息业主都不得而知，尽管物业企业要定期公布收支情况，但个体业主因为难以监管，对物业公示的财务收支状况并不完全相信。信托制物业实现了三个公开透明：一是物业服务的内容和标准公开透明，即物业企业的义务公开透明；二是物业企业的收支公开透明，且每个业主可以查询质疑；三是物业企业的服务报酬公开且固定。信息的公开削弱了信息不对称壁垒，为信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二，（信义）关系建构。信托制物业中信托合同的签订形成了法律上的信义关系，一方面是物业企业必须忠实履行合同义务，依托公开平台实现财务透明和接受监督；另一方面业主也要信守按期缴纳物业费的义务。基于双方信义义务的履行，信义精神逐渐得到践行，在不断互动中构建起信义关系，也就是业主与物业之间的信任关系逐步建立，进而社区信任得以培育，这是信托制物业模式能够持续的原动力。

其三，协商参与。在信托制物业的实践中，信义关系的构建以致社区信任的培育是一个互动合作的过程，其中多元主体的协商参与是重要的推力。引入信托制物业，缘起于业主们的共同协商和集体表决；物业企业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报酬都是业主、业委会、物业企业在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下多次、多方协商的产物；物业维护基金的年度预算离不开社区的开放式参与。正是依托广泛的参与，把参与中协商而成的内容转化为双方或多方法律上的信义责任，从而确保了信义义务的履行。

其四，多元监督。这也是信托制物业的核心要素，物业企业服务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业主随时可以查询、质疑，物业企业承担回复和举证责任，随时而在的监督增强了业主对物业的信任；不仅如此，由于人数众多的业主难以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可能导致监督不力或流于形式，信托制物业创立的第三方监察人制度以专业、中立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业主监督的困局，进而敦促了信义义务的履行和信任关系的形成。

（二）信义治理的运行机制

信义治理缘起于社区物业服务的实践创新，基于法理上信义义务的履行，逐渐走向三方信义关系的构建和社区信任的生产，其落地过程有赖于以下机制：

第一，强弱反转的责任机制。小区物业企业与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强—弱”合作的典型代表，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强者有自由裁量权，弱者形成对强者的依赖，因物业服务引发的小区矛盾根源于这一关系逻辑。为此，信托制物业构建了强弱反转的责任机制，信托合同的签

① 此观点参照成都市社治委副主任江维于2022年3月19日的线上讲座《党建引领住宅小区信义治理的成都探索》。

订中明确规定了物业企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物业企业必须忠实履行以获取规定的报酬，每一业主随时可以通过双密码账户查询物业费用收支明细，面对质疑物业企业也要举证自证，第三方监察人受托对物业服务进行专业监督，物业维护基金账户独立、专款专用并实行财产隔离。可以看出，信托制物业更多强调了物业企业的信义义务，其目的就是要矫正之前的“强—弱”关系逻辑，要求强者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尽心提供服务来获得弱者的信任，为二者信义关系的构建提供基础。

第二，服务为先的报酬机制。如前所述，信托制物业特别强调物业企业的信义责任，物业服务内容、标准、年度预算业主均有参与协商的权利，只有先忠实履行义务才能获得商定的报酬，以业主利益为中心、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是信托的价值基础。其目的就是使物业企业变逐利为服务，推动民生领域的企业成为良心企业，促进民生产业发展成为良心产业。

第三，互为补充的监督机制。利益关联者（业主）的监督与第三方监察人的专业监督互为补充，业主的监督广泛而无时不在，但也可能因为人数众多使监督变得碎片和零星，甚至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引入第三方监察人使监督更为中立、科学和可信，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信义义务的履行，也能弥合利益双方的分歧，扩展协商和信任的空间。

第四，多方共赢的帕累托改进机制。信托制物业的推行，从根本上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帕累托改进。传统模式下的物业企业可能盈利率更高，但涨费难、收费难，且因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分歧不得不耗费时间和精力去应对随时爆发的物业冲突；业主对服务心生不满，物业纠纷使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业委会也深陷其中。信托制物业的实践无一方利益受损，业主获得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物业企业依凭信义服务获得合理报酬，并能凭借忠实履责在小区长期经营，成为存续经营的社会企业，甚至能把服务扩展到其他小区；业委会不再为物业纠纷“背锅”；物业纠纷的消减让矛盾在社区得以化解，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诉源治理，社区资本愈益丰厚，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由此，信托制物业源于化解社区治理实践中因物业纠纷引发的社区矛盾，其实践中创新的制度设计、形成的可操作要素和运行机制不仅直面长期困扰社区的物业服务难题，还因其导向的社区信任生产型构了一种信义治理模式，成为一种社区治理创新的解释框架（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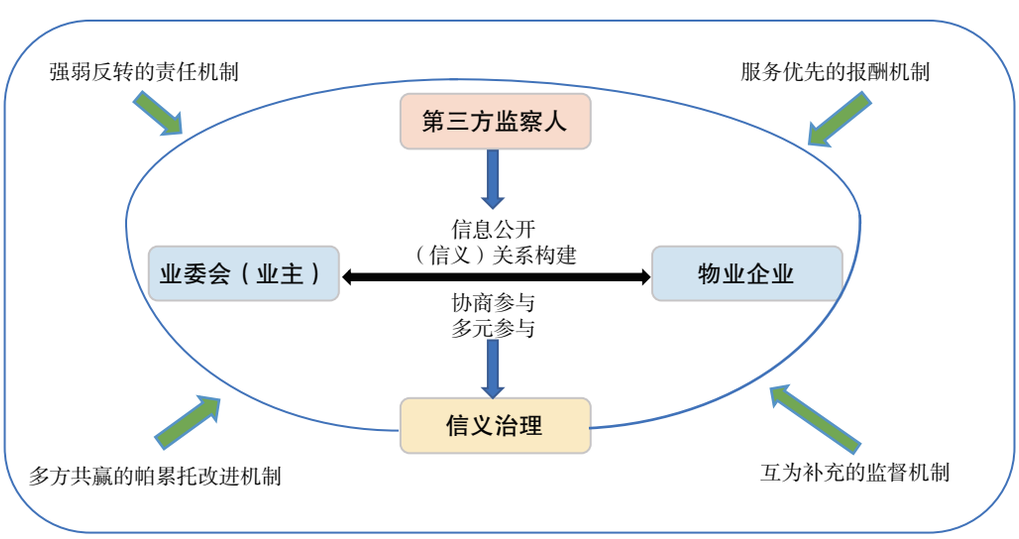


图 2　“信义治理”的分析框架

四、信义治理的检验、价值与限度

（一）信义治理的现实检验

始于物业管理模式创新的信义治理实践中成效如何？能成为社区善治的改进方向吗？需要结合推行信托制物业实践小区的实效来观察和检验。

首先，试点小区物业服务引致的治理成效明显。以A小区为例，信托制物业落地一年后，小区的物业纠纷由之前的20起降为0起，物业费收缴率由试点前的60%提升到99%。调研中社区干部也介绍说“各类矛盾纠纷减少98%，信访数量减少95%，物业缴费率达到99%，居民满意度高达95%。”① 因为享受了优质的物业服务，A小区居民2020年12月还通过业主大会表决主动上调了物业费。为A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企业2020年获得成都市社会企业官方认证，截至2021年10月已新承接了14个信托物业项目。

其次，信托制物业管理模式得到认同和推广。在首批7个小区试点成功后，2021年2月发布的《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提出要“推广‘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公开透明、开放参与、信义为本的物业管理协调机制。”② 截至2021年底，成都市共有200多个小区正推行信托制物业，52个小区完成信托制物业导入。③ 2023年6月，成都市全面部署小区治理攻坚三年行动，提出全面实施“信托制物业提质扩面行动”。到2025年，全市信托制物业服务小区力争达到1000个。④ 这一模式在其他小区推行是其运行有效的充分证明。2021年12月，成都市还召开了首届信义治理研讨会并成立信义治理学院，成为信义治理理论研究、实践指导和人才培育的平台；2022年8月，成都市武侯区社区信义治理标准化试点成功入选国家级社会治理（基层治理）项目，成为全国首个社区信义治理标准化试点项目。⑤ 这些都表明信义治理正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选择和趋向。

（二）信义治理的价值

信义治理不单是破解了物业难题，与之相伴随的体制建设彰显了丰富的价值。

第一，信义治理以制度供给方式重构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治理体系的关键是主体间关系的建构，党组织、居民、服务企业、社会组织在社区生态系统中如何定位、如何合作，进而建立起真正的协同共治体系？信托制物业的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产生了四重效应：一是还权，社区的治理主体和权益主体是居民，信托制物业把小区（物业维护基金）的财产权、物业费收支的知情权、质疑权、监督权和物业经费预算的参与权还给了业主，业主作为小区主人的地位得以落实；二是赋能，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如何实现？信托制物业通过开放预算、建立App查询平台为居民参与创设了渠道，降低了门槛，有助于激发小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内在动力；三是归位，物业企业以服务而非逐利为本，以服务获取稳定且有尊严的报酬是民生企业本质的回归，社会组织以监察人身份提供服务，亦是社会组织的价值回归；四是固核，信托制物业是在社区党组织的主导下植入的，是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组织对信托物业的落地进行方向把关、过程推动、促进机制构建和实施监督职能，成为社区治理的领导

① 数据来自与A社区干部的访谈（访谈编码：20220322A）。

② 《中共成都市委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成都日报》2021年2月8日第4版。

③ 《成都社区信义治理学院成立　今年200余个小区推行信托制物业服务》，http://cdswszw.gov.cn/tzgg/Detail.aspx?id=26621，访问时间：2023年10月30日。

④ 《“信托制物业”实践五年，如何破解老旧小区治理“最后100米”难题？》，https://roll.sohu.com/a/686035727_121123755，访问时间：2023年6月20日。

⑤ 《武侯区社区信义治理标准化试点入选国家级社会治理（基层治理）项目》，四川物业管理网，http://www.scwygl.com/News_Show.php?theld=7338，访问时间：2023年1月30日。

核心。由此，社区治理的主体各归其位，各尽其职，各享其益，携手迈向协同共治之途。

第二，信义治理有助于实现诉源治理和韧性治理。现实生活中的社区治理难在业主与物业之间利益矛盾的化解，难在业主之间的集体行动。信托制物业就是迎难而上，从行动倡导到制度安排，以法理信义义务的履行为本，通过还权于居民，推行参与式预算，利用技术平台为业主监督赋能，让居民通过关心物业费的使用逐渐走向参与公共生活、培育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和公共精神，进而承担公共责任，改进自己的生活环境。当社区居民逐步从关注个人权益到关心公共利益，意识到参与公共事务才能建构社区公共生活，为社区创造最大福利，社区的活力得以激发，这样的社区就会生成自愈力，成长为良性发展的韧性社区。这既是从源头上破解社区矛盾，也实现了法治、自治、智治和德治的融合。

第三，信义治理因社区信任的再生产加速了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共同体何以构建？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一个生活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居民需要物业服务，物业企业需要获取报酬并存续经营，二者本来存在共生的利益关联，关键是需要创造共生的价值基础和机制。信托制物业以信义义务为本，变单次博弈或强弱博弈为互动合作共赢关系，促进了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核心信任关系的构建，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双方首先成了利益共同体，共生利益——信任关系再向业主之间、业主与业委会之间扩展。随着信义意识、信义理念、信义精神的培育，信任成为社区最重要的资本，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共同体方可构建。

第四，信义治理的拓展应用场景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生活中“强—弱”逻辑关系的场景很多，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领域，比如医生与患者、教师与学生、律师与案主、高管与股东等，强者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二者地位和关系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社会和谐与稳定。信托制物业构建的强弱反转责任机制强调强势方为弱势方提供服务时必须遵守信义义务，从理论上讲，这一机制让信义治理可以推及预存款消费、房屋中介、社区公共空间运营管理等多个场景，直至拓展到政府、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为众人提供服务的领域。当社会的强势群体信守承诺，服务为本，信义成为民生行业的共同良知，进而成为社会良知和民众的生活习惯，互惠、互利、合作、利他的良善价值得以培育和延展，具有共同社会良知的现代人得以成长，社会治理自然走向现代化，因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归根结底是现代人的生长。

（三）信义治理的限度

作为从社区物业管理模式革新中提炼出来的信义治理，在逐步彰显其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当下的限度，以推动这一治理实践的完善和理论的建构。

其一，信义治理的可持续问题。信托制物业的实践得益于成都市社治委的强力推动，也得益于社区党组织的主导，是由外向内引入的物业管理模式。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确实给社区居民提供了新的选项，也构建了法理上的三方信义关系以让其落地，但其眼下还不是社区居民内在的自我创造，基于信义义务生产的社区信任还有待于在持续互动中厚植和巩固。同时因业主人数众多、阶层复杂和诉求纷杂，信托物业会不会把原来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还有待于观察，且信托制物业还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支撑。所以，只有社区居民基于公共议题的参与能力、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转化为持续的公共行动，试点创制成为稳定的制度，信义治理方能自然移植并行稳致远。

其二，信义治理中监督机制的内化问题。信托制物业中为确保物业企业信义义务的履行建立了业主与第三方监察人相互补充的监督机制，这种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外在监督。业主的监督虽借助智慧平台可以随时实施，但毕竟还是依赖业主的个体行为而非有效的集体行动；第三方监察人实施可持续且有效监督的动力机

制还有待完善。为此，作为利益共生主体的业主如何让监督成为自觉和自主的内生行为选择、第三方监察人的监督从一种“存在性威慑”转型为信义责任、物业企业从永续经营的角度建立自我监督机制，转向监督“自觉”，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和完善。

其三，信义治理的拓展运用场景还有待实践验证。信义治理的描述和阐释主要基于信托制物业服务的运用场景，其他场景的信义治理还是一种待扩展的领域和方向。在后续实践中，信义治理能否在其他场景（如社区公共空间与公共资源的运营管理、社区保障资金的管理等）良性运转，良心企业能否演化为良心行业，还有待于相关法律和机制的健全。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① 为夯实社区治理这一基础性工程，近年来各地都有很多探索。其中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引入，旨在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以化解物业纠纷为导向，依凭利益连接达致社会联结，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以信义互动关系的建构推动社区信任的生产和累积，直至实现培育具有共同良知的现代人、建设美好社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终极目标。这一创新实践成效初见，还需要不断通过制度配套、过程监管、社会力生长和文化涵育来推动其健康持续地运行。

■责任编辑/宋雨桃

How Is Fiduciary Governance Possible?: Practi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ust Property Management

WU Xiao-yan

(Party School of Sichuan Province of CPC, Chengdu 610071, China)

Abstract: The goal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s to build a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hat everyone has responsibilities, everyone participates and everyone shares. The residential community has shifted from a community of physical space to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a community of governance. It needs to rely on the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y in interactiv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activities to form a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 and mutual trust, and create a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interests and trust. In the practice of trust property services, the fiduciary relationship of the owner, the property committee and the property enterpris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fiduciary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ommunity subjects is reproduced on the basis of the fulfillment of the legal fiduciary duty. This is a kind of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trust for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China, which constructs the innovative approach for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fiduciar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ore elements such a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 participation in negotiation, multiple supervision, as well as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of strong and weak reversal, the reward mechanism of service priority, the complementary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Pareto improvement mechanism.

Keywords: trust property; fiduciary duty; community trust; fiduciary governance

①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在吉林长春市宽城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考察调研时的讲话。

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建构与实证研究

吴　波，周学馨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摘　要：老龄社会治理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方面，构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对推进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老龄社会治理内涵，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治理、老龄社会应对举措以及学术界相关研究，从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个维度逐层分解形成了包含15个要素层和65个指标层的指标体系。本文采用AHP－熵值法计算指标体系权重并对全国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间和区域内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耦合协调性分析发现，我国老龄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普遍偏低，治理主体发展滞后是制约老龄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为此，要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提高老龄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词：老龄社会；社会治理；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086－12

按照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7%～14%为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14%～21%为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超过21%则为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8.7%；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达13.5%。《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4.2%，老龄社会新形态格局已经形成且无法逆转。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都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时间上基本同步，并伴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过程。[①]为此，推进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成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议题。

2020年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从整体性和系统性角度对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进行研究，为研究老龄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并对老龄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治理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定性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随着老龄社会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我国对人口老龄

收稿日期：2023－11－3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制度框架研究”（项目号：22VRC1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波，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周学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负责人。

感谢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王雪琴同学的数据整理、处理工作。

① 周学馨：《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老龄社会治理》，《探索》2021第2期。

化能力的评估日益重视，尤其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2019）提出“选择有特点和代表性的区域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综合创新试点”、《“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2021）提出要“健全数据支撑”“建设公众需求牵引、政府监督管理、社会力量参与的全国养老数据资源体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2022）提出“综合运用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评价结果，做好老龄工作综合评估”。为此，老龄社会治理水平的定量研究逐渐成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关注的热点。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在结合已有研究基础上，厘清老龄社会治理的关键治理环节，尝试构建老龄社会治理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我国省级层面上进行了实证应用，以期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研究提供新的定量研究视角，也为老龄社会治理实践评估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文献综述

（一）社会治理评估相关文献

社会治理评估早期是以国家治理水平为研究对象的，如世界银行1996年发布世界治理指数（WGI）以两年一次的频率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表达权和问责（VA）、政治稳定和暴力/恐怖主义缺失（PV）、政府效能（GE）、监管质量（RQ）、法治（RL）、腐败控制（CC）等六个维度进行评分。据统计关于国家治理的指标体系有290个，其中综合性的指标有贝塔斯曼基金会和慕尼黑大学2003年发布的贝塔斯曼指数（BTI）、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PIA）、海外发展研究所1996年发布的世界治理评估指标（WGA）等。[①] 我国学者俞可平团队于2012年发布了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从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等6个角度对国家社会治理水平进行评估。[②] 国家层次的研究中视野更为宏观，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评估指标多以治理绩效为主要内容。

地方层次的社会治理评价研究视角相对微观，包括省域尺度、[③④⑤] 市域尺度、[⑥⑦⑧⑨] 县域尺度和农村尺度。[⑩⑪] 从研究视角看，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从政府职能出发，认为社会治理评价要根据评价价值取向定位的要求，综合反应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的绩效，并根据政府职责分解出经济调节、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等职能，构建指标体系；二是认为治理的核心是多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在指标体系中强调公众参与、多元主体的作用，将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居民自治作为指标体系中的构成要素；三是认为社会治理应该包含治理过程，因此将治理过程纳入评价体系中，分解出治理过程、过程善治指标、过程性评估等维度。

（二）老龄社会治理内涵相关文献

1982年联合国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老龄化”的概念开始进入政府和学界视野，并不断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有消极的一面，但更需要积

① 敬乂嘉，周霓羽，闻静：《对国外治理评估指标的比较分析》，《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21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课题组，俞可平：《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2期。

③ 施雪华，方盛举：《中国省级政府公共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政治学研究》2010第2期。

④ 南锐：《精细化视角下省域社会治理绩效的组合评价——基于29个省域的实证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⑤ 田发，周琛影：《社会治理水平：指数测算、收敛性及影响因素》，《财政研究》2016第8期。

⑥ 过勇，程文浩：《城市治理水平评价：基于五个城市的实证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0第12期。

⑦ 张锋，罗翔：《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评估体系构建研究——以上海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8年第9期。

⑧ 彭莹莹：《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应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第2期。

⑨ 李友根：《中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评估与发展——基于变异系数法的聚类分析》，《重庆社会科学》2020第9期。

⑩ 樊红敏，张玉娇：《县域社会治理评价体系：建构理路与评估框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第1期。

⑪ 吴新叶：《农村社会治理的绩效评估与精细化治理路径——对华东三省市农村的调查与反思》，《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第4期。

极应对。[①] 我国学者围绕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与发展趋势、[②③④⑤] 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⑥⑦⑧⑨]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老龄化尚未形成基础治理理论。从既有研究看，代表性的观点有三：一是老龄社会治理是一种领域特殊、常态化、长期性的社会治理，内嵌于普遍意义的社会治理之中。[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老龄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宏观理论框架。二是老龄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⑪] 包括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家庭及老年人等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主体是对传统的计划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等传统二分法思维的扬弃，它意味着治理主体的组成是由政府、社会、家庭、个人等多方主体构成，各方主体都要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参与到老龄化相关的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三是老龄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是构建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⑫] 要将“中国特征”向“中国优势”转变，依靠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打破养老服务的部门界限和条块分割现状，整合政府资源、市场资源、闲置资源和人才资源，形成系统化的资源整合能力。为此，中国老龄社会治理是特殊领域的社会治理，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体制的表述，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同样对老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三）养老服务评估相关文献

国内对于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评价体系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也较为分散。一是围绕世界卫生组织（WHO）围绕老龄化问题提出的“健康老龄化”，从老年人自身健康、老年人家庭与物质生活、老年人所在社区、老龄化社会指标等维度，[⑬] 或以“积极老龄化”理念指引，从健康、参与、保障等维度[⑭]建立的指标体系。二是关于养老服务水平的评价，一方面是整体养老服务水平的评估，根据养老服务的提供方式分别对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水平进行评估；[⑮] 另一方面是基于可达性指标对养老服务空间分布的公平性的评估。[⑯⑰] 三是从老龄化事业的角度建立评价体系，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HDI）为理论依据提出指标选取及指数构造的研究思路，从健康、生活质量、参与、保障四个方面构建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⑱]

（四）文献评述

回顾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和老龄社会治理相关研究，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在社会治理领域已有较丰富的探索成果，尤其是对政府、社会和个人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职责、关系的厘清，为社会治理理论及评价指标体系的“中国化”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并形成了“国

① 邬沧萍：《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1 第 6 期。
② 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人口研究》2005 第 6 期。
③ 翟振武，陈佳鞠，李龙：《2015～2100 年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人口研究》2017 第 4 期。
④ 王广州，王军：《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经济社会影响及公共政策应对》，*China Economist* 2021 第 1 期。
⑤ 陈卫：《中国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预测》，《社会科学辑刊》2022 第 5 期。
⑥ 党俊武：《如何理解老龄社会及其特点》，《人口研究》2005 年第 6 期。
⑦ 杜鹏，王永梅：《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老龄化的社会治理——成就、问题与现代化路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 第 6 期。
⑧ 陆杰华，刘芹：《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特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七普”数据的解读》，《人口与经济》2021 第 5 期。
⑨ 王进文：《主体性取向的乡村老龄社会治理：实践逻辑与路径建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8 期。
⑩ 胡湛，彭希哲：《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8 第 12 期。
⑪ 赵伟：《构建老龄化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体系》，《人民论坛》2020 第 Z1 期。
⑫ 敬乂嘉：《老龄社会的复合治理体系对 1982—2015 年老龄政策变迁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20 第 5 期。
⑬ 陈小月：《“健康老龄化”社会评价指标的探索》，《中国人口科学》1998 第 3 期。
⑭ 曾通刚，赵媛：《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化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匹配》，《地理研究》2019 第 6 期。
⑮ 童峰，刘金华：《浅谈养老服务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学术论坛》2015 第 12 期。
⑯ 韩非，罗仁朝：《基于可达性测度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匹配研究——以南京为例》，《经济地理》2020 第 9 期。
⑰ 殷为华，刘爽：《上海市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可达性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21 第 6 期。
⑱ 任兰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年。

家—省—地级市—县市—农村”五级评价体系，为本文构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指标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包括重视多元主体的作用、关注治理过程性指标和结果性指标、强调治理能力的建设等。特别是，养老服务评估相关文献，围绕“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人类发展指数”等理念，已经构建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为本文分析中国老年社会治理的关键领域提供了基础，包括养老方式、老年人健康、社会参与等。

但是，无论是社会治理的指标体系或是养老服务相关的评价指标，都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评价。一是老龄社会治理与当前的社会治理的主客体关系不同。尽管我国学界已经形成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党委、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识，但在主客体关系上仍然沿袭政府为主体，社会为客体的研究思路。[①] 我国居家养老是主要养老方式，家庭尤其是老年人自身是治理主体重要的要素，政府—社会的二元关系在老龄社会治理中不再成立，老年人作为治理对象同时是治理主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老龄社会治理与养老服务的视野不同。尽管同样是老龄化相关议题的评估研究，老龄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资源调动的整合化和治理目标的综合性，决定了其在内涵和外延上比养老服务更为丰富。有鉴于此，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提出从社会治理的视角考察老龄化问题，从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个方面构建起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并在融合多源数据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结合熵值法确定了各级指标权重，实证分析了我国老龄化治理的水平，并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出治理主体的建设是实现我国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二、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构建

（一）评价指标选取

中国老龄社会治理是特殊领域的社会治理，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体制的表述，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同样对老龄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基于老龄社会治理内涵，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治理、老龄化社会应对举措以及学术界相关研究，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个方面构建由准则层 4 个一级指标、要素层 15 个二级指标和指标层 65 个三级指标所构成的“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价体系”，准则层包括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其中，治理主体（包括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老年人自治）反映的是多元治理主体对老龄社会治理的管理，衡量我国社会治理体制适老化的成效；治理能力（包括法治建设、经济保障和适老环境）体现的是老龄社会治理的凭借，是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协调和组织各类资源用于老年人群体的衡量指标；治理过程（包括权益保障、决策参与和执行协作）是老年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更强调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框架；治理绩效（包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学和老有所安）的直接体现是老年人群体的生活品质改善及治理成效。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等。所搜集数据有绝对值和相对值指标两类，其中绝对值指标是指可以直接横向比较的指标，其与人口规模关系不大，如指标层“社区党组织覆盖率”反映出了治理主体中党建引领情况，可以在省（直辖市）间、城市间、县域间等进行直接比较；相对值指标是指由于人口规模影响较大、必须计算人均数值后才能横向比较的指标，如指标层“万人老年人学校数”反映的是老年人通过老年人学校实现自治的绩效，其与人口规模是反比例关系，必须折算后进行横向比较。同时，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数据无法获取，因此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① 左晓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评价研究》，《社会科学》2016 第 4 期。

（三）指标体系权重

1. 熵权法

熵权法根据各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指标的变异度越大，信息熵越小，有效价值越大，相应权重也越大，反之则相反。熵权法权重依赖于真实数据，其计算过程如下：

1）构造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A=\begin{bmatrix} X_{11} & X_{12} & \cdots & X_{1n} \\ X_{21} & X_{22} & \cdots & X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X_{m1} & X_{m2} & \cdots & X_{mn} \end{bmatrix} \tag{1}$$

其中，X_{ij}为第 i 个样本的第 j 项数值，$1\leqslant i\leqslant m$，$1\leqslant j\leqslant n$。

2）由于评价体系各个指标量纲不一致，需要对指标做标准化处理，完成指标同质化转换。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处理方法如下。

正向指标：

$$X'_{ij}=\frac{X_{ij}-X_{\min}}{X_{\max}-X_{\min}} \tag{2}$$

负向指标：

$$X'_{ij}=\frac{X_{\max}-X_{ij}}{X_{\max}-X_{\min}} \tag{3}$$

其中，X'_{ij}是第 i 个样本的第 j 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X_{\max}$是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X_{\min}$是最小值。

3）计算第 i 个省第 j 项指标比重：

$$Y_{ij}=\frac{X'_{ij}}{\sum_{i=1}^{m}X'_{ij}} \tag{4}$$

4）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_j=-\frac{1}{\ln(m)}\sum_{i=1}^{m}Y_{ij}\times\ln Y_{ij} \tag{5}$$

5）计算指标差异系数：

$$d_j=1-e_j \tag{6}$$

6）计算指标权重值：

$$w_j=\frac{d_j}{\sum_{i=1}^{n}d_i} \tag{7}$$

2. 层次分析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根据指标体系设计专家咨询问卷，邀请相关专家填写问卷后形成判断矩阵。判断矩阵中，从 1（相同重要）到 9（前一指标相比后一指标极为重要）标出同一层次的指标两两后的相对重要性。在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后，采用根法计算可得到各层级指标相对权重。

1）建立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A=\begin{bmatrix} a_{11} & a_{12} & \cdots & a_{1n} \\ a_{21} & a_{22} & \cdots & a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a_{m1} & a_{m2} & \cdots & a_{mn} \end{bmatrix} \tag{8}$$

其中 a_{ij}表示第 i 项元素相对第 j 项元素的重要程度。

2）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元素权重，本研究采用根权重法：

$$w_i=\frac{\sqrt[n]{P_i}}{\sum_{i=1}^{n}P_i} \tag{9}$$

其中：$P_i=\prod_{i=1}^{n}a_{ij}$。

3）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

$$CR=CI/RI \tag{10}$$

$$CI=\frac{\lambda_{\max}-n}{n-1} \tag{11}$$

$$\lambda_{\max}=\frac{1}{n}\frac{(Aq)_i}{q_i} \tag{12}$$

其中，CR 为随机一致性比率，仅当 $CR\leqslant 0.1$ 时可以认为判断矩阵具有较为一致性；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lambda_{\max}$是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q=(q_1,q_2,\cdots,q_n)^T$ 是指标组成的列向量，$(Aq)_i$ 是矢量 Aq 的第 i 个元素。

3. 组合评价

本文采用组合评价法将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有机融合，其步骤如下。

1）设 m 个上层准则，n 个子准则，层次分析法求得的上层准则权重为 $B=\{\beta_1,\beta_2,\cdots,\beta_m\}$，各子准则权重为 $\Phi=\{\varphi_1,\varphi_2,\cdots,\varphi_n\}$，熵权法求得各子指标层权重为 $A=\{\alpha_1,\alpha_2,\cdots,\alpha_n\}$。

2）利用组合评价法计算子准则的组合权重 $E=\{\tau_1,\tau_2,\cdots,\tau_n\}$，其中

$$\tau_i=\frac{\varphi_i\alpha_i}{\sum_{i=1}^{n}\varphi_i\alpha_i} \tag{13}$$

3）按照子准则与准则对应关系，记子准则组合权重为 $E=\{\tau_{ij}\}=\{\tau_{11},\tau_{12},\cdots\tau_{1n_1},\tau_{21},\tau_{22},\cdots,\tau_{2n_2},\cdots,\tau_{m1},\tau_{m2},\cdots,\tau_{mn_m}\}$，其中 n_1，n_2，…，n_m 是各上层准则包含子准则数量。

4）对 E 做归一化，即

$$\omega_{ij}=\frac{\tau_{ij}}{\sum_{j=1}^{k}\tau_{ij}} \tag{14}$$

其中 $k=n_1,n_2,\cdots,n_m$，得到 $\Omega=\{\omega_{11},\omega_{12},\cdots,\omega_{1n_1},\cdots\}$。

5）重新记子准则的熵权重为 $A=\{\alpha_{11},\alpha_{12},\cdots,\alpha_{1n_1},\alpha_{21},\alpha_{22},\cdots,\alpha_{2n_2},\cdots,\alpha_{m1},\alpha_{m2},\cdots,\alpha_{mn_m}\}$。

6）按照子准则与上层准则对应关系，计算 $A'=\{\alpha'_1,\alpha'_2,\cdots,\alpha'_m\}$，其中

$$\alpha'_i=\sum_{j=1}^{n_i}\alpha_j \tag{15}$$

其中 n_i 是第 i 个上层准则包含的子准则数量。

7）利用组合法计算上层准则组合权重 $\Omega=\{\omega_1,\omega_2,\cdots,\omega_m\}$，其中

$$\omega_i=\frac{\alpha'_i\beta_i}{\sum_{j=1}^{n_i}\alpha'_j\beta_j} \tag{16}$$

表 1　老龄化治理水平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权　重			属性
				AHP 权重	熵值	组合权重	
老龄化治理水平	治理主体（0.364）	党委领导（0.086）	社区党组织覆盖率	0.528	0.003	0.007	+
			社会组织中党员占比	0.333	0.010	0.014	+
			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已建率	0.140	0.017	0.010	+
		政府负责（0.283）	大型养老机构占比（300 张床位以上）	0.288	0.019	0.024	+
			养老机构年末职工人数	0.133	0.018	0.011	+
			万人养老专业技术人员	0.257	0.015	0.017	+
			大学以上学历养老从业人员占比	0.133	0.010	0.006	+
			万人养老机构床位数	0.190	0.012	0.010	+
		社会参与（0.132）	养老机构志愿者服务时间	0.143	0.047	0.029	+
			社会养老机构占比	0.429	0.005	0.010	+
			养老机构志愿者服务人次数	0.429	0.049	0.091	+
		老年人自治（0.499）	万人老年活动站/中心/室数	0.296	0.011	0.014	+
			万人参与老年活动站/中心/室人数	0.163	0.012	0.009	+
			万人老年人协会数	0.244	0.100	0.107	+
			万人参与老年人协会人数	0.108	0.019	0.009	+
			万人老年人社团数	0.136	0.034	0.020	+
			万人老年人社团参加人数	0.054	0.030	0.007	+
	治理能力（0.242）	法治建设（0.215）	万人老龄系统接待来信来访次数	0.146	0.030	0.019	+
			老年法律援助中心数	0.439	0.017	0.033	+
			涉老案件数	0.311	0.024	0.033	+
			维权协调组织数	0.104	0.016	0.007	+
		经济保障（0.622）	每月平均养老金收入	0.274	0.015	0.017	+
			每月平均商业养老保险收入	0.186	0.012	0.009	+
			每月高龄津贴	0.083	0.019	0.007	+
			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比例（%）	0.105	0.010	0.005	+
			享受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比例（%）	0.153	0.006	0.004	+
			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比例（%）	0.121	0.026	0.014	+
			仍然从事有收入工作比例（%）	0.078	0.009	0.003	+
		适老环境（0.163）	房屋光线昏暗（%）	0.415	0.006	0.011	−
			住房有扶手比例（%）	0.244	0.002	0.002	+
			住房地面不滑比例（%）	0.154	0.005	0.003	+
			住房有电梯比例（%）	0.116	0.013	0.007	+
			住房有呼叫/报警设施比例（%）	0.071	0.003	0.001	+

表 1（续）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权　重			属性
				AHP 权重	熵值	组合权重	
老龄化治理水平	治理过程（0.212）	权益保障（0.691）	知晓《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比例（%）	0.140	0.008	0.005	+
			享受公共交通票价减免比例（%）	0.280	0.014	0.017	+
			享受普通门诊挂号费减免比例（%）	0.174	0.017	0.013	+
			享受公园门票减免比例（%）	0.103	0.015	0.007	+
			享受免费体检比例（%）	0.303	0.010	0.013	+
		决策参与（0.174）	参与社区选举比例（%）	0.255	0.005	0.005	+
			向社区提出建议比例（%）	0.112	0.007	0.003	+
			社区征询意见比例（%）	0.360	0.010	0.016	+
			家庭重大支出做主比例	0.274	0.006	0.008	+
		执行协作（0.135）	参与维护社区治安比例	0.189	0.010	0.009	+
			参与调解邻里纠纷比例	0.387	0.010	0.018	+
			参与维护社区卫生环境比例	0.135	0.009	0.005	+
			参加关心下一代教育比例	0.194	0.015	0.012	+
			参加文化科技推广活动比例	0.095	0.013	0.005	+
	治理绩效（0.182）	老有所养（0.456）	老年人收入	0.281	0.017	0.020	+
			老年人平均储蓄额	0.199	0.017	0.015	+
			人均养老金结余	0.370	0.014	0.023	+
			年金账户数占在职职工比例（%）	0.151	0.024	0.016	+
		老有所依（0.174）	看得清楚者比例（一般及以上）	0.234	0.008	0.008	+
			听得清楚者比例	0.211	0.004	0.004	+
			无慢性病者比例	0.149	0.007	0.004	+
			身体健康自评（一般及以上）	0.405	0.002	0.004	+
		老有所乐（0.084）	读书/看报者比例	0.400	0.008	0.014	+
			影院看电影/戏剧院听戏者比例	0.200	0.018	0.016	+
			跳舞（广场舞/扭秧歌）者比例	0.400	0.010	0.017	+
		老有所学（0.207）	经常上网者比例	0.157	0.020	0.014	+
			万人老年人学校数	0.594	0.032	0.083	+
			万人老年人在校人数	0.249	0.029	0.031	+
		老有所安（0.079）	觉得啃老的比例	0.249	0.006	0.006	−
			有人照顾比例	0.157	0.008	0.006	+
			自评比较幸福者比例（一般及以上）	0.594	0.005	0.013	+

注：表格中准则层和要素层括号中为组合权重。

（四）指标体系计算方法

老龄化治理指数是在指标层无量纲处理基础上进行逐层综合加总计算，得到每个评估样本的要素层、准则层和最终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Q_j^i = \sum_{k=1}^{n} w_{ik} \times Z_j^k \qquad (17)$$

其中，w_{ik}是指标 i 的第 k 个子指标，Z_j^k 是指标 i 的子指标无量纲化的指标值，n 为指标 i 下子指标的个数。例如对于样本 j 的要素层“党委领导”，其子指标为社区党组织覆盖率、社会组织中党员占比、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已建率等 3 个子指标，n 为 3，相应的有 Z_j^1、w_{i1}、Z_j^2、w_{i2}、Z_j^3、w_{i3}。Q_j^i 是样本 j 在指标 i 的综合值。

三、老龄化治理水平评估结果分析

（一）老龄化治理水平总体分析

根据老龄化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依据 AHP－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组合权重得到全国各省市老龄化治理水平指数（表 2）。一是，东部平均治理水平较高。东部社会治理水平平均值为 0.35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74，治理水

平排名前5的省市全部在东部，分别是北京市（0.548），上海市（0.488），浙江省（0.418），江苏省（0.409）和天津市（0.406）。二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治理水平差异接近，中部地区平均值为0.196，西部地区0.156，东北地区为0.133。三是，区域内部治理水平不均衡。东部地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峰分布”特征，变异系数为36%，区域内治理水平指数最低的是海南省（0.161），与北京市（0.548）差距大。

表2　老龄化社会治理评估结果

		社会治理水平	治理主体	治理能力	治理过程	治理绩效
东部地区	均值	0.353	0.251	0.361	0.439	0.444
	变异系数	35.90%	40.20%	36.66%	42.87%	39.53%
北京		0.548	0.421	0.565	0.670	0.641
天津		0.406	0.258	0.376	0.619	0.513
河北		0.198	0.174	0.206	0.196	0.235
上海		0.488	0.306	0.546	0.595	0.643
江苏		0.409	0.334	0.380	0.425	0.559
浙江		0.418	0.264	0.465	0.504	0.553
福建		0.313	0.139	0.350	0.598	0.327
山东		0.357	0.342	0.266	0.309	0.529
广东		0.229	0.137	0.245	0.334	0.278
海南		0.161	0.138	0.208	0.137	0.166
中部地区	均值	0.196	0.230	0.230	0.312	0.312
	变异系数	56.86%	9.32%	9.32%	13.01%	13.01%
山西		0.219	0.171	0.238	0.238	0.272
安徽		0.204	0.129	0.221	0.221	0.316
江西		0.331	0.420	0.236	0.236	0.329
河南		0.179	0.131	0.191	0.191	0.257
湖北		0.249	0.171	0.247	0.247	0.367
湖南		0.226	0.152	0.249	0.249	0.329
西部地区	均值	0.156	0.281	0.248	0.342	0.342
	变异系数	50.30%	23.99%	20.68%	36.44%	36.44%
内蒙古		0.208	0.160	0.258	0.209	0.230
广西		0.200	0.104	0.224	0.306	0.246
重庆		0.288	0.164	0.347	0.292	0.428
四川		0.287	0.167	0.351	0.253	0.449
贵州		0.172	0.100	0.223	0.213	0.205
云南		0.204	0.118	0.222	0.215	0.319
西藏		0.302	0.395	0.199	0.237	0.314
陕西		0.268	0.132	0.362	0.282	0.381
甘肃		0.143	0.117	0.223	0.130	0.110
青海		0.272	0.128	0.256	0.293	0.518
宁夏		0.285	0.140	0.384	0.252	0.451
新疆		0.284	0.149	0.328	0.298	0.452
东北地区	均值	0.133	0.326	0.252	0.225	0.225
	变异系数	21.81%	12.49%	15.40%	40.73%	40.73%
辽宁		0.264	0.166	0.363	0.288	0.299
吉林		0.173	0.111	0.282	0.211	0.122
黑龙江		0.225	0.121	0.331	0.257	0.254

（二）老龄化治理水平维度分析

治理主体指数反映的是多元治理主体对老龄社会治理的管理，衡量我国社会治理体制适老化的成效，是体现多元共治理念的维度。治理主体准则层评估结果表明，北京市的治理主体发展水平最高（0.421），其次是江西省（0.420）、西藏自治区（0.395）、山东省（0.342）。治理主体的要素层指标中，权重最大的分别是政府负责（0.283）和老年人自治（0.499），其中老年人自治各省市得分普遍较低，因此老年人治理水平较高的省市，如江西省（老年人自治评分 0.687）、西藏自治区（老年人自治评分 0.647），单项排序在第一和第二位，在政府负责、社会参与两项得分较低，治理水平总体评价得到较大提升。

治理能力体现的是老龄社会治理的凭借，是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协调和组织各类资源用于老年人群体的衡量指标。治理能力准则层评估结果表明，北京市的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最高（0.565），其次是上海市（0.546）、浙江省（0.465）和宁夏回族自治区（0.384）。经济保障是影响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其权重达 0.622，因此治理能力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东部省市、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治理能力指数得分较高。从原始数据看，指标层权重最高的是每月平均养老金收入（0.294），其中北京市为 3405.8 元，上海市为 3030.33 元，宁夏回族自治区为 1980.07 元，浙江省为 1450.08 元。

治理过程是老年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老龄社会治理的治理过程更强调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框架，包括参与老年群体自身的公共事务的渠道和参与更广泛社会事务治理的渠道。[①] 治理过程准则层评估结果表明，北京市治理过程发展水平最高（0.670），其次是天津市（0.619），福建省（0.598）和上海市（0.595）。权益保障是影响治理过程指数的关键因素，东部省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老年人的权益保障较为完善，总体治理过程水平较高。西部部分省市，如青海省（0.51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0.451）、四川省（0.449）和重庆市（0.428）等，则在执行协作方面发展较好。

治理绩效是老龄社会治理的结果评价指标，根据老龄社会治理的定义，绩效的直接体现是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全面提高。治理绩效准则层评估结果表明，上海市的治理绩效水平最高（0.643），其次是北京市（0.641）、江苏省（0.559）和浙江省（0.553）。从原始数据看，老有所养是治理绩效中权重最高的指标（0.456），指标层主要是养老金收入、平均储蓄额、人均养老金结余等指标，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东部地区、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治理绩效至少得分较高。

（三）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协调度分析

协调度是系统中各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所达到的一致性水平，对于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而言，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构成了 4 个子系统，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要求子系统间在发展上相辅相成、协调统一。本文进一步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老龄社会治理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计算老龄社会治理系统内部四个维度的耦合度：

$$C = \sqrt[4]{\frac{M_1 \times M_2 \times M_3 \times M_4}{(\frac{M_1 + M_2 + M_3 + M_4}{4})^4}} \quad (18)$$

其中 M_1，M_2，M_3，M_4 分别代表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采用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评价中得到的准则层指标值测度。C 为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四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度，该值越大，说明老龄社会治理内部四个维度间相互作用程度越强，反之相互作用程度越弱。在耦合度 C 的基础上计算四个维度间的耦合协调度 D：

$$D = \sqrt{C \times T} \quad (19)$$

其中：

$$T = \alpha M_1 + \beta M_2 + \gamma M_3 + \theta M_4 \quad (20)$$

α，β，γ，θ 分别是 M_1，M_2，M_3，M_4 四个维度的重要程度，采用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评价

① 丁志宏，夏咏荷，张莉：《我国老年人制度化政治参与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兰州学刊》2019 年第 5 期。

中熵值法得到的准则层指标权重作为 α，β，γ，θ 的值，满足 $\alpha+\beta+\gamma+\theta=1$。耦合协调度是耦合相互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测度，其值越大，说明四个维度之间协调性越好，反之越差。本文借鉴相关研究，并根据本文研究特点，将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为六种类型（表 3）。

表 3　老龄社会治理协调等级划分

耦合度（C）		耦合协调度（D）	
指标值	对应类型	指标值	对应类型
［0，0.1］	极低水平耦合	［0，0.1］	严重失调
（0.1，0.3］	低水平耦合	（0.1，0.3］	中度失调
（0.3，0.5］	拮抗	（0.3，0.4］	濒临失调
（0.5，0.6］	磨合	（0.3，0.5］	初级协调
（0.6，0.8］	高水平耦合	（0.5，0.7］	中度协调
（0.8，1］	良性耦合	（0.8，1）	高度协调

2. 耦合协调度结构及分析

计算结果显示（表 4），全国各省市老龄社会治理四个维度的耦合度均大于 0.8，处于良性耦合阶段，说明我国各省市老龄社会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个维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表现出相互依赖的良性耦合关系。其中，青海省和福建省耦合度相对较低，分别为 0.889、0.883，均对应良性耦合状态。其余省市耦合度均在 0.9 以上，说明各省市老龄治理水平四个维度间存在较强相互作用。相对耦合度而言，全国老龄社会治理四个维度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在 0.4 至 0.8 之间，分值最高为北京市（0.734），最低为甘肃省（0.371）。这说明尽管我国各省市老龄社会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个维度之间已经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但相互间协调性仍有提升空间，进而提高全国老龄社会治理水平。从分布看，我国仅北京市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处于高度协调阶段，13 个省市处于中度协调阶段，15 个省市处于初级协调阶段，2 个省市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和天津市耦合协调度均在 0.6 以上，较为接近高度协调阶段。海南省和甘肃省得分较低，均低于 0.4，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表 4　老龄社会治理耦合度

	耦合度指数 C	耦合类型	协调耦合度指数 D	协调类型	滞后类型
东部地区					
北京市	0.984	良性耦合	0.734	高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天津市	0.949	良性耦合	0.621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河北省	0.994	良性耦合	0.444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上海市	0.962	良性耦合	0.685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江苏省	0.982	良性耦合	0.634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浙江省	0.963	良性耦合	0.634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福建省	0.883	良性耦合	0.526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山东省	0.966	良性耦合	0.587	中度协调	治理能力滞后型
广东省	0.951	良性耦合	0.466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海南省	0.985	良性耦合	0.398	濒临失调	治理绩效滞后型
山西省	0.986	良性耦合	0.465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安徽省	0.952	良性耦合	0.441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江西省	0.977	良性耦合	0.568	中度协调	治理能力滞后型
河南省	0.971	良性耦合	0.417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湖北省	0.964	良性耦合	0.490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湖南省	0.964	良性耦合	0.467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表 4（续）

	耦合度指数 C	耦合类型	协调耦合度指数 D	协调类型	滞后类型
西部地区					
内蒙古	0. 985	良性耦合	0. 452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广西	0. 930	良性耦合	0. 431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重庆市	0. 944	良性耦合	0. 521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四川省	0. 937	良性耦合	0. 519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贵州省	0. 954	良性耦合	0. 406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云南省	0. 943	良性耦合	0. 438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西藏	0. 966	良性耦合	0. 540	中度协调	治理能力滞后型
陕西省	0. 926	良性耦合	0. 498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甘肃省	0. 958	良性耦合	0. 371	濒临失调	治理过程滞后型
青海省	0. 889	良性耦合	0. 491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宁夏	0. 911	良性耦合	0. 510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新疆	0. 929	良性耦合	0. 513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东北地区					
辽宁省	0. 962	良性耦合	0. 504	中度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吉林省	0. 929	良性耦合	0. 401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黑龙江省	0. 939	良性耦合	0. 459	初级协调	主体建设滞后型

3. 内部失调类型分析

我国老龄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普遍偏低，因此本文进一步依据老龄社会治理四个维度发展情况将内部失调类型划分为主体建设滞后型、治理能力滞后型、治理过程滞后型和治理绩效滞后型，以此分析我国老龄社会治理的失调情况。从结果看，主体建设滞后型的省市达 26 个，治理能力滞后型的省市有 3 个，治理绩效滞后型和治理过程滞后型的省市分别 1 个。这表明，治理主体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老龄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

结　语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实施老龄社会治理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数模型，对于落实积极老龄化理念，不断完善我国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老龄社会治理具有治理客体的特殊性和治理向度的互动性，与一般意义的社会治理在治理机理、治理领域上有所差别，体现为：一是老龄社会治理更为强调与老年人群体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关系，二是一般意义社会治理的政府—社会的二元关系在老龄社会治理中不再成立，我国居家养老是主要的养老形式，其特征决定了老龄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家庭和老年人自身的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其运作机理要在更为微观的视角下予以考察。本文以老龄社会治理内涵为逻辑起点，在综合国内外社会治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老龄社会治理评估的四个维度：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从治理生命周期的角度形成了逻辑完备互斥的四个准则层。在四个维度下分别设计要素层和指标层，将过程指标与结果指标结合，形成了能够体现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领域特殊性的评估指标体系，有助于研究者把握老龄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的长期、动态关系，为治理主体不断补齐短板、提升治理绩效提供支撑。

运用 AHP－熵权法计算指标体系权重，并以我国各省市为研究单元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老龄化治理水平在东部与中西部省市间、东中西部省市内部均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分维度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差异的基础性要素。经济发达的省市有较充足的财力、物力投入到老龄社会治理中，因此在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上均有

更高水平。耦合协调度分析表明，我国各省市间老龄社会治理的四个维度相互作用较强，但协调程度普遍偏低，其中治理主体已经成为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水平的短板。

针对我国老龄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各省市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为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奠定物质基础。二是加强党建引领，鼓励多方参与老龄社会治理。强化各级党委在老龄社会治理中的统揽作用。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老龄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强化基层力量配备，积极发挥城乡基层党组织在老龄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发动基层党员干部、社区、志愿者和老年人群体的力量，尤其重视老年人自治水平提升。三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进一步优化老龄社会协同共治机制，着重解决多元治理主体在涉及老人养老、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方面面临的资源投入不均衡、协同共治难的问题，从而有效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效能。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治理和积极应对老龄化的理论为指引，从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大维度构建了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四大维度之间的相互匹配关系，初步探索了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评估的研究领域。但研究中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尽管我国老龄社会新形态格局已经形成且无法逆转，但学术界关于老龄社会治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老龄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仍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不断丰富。二是受数据的可获得性约束，诸如养老绩效维度下“老有所为”等指标并未予以考量，同时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研究尺度局限于省域，仅在宏观上分析了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现状。指标体系的完善，尤其是融合更多市域尺度指标，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作进一步讨论。

■责任编辑/宋雨桃

Construc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n Aged Society and its Case Analysis

WU Bo & ZHOU Xue-xin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of CPC,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an aged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our national strategy in active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n aged socie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for an aged society.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governance of an aged society and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including the coping measures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finding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paper gives an incisive analysi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governance subject, the governance ability, the governance process and th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including 15 element levels and 65 indicator levels. The paper uses the AHP entropy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weight of the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e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China's aged socie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s for governing the aged society in China vary from place to plac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for governing the aged society in China is generally low, and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ance subjects is the key cause that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ance.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Party building as the guidance, and improve the co-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for an aged society.

Keywords: aged society; social governance; index system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实践及逻辑

沈　澈，党秀云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服务与质量并重是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不断健全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模式，在民族地区先后实行了临时性、组织化、社会化、标准化及数字化经办服务模式。民族地区通过自身能力建设与国家专项支持，在服务主体上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形成叠加合力，服务对象上倡导公民资格与制度标准，服务目标上夯实各民族福利共同体，实现了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从无到有、从有到均、从均到优，建立了一体共享的服务格局。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地区应坚持并优化整体性经办路径，通过外部的人才、技术支持提升自身经办能力，逐步消弭服务边界以促进人才及劳动力合理流动，促进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惠及边疆地区，通过公共服务共同体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整体性；共享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098－09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要“完善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①]社会保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早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发布《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保障列为基本公共服务，要求逐步提升社会保障服务的能力和标准。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服务保障与经济保障并重逐渐成为社会保障的新理念和成功经验。[②]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涵盖资格申报、业务办理、待遇获取等环节，直接与参保人产生行为互动，事关人民群众能否获得更便捷、更有尊严的经济支持和公共服务。

收稿日期：2023－01－30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传承互助精神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项目号：21LLSMB0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沈澈，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党秀云（通讯作者），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② 白维军，童星：《论我国社会保障服务的理念更新与体系构建》，《中州学刊》2014年第5期。

我国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经历了初步探索、框架构建、快速发展、日趋完善四个阶段。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提高社会保障经办的信息化服务水平，[①] 通过制度化建设实现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精准化，激发个人的参与意识与主体意识，是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保障服务满意度、公平感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采用制度统一、专项扶持的路径建立健全了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了各族群众的风险抵御能力。同时，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服务理念从传统到现代，项目从单一到多元，在服务标准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充分考量了特定的地区变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政府需延续并优化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管理的成功经验，完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落实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提升民生福祉、消弭地区差异，这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在梳理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发展史的基础上，尝试回答如下问题：第一，在历史变迁中，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如何顺应时代特征并兼顾地区特色，在遵循“常量”的基础上产生了哪些“增量”？如何实现“常量”与“增量”间的辩证统一？第二，在现实条件下，如何结合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而发展“常量”并优化“增量”，让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助力民族地区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认同感，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实践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促进民族地区的民生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一方面，民族地区以标准化、一体化为导向，提升自身的内生动力，探索普适性服务原则，提升社会保障服务效率；另一方面，国家兼顾地区间的发展程度、文化习俗差异，探索适合地区的服务方式，取得最优的社会保障经办效果。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服务在“地区的合理增量”与“统一的标准常量”之间寻求均衡，最终目标是促进地区间均衡稳定发展，增强各族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国家认同感。

（一）临时性—应急导向服务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明确了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民族地区的民生保障工作比其他地区更复杂，部分民族处于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国家百废待兴，暂时无法提供普遍化的社会保障服务，主要通过临时性、灵活性、过渡性、实物式的社会救济服务，帮助民族地区群众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极度贫困。例如，1951 年，贵州镇远专区遭遇重大旱灾，当地政府为灾民发放救济粮、农业贷款，向灾民预购农产品，干部甚至从自己口粮中结余出一部分支援受灾群众。[②] 云南怒江地区的碧江、福贡、贡山和泸水边疆四县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后，于 1951—1953 年间政府直接为群众无偿发放铁质农具、救济款和寒衣，[③] 帮助群众救急解困，以新的生产技术提高生活质量。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没有形成独立的经办服务，但在尊重民族间生产水平、生活方式差异的基础上，满足各族群众的现实保障需求，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各民族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二）组织化—微观单元服务阶段

民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惠及人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 1953 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城镇企业职工按照民族平等原则参加本企业的福利保障，由工会负责资金管理，企业

① 边恕，李东阳：《加快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体系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 第 5 期。
② 李飞龙：《建国初期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初探》，《兰台世界》2014 年第 22 期。
③ 江也川：《伟大的跨越：云南怒江流域民主改革的经验与启示》，《学术探索》2020 年第 5 期。

所属医疗机构或特约医院提供医事服务，企业负责退职业务经办及待遇发放。

民族农村地区及农牧区以生产合作社为单位提供集体化的社会保障服务，群众筹资创办公益性养老院、保健站和医疗站，[①] 直接提供免费医疗，对无家庭依靠的“五保”老人实行集中供养，对其他无劳动能力老人给予实物保障。例如，内蒙古牧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养老保障转为集体模式。无劳动能力的老人由村集体按照人均标准发放粮食、衣物等基本生活用品，有劳动能力者参加集体轻体力劳动换取工分粮。敬老院中的五保户老人可从事轻劳动。同时，中央对民族地区发展给予专项支持，1963年起，国务院适当增加民族自治地方的机动财力补助费和预备费，即“三项照顾”政策，并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继续保留。1977年，国家设置“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②] 上述专项政策对民族地区的民生服务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组织化服务阶段，民族地区没有成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而是以城镇企业或农村集体为微观单元，直接提供经办及保障服务。组织化的社会保障服务模式注重微观单元内的公平分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但城镇企业和农村集体需专项费用维持社会保障业务运转，间接增加了生产成本，给城乡经济单元带来额外负担。如何让社会保障成为社会服务，减轻城镇企业及农村集体的负担，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难点。

（三）社会化—区域性服务阶段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2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降低城镇企业和农村集体的非生产性负担，增强市场竞争力，中国开始探索社会化的公共事务服务模式。1986年4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提出“改革社会保障管理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③] 同时提出“民族地区逐步进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突破了个体化、经验化、分散化的传统方式，按照实际情况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化、规范化、专业化服务模式。

20世纪90年代，民族地区先后成立专门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及管理机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从无到有，实现了社会化管理，成为公共服务项目。例如，宁夏于1990年1月将退休费用统筹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更名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西藏在2000年3月机构改革中专设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自治区医疗保险管理中心）。2005年后，广西的城镇低保人员通过社区协助评议实现了动态化管理服务。[④] 在农村，民族地区于1992年开始实行农牧区“老农保”，21世纪初探索“新农保”，设置了三级经办服务体制，即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专职具体经办，村设兼职协办人员。

社会保障服务从单元化过渡到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转型成本，而民族地区的成本高于其他地区。第一，宣传普及成本高。部分较偏远民族地区的群众习惯于传统的、朴素的族系内熟人社会互助，或集体组织直接提供保障服务，而对于相对复杂的社会保险缴费及待遇计发、社会救助资格审核等服务环节的理解不足，认可度不高。[⑤] 第二，空间距离成本高。部分民族地区因地广人稀、崇山峻岭产生地理阻隔，各族群众居住分散。在社会保障服务过程中，经办机构及参保群众都需要付出较大的交

① 于长永，刘康，何剑：《改革前后三十年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变迁》，《西北人口》2011年第4期。

② 崔登峰，朱金鹤：《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

③ 孟颖颖：《中国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及改革方向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④ 齐宝和，董文良：《中国民族年鉴》，北京：中国民族年鉴社，2007年。

⑤ 陈业强，陈浩：《小凉山彝族民间社会支持体系与国家社保制度互动研究——人类学视野下的福利体系多元主义》，《学术探索》2015年第9期。

通成本，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参保群众可能放弃权益。[①] 第三，信息沟通成本高。部分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管理能力有限，大多依靠宣传板张贴信息、纸质档案管理等传统方式。民族地区存在语言差异，社会保障经办的业务术语翻译成民族语言难度大，群众获取信息不充分。第四，民族地区面临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费不足、人员编制少等现实困境。例如，截至2009年底，西藏社会保障经办人员与受益人数的比例为1∶7000，2012年达到1∶13000，远未达到国内1∶5000的基准比例。[②] 综上，进一步升级服务技术水平、统一服务标准、提升服务效率成为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深化改革的内在动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专项支持的方式继续助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启动“金保工程”，利用信息技术建立集中管理的数据中心，形成部、省、市三级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网络，建立规范化的12333电话服务系统和基层信息服务平台。[③] 中央专项支持提升了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发展速度，增强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

（四）标准化—均等化阶段

2010年10月，国家颁布《社会保险法》，对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的机构设立、财政保障、信息公开、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出法制化规定。2011年国家标准委员会发布《社会保险服务总则》（编号GBT27768—2011），细化了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标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标准，促进各地社会保障服务一体化，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优化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民族地区按照国家统一标准，积极促进社会保险服务标准化。例如，2011年9月，宁夏发放首批3.4万张社会保障卡。[④]

在社会保障服务标准化的进程中，国家为民族地区提供专项支持，实现硬件设施、服务窗口规范化。2014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达新疆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322亿元，专项用于建设地（州）、县（市）、乡镇（街道）三级人力资源市场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站）建设以及设备购置。[⑤] 在国家专项支持的推动下，民族地区自身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社会保险服务标准化、数据化建设同步于全国水平，宁夏、内蒙古等地区在全国较早实现社会保险数据省级集中。在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重点从“遵从差异”过渡到“消除差距”，在业务申请、资格审核、待遇领取、权益转移、监督管理方面遵循统一规范及标准，促进了地区间公共服务的整体性发展。

（五）数字化——一体化阶段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随着公共服务领域“互联网+”战略和“放管服”改革深化，数字化、智能化、远程化成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新趋势，全国各地先后建立居民社会保障电子信息档案，开发社会保险经办App，推动网上业务经办，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民族地区积极探索数字化经办模式，先后开通12333公共服务网和12333手机App服务，实行远程查

① 白维军，刘银喜：《流动型社会保障服务：内涵界定、要素分析与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9期。

② 王誉霖：《边疆地区社会保险管理模式探索性研究——以西藏地区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金保工程一期建设项目通过验收》，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huanti/jinbaogongcheng/jbgcgongzuodongtai/201206/t20120608_47452.html，访问时间：2022年6月5日。

④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宁夏社会保险事业发展概况》，http://www.nx.si.gov.cn/dwgk/shbxsyfzgk/，访问时间：2022年4月8日。

⑤ 央广网：《自治区发改委：国家拨付1.322亿元专项资金且新疆就业》，http://xj.cnr.cn/2014xjfw/2014xjfwtj/201406/t20140624_515721256.shtml，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0日。

询与经办、人脸识别、审核认证，并签发电子社会保障卡，将实体社会保障卡的功能从单一医疗服务扩展到待遇领取、就业服务、惠民补贴及服务等。同时，民族地区通过“互联网 +”增强了信息整合能力，促进了不同保险、不同平台、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间的信息共享。例如，广西南宁将失业保险资格审核环节到用人单位办理人员增减环节，数据比对自动确认领取资格并智能计算待遇标准，同步进行失业登记。宁夏整合市县数据资源，实现数据信息大整合的省级集中目标，推行线上全区通办。①

“互联网 +”提升了社会保障经办的信息处理效率，促进了经办能力向基层组织传递，助力公共服务“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民族地区在省（自治区）、市（州、盟）、县（自治县、旗）三级经办服务的基础上，将居民参保登记、缴费申报、领取待遇资格申报及核定等服务事项下沉至乡镇、街道的服务中心，在人口集中地区配备村级社会保障协理员，在社区设立社会保障业务办理窗口，建立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和五级经办服务网络，构建了线上网络平台与线下实体平台相结合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体系。

三、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逻辑阐释

经过数十年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逐渐同步于国家总体进程，部分服务项目甚至领先于其他地区，这受益于地区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支持双重叠加的合力。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实践充分阐释了谁来服务（服务主体）、服务谁（服务对象）、为什么服务（服务目标）、如何服务（服务路径及服务工具）的逻辑线，体现了共治、共享、共识的公共服务目标。

（一）服务主体：从政府主场到治理下沉与多主体入场

首先，政府是中国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各级政府的治理合力是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不断优化的推动力。为促进公共服务发展，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及国家认同感，中央政府通过政策支持、财政转移支付、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等项目支持民族地区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其他地方政府将公共服务作为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重要内容。在外部支持下，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持续优化社会保障经办流程和服务内容，提升自身内生动力。央地政府间的纵向支持、其他政府间的横向支援形成了综合助推力，共同构成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供给主体。

其次，民族地区自身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能力持续夯实，服务主体逐步下沉。在国家支持和数字化助力下，民族地区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向上，乡镇、街道逐渐建立起社会保障服务站，经办服务下沉至基层组织并融入各族群众的生活圈，人口聚集及条件成熟地区由村、社区的服务网点就近提供经办服务，沿边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水平持续改善。横向上，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社会保障经办一体化进程，在提升属地化经办水平的同时积极推行医疗保险异地即时结算等全国联网服务项目，实现区域联动与资源整合。

再次，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从政府主场发展到多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公众成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微主体。公共服务数字化提升了服务方与需求方的信息对称性，增强了个人的信息获取和自我经办能力。个人直接参与社会保障事务管理及意见表达的路径更畅通，自主性增强。民族地区建成以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社会组织及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公众自主服务的多主体综合治理体系，实现了从政府主场到多主体入场、基层多点分布的服务网络。

（二）服务对象：从单元化服务到规范性普惠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坚持“以人民

① 中国社会保障编辑部：《2019 年度社保之最——社保经办管理服务地方创新报告》，《中国社会保障》2020 年第 2 期。

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服务对象是各族群众。在不同时期，经办服务充分结合社会发展目标及社会保障的现实特征，设定具体的服务范围及服务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以“补差”原则确定社会保障服务对象。为了让部分民族或支系尽快摆脱困境，社会保障服务以民族整体为对象，以帮助困难群众提升生产能力，脱离贫困状态。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对象体现了劳动者优先原则。中国依托企业、村集体等城乡生产单元提供保障服务，主要服务对象为工人、农民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保障步入社会化、标准化轨道，经办服务遵循对象法定原则，如社会保险依缴费义务履行情况确定受益资格、社会救助以经济收入及家庭状况确定服务对象等。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保障以普惠共享为价值导向，正逐步建立惠及全体人民的经办服务体系。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兼顾“补差”和“普惠”，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上关注边疆地区和较晚脱贫地区，促进地区间、民族间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对象体现了从情感化到规范化、从群体性到公共性的变迁，体现了全民普遍受益、兼顾地区现状的公共服务理念。

（三）服务目标：从弥补差距到均等共享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总体目标是改善民生并维护各族群众利益，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中华民族认同感。围绕总体目标，民族地区适时调整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阶段性目标，确保各族群众平等地共享社会保障服务。在价值性目标上，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从促进民族平等、维护社会和谐发展为实现各民族公共事务共治共享；在时效性目标上，从解决“急难险重”的突发性民生问题发展到常态化公共服务；在惠及性目标上，从保障重点群体、夯实劳动者福利发展为普遍、均等地惠及各族群众，提升散居地区、边疆地区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在包容性目标上，从依托各民族传统保障方式、缩小保障水平差距发展到建立内聚性、制度化、理性化的经办服务体系，兼顾各族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在整体性目标上，从分地区、分行业的单元化服务发展到建立一体化、跨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民族间交流、共治及共享，增强了福利获得感和国家认同感。

（四）服务路径：从外部推力到内外部合力叠加

根据公共服务的受益对象与供给者范围相一致的原则，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社会组织是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内生动力。国家、上级政府、其他地区的政府及社会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助力民族地区提升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质量，增进边疆稳定，夯实中华民族认同感，形成了民族地区经办服务发展的外部推力。因此，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呈现外部推力与内生动力综合发力的“叠加双路径”模式。

首先，在“叠加双路径”模式下，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更加理性化。社会保障服务从熟人社会互惠发展到企业及村集体的半熟人社会互助，[①] 建立了陌生人社会标准化、统一化经办模式，融入了数字化的技术理性，实现了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现代化治理。其次，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内生动力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更夯实、社会组织参与更普遍、公众自我经办路径更多元。再次，外部推力不断优化。国家及其他地区通过专项支持、对口支援等方式助推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从“补财力”发展到“补人力”，从建设基础设施、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到全方位夯实治理能力，将外部推力转化为民族地区经办服务水平自我提升的内生动力。

（五）服务技术：从工具化辅助到数字化重塑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技术经历了传

① 沈澈：《从熟人社会到现代治理：民族地区互助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及目标走向》，《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统手工化、微机电算化、网络信息化、智能数字化阶段，经办服务技术升级对民族地区更具现实意义。首先，微机电算化提升了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在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宣传普及阶段，微机电算化提升了服务效率及便捷度，促进各族群众突破传统的熟人群体间互助惯习，接受新兴的社会保障项目。其次，网络信息化加速了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一体化。在国家专项支持下，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同步建设金保工程、社会保险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以统一的经办服务标准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民族地区积极融入国家的公共服务整体化进程。再次，智能数字化夯实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内生动力。数字化重塑了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方式，各族群众通过客户端广泛参与业务经办，远程多渠道完成缴费、信息核对、权益获取等各项服务，实现自我经办和充分意见表达。智能化实现了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医疗网点、金融服务网点、税务机构一体化整合，各族群众可在统一的数据平台中实现服务共享共融。

四、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新变量及改革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起始于分散化、个案化、临时性的互助济困，发展于标准化、规范化、统一化的社会性经办服务，成熟于数字化、多元化与自主化的智能服务。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融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融入社会保障的一般性规律、融入政府的社会服务责任，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间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需提升各族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进而夯实国家认同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新目标下优化原有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逻辑，并探索新的实践轨迹。

（一）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实现“纵向到底”并“横向到边”

在共治共享的发展目标下，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社区、市场、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在场并协同发力。在纵向上，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下沉至社会基层“微单元”乃至个体参与者，应畅通多主体参与渠道，整合分散化个体形成治理合力，实现“纵向到底”。在横向上，应确保经办服务实现普惠性，让社会保障全面惠及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横向到边”。首先，人口较为集中的民族地区在社区、村镇等基层组织增设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网点，并通过标准下达、人员下沉、资源下拨等方式增强网点经办能力、拓展服务项目。其次，通过简化经办流程、加大宣传力度等方式提升各族群众的自主参与意愿，加强群众对经办服务的评价和建议能力。再次，简化网络经办流程以消弭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畅通老年人的经办服务获取路径，促进各年龄群体深度参与。最后，重视民族地区内发展较缓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水平提升，包括边疆地区、较晚脱贫地区、乡村地区等。民族地区内存在经济极化现象，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落后于本地区的首位城市，[①] 成为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均等化的“难点”与“堵点”。上述地区需要在充分评估可行性的基础上，在人口分散地区综合运用人工流动服务、数字远程服务、定期集中服务等方式来打通社会保障经办的“最后一公里”。加快互联网、交通、服务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普惠性、便捷性、可及性，夯实沿边地区、农村地区、较晚脱贫地区政府公共服务的基础能力。

（二）服务便捷性：实现跨地区经办及服务整合

在人口自由流动、社会保险跨地区即时结算、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逐步形成的背景下，人才与劳动力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频繁

① 卢小平：《经济极化背景下民族间发展差距问题变化及应对》，《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流动已呈常态。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进一步消弭“地区内”与“地区外”的身份限定，走向全国一体化。首先，提升民族地区流入人才及劳动力的融入感。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流程便捷化，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准入门槛“去户籍化”，合理优化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人才绿色通道。其次，提升民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的归属感。通过“互联网+社会保障经办”，推行数字终端业务经办个体化、自主化，实现高频事项跨地区通办、个人信息事项即时可查、返乡创业及就业人员社会保障一站式经办。再次，增进地区间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交流互通及共融互动。优化地区间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体系的横向衔接，实现数字经办平台信息共享及业务互认，减少转移接续成本，以开放的服务体系助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

（三）服务目标：实现共治共享并夯实福利共同体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及经办服务起着增益全民福利、提升国家认同、夯实福利共同体的积极作用。首先，应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质量，实现公共服务空间均等化，以较高的社会治理水平促进边疆地区民生发展，提升各族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国家自豪感。其次，促进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从单方供给型转为供需双方合意型，让各族群众在对社会保障经办的监督、管理及意见表达中，加深交往交融，提升福利获得感并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次，普及国家通用语以确保各族群众能够公平地获取经办服务的信息资源，同时重视民族语言中社会保障专有名词的翻译质量，实现经办人员、受益人员的信息对称。

（四）服务协同性：优化外部支持并构建服务共同体

中央专项支持、其他地区对口支援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发展，缩小了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随着民族地区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发展路径不仅是“补差式”，更应转变为与其他地区的“交融互通式”，即坚持并优化现有的支持路径，建设公共服务共同体，实现经办服务的内容、标准、质量地区间统一。首先，国家和其他地区优化对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经办的支持内容，兼顾经办场所、服务设施等“硬条件”和智能化平台建设等“软实力”支持，侧重人员培训、全民数字素养提升，以及经办平台的更新迭代，从根本上提升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能力。其次，优化社会保障经办服务资源的配置，重点锚定于较晚脱贫地区、边疆地区及易地搬迁地区。民族地区内的发展较快地区发挥地缘相近、习俗相似、资源相通的优势，带动发展较晚地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内生动力。再次，随着民族地区与其他公共服务能力差距不断缩小，地区间互动关系应兼顾对口援助及地区合作两个方向，实现社会保障经办的地区间一体化、协同性服务，构建民族地区内、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服务共同体。

（五）服务安全性：注重风险管理及信息安全

在智能化数字服务背景下，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不仅面临道德风险、操作风险、硬件故障等传统风险因素，还面临诸多非传统风险，在信息安全、公民隐私保护、基金监管等领域都存在新的风险点。在民族地区，上述风险的应对难度高于其他地区，边境地区更复杂的信息安全形态、频繁的人口流动都加大了经办及监管压力。民族地区应建立社会保障经办服务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全面覆盖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和事后追责各环节。首先，以数字赋能强化个人信息及基金安全监管，开展动态逻辑检测及大数据预警分析，及时识别信息泄露、数据异动风险。其次，关注边疆跨境流动劳动力的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及安全，规避境外风险因素干扰，识别境外涉社会保障欺诈风险。再次，强化社会宣传及工作人员培训，夯实国家总体安全观及公民信息安全观。

（六）服务整体性：项目间边缘淡化及多元协同

中国的社会保障正在从现金给付为主向服

务保障与现金支付并重过渡。随着长期护理保险、养老服务、就业促进等项目的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经办业务与服务性保障项目的关联性增强，经办与服务项目间的边界淡化。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应对接并兼容其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保障及民生服务整合式发展，夯实社会内聚力。首先，整合服务主体，实现协同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与经办服务由同一主体或相关主体协同提供，实现业务经办与服务一站式获取。综合民族传统互助资源、现代社会组织协同开展志愿服务，入村入户完善服务台账。其次，整合服务方式，满足多层次需求。民族地区在满足群众基本社会保障及经办需求的基础上，优化服务方式以满足群众更高层次的需求，包括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社会保障服务、畅通意愿表达渠道实现深度参与等。再次，整合服务平台，弥合空间边界。通过数字化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一体化服务，弥补民族地区空间分散的不利因素，实现从各地自行办理到标准化全网通办、从碎片化办理到一站式服务的过渡。

■责任编辑/宋雨桃

Practice and Logic of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ecurity Services in Ethnic Areas of China

SHEN Che & DANG Xiu-yu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equal emphasis on service and quality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social security service models, and implemented temporary, organized, socialized, standardized, and digital service models in the ethnic areas of China. Through their own capacity building and special national support, these ethnic areas have formed a combined force deriving from the support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terms of service subjects, advocated citizenship and institutional standards in terms of service objects, and strengthened the welfare community for all groups in terms of service goals. They have achieved social security services from scratch, from availability to equality, and then from equality to excellence, and established an integrated and shared service pattern.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these ethnic areas should follow and optimize the overall management approaches, enhance their own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through the help of the external talent and technical support, gradually eliminate service boundaries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flow of the talent and labor, promote social security services to benefit the border areas,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rough public service communities.

Keywords: ethnic areas; provision of services; social security; wholeness; sharing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法律风险及其规范化防控

丁国峰，寿晓明
［安徽大学，合肥　230601］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科技的发展，迅速席卷了数字社会的每个角落，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数据和算法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了传统营销模式。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权力的逐渐失控却导致了消费者法律主体地位异化、个性化推荐算法歧视异化、算法黑箱形成信息茧房异化等一系列法律风险。这些算法法律风险使得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算法信任逐步丧失。只有重构算法信任和建构算法问责机制才能化解算法危机和算法风险，从外部的责任归属上建构算法规范的治理信任，从内部的契约诚信建构算法规范的合约信任，从底层技术设计上建构算法规范的技术信任。在重构算法信任和算法问责的基础之上规制算法，重塑法律层面的主体—行为—责任链条，赋予消费者数据访问权平衡数据流通和保护，通过区块链技术从技术层面治理算法，以此实现数字营销新业态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

关键词：算法信任；算法问责；数据访问；数字营销；算法权力
中图分类号：D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107－13

一、问题的提出

21 世纪作为互联网的时代，随着数据、算法和算力之间的深度融合使得人类以一种极具颠覆性的方式迈入数字社会。随着以 ChatGPT 为代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算法、数据和人工智能之间的连接更为紧密。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借助数据逐渐异化成了一种社会性权力，掌控社会上权利义务和财富资源的再分配。当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字营销新业态展现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而数字营销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日益凸显其前沿性、重要性，并逐步渗透于互联网环境下各类营销活动、运营之中，深刻影响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同时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在其中的异化使得数字营销新业态的发展出现了众多不良因素，当算法和平台商家相结合，深入且广泛地嵌入到我们生活中并不断拓展之时，看似理性的算法却引发了一系列算法危机和法律风险，算法歧视、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算法霸权等法律问题层出不穷。而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权力异化带来的问题使得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得消费者对于算法产生了极强的不信任感，也使得平台商家通过算法侵犯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可以利用技术主义逃避责任，如何重构算法信任成了摆在数字营销新业态发展面前的一大难题。算法信

收稿日期：2024－01－06
作者简介：丁国峰，安徽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寿晓明，安徽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任作为社会信任在数字时代的一种信任形式，社会信任反映的是对陌生人或者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是社会正常运作的诚信基石。在数字时代之前社会正常运作则依赖人际信任[①]和法律信任[②]的共同维系，但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是信息的不对称和法律功能的下降使得社会信任体系日渐式微。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依靠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强大算力的加持下使得算法风险愈演愈烈，使得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的对于算法、交易以及平台的信任愈发脆弱。法律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出现显示的滞后性和模糊性，使得本身并不平等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更加不平衡，强势的一方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从而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进入不断加剧权利义务不平衡的恶行循环之中。如果放任算法权力的异化，终究不利于数字营销新业态的良性发展。如何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是促进数字经济良性发展亟待解决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问题。

不少学者基于前瞻性和预测性的立场，开始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路径。有学者提出“应以监管权的开放协同、监管方式的多元融合、监管措施的兼容一致为特征推动监管范式的全面革新，迈向面向人工智能‘2.0’时代的‘治理型监管’”[③]。也有学者提出应当“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制度设计优化、治理工具创新的同频共振，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落实”[④]。或者从算法透明度的角度出发提出“技术上制造可解释人工智能是实现算法透明的一种新的选择”[⑤]。抑或从治理算法歧视出发，提出“推动公民权利意识、算法素养、意识形态主体地位的确立，综合应用多种手段以防范化解消除算法歧视带来的有害影响”。也有学者从治理算法共谋角度出发，提出“既要注重公平竞争与消费者保护，也要兼顾效率目标，来开展算法技术创新和发展”[⑥]。或者从算法安全审查入手，提出“充分发挥平台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协同共治效能，夯实算法审查的社会基础”[⑦]。学界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路径角度多样，但都认识到传统依赖法律规制的常规手段已然无法适应数字社会的发展，应当建构涵盖法律规则、行业规制和技术准则为基础的敏捷性治理。“算法风险会引发公众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危机，产生算法恐慌情绪并可能导致算法污名化，进而阻碍数字中国的进程。”[⑧]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的出台，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治理日趋规范，信任和责任作为硬币的一体两面，建构算法信任便是重塑算法切断的法律主体—行为—责任链条，重塑算法的问责机制。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信任异化和法律风险

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虚拟数字人等人工智能新技术以此攫取商业利益，拉大了商家与消费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地位。数字营销新业态与传统商业营销有着质的突变，平台商家通过虚拟数字人进行背后操控，从而对整个交易进行隐形控制，同时平台商家运用算法权力掌握了交易的主动权，而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和用户则在算法权力的异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主体

① 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辞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一种概括化期望。

② 法律信任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理性认知和积极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法律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尊重，它既是法律存在的基础，也是法律实施的关键。

③ 张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现代法学》2023年第3期。

④ 陈兵，董思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风险及治理基点》，《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10期。

⑤ 杨志航：《算法透明实现的另一种可能：可解释人工智能》，《行政法学研究》2024年第3期。

⑥ 刘奕麟：《人工智能时代反垄断法的挑战：算法共谋的竞争威胁与制度构建》，《计算法学》2023年第11期。

⑦ 邹开亮，刘祖兵：《论类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治理——基于算法安全审查视角》，《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⑧ 黎梦兵：《数字中国背景下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研究》，《探讨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人格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依靠和数据的深度融合从单纯意义上的函数衍变成为分配权利义务的社会性权力，而在数字营销新业态的具体场景中，平台商家则借助算法权力使得其可以掌握海量的消费者数据、用户数据，以此掌握消费者和用户的消费画像从而做出个性化推荐的算法歧视，消费者和平台商家原先建构的平等交易机制由此被颠覆。“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推动着人工智能算法在工商业活动中的深度应用，此过程中，数据分析和算法内部演算带来了针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性对待。”① 同时，平台商家运用算法自动化决策使得消费者逐渐被自身数据包裹成一个信息茧房，消费者由于逐渐丧失交易的主动性，平台商家则借助算法掌握了消费者相关的所有数据，使得消费者逐渐异化成为生产数据的客体，消费者在算法权力的异化过程中逐渐失去法律人格，由此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可以借助算法形成了绝对强势地位。消费者对于平台商家和算法的信任在一次次算法自动化决策过程中逐渐丧失，算法借助互联网摆脱了法律主体—行为—责任链条，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兴法律风险，而算法权力的异化终究会反噬数字营销新业态的良性发展，算法危机的来临终究不利于数字社会的长治久安。

（一）算法歧视破坏交易平等机制

虚拟数字人等数字科技和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下，网络直播等平台营销手段发生了质的突变。“自治算法作为电商平台自治的技术手段，本身具有合法性和中立性。”② 相较于以往消费平台而言，数字营销可以通过利用数字人等虚拟技术从而减少人工介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得商家可以运用算法通过虚拟数字人和消费者进行交互。虚拟数字人作为以往平台运用算法等数字技术的集大成者，使得算法风险更加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对于传统的营销手段，通过网络直播等形式商家直接面向消费者推销商品，对于商品的真实性和价值则基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互以及消费者对商品的认知等进行综合判断。传统营销手段由于没有借助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地位则依赖人际信任和法律信任进行规制，双方基于交易习惯和伦理道德维持交易的契约精神，同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等现行法律法规，以及未来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字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数字促进法》），对商家和消费者的行为通过法律进行规制和追责。而在虚拟数字人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平台营销后，运用虚拟数字人则切断了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人际交互，虚拟数字人背后的算法则依托技术主义斩断了法律主体—行为—责任链条，商家通过算法摆脱了原有的束缚从而破坏了《电商法》《消法》倾向性保护消费者的交易平等机制。

“算法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偏见及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偏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映射，逐渐显现侵害社会公众的人格平等权、隐私权，并对数据安全形成威胁甚至破坏，从而导致对社会危害现象的发生。”③ 平台商家通过虚拟数字人代替了原先的人工服务，而虚拟数字人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和消费者交互过程中，则依赖对消费者已有数据作为基础进行算法训练，通过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交易记录等消费信息从而进行个性化推荐，通过对消费能力和消费次数综合预测消费者的未来消费可能性。同时，平台商家基于规避责任和不利信息从而攫取最大经济利益的出发点，在运用算法时从主观上很大程度上会对算法的训练数据进行刻意剔除原先不利的记录和信息，在算法收集训练样本的开始便使算法产生了偏向性和歧视性选择。“人工智能的发展让经营者基于消费者信息精准

① 朱宝丽：《数据正义、算法歧视与规制》，《征信》2023 年第 3 期。
② 程增雯：《平台经济领域自治算法滥用与反垄断规制》，《南方金融》2021 年第 10 期。
③ 岳平，苗越：《社会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偏见的问题与规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

预测其支付意愿从而进行价格歧视成为可能。”[①] 随着虚拟数字人的形象朝写实、仿真的方向发展，使得虚拟数字人从外表和动作、语言等和真人难以区分，同时借助元宇宙场景的复刻使得消费者难以分辨，图灵测试的奇点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生已然愈发临近。虽然虚拟数字人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属于弱人工智能的范畴，但由于虚拟数字人基于现有法律规范难以对其进行法律界定，从而使得商家可以以此为契机挣脱法律束缚。虚拟数字人向消费者推广商品时，由于其交互的话语都基于算法自动化决策输出的结果，并不如传统营销是基于自身感受和主观意志形成，虚拟数字人无法真实感知商品的真实性，很容易对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产生欺骗误导。同时算法可以针对不同消费者群体甚至特定消费者量身定做相应的话术，形成误导性引导消费者购买商家商品。而消费者在事后维权时则由于难以证明自身存在重大误解等可撤销事由无法撤销相应的合同。“诚信和信任是人们更新社会价值观的基础，是实现社会价值变革、推动价值观体系创新的催化剂。”[②] 平台商家借助算法运用个性化推荐从而破坏了原本的交易平等机制，大数据杀熟现象在实务中早已司空见惯，实质上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从而流失消费者对平台商家的信任，长此以往不利于数字营销新业态的健康发展。

（二）算法黑箱编织交易信息茧房

“算法黑箱对算法决策提出了挑战，算法透明要求算法可解释。”[③] 平台商家借助虚拟数字人这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损害交易平等机制外，由于虚拟数字人交互的内容都是依赖算法，平台商家从输入的训练数据中便早已注入了带有偏见性和歧视性的主观意识。算法本身作为一种中立性技术的存在，算法最初只表示数学意义上的函数运算，其并不具备社会层面上的权力分配。但由于算法和数据的深度嵌入使得在数字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运行无法抛开数字的深层次影响。算法由于其内部运作的不可解释性，即便是专业人士去分析算法运作的代码和函数依旧存在极大困难，而对于消费者等普罗大众由于巨大的知识鸿沟的存在，无法对算法的运行代码和关键因素进行认知和理解。“算法作为人类利用机器抓取、处理并输出数据的手段，其所得结果受到编写者主观偏差，技术偏差等多种影响。”[④] 对于算法从知识转化为数据输入，再从数据输出转化为知识这一过程，其中数据和数据的相关关系并不是法律层面上的因果关系，难以从现有认知中对算法自动化决策做出合理解释。而算法的质料则来源于消费者遗留的数据废料，在传统营销中并不注重或者难以使用的数据成为了平台商家获取商机和市场份额的重要竞争优势。平台商家通过和消费者在进入平台签订同意用户协议从而获得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数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中对于收集个人信息采取知情同意作为基本原则，但平台商家则利用格式条款以此规避责任，并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算法自动化决策打开方便之门。

“平台‘大数据杀熟’是通过算法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存在社会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双重可责性，应当予以规制。”[⑤] 平台商家利用收集到的消费者个人信息通过数据训练形成个性化算法，以此做出的用户画像可以针对特定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量身定制，实时动态监控消费者在平台上的一切痕迹。消费者个人在平台面前所谓的私权利早已暴露无遗，消费者对于自身的个人信息、隐私在强大的平台商家面前成了其进一步发展的商业资源，甚至成为改善平台商家的服务模式的重要契机。搜集消费者

① 李倩，[荷兰] 尼尔斯·J. 菲利普森：《人工智能驱动下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一个法经济学分析》，《财经法学》2023年第4期。

② 宇文利：《从个人诚信到社会信任：价值观内在伦理秩序的建构》，《伦理学研究》2020年第6期。

③ 杨志航：《算法透明实现的另一种可能：可解释人工智能》，《行政法学研究》2024年第3期。

④ 吴椒军，郭婉儿：《人工智能时代算法黑箱的法治化治理》，《科技与法律》2021年第1期。

⑤ 郑鹏程，龙森：《公共性视角下平台“大数据杀熟”的规制逻辑与路径》，《吉首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数据形成的算法则将消费者群体进行划分，以此进行个性化推荐，消费者在平台上所获得的信息则都是根据用户画像特定推送的结果。消费者难以知晓和识破算法个性化推荐的信息是否属于最优解，有些时刻算法推送的结果的确契合消费者内心的真实意愿，但由于算法并不具备法律上甚至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结果准确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数据和远期数据是否拟合。当平台商家极尽所能搜集特定消费者数据，并以此形成个性化算法时，消费者所获得的信息的确很有可能是其内心的真实法效意思。但这些消费者自身的数据通过算法在消费者身旁逐渐形成一道道隐形的信息围墙，将消费者包裹进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中。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导致消费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大打折扣，实施行为时消费者内心真实的法效意识表露于外，但由于消费者获得的信息都是具有偏向性和歧视性，平台商家甚至可以通过算法预测消费者的未来消费行径，消费者内心的法效意识是否真实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其次，信息茧房是否可以以消费者重大误解为基础的撤销权事由仍旧存疑，消费者在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中无法获得交易的有效信息，使得交易的公平性难以保证，消费者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由于判断依据的狭隘和偏向性使得行为的有效性存在瑕疵。

（三）算法权力异化交易主体地位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本质是作为数学意义上的函数运算，由于运用到计算机上的代码和编程成为数据处理模型。当下的数字经济，通过对数据背后经济价值的挖掘和利用，使得数据成了社会新兴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数据的价值则基于算法的集成效应，数据在没有经过收集、处理和分析汇聚成大数据之前，其并没有相应的经济价值。算法和数据的深度融合使得两者相辅相成，数据的价值由算法决定，算法则需要数据作为质料。平台商家借助算法通过对消费者数据的占有、处理和结果输出，演变成为针对消费者的经验策略，同时借助消费者数据掌握市场的份额和走向，算法俨然成为主宰平台交易的权力之手。人工智能的加持使得数据同时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平台商家借助手中掌握的消费者数据的同时对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范围进行限制，从而在交易上占据主动和主导地位，使得消费者本已处于弱势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平台商家在数字营销中掌握消费者数据通过算法来影响甚至操控消费者的预期消费行为，虚拟数字人的出现使得算法权力的操控显得更加具备隐蔽性和欺骗性。算法借助虚拟数字人逐渐对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进行侵蚀。算法一方面影响消费者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从主观层面开始消解消费者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另一方面算法通过信息茧房对消费者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产出影响，在客观层面开始规范消费者的个人行为。算法从消费者主客观层面逐渐异化其法律上的主体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俨然成了数字时代新兴的社会性权力，算法对各方权利义务的重新配置愈发显示出重要性。

平台商家运用算法权力不仅通过收集海量的消费者数据来获得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则是监视资本主义的形成，将消费者嵌入到数据生产的链条之中，从主体地位异化为被算法支配控制的客体。平台商家在搜集海量消费者数据后进行分析处理，对消费者进行单向监视，以此来预测和调整消费者未来消费行为，从而占据市场份额和获得高额收益。监视资本主义是算法和平台的深度融合下的必然产物，平台商家在算法权力的帮助下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获取消费者数据，形成了无孔不入的商业监视，平台商家以免费提供服务来获取消费者数据，其中包括消费者个人信息、消费记录、消费习惯和位置信息等一切相关数据。平台商家的监控除了获取消费者数据之外，在算法分析处理消费者数据之后，通过虚拟数字人来对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推荐和评分机制，以此来影响消费者的未来消费行径。同时，消费者过往的消费信息和消费习惯成了个性化定价的重要依据，平台商家借助虚拟数字人对消费者进行轻推，说服消费者购买相应的商品和服务，在监视资本主义的作用下，平台商家通过算法来实现收

益，对于商家而言算法成了其未来商业决策的重要甚至唯一考量因素，使得商家自身在实施商业行为时的自主性同样受到了挑战。算法权力逐渐异化了平台商家和消费者这对交易相对方的法律主体地位，消费者在算法权力面前的价值成了经济利益的生产数据价值，在监视资本主义建构的数据生产体系中异化为数据商品和市场原料。“平台经济模式的成功建立在社会信任和期许之上，而平台经济近年来出现的各类问题则可能触发了‘背信厌恶’的社会心理机制，导致较为强烈的负面情绪，由此促使决策者调整规制力度。”①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规范的法理逻辑重构

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商家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使得整个交易环境和体系难以形成信任的良好社会氛围，消费者对于商家和算法产生了极强的不信任感，如何化解算法权力带来的算法信任危机成了数字营销新业态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通过创新性的“算法可理解 + 数据可信 + 参数可解释”治理架构，结合算法识别、数据可信以及算法可理解等基础性规则。② 算法信任的危机则来源于平台商家利用算法斩断了法律上的主体—行为—责任链条，使得平台商家可以躲藏在技术主义的盾牌之后规避现有法律规制。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重构算法信任的顶层涉及则是确立算法责任归属，将被算法斩断的法律主体—行为—责任链条重塑，确立平台商家的法律责任。在外部算法治理的基础之上，从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内部的交易契约形成的意思自治中，确立算法使用的智能合约以此确立交易的诚实信任原则，从而在数字营销新业态的交易环境中形成算法合约信任。而在算法信任的底层设计中则需要秉持对算法的客观中立的态度，对算法自动化决策保持利用和监管的双准则，可以利用算法在智能合约和匿名化等技术保障交易安全和信息安全，通过重构算法信任从而化解算法权力异化带来的现实危机和法律风险。

（一）责任归属：算法规范的治理起点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在数字时代借助和数据的深度嵌合摆脱了传统法律主体—行为—责任的责任归属，要实现从算法危机到算法信任的转变则需要对算法治理中重建主体—行为—责任链条，以此重构算法信任的问责治理。对于平台商家在数字营销中算法的规制则在《电商法》第 18 条设置了相应义务，平台商家运用算法进行推荐时也应当提供非个性化推荐的一般结果，但在区分个性化搜索结果和自然搜索结果时在实务中依旧难以落地，平台商家在运用搜索算法时必然会以消费者数据作为训练样本，所谓的自然搜索结果在技术层面难以实现。同时《电商法》基于尊重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原则，即便提供了自然搜索结果是否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最优路径同样存疑。根据帕累托最优，平台商家即便提供相应的自然搜索结果渠道，暂且不论平台商家为此承担的成本，消费者通过自然搜索是否能够获取本身所需可能难以企及个性化推荐，自然搜索渠道在和个性化推荐的实践竞争中并没有优势，终究会被数字经济市场所淘汰。数据分享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社会共识，与其限制算法个性化推荐的使用不如规范算法的使用。《电商法》中对于违法算法责任更为直接的是平台商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对于消费者民事权益的救济却没有规范，司法实践中由于消费者举证取证困难、维权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此类案件的数量少之又少，和数字营销新业态蓬勃发展的新兴趋势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背后显现的则是消费者对于平台商家和算法的不信任，平台商家的数字营销可能在短期内会实现发展，但对于重构算法信任和数字营销新业态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恶性影响。

“传统的线性商业模式通过自身创造产品和服务创造价值，而在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下，

① 戴昕：《平台责任与社会信任》，《法律科学》2023 年第 2 期。

② 王德夫：《论人工智能算法的法律属性与治理进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

通过网络连接解决客户群之间的协调和交易成本问题来创造价值。”[①]《电商法》对于数字营销平台设置算法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调整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自然这并非民商法领域第一次为了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再分配做出的努力。《消法》出于倾斜性保护消费者的考虑，为消费者设置了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以此作为抗衡平台商家的法律之盾。《电商法》在对消费者权益具体化针对性地提出了平台商家运用算法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在责任归属中建构算法治理信任。数字营销新业态下的平台商家对算法的广泛运用，则是基于对消费者和用户数据的掌握、分析和控制，从而使得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在交易等信息上处于一个极为不平衡的状态，交易的公平诚信等信任机制则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甚至平台商家借助虚拟数字人等新兴科技大肆掠夺消费者数据，从而对消费者形成信息茧房。《个保法》中提出的知情同意原则却由于算法的出现形同虚设，算法和数据的深度融合以及算法、数据和算法形成的人工智能，使得匿名化技术等个人数据和隐私的保护机制难以发挥其真实效应。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借助算法使得数字经济生活中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逐渐被颠覆，算法个性化推荐在数字营销外在下演化成了合法歧视的错误常态。算法成为了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掠夺消费者的隐形武器，《消法》中构建的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在算法面前失去了实际意义，算法权力在商业平台的异化危机使得消费者和用户的劣势地位逐渐加剧。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力量悬殊，使得消费者由于维权难度和成本的高昂不得不容忍这种司空见惯的违法行径。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对于算法的运用，使得维系个人数据保护和共享的知情同意机制在算法权力面前被彻底击碎。消费者成了算法控制数据生产链条中的一重要环，一方面作为生产者不断生产数据，另一方面又作为消费者不断反馈使用数据。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重构算法信任的基础则是重新链接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行为—责任链条，应当在《电商法》的基础上建构算法责任归属，以此建构算法治理信任。应以监管权的开放协同、监管方式的多元融合、监管措施的兼容一致为特征推动监管范式的全面革新，迈向面向人工智能“2.0 时代”的“治理型监管”[②]。

（二）契约诚信：算法规范的合约要点

“进入大数据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权力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个人生活越来越具备‘构成性地位’。”[③] 在外部的算法治理层面，通过重构主体—行为—责任的法律链条来实现责任归属，在算法治理信任上建立外部监管上的信任机制。而在内部的算法合约层面，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则是实现算法合约的契约双方，传统的合同可能难以适应算法权力异化数字营销新业态的新型交易模式。可以基于智能合约作为基础，实现双方的交易目的和保障交易安全以及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平台商家为了尽可能的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取商业信息，需要获得消费者和用户的个人信息，而消费者和用户则需要借助平台获得所需的服务和商品。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基于数据和算法作为中介形成了数据服务合同和数字营销买卖合同的混合合同。同时根据《电商法》《消法》中规定平台商家的算法义务和法律责任，以此形成算法合约。在算法合约中应当载明平台商家收集消费者信息的范围和用途，对于一般个人信息由于其不具备或者私密性较低，平台商家可以采取默示同意的方式收集消费者的此类信息。基于社会本位对个人信息采取保护和流通并重的态度，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由于其没有成为大数据中的组成部分，具备潜在的经济价值，但如果不对消费者个人的信息进行处理、分析、集成，那么消费者个人信息也仅仅是信息罢了，消费者在互联网上留

① 董京波：《平台自治的监管问题研究——以平台的双重身份为视角》，《商业经济与管理》2020 年第 7 期。
② 张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现代法学》2023 年第 3 期。
③ 曹博：《算法歧视的类型界分与规制范式重构》，《现代法学》2021 年第 4 期。

存的大量信息则是在各个平台之中，平台在收集消费者的信息时如果单纯依赖现有《个保法》的知情同意原则处理，其无法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流通利用的双重要求。“在获取个人数据时，未来的应用和后果通常无法预知或不够明确”①，可以通过以哈希算法为基础的智能共识作为消费者和平台商家签订的格式合同，对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采取默示同意从而实现个人数据的收集，而对于消费者的隐私信息则采取明示知情同意的做法进行授权，实现个人信息的分层保护。“智能合约代码的执行方式比人们的行为方式更容易预测。”② 现有平台的隐私信息条款则可以被智能合约所取代，以哈希算法作为技术支持实现合同的格式化，从而保障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智能合约的不可篡改性使得消费者遭受侵权后以此作为证据向平台商家追责，为了矫正双方的不对等地位，应当以无过错原则作为归责基准，要求平台商家对自身无过错提供相应证据。

“如果数据控制者对数据主体提供的数据具有商业利益，则会导致该利益与其对数据主体的责任发生冲突。”③ 平台商家为获得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形成的契约应当作为一种数据服务合同认定。数据由于其无限复制的特性使得数字营销无法满足买卖合同要求合同标的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要件。同时数据在消费者手中并不能作为智力成果进行规制，如果将两者的关系作为许可合同则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对于智力成果的创新性、新颖性等基本特点。如果将其看作承揽合同对待，则无法涵盖行为的整个过程。承揽合同是要求完成一定工作并交付劳动成果作为标的的合同类型，而平台商家对消费者数据则是通过数据爬取、API接口、Web采集工具和数据库查询等方式获取，再将数据进行脱敏、清洗、审核等处理收集流程从而完成收集，对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不是基于承揽关系。数据作为无形的比特流，在消费者手中是以信息的形态存在，平台商家无法直接将信息转化成为数据，整个数据收集过程则依靠互联网。平台商家收集消费者的数据并不是为了完成数据本身的排他性使用，而是为了将消费者的信息转化成为平台商家所需的数据。平台商家则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服务以此来对价获取的信息，这和网络服务合同类似可以看成是数据服务合同。当前《民法典》并未包括服务合同，则可以作为一种无名合同参照最接近的有名合同进行规制，可以参照买卖合同对数据服务合同进行规范。“建立用户与平台之间的信息服务合同，令平台让渡部分算法控制权给用户，预防算法对用户轻微的精神性一般人格权益的侵害。”④ 通过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内部建构意思自治的算法合约，对平台商家收集消费者数据和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确立智能合约的格式合同，从而在数字营销新业态的交易环境中形成契约诚信，以此达成算法合约信任。“数字信任具有计算性信任与组织信任双重特征，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有必要削弱通知—同意的制度功能，并建立基于风险的数据保护规则与基于场景的商业模式行为规范。”⑤

（三）客观中立：算法规范的技术目标

算法规范在外部建构的治理信任和内部建立的合约信任的基础之上，应当对算法秉持一个中立客观的态度，与其说大众是恐惧算法本身的不可解释，不如说是对被算法背后操控的恐惧。在数字时代的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作为一种新兴科技早已深度融合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应当在法律监管的基础上对算法保持开放的态度。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商家在运

① ［荷兰］玛农·奥斯特芬：《数据的边界：隐私与个人数据保护》，曹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7页。

② T. J. de Graaf, *From old to new: From internet to smart contracts and from people to smart contracts*,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2019, p. 7.

③ Sylvie Delacroix, Neil D. Lawrence, *Bottom – up data Trusts: disturbing the 'one size fits all' approach to data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2019, p. 241.

④ 周子琪：《论算法侵害的私法规制》，《湖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⑤ 谢尧雯：《基于数字信任维系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浙江学刊》2021年第4期。

用算法收集消费者的信息时，消费者可以要求平台商家对自己的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以此保护消费者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个保法》第73条对于个人信息匿名化的规定，规范了个人信息匿名化是不可识别且不可复原。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GDPR）中对匿名化则认为是否具有可识别性要点考虑所有可能的合理手段，所以客观因素都应当考虑在内。美国由于采取分散立法，其提出的则是去身份化或去识别化，规定为无法识别且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可以被识别出来是个人信息。匿名化、去身份化、去标识化的技术手段都是希望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转换成为非个人信息，从而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法律上对于个人信息的兜底保护措施则是基于现有技术的基础之上实现，现有算法对于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则在数据源上进行技术限制，保证后续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平台商家则应当将运用算法实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匿名化作为格式合同中的一项内容予以固定，以此实现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流通利用的平衡。

“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无论如何，关于自动化决策过程的讨论不应局限于技术学。”① 去标识化算法作为个人信息匿名化的初期算法，其主要原理则是通过泛化和抑制的方式在数据挖掘过程中保护个人信息隐私安全。其中泛化技术则是基于降低对数据操作微粒来提供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抑制技术则是通过删除数据中相对敏感隐私的属性内容来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则有T－近邻算法、L－多样性算法和K－匿名算法等。但随着大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原先的技术开始滞后，随之产生了联邦学习模型和差分隐私模型。其中联邦学习模型作为一种隐私计算模型，在数据收集中的运用尤为突出。其原理是一种分布式机器学习技术，在分布式机器学习框架下满足交易各方对于信息、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需求。从根本上讲则是数据不发生转移，算法输入后直接输出结果，联邦计算的显著特征就是针对不同用户分别提供数据需求和训练模型，不同用户的数据并不会相互交互，数据运行过程中各个机器之间也是独立运行操作。联邦计算中并不需要其他数据进行处理，只需要对自身相关的数据进行处理。同时数据的权属并不会发生转移，使得数据收集的形式从数据流转转化为数据运算的结果。联邦算法的这一核心优势使得其在数据收集中有效解决了数据流通利用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矛盾，从而在技术层面实现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性。重构算法信任从底层逻辑上则是需要对算法规范的技术信任，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技术手段，同时从内部实现合约信任、外部实现治理信任，从而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重构算法信任和算法问责，重塑算法切断的法律主体—行为—责任链条。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预防及规范化治理

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下重构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信任和算法问责为基础，实现算法危机到算法信任的转变。在算法规范的治理信任方面，则需要建构以《电商法》《消法》为基础的原则性的平台问责制，从而规避平台商家利用法律漏洞逃避法律责任追究；同时在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形成合约信任，在基于智能合约的基础之上，赋予消费者数据访问权，从而实现数据流通利用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平衡；最后则对算法这项中立性技术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运用区块链技术从技术层面治理算法，从而实现以技术治理技术的底层设计。“业已开展的算法治理不宜过度冒进，宜审慎处理好当前与未来、名义与实质、规范与发展的关系。”② 未来应当建构算法专项的部门法，从而推进算法和数据、技术层面的共同治理，实现数字营

① Rolf H. Weber, *Socio－ethical values and legal rules on automated platforms: The quest for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2020, p. 3.

② 刘泽刚：《论算法认知偏差对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的负面影响及其矫正》，《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1期。

销新业态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

（一）算法归责：平台问责制

《电商法》中对于平台商家规范的算法结果的明示义务、算法自然搜索结果的提供义务等内容，希望对平台商家的算法归责具体化从而在实务中具备可操作性，但实际情况却和立法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电商法》过于细致具体的规范很有可能使得平台商家规避掉算法的监管审查，平台商家则可以设置相对隐蔽的自然搜索结果入口等方式使得《电商法》规定的算法归责丧失存在基础。数字营销新业态在当下发展的越发繁荣，使得平台商家为了自身的商业经济利益，将对算法的元规制流于表面形式，甚至利用算法以规避现有法律法规的责任归置。法律规定中对于平台商家在运用算法时不得进行歧视性的个性化推荐，但平台商家则可以通过改换数据从而规避法律限制。在此情形下，行政监管部门则很容易陷入算法监管的悖论怪圈之中，在不断接到消费者的举报和投诉后，投入相应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进行算法审查和评估，但平台商家则可以轻易对算法进行针对性篡改从而规避法律监管。但平台商家通过算法获得不正当利益的同时却并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追究其本质则是平台商家通过算法权力和掌控数据，从而相较于消费者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实际地位，违背现行法律规范、运用算法不当获利以及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算法文化监控、算法可解释性和算法可控性纳入算法审查范围，合理评估算法对国家和社会的冲击，明确算法安全内容。”① 因此在数字营销新业态中对平台商家的此类行为进行原则性规定，定性为侵害消费者的欺诈、诱导和滥用优势地位等侵权行为，从而扩大对平台商家的算法监管范围，减少法律漏洞。“在坚持平台侵权责任过错归责的基础上，对于可以确认为新型侵害的个人敏感信息泄露适用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对产生歧视后果的平台算法适用无过错责任。”②

同时应当拓宽消费者的维权路径和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收益，从而激活消费者和平台商家在算法责任上的民事权利义务博弈。《个保法》第 70 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拥有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公益诉讼制度，但从实践情况而言，个人信息的公益诉讼使用率极低。虽然《个保法》为了平衡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力量从而引入第三方对算法进行监管，但基于算法等人工智能知识鸿沟的存在，使得第三方无法单独依靠自身对算法的内容进行理解和认知，更难以做到实质意义上的算法法律监管。如何将《个保法》中规定的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制度落到实地，则需要消费者和第三方以及专业的算法监管机构共同对算法进行系统性监管，建构算法的元规制和独立规制的二元监管机制。应当建构《电商法》算法义务基础之上的平台问责制，《电商法》规范了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商家的运用算法的明示义务和自然搜索提供义务，但平台商家则会借助过于细致的现行法律规范逃避事后责任归置，未来在确立平台商家运用算法的原则性责任和义务，从而涵盖现有实务中大量具有争议的算法责任问题。算法问责制应当涉及平台在使用算法时的具体场景、理由和具体算法解释，在数字营销新业态的具体场景中根据算法运用的特殊性确认其隐含的认知和规范标准。对平台商家设置的算法问责制内核在于矫正平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悬殊权利义务的纠偏机制，因此算法问责制应当从矫正两者之间悬殊的地位差距作为具体路径。“分类分级作为我国当前算法治理体系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监管的共同原则，是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重要切入点。”③ 未来算法规制应当在意思自治和公平诚信的指导原则下，基于《电商法》《消法》《民法典》等现行

① 邹开亮，刘祖兵：《论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治理——基于算法安全审查视角》，《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6 期。

② 丁宇翔：《跨越责任鸿沟——共享经营模式下平台侵权责任的体系化展开》，《清华法学》2019 年第 4 期。

③ 陈兵，董思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风险及治理基点》，《学习与实践》2023 年第 10 期。

法律的算法规制体系，通过对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商家不当应用算法的侵权行为认定、消费者激励机制和算法问责制的构建，以此重塑算法的主体—行为—责任法律链条，从而建构算法治理信任和外部的算法监管机制。

（二）个人赋权：数据访问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和数据的深度融合使得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商家可以获取海量消费者相关的一切数据和信息，平台商家在获得海量的消费者相关数据和信息后利用算法形成商业决策，从而攫取商业经济利益。社会本位下消费者的个人数据和信息需要平衡流通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原先提倡的数据生产者权则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进行了倾斜性的保障，将消费者自身产生的数据作为财产客体予以保护，使得消费者可以获得自身形成的数据从而保护消费者的信息和隐私，以此从算法流程的源头即数据收集阶段分流元数据，但数据生产者权方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病，例如数据生产者的范围和界限并不明晰、数据生产者权为保护消费者而设置壁垒从而具有排他性等一系列问题。《个保法》第 45 条第 3 款设置了数据可携带权，但数据可携带权的设置并不能完全解决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力量不对等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讲，数据可携带权仅仅指向消费者的历史数据，但并不包括实时传输数据和数据互操作性的规范，由此而言数据可携带权的设立更多侧重于保护消费者的数据信息安全，而并非为了实现数据的流通利用。同时数据可携带权设置的权利主体是一切数据主体，数据可携带权并不能被放弃，由于未能考虑到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不平等的交易地位，从而在实际情况反而限制了数据流通利用。应当对数据可携带权进行修正为数据访问权，其核心内容则是为消费者设立数据访问权和携带权，以保障数据的全面流通利用。

“要解决数据流通问题，绝不可能通过数据访问、数据权属、数据保护或者数据交易规则的安排而单独实现，而必须站在数据治理的高度，对数据流通问题进行整体把握。”① 数据访问权的设置从权利主体方面应当涵盖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以及享有合法权益的主体，数据访问权是基于人的身份主体而产生，具有不可放弃性，因此权利人之外的其他人无法基于合同获得权利救济。假设具有合法利益的主体没有被涵盖到数据访问权人之中，则其无法从法律上获得相应救济。在权利客体方面，数据携带权不应仅仅将消费者相关的数据作为保护客体，而应当扩大到非个人数据和间接获得的数据，从而使得权利人获得更为广泛的数据使用自由，进而更好地预防和解决算法带来的危机和法律风险；在权利内容上，数据访问权则包括数据携带权和数据访问权，从而平衡数据流通利用和消费者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数据访问权方案相较于数据生产者权方案不具有排他性，使得消费者作为权利主体并不能妨碍平台商家获得和利用其个人的数据，同时数据访问权提供的救济在保障消费者等权利主体获取、使用数据的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小。数据访问权的设立则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数字营销新业态下平台用户同时也具备消费者的身份，对于消费者个体而言，保护自身数据相关的信息和隐私以及在平台中获得相应的服务和产品，则远比数据本身隐藏的商业经济价值更为重要。而对于平台商家，获取相关数据作为商业竞争的重要资源日益重要，只有数据流通利用才能实现商业价值。数据访问权其固有属性则可以免除消费者因处于弱势地位而丧失数据权利的法律风险，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由于算法产生的悬殊的议价能力，使得仅凭数据生产者权方案难以真正发挥实际效能，甚至可能面临实际困境而不得不放弃的境地。数据访问权的设立使得消费者可以抵消算法带来的劣势因素，使得平台商家不得不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内部的合约自治，以此形成良性的交易环境。

① 王洪亮，叶翔：《数据访问权的构造——数据流通实现路径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23 年第 1 期。

（三）以技治技：区块链技术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风险的法律规制体系须结合算法、代码、数据、智能机器等之间的内在运行机理加以分层构建。”① 数字营销新业态下为了从技术上规制算法，则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做到以技治技。区块链技术是指一种按时间顺序存储数据的链式数据结构，区块链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库，其运作原理是通过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共同记账、相互验证，从而达成对一笔网络交易记录的共识。“区块链技术允许财产交易的虚拟去中介化和自动化，这可能有助于设计未来的平台，”② 区块链依靠的则是智能合约、哈希算法、共识机制、非对称加密和分布式等数字技术。通过区块链的网络，在以上技术的加持下共同保证交易记录的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在平台交易中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使得交易记录得以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并且可以生成相应的智能合约从而极大地简便了平台交易的成本，同时也保证了平台交易的安全性。区块链的生产使得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对算法规范的技术信任进行了相应简化，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做法其实也表明区块链本身就是一个信任机器，使得区块链可以直接代替中心化模式的中心。由于区块链依靠算法使得其并不需要依靠人类的操作可以进行自动化决策，使其可信度远远高于不稳定的人际信任。“现代社会信任体系因为信息不对称加剧与法律功能下降而式微，区块链技术以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征成为一种新的信任机制，从而构建数字信任。”③ 由于区块链展现的高度信任，使得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可以依靠其作为中立性的技术从而实现交易的公平性和安全性。

“区块链技术作为技术信任的标杆，以其特有的去中心化运作模式赋予技术信任以‘强信任感’，使得技术信任超过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信任模式。”④ 从空间角度来看，区块链形成的信任则是依赖哈希算法、智能合约等特定算法形成的技术信任，依靠互联网这个网络空间，使得其可以摆脱有限群体约定俗成的既有文化约束，也可以挣脱血缘姻亲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算法规范的技术信任倚重的是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双方在区块链技术的既定法则下形成契约，达成共识，并不会受到伦理道德和传统习俗的约束。在区块链技术中，依靠的则是算法作为中立性技术带来的契约诚信和意念自治，区块链在平台交易中使得交易各方主观上改变了对算法原有的偏见和质疑，可以从客观技术层面上开始对算法作为辅助工具带来的安全便利持肯定态度。而从技术角度出发，其底层逻辑依靠的则是算法技术的加持，作为一项自动化决策的技术，区块链并不需要人工的介入便可以自行运转，使得区块链成了一个信任机器，其并不会带有人为主观性从而规避人性的缺陷。从人际互动角度入手，区块链作为免受人际关系互动的信任机器，其避免了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泄露，保证了平台交易的安全和保密。同时交易各方可以通过区块链提前知晓对方的信用情况，从而对是否进行交易进行预判。“算法规制的真正对象不应落脚于算法，而应揭开算法的面纱，穿透算法去规制算法背后的种种力量。”⑤ 通过区块链技术使得从技术层面规制算法，从而保证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对于算法秉持技术信任，通过区块链技术治理算法达到算法信任的底层技术规制，从而重塑算法切断的法律主体—行为—责任链条，实现算法的问责机制。

结 语

面对智能数字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尤瓦

① 胡小伟：《人工智能时代算法风险的法律规制论纲》，《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② Rosa M. Garcia – Teruel, Héctor Simón – Moreno, *The digital token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2021, p. 1.

③ 张清，郭胜男：《人际信任、法律信任与数字信任：社会信任的谱系及其演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④ 徐祥运，高海鑫：《区块链技术对社会信任模式的影响及所致信任风险的防范》，《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1期。

⑤ 蔡星月：《以算法规制算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尔·赫拉利曾指出未来数字经济链的顶端将是各种类型的人工智能算法。聚焦于数字营销新业态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权力异化带来的一系列法律风险和危机使得算法信任荡然无存。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做出的自动化决策与各种平台有机结合，不断颠覆并快速带领人们迈向算法媒介性社会。面对新的社会样态，我们应当抱有客观、包容的心态给予算法技术足够的创新空间，但与此同时还应审慎和理性地分析算法危机的根源和特征，并有针对性地总结算法治理经验，探索最佳治理方案。从缓解算法焦虑到迈向算法信任，重构数字营销新业态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信任，重塑法律层面的主体—行为—责任链条，实现平台商家的算法问责制，并且通过区块链技术治理算法，以此化解算法危机实现算法信任。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依靠的不仅是算法技术本身的优化和完善，更需要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建立有效应对的算法治理机制。创新先行、治理助力，如此才可从容应对、稳步前进。最终实现数字营销新业态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治化防控，促进数字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张瑞臣

Legal Risks of th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and their Standardiz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NG Guo-feng & SHOU Xiao-ming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rapidly swept every corner of the digital societ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algorithms in the new format of digital marketing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marketing model. However, the gradual loss of control of the power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leads to a series of legal risks such as the alienation of the consumers' legal status as the subject, the discrimination of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and the alienation of information cocoons formed by algorithmic black boxes. These algorithmic legal risks make the algorithmic trust gradually lost in the new format of digital marketing. Only by reconstructing algorithmic trust and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can algorithmic crises and algorithm risks be resolved, the governance trust of algorithmic specification be constructed from extern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he contract trust of algorithmic specification be constructed from internal contract integrity, and the technical trust of algorithmic specification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underlying technical design. On the basis of reconstructing the algorithmic trust and accountability, the algorithm is regulated, the subject-behavior-responsibility chain at the legal level is reshaped, the consumer's right to data access is given to balance the data circul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the algorithm is governed at the technical level through blockchain technology so as to realize the leg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risks of th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in the new digital marketing format.

Keywords: algorithmic trust;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data access; digital marketing; algorithmic power

数字赋能提升城市旅游绩效机制初探

刘　凤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摘　要：数字赋能对中国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在理论分析数字赋能对旅游业价值重塑与价值创造基础上，本文使用我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的文化赋能、景区赋能和生态赋能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赋能显著提升了城市旅游绩效，并且结果在剔除可能的极端值，变换估计方法下依旧显著；（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赋能通过激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文化资源经济价值、加强以5A级景区为代表的景区资源优势、提升以生态效率为代表的生态价值转换方式促进城市旅游绩效提升；（3）区域异质性的考察发现，中部和西部地区以文化赋能和景区赋能为主，生态赋能的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加快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推进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利用数字技术扩大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充分发挥东中西地区优势等建议。

关键词：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新质生产力；生态效率；文旅融合

中图分类号：D630；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120－15

引　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①]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新发展阶段激发新动能的决定力量。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要以广泛深刻的数字变革，赋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②]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作为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幸福产业，旅游业如何运用数字化科技创新成果赋能传统业态，促进数字技术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发展产业内新质生产力，是关乎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城市旅游绩效体现城市内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行业在财务、组织、营销、经济等方面综合表现，是一个城市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③]目前旅游业过度依赖传统技术与制度，[④]导致传统旅游业产品同质化、粗放式发展等弊端凸显，[⑤]限制了城市旅游绩效的提

收稿日期：2024－01－16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演进与完善发展研究”（项目号：2024J0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凤，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　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

②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四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4年3月13日。

③ 彭红松，李畅，吴丽敏等：《国外旅游绩效评估方法研究进展与启示》，《人文地理》2021年第6期。

④ 黄蕊，李雪威：《数字技术提升中国旅游产业效率的机理与路径》，《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

⑤ 魏敏，彭倩：《从产业附加值看改革开放40年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及变迁》，《旅游学刊》2019年第1期。

升。数字技术的使用为城市旅游绩效提升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式，从改造传统旅游产业的角度看，数字技术的使用是旅游企业成本优势的体现以及产品服务差异化的决定因素，并且能够通过预测旅游流量、促进价格透明度和竞争、改造分销渠道等方式提高旅游企业效率。①

一、文献综述

当前，关于数字赋能旅游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数字技术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视角。数字技术通过持续创新驱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旅游的行业边界和运行模式，呈现出以“质量”路径为主、“流量”路径为辅。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节能提效、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供需匹配度、提升游客服务水平等维度实现精准营销、智能服务，促进旅游业产业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升级、商业模式创新，从而推动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②

（2）数字技术与旅游产业融合视角。经过产品、技术、市场和企业四个层面发挥作用，通过数字文化、市场融合、需求、旅游市场共同发挥融合效应，重塑产业价值链、变革运营模式、提升资源利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实现数字技术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满足游客对数字文化、旅游等方面日益多元化、品质化和个性化的需求。③

（3）数字赋能旅游绩效实证研究视角。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普及、智慧旅游城市试点与流量效应等角度进行实证研究，④ 发现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智慧旅游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水平、升级产品和服务、加快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同时降低成本，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旅游绩效，为数字技术使用对城市旅游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大量实证经验证据。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研究大多侧重于数字技术的使用，但数字化促进城市旅游绩效增长的作用机制应区别于传统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技术积累速率不同，技术演进会因路径依赖形成地区间的技术差异，⑤ 具备技术比较优势的地区依靠已形成的技术路径，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发挥竞争优势，不具备技术比较优势的地区则竞争力下降，二者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我国技术中心度水平不断提升，但各地区间的差距日益扩大，⑥ 就数字技术而言，区域间数字设备接入的差异会对区域旅游业的均衡发展产生影响。⑦然而，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总体差异在微弱波动中缩小演进，⑧ 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与我国城市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并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现有文献过度关注于数字技术使用，对数字赋能与旅游绩效的关系讨论中多涉及创新与技术进步等传统经济增长机制，却忽视蕴含在城市内部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与生态价值等虽可以被数字赋能却难以迅速流动的要素，导致从数字技术特殊性出发分析数字化如何赋能文化、景区、生态等重要因素进而对城市旅游绩效产生影响的分析则较少。在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文旅融合是路径、景区是直接

① 罗浩：《旅游产业与信息技术进步》，《旅游学刊》2012 年第 7 期。

② 夏杰长，贺少军，徐金海：《数字化：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方向》，《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 年第 2 期；王俐，周向红：《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流量”还是“质量”?》，《浙江社会科学》2023 年第 6 期；陈琳琳，徐金海，李勇坚：《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与路径探索》，《改革》2022 年第 2 期。

③ 熊正德，柯意：《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内涵、机理与测度》，《中国流通经济》2023 年第 12 期；郭新茹：《数字技术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逻辑机理与创新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1 期。

④ 冀雁龙，李金叶，赵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经济问题》2022 年第 7 期；樊玲玲，谢朝武，吴贵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能否提升旅游业绩——170 个旅游城市的实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蒋瑛，刘琳，刘寒绮：《智慧旅游建设促进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准自然实验》，《旅游科学》2022 年第 2 期。

⑤ Arthur, W Brian,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 – 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 (394): 116 – 131.

⑥ 郑江淮，戴玮：《中国技术空间雁行式变迁缩小了地区经济差异吗——基于地区间技术邻近度的假说和实证》，《财贸经济》2021 年第 12 期。

⑦ 杨勇，邬雪：《从数字经济到数字鸿沟：旅游业发展的新逻辑与新问题》，《旅游学刊》2022 年第 4 期。

⑧ 吴文智，赵磊：《中国城市旅游业发展地区差异与空间极化研究》，《旅游科学》2021 年第 1 期。

指向、生态是旅游可持续的重要保障。鉴于此，本文认为，分析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提升的理论机制与实际效果，在准确把握数字赋能文化、景区、生态三种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不仅为旅游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理论支持，也有助于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方向和指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赋能是数字技术参与价值重塑与价值创造的过程。[①]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降低运行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旅游服务等，对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 数字赋能旅游业价值重塑的本质在于消除多重维度的信息不对称，即消除时空异质性的信息不对称、减少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降低要素配置领域的信息不对称。数字赋能旅游业价值创造的本质在于个性化产品和定制化服务更加符合个体消费者需求，使得更多潜在的交易可以由市场实现。

首先，数字技术有效消除了时空异质性的信息不对称。在传统旅游业中，地域的隔阂和时间的限制往往导致信息滞后和失真，使得旅游资源的开发、推广和服务难以精准对接消费者需求。然而，在数字技术助力下，信息都能实时、准确地传达给消费者，极大地提升了信息的透明度和时效性。其次，数字赋能也减少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互联网平台，消费者可以精准获取相关信息，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消费决策。同时，生产者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行为模式，进而优化产品设计和营销策略，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最后，数字技术还可以降低要素配置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在旅游业中，要素配置包括人力资源、资本、旅游资源等多方面的整合和优化。通过数字化平台，各种要素可以更加高效地流动和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而数字赋能旅游业价值创造的本质在于推动个性化产品和定制化服务发展。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旅游业能够提供更符合个性化需求的高端服务。这不仅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也为旅游业开辟了新的价值创造空间。通过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更多潜在交易得以实现，进一步推动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应当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文旅融合，加快文旅产业升级，促进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③] 其次，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可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打造个性化高端旅游，增加景区收入。最后，数字技术可促进旅游行业与生态系统融合，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④] 因此，通过数字技术，可实现文化赋能、景区赋能和生态赋能，从而挖掘文化资源经济价值、发挥景区资源优势、提升生态价值转化方式，最终实现提升旅游绩效的目标。

（一）数字赋能旅游业发展的理论逻辑：价值重塑与价值创造

数字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想逻辑，是在基于大数据信息技术全面整合旅游行业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旅游行业的数字化管理水平，促进游览方式、体验方式、服务方式以及管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首先，数字技术通过信息的高效传递和获取，使得旅游企业和游客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畅通，有助于旅游企业更精准把握市场需求，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和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其次，数字技术能够对大量的旅游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应用，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旅游企业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同时，还能更好地预测市场趋势，制定更为精

① 焦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从价值重塑到价值创造》，《经济学家》2020 年第 6 期。

② 曾博伟，安爽：《“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融合体制机制改革的思考》，《旅游学刊》2020 年第 6 期；袁惠爱，赵丽红，岳宏志：《数字经济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3 年第 5 期；乔向杰：《智慧旅游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学刊》2022 年第 2 期。

③ 翟姗姗，查思羽，郭致怡：《面向文旅融合发展的非遗数字化技术体系构建与服务场景创新》，《情报科学》2023 年第 7 期。

④ 党红艳：《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转型的底层逻辑》，《经济问题》2023 年第 3 期。

准的营销策略，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增加旅游收入。最后，数字技术可以推动旅游商业模式的创新。传统的旅游商业模式正在被数字技术所改变，新的商业模式如在线旅游平台、共享经济等正在崛起。不仅提高了旅游业的运营效率，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便捷、多样的旅游选择。通过对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在其中注入知识、科技，实现从大量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转为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约式发展方式，促进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赋能实现了城市旅游市场整体的帕累托改进和福利增进，可进一步提高效率。如图 1 所示，假设旅游市场中存在着旅游供给方与需求方，供给方生产旅游产品 1 与旅游产品 2 的成本均为 C，定价分别为 P1 与 P2，消费者对两种旅游产品的预期价格为 P3 与 P4。由于生产者掌握旅游产品的质量信息，其对产品 1 的定价 P1 大于自由竞争情况下的价格 P0，因此生产者获得的利润为 P1 – C，信息不对称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为 P1 – P0，而消费者剩余为 P3 – P1。数字技术对城市旅游价值重塑的影响机理在于，通过数字赋能，旅游消费者和旅游生产者可获得相同信息，从而消除信息溢价，旅游产品 1 的最终定价为 P0，生产者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为 P1 – P0 转化为消费者剩余的增量，从而进行了价值重塑。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对于包含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旅游市场整体而言，价值重塑将拥有信息溢价一方的超额利润转变成为另一方的福利，但这个过程更多是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并不能让城市旅游业创造新的价值。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发展更加积极的影响是价值创造的过程。如果旅游消费者期望价值 P3 低于旅游生产商获得超额利润的价格水平时（即 P0 < P3 < P1），生产商为获得价格溢价而选择的高价策略，就无法实现交易行为。数字赋能使在旅游领域的生产商与旅游者之间的信息透明化，当生产商在了解顾客的决策情况后会降价至自由竞争条件下的 P0，以促进更多潜在交易的进行。此时，生产者获得 P0 – C 的利润，消费者剩余提高到 P3 – P0。对于旅游产品 2，当旅游消费者预期价格小于旅游产品的生产成本时（即 P4 < C），即便在信息分布完全对称情形下交易行为亦无法进行。通过数字赋能，使得旅游市场中的生产者可以充分运用庞大的数据资源发现与满足旅游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升旅游产品生产效率使得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预期价格从 P4 提高至 P5（P5 > C），生产成本从 C 下降到 C1，实现城市旅游 P5 – C1 的价值创造。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1：数字赋能对城市旅游绩效起到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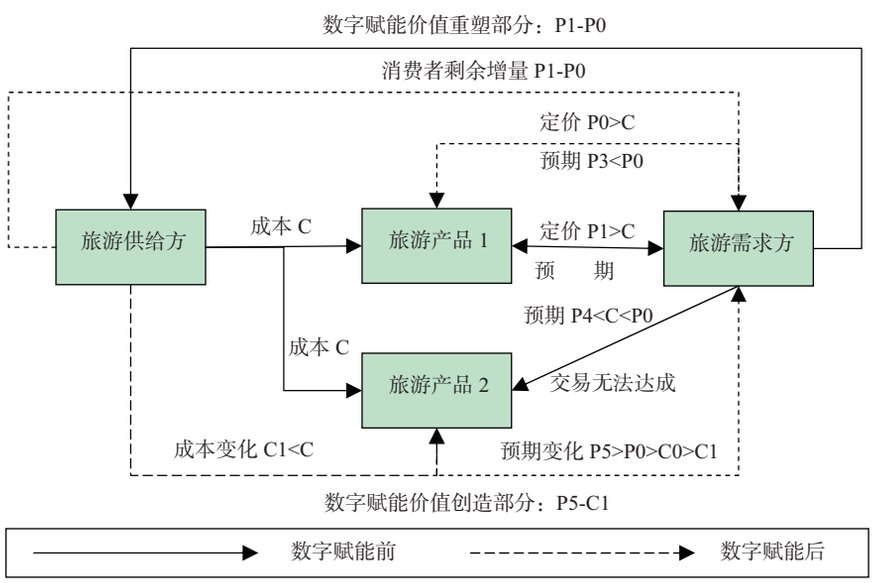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赋能旅游业发展的理论逻辑

（二）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的文化赋能机制

根据旅游动机理论，许多游客的目标除了欣赏自然景观外，还有文化学习与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首先，文化可以增加

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通过挖掘和利用地区的文化资源，旅游业可以开发出更具特色和个性化的旅游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提升城市经济收益。其次，文化能够提升旅游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同时促进当地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加深游客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最后，通过引入文化元素，可以提升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对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够促进二者互利共赢，[①] 数字技术有利于促进文旅融合，[②]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城市文化资源与该城市的旅游绩效关系密切，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抓手。[③]《“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也明确指出，“要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支持非遗有机融入景区，鼓励非遗特色景区发展”。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欠缺与现代社会沟通的途径，难以扩大传播范围、不同的传承人存在主观领悟上的偏差，容易造成传播信息遗漏，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等困境。数字赋能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口传身授”传承方式的局限性，激活了地区旅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虚拟现实技术、DV 影像、现代动画、信息空间、建立数字化数据库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和展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保护、有效传承、广泛传播、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有效保障。通过数字技术挖掘非遗资源潜在的经济价值，在旅游项目中融入非遗元素，吸引更多游客，创造新的价值。此外，城市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文化的多样性也能够借助数字赋能的方式进行宣传，提升该城市的旅游绩效。同时，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传承后代”，有助于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与旅游事业的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将其应用于旅游业中，能丰富游客的体验层次，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拓宽旅游产品类型，提高旅游地知名度，促进城市旅游绩效的持续增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2：数字化通过赋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文化赋能机制促进城市旅游绩效增长。

（三）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的景区赋能机制

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吸引物、消费的关键环节。高级别景区与旅游资源的品质息息相关，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推动旅游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提升旅游目的地品牌效应和竞争力、吸引更多游客起到重要作用，[④] 其中，5A 景区是游客的首选。实证研究表明，5A 级景区对城市旅游人数、收入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⑤] 能够显著推动城市的旅游发展。[⑥] 通过数字赋能景区尤其是高级别景区在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激发景区资源的活力，实现旅游绩效提升。在直接赋能方面，数字技术促进景区资源优化，形成优质的旅游供给，利用网络效应，打造旅游产业集群。[⑦] 在间接赋能方面，数字化程度高的景区更能吸引相关基础设施投资、获取区域政策支持、取得旅游平台及官方网址更高的推介力度。[⑧]

首先，数字化技术可以显著提升 5A 级景区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精细化管理手段，景区可以更精准地掌握市场变化和游客需求，制定科学、精准的经营策略和营销方案。同时，数字化技术有利于景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

① 张朝枝，朱敏敏：《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旅游学刊》2020 年第 3 期。

② 刘英基，邹秉坤，韩元军等：《数字经济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机理、渠道与经验证据》，《旅游学刊》2023 第 5 期。

③ 翟姗姗，查思羽，郭致怡：《面向文旅融合发展的非遗数字化技术体系构建与服务场景创新》，《情报科学》2023 年第 7 期。

④ 黄远水，陈钢华，伍弦：《福建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研究——基于国家 3A 级以上旅游景区的统计分析》，《经济地理》2010 年第 7 期。

⑤ 袁诚，侯哲灏，陈景祺：《中国 5A 级景区分布特征及其经济效应探讨》，《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 年第 4 期。

⑥ 龚勤林，邹冬寒，周沂，朱晟君：《高级别景区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22 年第 8 期。

⑦ 唐承财，孙孟瑶，万紫微：《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19 年第 10 期。

⑧ 史甜甜，曾丽，靳文敏，关燕琴：《5A 级旅游景区微信公众号对客服务功能及其建设水平研究》，《旅游学刊》2021 年第 10 期；刘瑞明，李林，亢延锟，赵勇：《景点评选、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2 期；张初兵，李义娜，吴波，李东进：《旅游 App 用户粘性与购买意向：互动性视角》，《旅游学刊》2017 年第 6 期。

提高整体效益。其次，数字化技术能为5A级景区带来全新的游客体验。借助虚拟现实等技术，游客可以享受到更加生动、逼真的旅游体验。此外，通过移动应用、自助服务等数字化手段连接景区和游客，游客可以更方便获取景区信息、预订门票、规划行程等，促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快速迭代升级，实现景区精细化管理，错峰旅游、分流旅游，极大地提升旅游的便捷性和舒适性。再者，数字化技术还有利于促进5A级景区与周边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景区可以与酒店、餐饮、交通等周边产业实现紧密合作，共同打造旅游产业链。一方面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为游客提供更加完整的旅游体验，从而提升城市旅游的吸引力。最后，数字化技术还有助于提升5A级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数字化营销手段，景区可以扩大知名度，通过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吸引更多游客。将景区的经营管理与服务高度智能化，提高景区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实现景区、资源、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和谐统一。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3：数字化通过赋能以5A级景区为代表的景区赋能机制促进城市旅游绩效增长。

（四）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的生态赋能机制

根据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旅游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领域，生态环境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应当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理念融入旅游发展，减少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①] 保证游客、旅游地居民、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均衡，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产生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旅游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数字赋能地区生态效率、生态品质提升并能通过生态旅游的形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高“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的效率。此外，数字赋能改变了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②] 降低传统旅游业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以及环境的污染，通过大数据手段对生态产品进行有效保护与价值评估，促进旅游新产品的开发，更加注重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以更高的生态效率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对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数字技术能够提升生态资源的监测与管理效率。通过物联网、卫星遥感等技术，对城市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实时、动态的监测，掌握生态资源的变化情况，确保旅游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其次，数字技术有助于优化旅游活动的生态足迹。通过大数据分析游客行为模式，可以更加精准地规划旅游线路、安排旅游活动，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同时，借助智能化的旅游服务系统，为游客提供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再者，数字技术能够促进生态旅游产品的创新与发展。结合当地的生态特色和文化底蕴，开发出具有独特魅力的生态旅游产品，如生态体验游、自然观察游等。此外，数字化技术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等网络平台，可以广泛传播生态旅游的理念和特色，吸引更多游客关注和参与。最后，数字技术还有助于推动生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促进生态旅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同时，为生态旅游产业的监管和评估提供有力支持，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提高城市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升游客体验，进一步推动城市旅游绩效的增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4：数字化通过赋能以生态效率为代表的生态赋能机制促进城市旅游绩效增长。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赋能对旅游业绩效的影响。为了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控制城市与时间层面变化的因素，建立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Tour_{i,t}=\alpha_0+\alpha_1 Dig_{i,t}+\alpha_2 X_{i,t}+\rho_i+\tau_t+\varepsilon_{i,t} \quad (1)$$

为了揭示本文假说所提出的文化赋能机制、景区赋能机制、生态赋能机制是否成立，在基

① 杨海龙，孙业红，崔莉：《“一带一路”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生态文明视角》，《旅游学刊》2023年第5期。

② 张于喆：《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发展思路与主要任务》，《经济纵横》2018年第9期。

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拓展基准回归，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机制变量与机制变量的交互项，通过交互项的显著性验证该机制的效果，模型设定如下：

$$Tour_{i,t}=\delta_0+\delta_1 Dig_{i,t}+\delta_2 M_{i,t}+\delta_3 Dig_{i,t}\times M_{i,t}+\delta_4 X_{i,t}+\rho_i+\tau_t+\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下脚标 i 与 t 分别表示城市与年份，被解释变量 $Tour_{i,t}$ 为旅游绩效，核心解释变量 $Dig_{i,t}$ 为数字赋能水平的综合指标，机制变量（$M_{i,t}$）分别为文化资源（$Cul_{i,t}$）、5A 级景区数量（$Sce_{i,t}$）、城市生态效率（$Eco_{i,t}$），控制变量 X 包含产业结构、资本投资、政府干预、空气质量、人力资本等因素，ρ_i 与 τ_t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城市旅游绩效（Tour）

现有研究中，多数学者采用旅游收入测度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却忽略旅游人次对于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准确测度城市旅游绩效水平，本文借鉴樊玲玲等[①]利用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数构建指数模型的方法来反映城市旅游绩效，具体指标计算方式如下：

$$Tour_{i,t}=\sum_{i=1}^{j}P_{it}S_{ijt}\quad (j=1,\cdots,4) \quad (3)$$

考虑城市 i 在 t 时期的旅游绩效 $Tour_{i,t}$ 要兼顾“质”与“量”，本文将权重 $P_{i,t}$ 赋值为 0.25，S_{ijt} 具体包括：国内旅游收入与按当年汇率换算为人民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人数以及国内旅游人数、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的对数。

2. 解释变量：数字赋能指数（Dig）

现有研究中对于数字赋能测度的相关文献较少，从赋能角度出发的城市层面测度则更为稀少。本文借鉴赵涛，张智，梁上坤研究思路，[②] 结合城市层面相关数据可获得性采用数字赋能指标，选择使用改进的熵值法，即在普通截面熵值法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变量，将其拓展为面板数据的熵值法测度数字赋能。则 x_{ijt} 为 t 年 i 市的第 j 个指标，并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鉴于本文使用的均为正向指标，因此将指标标准化为 $x'_{ijt}=x_{tij}/x_{\max}$ 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在指标处理完成的基础上，计算各指标下第 t 年 i 市的指标占比：

$$y_{\theta ij}=\frac{x'_{tij}}{\sum_t\sum_j x'_{ijt}} \quad (4)$$

进一步得出第 j 项的熵值，其中，$k=1/\ln(rn)$

$$e_j=-k\sum_t\sum_j y_{ijt}\ln(y_{ijt}) \quad (5)$$

求得 e_j 后，定义 j 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为 $g_j=1-e_j$，由此可以确定第 j 项指标的权重为 $w_j=g_j\sum_j g_j$，最后得到各市数字赋能指数为：

$$Dig_{it}=\sum_j w_j x'_{tij} \quad (6)$$

其中，数字赋能程度的变量包含每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体现出数字赋能特定城市旅游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

3. 机制变量

（1）文化资源（Cul）：本文选取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数据构造文化资源机制代理指标。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赓续，是区域旅游文化中最具独特魅力的资源。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项目名录，非物质遗产的数量代表各地市对非物质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进程，能够从时间维度上衡量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本文以手工逐项整理各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形成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考虑到我国悠久的历史底蕴形成了丰厚而迥异的地域文化，本文以方言分化指数度量城市文化多样性基础[③]，方言的形成是历史、文化、地理等诸多因素共同造就的，其语音语调、句法结构等在短期内几乎不会有任何变动，因此该指标能够衡量文化多样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ul_{i,t}=IntCul_{i,t}+DiaDiv_i=IntCul_{i,t}+(1-\sum_{i=1}^{n}Dia_{i,j}) \quad (7)$$

$IntCul_{i,t}$ 为城市 i 在 t 时期拥有的非物质文化

① 樊玲玲，谢朝武，吴贵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能否提升旅游业绩——170 个旅游城市的实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②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0 期。

③ 李红，韦永贵：《文化多样性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基于民族和方言视角的考察》，《经济学动态》2020 年第 7 期；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2015 年第 2 期。

遗产数量，$DiaDiv_i$ 为不随时间改变的变量，其经济含义为对城市内随机选取的任意两个个体讲不同方言的概率大小，$Dia_{i,j}$ 为城市 i 使用方言 j 的人口比重。

（2）5A 级景区（Sec）：高级别景区与旅游资源的品质息息相关，5A 级旅游景区代表了中国最高级别的精品旅游景观，5A 级景区设立时间及所在城市的数据整理来自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公开信息。

（3）生态效率（Eco）：生态与旅游的结合是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基于此本文运用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SBM）来测度产业生态效率，其中的投入与产出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生态效率评估价体系

指标	要素类别	指标构成
投入	资源投入	资本存量、从业人数、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全年供水总量、全年用电总量
	环境投入	工业烟尘排出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出量
产出	经济效益	地区生产总值

注：资本产存量的测算采用永续盘存法，采用相对效率集合递减模型 $K_t = I_t +（1-\delta）K_{t-1}$，$K_t$ 和 K_{t+1} 分别代表第 t 期和第 $t-1$ 期的资本存量，I_t 为资本投入额折旧率 δ 的取值为 9.6%。

4.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水平（Ind），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政府干预水平（Gov），用政府支出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表示。空气质量水平（PM2.5），用年均 PM2.5 指数表示。人力资本水平（Hum），用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的人数来衡量计算，为与其余变量的数量级相匹配，本文在计算中除以 100。资本投资水平（Cap），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对于未公布具体数值的部分本文以增速计算进行补足。

（三）数据说明及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0—2021 年 wind 数据库、EPS 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通信年鉴》、各地区城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最终形成 246 个地级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各变量统计性描述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	指标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城市旅游绩效（Tour）	2，773	9.98	1.94	1.15	18.64
解释变量	数字赋能指数（Dig）	2，773	0.07	0.08	0.00	0.77
机制变量	文化资源（Cul）	2，679	4.88	7.93	0.00	124.25
	景区资源（Sec）	2，773	0.47	0.86	0.00	8.00
	生态效率（Eco）	2，605	0.30	0.16	0.04	1.07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Ind）	2，773	0.40	0.10	0.04	0.84
	人力资本（Hum）	2，773	195.98	250.28	0.00	1395.82
	政府干预（Gov）	2，772	0.18	0.10	0.04	0.87
	资本投资（Cap）	2，773	0.73	0.33	0.09	4.73
	空气质量（PM2.5）	2，773	49.59	17.02	10.32	102.38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基础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第（1）列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赋能指数（Dig）对被解释变量城市旅游绩效（Tour）的影响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第（6）列总体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资本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在 1% 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的提高、资本投资的积累、人力资本的培育与政府管理能力的提高对城市旅游绩效具有正向作用，政府干预程度为

负，这是由于在不同区域政府干预所产生的异质性激励作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其差异。①

此外，本文采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检验数字化能否赋能旅游绩效增长。第（2）至第（6）列回归结果显示，即使在回归中逐步控制产业结构（Ind）、资本投资水平（Cap）、人力资本水平（Hum）、空气质量水平（Eco）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赋能对城市旅游绩效的影响依旧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数字赋能对城市旅游绩效的提高效果显著的，究其原因在于数字赋能旅游产业突破现行技术与制度体系的路径依赖，解决产品同质化、粗放式发展等弊端，促进旅游业态创新，从而验证了本文假说1。

表3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名	（1）	（2）	（3）	（4）	（5）	（6）
	Tour	Tour	Tour	Tour	Tour	Tour
Dig	1.94***	1.45***	1.24***	1.36***	1.17***	1.17***
	（0.37）	（0.39）	（0.39）	（0.39）	（0.40）	（0.40）
Ind		1.85***	1.14**	1.57***	1.15**	1.21**
		（0.44）	（0.46）	（0.49）	（0.50）	（0.56）
Cap			0.62***	0.71***	0.68***	0.68***
			（0.12）	（0.12）	（0.12）	（0.12）
Gov				−1.57**	−1.58**	−1.57**
				（0.68）	（0.68）	（0.68）
Hum					0.15***	0.15***
					（0.05）	（0.05）
PM2.5						0.00
						（0.00）
Constant	9.84***	9.13***	8.98***	9.01***	8.93***	8.85***
	（0.04）	（0.17）	（0.17）	（0.17）	（0.18）	（0.34）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773	2，773	2，773	2，772	2，772	2，772
R^2	0.14	0.12	0.48	0.51	0.51	0.52

注：***、**、*表示估计量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基础回归结果表明，数字赋能提高了城市旅游绩效。但为了排除混淆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干扰，确保研究结论可靠，本文分别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可能的极端值、改变样本范围、变换估计方法四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选取互联网普及率（Int）以及信息产业产出（Iop）作为代理指标进行估计。（2）样本缩尾。考虑到一些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及旅游业效率远高于其他地区，而一些地区则恰恰相反。将这些样本纳入其中，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本文分别对数字赋能指数和城市旅游绩效进行1%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不利影响。（3）改变样本范围。自2013年国务院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以来，先后有三批共计120个城市（群）作为试点城市，相关研究时常将“宽带中国”试点视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将样本聚焦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有助于验证本文基础回归的稳健性。（4）变换估计方法。采用分位数回归研究多个分位点上的回归关系，考察数字赋能对城市旅游绩效的影响趋势及变化情况，对于异常值与异方差问题均有着很强的稳健性。

① 张杰，郑姣姣：《中国南北发展分化：政府干预视角下的异质性创新激励效应》，《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7期。

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第（3）至第（7）列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赋能对于城市旅游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第（1）、（2）列检验结果不显著，侧面说明数字赋能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用互联网普及率以及互联网相关产出代替。具体结果中，第（1）列与第（2）列回归中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互联网普及率与信息产业产出后系数明显降低，一方面说明了基础回归的结果显著，另一方面说明了单一变量衡量数字赋能的方法不能较好的表达数字赋能的内涵，仍需要使用原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赋能指数（Dig）。第（3）列进行1%缩尾处理后与（4）列将样本聚焦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数字赋能对城市旅游绩效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可以佐证基础回归结论的稳健性。此外，考察第（5）至第（7）列对应分位上回归系数发现，一方面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基础回归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回归系数在数值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表明数字赋能对城市旅游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较强的异质性，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异质性分析。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	替换变量		缩　尾	宽带中国	分位数回归		
	（1）	（2）	（3）	（4）	（5）	（6）	（7）
	Tour	Tour	Tour	Tour	Tour（25%）	Tour（50%）	Tour（75%）
Int	0.31						
	（0.23）						
Iop		0.05					
		（0.05）					
Dig			2.15**	3.54***	2.87***	3.80***	1.21***
			（0.84）	（0.86）	（0.52）	（0.30）	（0.39）
Constant	8.76***	8.75***	8.75***	11.98***	8.60***	9.01***	8.89***
	（0.33）	（0.33）	（0.42）	（1.17）	（0.26）	（0.15）	（0.3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664	2，660	2，772	491	2，772	2，772	2，772
R^2	0.12	0.12	0.52	0.53	0.20	0.25	0.29

注：***、**、*表示估计量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

鉴于数字赋能的效果并非一蹴而就，其促进城市旅游绩效提升具有时滞效应。为解决潜在的动态面板偏差问题，验证基础回归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进行Arellano－Bond等一系列检验之后，确定城市旅游绩效的滞后阶数为一阶。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第（1）列与第（2）列是使用OLS和LSDV进行估计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纳入因变量滞后项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市旅游绩效滞后一期的系数与系统GMM回归中数字赋能系数均显著，数字赋能回归系数的数值0.97介于OLS对回归系数高估的0.99与LSDV对回归系数低估的0.96之间，说明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此外，AR（1）小于0.1表明随机误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AR（2）大于0.1说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的P值大于0.1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因此，即便考虑到滞后效应的影响，使用系统GMM的回归结果仍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动态面板与滞后效应回归

变量名	OLS	LSDV	SYS－GMM
	（1）	（2）	（3）
	Tour	Tour	Tour
$Tour_{t-1}$	0.63***	0.45***	0.37***
	（0.02）	（0.02）	（0.02）
Dig	0.99***	0.96**	0.97***
	（0.42）	（0.61）	0.42
Constant	4.84***	6.86***	7.87***
	（0.29）	（0.83）	（0. 3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双向固定效应	NO	YES	
Arellano－Bond AR（1）			0.00
Arellano－Bond AR（2）			0.83
Sargan 检验			0.45
N	2，773	2，773	2621
R^2	0.53	0.72	0.48

注：***、**、*表示估计量在 0.01、0.05、0.1 水平上显著。

（三）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的文化赋能机制检验的结果如表 6 所示。其中，从第（1）列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赋能指数与文化资源的交互项、数字赋能指数、文化资源对城市旅游绩效增长的影响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了数字赋能对文化资源的正向调节作用，能够促进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从而验证了本文假说 2。本文进一步对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文化资源机制的地区异质性展开分析，如表 6 中第（2）至第（4）列的异质性考察所示，中西部地区文化赋能机制显著。究其原因在于数字赋能显著激发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为代表的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通过数字赋能对文化资源的正向机制促进了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产生异质性原因在于：一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为文化赋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使得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二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在近年来的政策支持下，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和发展力度，进一步推动了文化赋能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三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使得文化赋能机制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和应用。最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文化创新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使得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文化赋能方面能够创造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景区赋能机制的检验的结果如表 7 所示。其中，从第（1）列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赋能指数与 5A 级景区的交互项、数字赋能指数、5A 级景区对城市旅游绩效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了数字赋能对 5A 级景区的正向调节作用，会促进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从而验证了本文假说 3。本文进一步对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景区赋能机制的地区异质性展开分析，如表 7 中第（2）至第（4）列的异质性考察所示，中西部地区景区赋能机制显著。究其原因在于数字赋能显著加强了以 5A 级景区为代表的景区资源优势，通过数字赋能景区资源的正向机制促进了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产生异质性原因在于：一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以及众多历史遗迹和民族特色，为景区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二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在近年来的政策支持下，对旅游和文化产业的投入不断加大，推动了景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融合，推动了景区赋能机制的深化和创新。三是由于东部地区旅游业发展较早，市场竞争较为激烈，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市场推广方面更加注重创新和差异化，通过独特的宣传方式和

营销策略，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游览。

表 6　文化赋能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1）	（2）	（3）	（4）
	Tour（全样本）	Tour（东部）	Tour（中部）	Tour（西部）
Dig	1.24***	−0.54	1.48***	3.31**
	（0.44）	（1.20）	（0.50）	（1.30）
Cul	0.02***	0.01	0.09***	0.17***
	（0.01）	（0.01）	（0.02）	（0.05）
Dig * Cul	0.04***	0.03**	0.41***	0.42***
	（0.01）	（0.01）	（0.11）	（0.12）
Constant	9.34***	12.47***	7.30***	9.78***
	（0.34）	（0.59）	（0.54）	（0.7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2，678	1，068	947	663
R^2	0.57	0.63	0.68	0.67

注：***、**、* 表示估计量在 0.01、0.05、0.1 水平上显著。

表 7　景区赋能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1）	（2）	（3）	（4）
	Tour（全样本）	Tour（东部）	Tour（中部）	Tour（西部）
Dig	1.20***	−0.89	1.85***	3.06***
	（0.40）	（0.94）	（0.49）	（0.92）
Sec	0.20***	−0.09	0.51***	0.81***
	（0.05）	（0.06）	（0.10）	（0.15）
Dig * Sec	0.57**	0.65***	2.45**	−0.28
	（0.19）	（0.19）	（0.73）	（0.96）
Constant	8.90***	12.46***	6.85***	9.07***
	（0.23）	（0.25）	（0.96）	（1.2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2，772	1，068	1，007	697
R^2	0.52	0.53	0.44	0.59

注：***、**、* 表示估计量在 0.01、0.05、0.1 水平上显著。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生态赋能机制的检验的结果如表 8 所示。其中，从第（1）列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赋能指数与生态效率的交互项、数字赋能指数、生态效率对城市旅游绩效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了数字赋能对生态效率的正向调节作用，会促进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从而验证了本文假说 4。本文进一步对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中生态效率机制的地区异质性展开分析，如表 8 中第（2）至第（4）列的异质性考察所示，东部和西部地区生态赋能机制显著。究其原因在于数字赋能显著提高了城市生态效率，在兼顾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生态产品的价值转换，通过数字赋能，对生态效率的正向机制促进了城市旅游绩效增长。地区异质性主要源于：一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技术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较高，这为生态赋能机制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和技术支持。而西部地区虽然整体经济水平相对

较低，但近年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注重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对生态保护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中部地区虽然也有一定的生态优势，但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可能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生态赋能机制的发挥。二是从政策支持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都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点支持和关注，推动了生态建设和生态赋能机制的发展。三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四是从市场机制和科技创新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在生态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产业化方面表现较为突出。东部地区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推动了生态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西部地区则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积极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特色产业，推动了生态赋能机制的深化。

表 8　生态赋能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1）	（2）	（3）	（4）
	Tour（全样本）	Tour（东部）	Tour（中部）	Tour（西部）
Dig	1. 58 **	2. 13 **	0. 36	7. 80 ***
	（0. 75）	（1. 00）	（1. 82）	（1. 90）
Eco	1. 48 ***	1. 77 **	0. 25	2. 75 ***
	（0. 33）	（0. 71）	（0. 41）	（0. 95）
Dig * Eco	1. 80 **	1. 84 **	4. 14	7. 57 **
	（0. 74）	（0. 73）	（2. 77）	（3. 03）
Constant	9. 46 ***	10. 18 ***	9. 12 ***	8. 90 ***
	（0. 09）	（0. 14）	（0. 16）	（0. 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2，605	993	960	652
R^2	0. 58	0. 52	0. 53	0. 65

注：***、**、* 表示估计量在 0. 01、0. 05、0. 1 水平上显著。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部和西部地区以文化赋能和景区赋能为主，生态赋能的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各地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的机制各有侧重。如表 9 所示，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总体效应的地区异质性呈现西部地区数字化指数系数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表明数字赋能促使中部及西部地区城市旅游绩效增长向东部地区收敛，对于构建我国旅游业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有着正向作用。

表 9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总体效应的地区异质性

变量名	（1）	（2）	（3）
	Tour（东部）	Tour（中部）	Tour（西部）
Dig	1. 15 ***	2. 14 **	4. 65 ***
	（0. 44）	（0. 86）	（0. 90）
Constant	10. 25 ***	9. 58 ***	9. 50 ***
	（0. 05）	（0. 06）	（0. 0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1，068	1，007	698
R^2	0. 46	0. 52	0. 63

注：***、**、* 表示估计量在 0. 01、0. 05、0. 1 水平上显著。

（四）内生性检验

本文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解决熵值法基于多个指标法综合测度而产生的误差、旅游业绩效增长引致的城市数字化需求的反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基于下述考量，选取1984年各城市的固定电话数量（Tel 84）与邮局数量（Pof 84）作为数字赋能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从相关性角度考察，固定电话与邮局的截面数据能够代表不同地区通信技术的历史水平与后期该地区数字化建设相关，满足相关性假设。另一方面，从外生角度考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所使用的信件、电报等通信方式对城市旅游绩效的作用逐渐式微，满足外生性假设。此外，由于这两种变量不随时间改变，本文将与各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进行交互，后者反映了全国层面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与城市互联网发展相关，但难以直接影响各城市的旅游业绩效。

表10显示了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的工具变量结果。在控制全部控制变量和双重固定效应的情况下，采用IV－2SLS方法，数字赋能对旅游绩效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以一阶段F统计量为13.20，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本文还尝试了以城市旅游绩效对数（LnTourP）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2SLS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赋能对旅游绩效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以一阶段F统计量为17.73，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

表10　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增长的工具变量结果

变量名	Tour			LnTourP		
	（1）	（2）	（3）	（4）	（5）	（6）
Dig	13.40***	3.90***	6.78***	14.00**	4.76***	8.63***
	（4.47）	（0.86）	（1.42）	（5.61）	（1.09）	（1.75）
Cul	0.04***			0.03***		
	（0.01）			（0.01）		
Dig＊Cul	0.14**			0.13＊		
	（0.06）			（0.07）		
Sec		0.53***			0.35***	
		（0.06）			（0.08）	
Dig＊Sec		0.70**			0.83***	
		（0.39）			（0.27）	
Eco			0.79***			0.57**
			（0.22）			（0.29）
Dig＊Eco			－2.79			－3.67
			（1.94）			（2.38）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228	2，307	2，165	2，228	2，307	2，165
R^2	0.76	0.70	0.27	0.96	0.80	0.53
第一阶段F值	13.20			17.73		

注：***、**、＊表示估计量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2010—2021年共计24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数字赋能对旅游业价值重塑与价值创造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城市旅游绩效的文化资源、景区资源、生态价值转化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赋能显著提升了城市旅游绩效，并且结果在剔除可能的极端值，变换估计方法下依旧显著；（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赋能通过激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加强以

5A级景区为代表的景区资源优势、提升以生态效率为代表的生态价值转换方式促进城市旅游绩效提升。（3）异质性分析发现，中部和西部地区以文化赋能和景区赋能为主，生态赋能的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突出。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旅游业数字化转型。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与高质量旅游大数据的互联共享，避免由数字技术扩散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导致的我国旅游业发展地区差异扩大，以旅游数据的高质量共享促进我国旅游区域间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

第二，开辟智慧旅游的新路径，加快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建立文化旅游数字化平台，提升旅游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实现文化旅游资源的共享和互通，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文化旅游服务。将优秀文化融入旅游景点和旅游线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与产业化利用。在旅游项目中融入非遗元素，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利用数字平台推广“非遗+特色村镇、街区”“非遗+文创产品”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旅游项目，构建数字营销平台，促进精准营销。

第三，推进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利用数字技术调动景区活力。发挥好高级别景区的品牌效应，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根据不同地区的景区特点和性质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发展核心旅游区域，带动周边旅游景点协同共进，吸引更多游客。建立完善的数据共享机制，推动景区与旅游部门、其他景区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和高效利用。通过开发移动应用或小程序，为游客提供便捷的在线服务，如在线购票、导览服务、酒店预订等。建立统一的服务、管理、营销等系统，打造景区高端个性化旅游服务，积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第四，构建智慧旅游生态系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旅游地的生态资源进行精准管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新设和验收工作，利用数字技术扩大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在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与价值评价机制上的优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展“绿色旅游”“康养旅游”“生态旅游”，始终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生态经济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第五，充分发挥东中西地区优势，东部和西部地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景区和文化优势。

■责任编辑/张 磊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Empowerment Promoting Urban Tourism Performance

LIU Fe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Digital empower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achie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With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value rebuilding and value cre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caused by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anel data of some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of cultural empowerment, scenic-area empowerment and ecological empowerment in connection with digital empowerment manifested in the urban tourism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Digital empower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urban tourism performance, and the results are still significant when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have been replaced, the possible extreme values have been eliminated, and the estimation methods have been changed. (2) The mechanism-test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empowerment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tourism performance by stimulating the economic value of cultural resources represented b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rengthening the resource-based advantages of scenic spots represented by 5A-level scenic spots, and improving the transformation mode of ecological value represented by ecological efficiency. (3) The study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re dominated by cultural and scenic empowerment, while the role of ecological empowerment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promote the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t attractions,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expand the supply of high-quality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urban tourism performance;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ecological efficiency; fus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论析

高静毅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摘　要：教育家精神蕴含中华文化特有的化育智慧，凝聚中国教育特有的价值内核，展现人民教师特有的精神品格，体现了优秀教师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提供了目标指向和多维标识。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主要包括使命形象、榜样形象、化育形象、治学形象、亲和形象、文化形象。要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教育体系以实现形象塑造关口前移，多维创设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空间以实现形象塑造方法升级，系统构建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以实现形象塑造场域拓展。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共同特质；思政课教师；多维形象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4）03－0135－10

“形象”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知、判断和评价的综合性反映。思政课教师形象影响着思政课教学的亲和力、感染力和有效性，关乎社会公众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印象，塑造好思政课教师形象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培养造就“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①] 2023 年，习近平号召广大教师“以人民教育家为榜样，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②]“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③]从教育家的高度和精神品格的层面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提供了指引。

一、深刻把握教育家精神的科学内涵

与社会、国家、政治的运行逻辑相适应是教育获得现实合法性的关键，故而教育在不同的文化、国家和制度背景下体现出不同的精神长相。凝聚教育理性的教育家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④]以中华优秀传统

收稿日期：2024－03－06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政课的公众形象塑造研究”（项目号：22JDSZKZ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静毅，法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https：//www. gov. cn/zhengce/2018－01/31/content_5262659. htm，访问时间：2024－04－15。

②　《习近平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强调 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1 日第 1 版。

③　习近平：《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人民日报》2023 年 9 月 10 日第 1 版。

④　王大广：《论教育家精神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高等教育》2023 年第 23 期。

文化为基础，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蕴含着独特的化育智慧、价值内核和精神品质。

（一）教育家精神蕴含中华文化特有的化育智慧

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发展而成，蕴含中华文化特有的整体化育观、内在超越观和知行合一观。其一，“启智润心”“心有大我”“以文化人”“胸怀天下”的精神元素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整体化育观。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①]的人际责任理念，“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②]的隐性教育力量，到“太极生阴阳”[③]“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朴素全息观念，中华文化重视身与心的统一、我与他的统一、人与物的统一、天与人的统一，强调教育者要引导个体正确处理这几对关系以实现自我生命的充养和推扩。其二，“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精神元素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内在超越观。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④]孟子主张：“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⑥]《礼记·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⑦]程颐、程颢主张：“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⑧]皆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实现逻辑和反求诸己的修身治学方法，引导受教育者自内而外地提升人生品质，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充分尊重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激发个体成长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三，“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精神元素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知行合一观。孔子有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⑨]荀子曾讲：“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⑩]王阳明主张：“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⑪]明代王廷相提出：“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⑫]清代王夫之主张：“盖尝论之，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行焉？而宜之谓也。何以谓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⑬]都强调了实践是为学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重实践是中国自古重视的治学品质，教育家精神中“勤学笃行，求实创新”的精神元素是中华民族知行合一化育智慧的现代表达。

（二）教育家精神凝聚中国教育特有的价值内核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确立了人民教育的社会机制，在解构几千年文化统治格局的同时将人民置于教育的主体地位。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⑭]自此，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就统摄着中国教

① 〔清〕《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十三》，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808页。
② 〔清〕《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二》，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3页。
③ 〔明〕来知德：《周易集注》，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页。
④ 〔清〕《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十》，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91页。
⑤ 〔清〕《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二》，第5981页。
⑥ 〔清〕潘平格：《潘子求仁录辑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3页。
⑦ 〔清〕《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六》，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31页。
⑧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十五》，〔清〕全祖望，辅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7页。
⑨ 〔清〕《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十》，第5470页。
⑩ 梁启雄著：《荀子简释·第八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4页。
⑪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0页。
⑫ 〔明〕王廷相：《王廷相集·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78页。
⑬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八》，沈芝盈，梁连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2页。
⑭ 本书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页。

育的体用架构，贯穿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从全国范围的识字运动，到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如大中小学教育及成人教育，全日制教育、业余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以及为盲、聋哑和弱智的儿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等，越来越健全的国民教育体系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人民教育为人民”的价值宣誓以看得见的形式在全国落地，使得中国教育不仅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寄托着亿万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纵观我国教育改革历程，课程改革范式从指令型发展为创生型，课程体系从单一必修拓展至多维立体，教学模式从说理式到议题式、探究式、体验式，课程考核从唯分数论发展为核心素养导向，人是教育的中心，且这个人不是个别的、部分的、具体的“你我他”，而是从中国亿万人民群众中抽象出来的人，是类存在意义上的人。正因如此，中国教育才有底气于应然之为和实然之举两个层面确证其“为人”的价值内核。马克思把人性复归和人的解放看成一回事，中国教育就是这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教育家精神中“心有大我”“至诚报国”“乐教爱生，甘于奉献”“胸怀天下”的精神元素正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及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教育领域的体现，“大我”“天下”折射出中国教育的价值根源，即类存在的人，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讲：“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而“诚”“乐”“爱”“甘”则体现出主体追求和实现教育价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

（三）教育家精神展现人民教师特有的精神品格

我国较早关于“人民教师”的提法见于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他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教育家和教师”② “人民”这一表述体现教师的无产阶级立场，内在地规定着我国教师“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格，为新中国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③ 为此，“我国广大教师要率先垂范，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弘扬者、推动者，做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引路人，努力成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④ 在新中国教育政策的引导、支持和帮助下，人民教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精神品格内化为教师职业的重要标准，其精神特质在全世界教师队伍中格外鲜明。《英国教师专业标准（2011）》从“教学”和“个人和职业行为”两个方面八个维度阐述教师的专业素养，仅在第二部分《个人和职业行为》第一条提到“教师要在校内外保持较高的道德标准”⑤。美国洲际新教师评估与支持联合会（INTASC）制定的新教师入职标准提出了十条核心标准，即学科知识、学生学习、学生的多样性、教学策略、学习环境、交流手段、教学计划、评价策略、教师的反思与专业发展、合作关系。⑥ 美国国家教师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NBPTS）所制定的优秀教师认证标准提出了五条核心建议，即教师应致力于学生的发展和学生的学习；教师应该知道所授学科领域的知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2页。

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2018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28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1页。

⑤ Education, Training Foundation: Teachers' standards guidance for school leaders, school staff and governing bodi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eachers-standards, 访问时间：2024-04-15。

⑥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Interstate Teacher 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 (InTASC) Model Core Teaching Standards: A Resource for State Dialogue, https://ccsso.org/resource-library/intasc-model-core-teaching-standards, 访问时间：2024-04-15.

以及该学科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负责学生学习的管理和检测；教师能够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系统思考，并从经验中学习；教师应该是学习共同体的成员。[①] 我国《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基本理念是师德为先、学生为本、能力为重、终身学习。[②] 对比发现，关于“师德为先”的教师基本理念和“专业理念与师德”的具体表述仅出现在中国教师标准中，且这里的“德”有着丰富内涵，包含私德、公德和大德，体现了中外教师核心品质的差异。中国教师的社会主义立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人生志趣、己立立人、志在于仁的担当精神集中体现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教育家精神元素。

二、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的内容呈现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形象。做好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和追求，我想，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有一些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③] 为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提供了重要启发。教育家精神凝聚着“小我”和“大我”价值实现的双向生成，“经师”和“人师”现实践履的同向发力和“逐梦”和“筑梦”目标确立的同频共进，[④] 内含着优秀教师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提供了目标指向和多维标识。

（一）以“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塑造思政课教师的使命形象

使命形象是思政课教师使命具化而成的形象因素的综合。思政课教师的使命形象源于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是外部要求，即他者（主要包含党和国家、社会公众等主体）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培养，对思政课教师应尽责任和领受任务的整体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师“肩负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和责任”[⑤]“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⑥]。“如果说今天的学生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这是今天中国教师所要扛起的历史担当。”[⑦] 201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培育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⑧]。党和国家对思政课教师使命的具体化、形象化概括既有基于以往观察的实践总结，也包含基于社会需要的理性期待，体现了思政课教师使命形象的应然状态。二是自我体认，即思政课教师使命感的形成和外化。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本体实在，其形象塑造具有特殊性，他者的描述只是以大写意的手法勾勒出思政课教师使命的大致轮廓，完整使命形象的树立有赖于思政课教师在确证自我身份和体

① National Board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What Teachers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http：//www. nbpts. org/the_ standards/the_ five_ core_ propositio，访问时间：2024－04－15。

② 《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通知》，http：//www. moe. gov. cn/srcsite/A10/s6991/201209/t20120913_ 145603. html，访问时间：2024－04－15。

③ 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④ 冯刚，曹鹤鸣：《教育家精神的时代解读》，《思想战线》2024年第1期。

⑤ 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10日第1版。

⑥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2018年9月11日第1版。

⑦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8页。

⑧ 本书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32页。

认自我意义的过程中产生强大的使命感，催生积极的自我塑造行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教育家精神提升了思政课教师自我体认的层次和境界，“大我”将思政课教师的身份推扩至社会领域，规定思政课教师的使命，明确其使命形象的逻辑起点。“报国”凝练了思政课教师劳动的政治意义，践行着思政课教师的使命，指向其使命形象的逻辑终点。从身份确证到意义完成，思政课教师多维的、动态的使命形象逐渐展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向度规定其资政使命，培养人、塑造人的目标向度规定其育人使命，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目标向度规定其弘道使命，多维形象融合形成思政课教师“至诚报国”的使命形象。“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蕴含思政课教师的内生动力和价值追求，引导着思政课教师由内而外地塑造自身良好形象，自觉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塑造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公众形象的重要一维。

（二）以“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塑造思政课教师的榜样形象

榜样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思政课教师展现的值得效仿的形象要素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包括言行举止、道德情操、专业学识、精神品质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①] 出自南朝宋刘义庆著的《世说新语》，意为言行足以为士人的法则、举世的示范，“法则”规定思政课教师榜样形象的现实质量，“举世”指向思政课教师榜样形象的辐射范围和评价主体。思政课教师的榜样形象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附着性。抽象的、一般意义的榜样实体是不存在的，思政课教师的榜样形象往往与其他形象相伴而生，以“附着”的形式完成自身的实在化、具体化，呈现出较强的附着性。榜样形象的附着性提醒我们要切实推进教育家精神融入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培养、发展、评价全过程，不仅要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和管理体系，促使思政课教师学习、研究、践行教育家精神常态化、长效化，也要将教育家精神的科学内涵、精神特质、实践养成置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硕博人才培养方案以支撑教育家精神的全过程融入，引导学生将“教育家型教师”尤其是“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作为成长目标，以教育家精神的行动化打造思政课教师扎实的榜样形象。二是多样性。一名优秀的思政课教师可以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担当榜样、“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化育榜样、“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治学榜样，也可以是“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亲和榜样、“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文化榜样，还可以是多方面乃至全方面的榜样。榜样形象的多样性要求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空间的多维性、立体化。要优化思政课教师管理机制，在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中帮助思政课教师从“教书匠”形象升级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形象上来。要推进智慧思政建设，打造“移动的思政课堂”“思政云课堂”“思政微课”“互联网 + 课堂”“虚拟实验室”等思政课堂新样态，加强思政课教师信息素养培育，重构思政课教师职业能力体系。三是超越性。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道德牵引着人类灵魂的走向。[②]“师言”“师行”“师形”“师功”成为公认的教育力量，社会公众对思政课教师的道德情操报以更高期待，思政课教师的榜样形象必须超越职业、时间、场域、受众的规定，从一种职业形象发展为日常形象，才能得以迁移、留存、巩固和加深。除了作为知识分子、教师、学者在国家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承活动中垂范立则之外，思政课教师也要作为中国公民、长辈、朋友在更宽阔的场域彰显更具广泛性的模范价值，否则，当受教育者走出校园、远离文化教育战线，他们心目中的思政课教师形象便会逐渐模糊直至淡忘。如果思政课教师的优秀特质仅在其专业领域体现出来，社会公众也

① 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 页。

② 檀传宝：《走向新师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61 页。

会失去审视耐心和认同理性，认为思政课教师的精神品质无法向其他社会活动迁移。因此，思政课教师“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把立德、立言、立行统一起来，把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统一起来，把自律、他律、律他统一起来”①，自觉成为道德修养原本就很好的人，而不是因为这一身份才表现得有道德，要自觉成为道德立法者，而非仅仅做一名道德守法者。

（三）以“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塑造思政课教师的化育形象

“化育”源自《中庸》“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②，意为“生长变化”，在教育领域引申为“教化和育人”。思政课教师的化育形象是社会公众对其教书育人态度、能力、效果等的综合评价。“启智润心，因材施教”高度凝练了思政课教师的育人智慧，“启智”指向认知体系的完善，重在以理服人，“润心”指向精神家园的构筑，重在以情感人，“启智润心”离不开文化的承载与滋养，需要以文化人，而“因材施教”则从化育对象的视角规定“启智润心”的方法手段等。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思政课教师要“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③，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化育形象的多维塑造提供了重要启发。首先，以理服人形象。“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④ 思政课教师要将讲深、讲透、讲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宏微并进地引导学生学习真理、信仰真理、践行真理、传播真理、追求真理，在此过程中努力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其次，以情感人形象。思政课教师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理性平和的心态感染学生，避免成为照本宣科的“传话筒”和缺乏新意的“复读机”，努力为学生以及社会公众提供情绪价值。要有强烈的家国归属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结合学生需求和特征及时调整教学活动，推进教学话语的年轻化、教学氛围的轻松化，为教学注入情感力量。要探索开发和利用虚拟实验室，以AR、VR技术辅助充实思政课的情境体验。最后，以文化人形象。“教育是一种文化或者精神的事业。教师没有与此性质相匹配的追求、气质与修养就不合乎专业的需要，也无法获得专业生活的意义。”⑤ 思政课教师应扎实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涉猎和储备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在文化素养提升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养成一定的文化格局、文化底蕴、文化气质，这种文化格局并不冲抵其专业性、文化底蕴并不消解其时代性、文化气质并不减弱其权威性，而是作为一种宏大的学术胸怀、宽厚的知识储备、和合的求索精神承托立德树人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培育增添文化内涵、强化文化关照。⑥ 总之，思政课教师要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文化人结合起来，在有高度、有温度、有深度的教育活动中成人、成己。化育形象受其他多维度形象的密切影响，使命形象影响思政课教师的化育境界，榜样形象关乎思政课教师的化育力量，治学形象决定思政课教师的化育基础，亲和形象凝聚思政课教师的化育艺术，文化形象彰显思政课教师的化育格局，思政课教师良好化育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其他多维形象的巩固。

① 石云霞：《树立高度自觉意识 努力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8期。

② 〔清〕《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六》，阮元校刻，第3543页。

③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④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版。

⑤ 檀传宝：《走向新师德》，第15页。

⑥ 冯刚，刘晓玲：《坚持以文化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期。

（四）以“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塑造思政课教师的治学形象

治学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思政课教师做学问的动机、态度、内容、方法、手段、目标、成果等的整体印象。“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指向思政课教师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治学目标，为塑造思政课教师的治学形象提供了重要标识。首先，“勤”与“笃”规定思政课教师的治学态度。思政课教师要铭记习近平总书记“思维要新”的叮嘱，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深入挖掘经典文献的时代价值，及时跟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路线方针政策，与时俱进地武装自己的头脑。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日常生活中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以勤奋、刻苦、严谨、切实的学习态度锻造扎实学识。其次，“学”与“行”规定思政课教师的治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渊博的学识、深厚的理论功底是思政课教师的立教之本，是否真正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真理魅力关乎思政课教师的专业性；是否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融入教学教研等日常活动，是否切实到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关乎思政课教师的真实性。最后，“求是创新”规定思政课教师的治学目标。思政课教师要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等，推进理论创新和育人实效新高，做一名有思想的行动者和有行动的思考者，这关于思政课教师的思想性。治学形象与思政课教师其他多维形象彼此促成、密切相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为思政课教师提供了躬耕治学的内生动力，“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为思政课教师提供了治学修身的目标方向，而良好治学形象的塑造也为其他多维形象的塑造筑牢基础。

（五）以“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塑造思政课教师的亲和形象

亲和形象是思政课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展现的亲近、和合气质的总和。思政课教师的亲和形象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形式特征，如温文尔雅的态度、和蔼可亲的性格、大方得体的表达等，可以被不同主体感知，如学生、同行、家长、社会公众等，其根本决定因素是内在的仁爱之心。首先，仁爱之心激发思政课教师的精神超越性。“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仁者之爱应突破父母亲情的局限性，以温和的关怀之情在最大范围内爱人，这种精神超越性蕴含于中华文化基因，生成中国教师独有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曾讲：“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才有责任。”[①]“要把对国家的爱、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心中始终装着学生。”[②]这是教师仁爱品格的时代表达，仁者爱人的精神品格在教育领域集中体现为对教育、对学生的纯粹的爱，纯粹的爱激发精神上的超越性，赋予思政课教师更高的境界和更广的视野。其次，精神上的超越提供思政课教师甘于奉献的动力。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是对教师之爱的深刻诠释。[③] 教师的仁爱之心既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也是爱学生、爱教育、爱真理，这份高级而深厚的情感在其专业实践中具化为至诚报国的信念、以身作则的自律、遍植桃李的奉献、躬耕教坛的无悔、弘道养正的无私，为思政课教师亲和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情感之源。最后，甘于奉献的品质促成思政课教师亲近和合的人际印象。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人与人之间只有信任才会有

①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②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第 14 页。

③ 缪劲翔：《“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的丰富内涵和培育路径》，《中国高等教育》2023 年第 21 期。

交流，只有交流才会有沟通，只有沟通才会有影响，只有影响才会有传承。[①] 甘于奉献的思政课教师往往表现出稳定的善良与无私，学生在被尊重和被关爱的过程中更容易与教师产生积极互动。学生“亲师”“信师”的过程也是思政课教师亲和形象塑造和树立的过程。亲和形象影响着思政课教师公众形象的最终展现和功能实现，如果思政课教师让学生和社会公众产生“距离感”，其教学亲和力和感染力便无从谈起，思政课教师的使命形象、榜样形象等多维形象也会失去展现空间。

（六）以“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塑造思政课教师的文化形象

文化形象是思政课教师以文化人的主体形态，包括思政课教师的文化追求、文化格局、文化底蕴、文化气质等。“胸怀天下，以文化人”是中国共产党世界格局和人类使命在教育文化战线的集中体现，“胸怀天下”要求思政课教师具有国际视野，“以文化人”要求思政课教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感化世人，“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推扩了思政课教师的弘道范围，提升了思政课教师的弘道境界，将思政课教师形象置于更为广袤的时空之境。首先，思政课教师要创造性地参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人。“胸怀天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的宇宙观、天下观以及对大同社会的追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情怀早已融入中国人的基因，给思政课教师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生命力。思政课教师要在理论研究、思想交流、文化传播、人才培育中体现天下情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育受众。其次，思政课教师要自觉匹配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格局，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鼓舞人。从毛泽东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的“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历来将中国与外部世界、中国命运与人类命运联系起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思政课教师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感召力。思政课教师要面向国内外受众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以革命文化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最后，思政课教师要积极养成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感染人。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目标，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和人类进步一边。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秉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借鉴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和文明进步，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思政课教师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感染力。思政课教师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中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感染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建设的现代化，也是精神文化建设的现代化，思政课教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重要主体，要自觉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舞台打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

综而论之，教育家精神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个方面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使命形象、榜样形象、化育形象、治学形象、亲和形象、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关键标识和重要遵循，六个维度彼此依存、相互转化，共同构成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的公众形象。

① 冯刚：《思政教育需要有担当、有思考的新时代青年加入》，《中国青年报》2023年7月18日第9版。

三、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思政课教师形象的实践路径

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思政课教师新形象是一项实践课题，要切实推进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培养、发展、评价全过程，以实现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的关口前移、方法升级和场域拓展。

（一）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教育体系以实现形象塑造关口前移

教育家精神的生成是行为的精神化，作为精神象征的教育家精神可为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提供目标指向、现实标识和精神动力，而教育家精神的贯彻是精神的行动化，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思政课教师形象绝不意味着思政课教师的形象塑造只是多了一种精神指引和精神驱动，而是要将教育家精神嵌入思政课教师教育体系中，切实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育家型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型”思政课教师的培育。思政课教师的形象塑造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如果不能将教育家精神从抽象的精神高地转移到具体的教育实践，那“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思政课教师形象”便难以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产生切实的、普遍的、持久的影响。切实推进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教育体系，一方面，要推进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硕、博人才培养。职前教育是思政课教师教育的重要阶段，对思政课教师教育信念的形成和职业基础的打造具有深远影响，要将教育家精神的科学内涵、精神特质、实践养成置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硕、博人才培养，完善和优化培养方案以支撑教育家精神的全过程融入，引导学生将“教育家型教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型”思政课教师作为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要推进教育家精神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育和管理。以思政课教师岗前培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师风师德警示教育、组织生活会等日常教师教育活动为依托，围绕教育家精神设置科研项目，促使思政课教师学习、研究、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二）多维架构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空间以实现形象塑造方法升级

教育家精神标识思政课教师的多维形象，为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多维空间的架构和立体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启发。职业身份下的形象塑造对职场有着天然的依附，思政课教师职业发展的困境和形象塑造的难点是相通的，为有效突破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的困境，需要多维架构思政课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实现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方法从线性铺陈到立体塑造的升级。比如，针对由于科研选题的学科错位、学术成果难以转化为教学成果等原因，部分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与科研的协同上承受很大压力，不仅不利于科研和教学的双向推进，而且容易给学生和同行留下“专业不对口”印象的问题，要优化思政课教师管理机制，确保科研与教学互哺，在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中帮助思政课教师从“教书匠”形象升级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形象和“教育家型教师”形象上来。再者，面对真实的教学场地塑造了“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的经典教师形象，而当今“移动的思政课堂”“思政云课堂”“思政微课”“互联网＋课堂”“虚拟实验室”等新课堂样态的普及，倒逼思政课教师重构职业能力体系的现象，要加强思政课教师信息素养培育，包括信息检索和获取能力、视频剪辑和制作能力、在线课程录制和使用能力等，在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中帮助思政课教师从“照书念稿”形象升级到“全能教师”形象上来。

（三）在完善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实现场域拓展

教育家精神强调思政课教师的内在超越，指示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的特殊性，排斥带有表演性或囿于局部的形象塑造。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思政课教师新形象要充分发挥评价的监督和导向作用，增强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评价指标的全面性，特别是要建立健全思政课教师私

德私风教育监管机制，助推思政课教师的形象塑造从公共领域适当拓展到私人领域，在课上课下、人前人后、言行一致的榜样示范中帮助思政课教师塑造“全栖道德模范”形象。事实上，关于师德的“公”“私”之争一直存在，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师言”“师行”“师形”“师功”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力量，思政课教师的私人空间在一定意义上也会成为教育场域，正因如此，社会公众对思政课教师的道德情操等往往报以更高期待，这就对思政课教师形象塑造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要树立形象塑造的战略意识与主动意识，把握认知主体的期待，兼顾不同情境之下形象塑造的目标任务，才能找到兼具针对性与可行性的形象塑造路径。[①] 虽然从理论上讲作为公德的师德是思政课教师道德的基底线，作为私德的师德是思政课教师道德的高标准，但着眼立德树人的职业使命和言传身教的育人规律，思政课教师要对自身道德情操高标准严要求，从思想认识上弱化道德的公私之界，把师德师风当作对教师的道德和作风的总要求，严守私德以展现师德。尤其在信息时代，教师在学生面前是一个“单向度的透明人”，学生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关注思政课教师的社交动态，那些曾经作为私人空间的微信、微博、小红书、哔哩哔哩、抖音、快手等个人社交平台被赋予很强的公共意义和教育期待，从客观环境上也要求思政课教师时刻保持为人师表的榜样形象，自觉以师德师风引领私德私风，防止因私德不修而导致群体形象的坍塌。

■责任编辑/张瑞臣

On 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GAO Jing-yi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embodies the unique cultural wisdom of Chinese culture, consolidates the unique value core of Chinese education, showcases the unique spiritual character of the teachers for the people, reflects the common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xcellent teachers, and provides a target orient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identification for the image shaping of the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era. The images of the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era mainly include the image for a mission, the image of a model, the image as an educator and a trainer, the academic image, the friend-like image, and the cultural imag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achieve a forward shift in their image shaping, create multi-dimens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spaces for them to upgrade the image-shaping methods,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m to expand the field of their image shaping.

Keywords: spirit of educators; common traits;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multidimensional image

① 冯刚，杨小青，张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公众形象塑造的理论探赜》，《中国远程教育》2023年第6期。